

史记 ——上下五千年

第二卷

夏于全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饶 群

史记——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80 印张 1500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 3020 套

ISBN7-5385-0404-4/K·103

定价(全 4 卷) 39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言

自盘古开天以来，这块古老而又富有无限生机的土地上活跃着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善良、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优秀中华儿女，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不断地谱写着中华民族悠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史。中华民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 5000 多年。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是举世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则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被割断历史延续性的国家。从秦汉开始至 19 世纪前，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领先世界潮流。这一切都使中华文明倍受世人瞩目，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壮丽的景观。

了解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可以使我们油然而生民族自豪感、增强追赶和创造世界潮流的信心和决心，而且可以从学习、领会、研究我们的历史中吸取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此，我们谨郑重推出《史记——上下五千年》一书。

《史记——上下五千年》展示历史，以再现历史本来面目为己任，它按上古、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中华民国的历史顺序组织和编排内容，以大手笔、精制作、大投入为编撰基调，以全方位眼光扫描自盘古开天以来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漫漫历程。全书用条目形式详述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史实，气势恢宏，体系严密，经纬交织，不仅对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之背景作详细的铺陈，而且在客观描述历史事件及史实的同时，高度重视事件和史实本身所蕴含的重要历史经验和教训，并钩沉索隐将其发掘揭示出来，以满足广大读者“读史使人明智”的期望。《史记——上下五千年》展示历史，但并不等同于历史，它避免了一般通史中的那种学究气和文字上的枯燥乏味，而在保证通俗易懂的前提下，将叙述语言和文学语言有机结合，使文风更为活泼，能更有效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的编撰宗旨是要把读历史从文人学者所崇尚的雅好推广为广大普通读者的闲暇翻阅嗜好，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能真正成为广大炎黄子孙处世做人、事业进取的最宝贵精神财富。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权威专家学者执笔编写，编校质量精良。温故知新，鉴往知来。我们相信，此书的付梓对于广大收藏者和阅读者来说不啻是一个福音。

编者

2003 年 6 月

第二卷目录

隋 朝 (1)

 隋王朝的建立 (1)

 开皇之治 (1)

 弑父篡位 (2)

 营建东都 (3)

 开凿大运河 (3)

 出巡与扬威 (4)

 王薄起义 (5)

 瓦岗寨起义 (6)

 瓦岗寨起义失败 (8)

 隋的灭亡 (10)

唐 朝 (10)

 唐朝开国 (10)

 唐代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12)

 唐代科举制度 (13)

 玄武门之变 (15)

 贞观之治 (16)

 武后临朝称制 (19)

 中宗复位 (24)

 睿宗即位 (25)

 宋王让储 (26)

 开元盛世 (26)

 “救时宰相”与“伴食宰相” (27)

 奸相专权 (28)

 贵妃专宠 (29)

 尾大不掉 (31)

 安史之乱 (32)

 安庆绪弑父 (32)

 血战睢阳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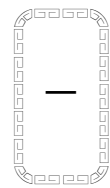
 收复两京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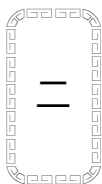
 胶战邺城 (35)

 河阳之战 (36)

 史朝义自杀 (38)

 藩镇割据 (39)





永贞革新	(40)
元和中兴	(42)
甘露之变	(44)
牛李党争	(45)
天补平均大将军	(46)
黄巢挺进江南	(48)
大举北伐克长安	(49)
大齐金统皇帝	(51)
狼虎谷的悲剧	(53)
五代十国	(53)
朱温建梁	(53)
李存勖马上得天下	(56)
大梁之战	(57)
后唐灭亡	(58)
后晋兴亡	(59)
后汉兴亡	(60)
吴国兴衰	(61)
前蜀兴衰	(63)
后蜀始末	(64)
长江中游的荆南和楚	(66)
南方沿海的闽和南汉	(67)
闽、楚灭亡和留、周二氏的兴起	(69)
郭威和柴荣改革	(71)
北 宋	(73)
陈桥兵变	(73)
李筠李重进反宋	(74)
太宗继位	(75)
王小波、李顺起义	(76)
宋辽歧沟关之战	(77)
澶渊之盟	(79)
宋夏延州之战	(80)
宋夏好水川之役	(81)
庆历新政	(83)
王安石变法	(85)
方腊、宋江起义	(87)
阿骨打称帝灭辽	(89)
汴京保卫战	(90)
靖康之变	(92)
南 宋	(94)

仙人关之战	(94)
藕塘之战	(95)
顺昌之战	(96)
郾城之战	(97)
隆兴和议	(99)
钟相、杨么起义	(99)
庆元党禁	(101)
金朝的衰亡	(102)
蒙古国的建立	(104)
成吉思汗	(105)
成吉思汗的征伐战争	(106)
窝阔台侵宋	(108)
拔都西征	(109)
忽必烈进攻南宋和统一吐蕃大理	(111)
忽必烈夺取汗位	(113)
南宋灭亡	(114)
元 朝	(116)
耶律楚材	(116)
海都之乱	(117)
民族分化	(118)
阿合马、桑哥事件	(119)
南坡之变	(121)
白莲教的活动	(122)
挑动黄河天下反	(123)
“小明王”亳州称帝	(124)
宋政权三路北伐	(125)
北方红巾军的失败	(128)
朱元璋势力的崛起	(129)
南方割据势力的消灭	(131)
朱元璋北伐与元朝的灭亡	(133)
明 朝	(134)
肃清残余割据势力	(134)
惠帝更改旧法与削藩	(135)
朱棣靖难与迁都北京	(136)
郑和下西洋	(138)
仁宣之治	(139)
土木堡之变 北京保卫战	(141)
夺门之变	(142)
弘治中兴	(144)

刘瑾专权 (145)

世宗崇道 (146)

张居正的改革 (148)

争立国本 (150)

妖书之案 (151)

挺击太子案 (153)

红丸案 (155)

移宫案 (156)

阉党专政 (159)

东南倭乱 (162)

戚继光平定倭寇 (164)

援朝战争 (167)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177)

反税监、矿监的斗争 (180)

东林党和复社 (182)

隋朝

隋王朝的建立

隋文帝杨坚,原是北周的勋戚重臣,被封为隋国公。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北周宣帝的皇后,性情柔婉,举止端雅,颇得宫妃的敬重。妻子独孤氏出身于鲜卑贵族。杨氏和独孤氏这两大家族都是北周王朝的顶梁柱。这种联姻,当然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宣帝的父亲周武帝历史上以灭佛而闻名,是位英俊的君主。儿子宣帝却是个庸碌的昏君。宣帝22岁做皇帝,还不到一年,就传位给8岁的儿子周静帝,自己当起太上皇,自称天元皇帝。这个昏君喜怒无常,看不中那位淑娴端庄的皇后,经常无故地责骂她,杨后却从容不迫,辞理不屈。一天,昏君暴怒,强令杨后自杀,并扬言要族灭杨氏全家。

后母独孤氏闻讯,仓皇进宫磕头求情,直磕得头破血流。

后父杨坚也奉召入宫。坦然而入,神色自若,打乱了昏君事先要谋杀他的计划。

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暂时避免了。

这场冲突的内在原因,要比帝后不睦的表面现象深刻得多。这是因为隋国公的潜在势力日增,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宣帝虽然昏庸,也已朦胧地感觉到了。同时,隋国公也在收揽人心,私下放风说:“天元昏愤,又自剪羽翼,容颜憔悴,寿命不会很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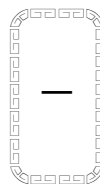
果如杨坚所料,大约未出1月,宣帝就颓然死去。朝廷重臣刘昉、郑译等,有些原本就是杨坚的心腹,乘机假传遗旨,召杨坚入朝辅政。杨后得知此事,大为惊愕,转念又想,皇帝幼小,家父辅政,总比大权旁落为好。

杨坚辅政不到两年,就剪除了异己势力,将政权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由隋国公晋封隋王,由隋王而受禅称帝。公元581年2月,建国号隋,改元开皇。至开皇九年(589)隋南下建康灭掉陈王朝,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

开皇之治

隋文帝开国,一改先朝弊政,励精图治,然后北逐强胡,南灭残陈,结束了近400年的大分裂局面,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隋帝国。

隋文帝治国有方。他首先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机构,又简化了地方行政层次,改革选吏制度,废除了300多年以来为世家豪族所把持的九品中正制,设科举士(此为科举制的创始),使中、小地主也有参政的机会,扩大了统治基础;经济上,采取轻徭薄赋,



鼓励农桑的政策,遂使生产蒸蒸日上,国势日渐强盛。

隋文帝初始亦倡导节俭,平日顿饭不过一肉,宫廷用物,残坏了的经过修补再用。皇后不尚丽服艳饰。宫人的衣服也是穿了再穿,少有新制。达官贵人也以节俭朴素为荣,便服多用布帛,不以金玉为饰。这样,久而久之,形成了隋初崇尚节俭的社会风气。

隋文帝对官吏贪污,总是严惩不贷,甚或失之苛酷。

隋文帝如此治国,20多年后,国家安定,经济繁荣,百姓乐业,一片兴旺景象。开皇十二年(592年),财政官员呈报说:“府藏皆满,粮食布帛无处容纳,已堆积在走廊和房下了。”文帝诏令再造新库。后来,又奏呈说:“新库落成,亦堆积无余。”文帝只好下令说:“告知郡县,寓富于民,不藏于府,免除今岁租赋,赏赐百姓。”早在平陈之后,就宣布免除江南10年租赋。这样富庶的景况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700年前,曾一度见于西汉初的文景之治,今再见于开皇之时。

这时,朝廷府库中储积了多少财物,史无确数。曾有这样的记载,粮食布帛足够朝廷支用五六十年。即至后来隋末洛阳被围困,城内布帛山积,以致用布帛作柴烧,用绢代绳汲水。唐朝代隋之后,堆积的布帛还用了20多年。

伴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户口也迅猛猛增。隋初北朝半壁河山有约360万户,南朝有户约50余万,合计不过400多万。20几年后,全国已有890余万户,4600余万人。户数比南北朝时约增加一倍,比西晋时约增长两倍,接近了东汉时的户口水准,即1000万户,5000万人。当然,这些是相当粗略的统计数字,但从中也可窥见东汉以后人口的起伏变化,以及隋文帝时期人丁兴旺的景象。

隋盛时,中国的版图东起大海,西到新疆,南抵云广,北至大漠,东西4600余公里,南北7400余公里。

隋文帝,作为封建帝王,当然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以及种种弊政,但他顺应历史的发展,统一了中国,又使国家迅速地富强起来,达到上述如此繁荣的程度,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弑父篡位

隋文帝晚年“雅好符瑞,暗于大道”,生活上追求享乐,日趋奢侈。593年(开皇十三年),他令杨素在岐州(陕西凤翔县)督造仁寿宫,开山填谷,工程紧迫,民工劳累死者上万人。两年后,宫殿建成,文帝和皇后独孤氏看到仁寿宫豪华壮丽,大加赞赏,褒奖杨素忠心,赏钱百万,赐锦绢三千段。598年(开皇十八年),文帝又从长安到仁寿宫建行宫12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察细行,不察大体,为人忌才。在他晚年,为政昏愤,不少功臣如刘昉、郑译、梁士彦、宇文忻等先后被杀或贬黜,“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所信者只有杨素,任其上下欺诈,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尖锐,“正道因兹弛紊”,为杨广的夺嫡篡位提供了方便。

杨广是文帝的次子,其兄杨勇为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杨广13岁封为晋王,20岁被任命为指挥统一战争的隋军主帅,功高权大,拥有军事实力,早有夺取

杨勇太子位置的企图。他和大臣杨素、宇文述等勾结,收买宫人和大臣为其在内廷虚美,“矫饰仁孝”,骗得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信任。皇后独孤氏不喜欢杨勇,东宫近臣也说杨勇的坏话。600年(开皇二十年),文帝正式下诏废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

604年(仁寿四年),63岁的隋文帝卧病仁寿宫,杨广和杨素合谋,指使心腹张衡入宫刺杀文帝,“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杨广杀生父后,又矫诏处死杨勇,而夺得帝位。605年杨广即位称帝,是为隋炀帝,年号大业,并决定迁都洛阳。

营建东都

炀帝(杨广)即位之后,在洛阳兴建东都。原来长安地位偏西,从经济方面考虑,要把南北各地人民缴纳的粮食绢帛,全部运到长安,未免困难。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到潼关,跟黄河相接,目的就在于解决运输问题。然而洛阳以西的黄河,水道并不通畅,三门峡尤其是当时无法克服的险阻,所以广通渠的作用只能减少一点困难,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炀帝决定在洛阳建设一个新都,使大部分物资毋须运往关中。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在大建筑师宇文恺的领导下,规模宏伟的大工程开始了。从这时起,到第二年正月完工,每月征用两百万个劳动力。13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东都早已毁掉,然而它的遗址,今天在洛阳市区以西,依然可以确实指出。据实地勘测,外郭城周围一共有50多里,城门位置和下水道等也都有遗迹可寻。城西北部的宫城是宫殿所在,皇城是文武官衙所在。从宫城中央各殿起,向南笔直穿过外郭城正中的城门,正对着城外的名山伊阙。

东都城里面,除宫城、皇城之外,有官吏百姓居住的坊,和丰都、大同、通远3市。市是商业区。丰都市周围8里,开12个门,内有3000余肆(店)。街道两旁,榆柳交荫,房屋整齐,堆满着珍奇的货物。当时有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天下各地被迁到东都,来点缀升平。另外还有河北3000多家工艺户,也离乡背井,来到东都。因此,洛阳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兴旺发达起来了。

开凿大运河

关陇地区的农业生产既然衰退,而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南朝270多年间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却成为“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宋书·孔季恭传后论》)的富饶之区。然而隋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心,却仍旧在北方。隋炀帝需要借运河来控制南方。沟通南北的运河大工程,就是在这种新的客观形势下进行的。所以,运河的开凿,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

运河的开凿,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第一,它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从此大大地缩短了南北的交通,便于南北的交通;第二,它使南北物产的交流有了畅通的渠道,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以后沿运河的干线上,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这些城市都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而繁荣起来,通济渠南端的扬州(江都),便逐渐形

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在海运尚未畅通以前,在内地的陆上交通尚未采用新式交通工具以前,运河一直是国内沟通南北的大动脉。第三,它使中华文明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大运河沟通了长江、黄河两大河流域,促进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使南北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使中华文明成为有机的统一的整体。

这条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无论通济渠、永济渠,都征发了上百万的民夫。通济渠在大业元年三月开凿,同年八月就通航了。永济渠在大业四年正月开凿,也不到几个月就通航了。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官吏督役严急的情况下迅速完成的,不可避免地给人民带来了很大苦难。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受冻挨饿,加上疾病侵袭,死亡的人在半数之上。(《开河记》)

隋炀帝开凿运河主要是为了连结南北方,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他沿运河巡行南方,本身就是显示隋朝国力的政治军事大示威。同时,也有便于他本人巡游享乐的目的。大业元年(605)。他下令开凿通济渠的同时,派官吏往江南造龙舟及各色船只数万艘,同年八月,通济渠这一段运河刚凿通,隋炀帝就带了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并十二卫军士,浩浩荡荡,乘舟前往江都。沿途之上,穷奢极欲,征发无度,耗资财,难以数计,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出巡与扬威

大业三年(607年),炀帝率甲士50万人,马10万匹,出巡出塞。他事先下令让建筑师宇文恺造了观风行殿与六合城,随驾出巡。观风行殿是一座可拆可装的宫殿,下置轴轮,进退自如,其大可容纳数百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活动房屋。六合城则是可拆可装的一座城池,周长8里,以板作骨,以布作饰,绘以丹青,上布旗旌,甲士可荷戟负戈在城上巡逻。这恐怕也是古代最大的活动建筑。草原上一夜之间突兀树起一座城池。城中又起宫殿。突厥可汗与酋长们远远望见以为是神助天成,敬畏不已。离城10里就不敢再骑马,跪于地上匍匐而行,纷纷争献牛羊驼马。炀帝则厚赐可汗酋长以大量金帛。

当时,朝臣高颎、贺若弼等人就曾私议皇帝此次出巡过于奢侈。炀帝知道了,立即将他们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大业五年(609年),炀帝又西巡张掖,并诏令西域17国的使臣前来晋见。又命令武威、张掖两郡的男男女女,都穿起最华丽的服饰,驾上最好的车马,列队欢迎,队伍长达数十里。如此兴师动众,原是为了向西域人民夸耀中原的富有。

第二年,西域使团和成队的商旅倾慕中国之富有,云集洛阳。炀帝诏令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搭起戏楼,戏场周长约8公里,乐师多至1.8万人。灯火辉煌,如同白昼,通宵达旦。这场大戏从正月十五日开台,整整演了半个月,到月底方才收场。

这期间,商旅们要求在市内进行交易。整个市容整顿一新,小商小贩锦衣丽服,竟连卖蔬菜的也用精美的龙须席铺地。西域商人路经酒食店,店主热情邀请入座,醉饱出门,不收分文,以显示隋的富庶。但客人并不痴呆受骗,有人就指着市间树木上缠饰的

彩绢质问说：“贵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给他们去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市上的人被问得无话可答。

炀帝这种虚荣浮夸的愚蠢行为并未赢得民族间的信誉，他的大民族思想，却招致了民族间的干戈。

大业十一年(615年)秋，当炀帝再次率领甲士出巡塞外时，突然遭到突厥人几十万骑兵的袭击，雁门(今山西代县)一带41座城堡被攻克39座。炀帝逃之不及，被围困在雁门城里。突厥人攻城甚急，飞矢纷纷落到炀帝脚前。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被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小儿子痛哭流涕，眼睛都哭肿了。多赖将士奋勇，死守孤城，才得以转危为安。

王薄起义

暴君隋炀帝继位以来，进行无休止的横征暴敛，早已叫百姓透不过气来。3次征高丽的战争，全国规模的大征调，更使永济渠沿岸的村落，几乎找不到男丁。劳力缺乏，田园荒芜，再加上一场洪水，粮价涨了几百倍，人民靠树皮野菜充饥。他们忍受不了兵役、徭役和饥饿的折磨，纷纷揭竿而起。

大业七年(611年)，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在长白山(今山东章邱)起义。这座山在邹平、长山、淄川诸县交界，山势险峻，周围60里，号称第二泰山。这个地方历来是起义农民隐身的场所，早在北魏时期，就“多有盗贼”。由于山里产铁，过去有人在山里制造兵器。传说王薄是个铁匠，很会打造枪头。正因为长白山具有各种优越条件，因此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不少人都在这里聚义。

王薄自称“知世郎”，他以先知先觉自居，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他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隋炀帝，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歌辞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稍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王薄起义好像星星之火，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便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

同年，孙安祖、窦建德在高鸡泊(今山东恩县)、张金称在鄆县(今山东夏津)、翟让与单雄信、徐世勣据瓦岗，外黄王当仁、济阳王伯当、雍丘李公逸、韦城周文举等纷纷起义。

大业九年(613年)，孟海公据济阳周桥(今山东曹县)、孟让在齐郡(今山东济南)、郭方预在北海(今山东益都)、郝孝德在平原(今山东德县)相继起义。

大业九年(613年)六月，礼部尚书杨玄感，乘炀帝第二次东征高丽之机，在黎阳(今河南濬县)起兵。在刘元进、朱粲、管崇等人的领导下，江南农民在余杭(今浙江杭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发动了起义，在白瑜娑等人的领导下，西北农民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等地起义。十二月，章丘杜伏威、临济辅公柝起义，与下邳苗海潮、海陵赵破陈等部会合。这时仅见于记载的起义军就达百余支，参加人数数百万。起义军“大则跨州连

郡 称帝称王 ,小则千百为郡 攻剽城邑”(《隋书·炀帝纪》)。大业十年以后 ,各地起义队伍切断了长安、洛阳、江都隋朝三大据点的联系 ,隋统治集团陷入农民起义的大包围中。

瓦岗寨起义

风起云涌、星罗棋布的隋末农民大起义 ,自大业七到大业十二年(616 年) ,经过五年的奋战 ,逐渐形成三大支队伍 ,一支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 ,一支是杜伏威、辅公柘领导的江淮起义军 ,一支就是翟让、李密的瓦岗军。

大业七年 ,东都法曹翟让犯了死罪 ,狱吏黄君汉钦佩翟让骁勇 ,以为他能拯救百姓 ,就暗中打开死牢门 ,将他放了。在东郡(今河南滑县)边界 ,有一处山势特别险要 ,峰回坡陡 ,莽林环抱。山上结着一个寨子 ,栅高垒固 ,称瓦岗寨 ,寨中正聚集着起义的农民。翟让亡命到瓦岗 ,被拥戴做了寨主。翟让的同乡单雄信骁健勇猛 ,善用马槊 ,还有年仅 17 的徐世勣 ,先后率部投奔翟让 ,队伍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因为聚义瓦岗 ,所以称为瓦岗军。

杨玄感兵败 ,谋主李密被捕 ,和其余 10 多名钦犯一起被押送东都。途中 ,李密等十余钦犯乘防守的人醉卧梦乡之机 ,凿墙穿洞 ,逃了出去。李密脱险后 ,为了躲避官府缉捕 ,改姓易名 ,辗转山村 ,四处亡命。后来他往来于外黄王当仁、济阴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李公逸等结寨聚义的群雄之间 ,鼓动他们下山取天下。

李密在大业十二年约了王伯当 ,投奔瓦岗寨。李密上山初 ,翟让因听说他是杨玄感的亡命将军而不信任他 ,把他软禁在营外。李密靠了王伯当的帮助 ,去见翟让献策说 :“如今昏君巡游江都 ,精兵集于辽东 ,这个形势如同过去项羽、刘邦奋起夺取天下的时机一样。足下雄才大略 ,瓦岗士马精勇 ,正可以席卷二京(长安、洛阳) ,诛灭暴虐 ,成就灭隋大业。”翟让因此对李密刮目相看。

李密见瓦岗人马愈来愈多 ,而粮草不敷供应 ,感到如果旷日持久 ,势必人马困疲 ,一旦强敌降临 ,就会涣然离散 ,于是向翟让又献一计 ,劝翟让下山夺取荥阳 ,养精蓄锐 ,然后大干一场。翟让称好。

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要隘虎牢关在郡境内。因此隋炀帝特派河南道讨捕大使张须陀为荥阳通守 ,全力对付瓦岗军。

李密部署翟让率兵从正面迎战诱敌 ,李密率精兵千余埋伏在荥阳北面的大海寺北密林中。张须陀一向藐视翟让 ,翟让且战且退 ,往北退了 10 多里 ,把张须陀的 2 万人马引到大海寺。瓦岗伏兵杀出 ,翟让回马杀回 ,和李密、徐世勣、王伯当一起围杀隋军。张须陀战死 ,隋军被歼 1.5 万余人。

紧接着 ,瓦岗军部署新战役。二月 ,李密、翟让带领 7000 轻骑 ,兼程疾驰 ,一举攻克了洛口仓。进城后 ,立即打开粮仓 ,赈济百姓。消息传开 ,瓦岗义军声誉传四方。以文辞闻名海内的祖君彦也来投奔瓦岗军 ,李密把军中书檄全委托了他。

瓦岗军夺取洛口仓的消息传到江都以后 ,隋炀帝吓得魂飞魄散 ,不敢再回东都。驻守东都的越王杨侗 ,任命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 ,与虎贲郎刘长恭各自领兵 ,夹击瓦岗军。刘长恭领的是少爷兵 ,拖拖拉拉 ,走了 11 天 ,渡过洛水 ,在巩县东南石沙子河西岸

列阵,南北长达10余里。李密、翟让早有部署,陈兵于石子河东岸,另有一部埋伏在横岭下。翟让先接战,不利。李密即指挥后队蒲山公营横冲官兵队阵,隋兵大败,刘长恭在混乱中换上士兵衣服,逃回了东都。裴仁基失期未到,等听到刘长恭失败,吓得不敢前进,屯兵于巩县东南的百花谷,固垒自守。后来还屯虎牢关。

瓦岗军威震中原,翟让感到自己能力已不足继续领导,就让位给李密,奉李密为魏公。李密设坛场,即位,组织行军元帅府,改元永平,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单雄信为左武卫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卫大将军,其余都拜授官职,令他们各领本部。李密建立了独立政权,号令天下。孟让、郝孝德、秦叔宝、程咬金等各路英雄都络绎不绝地投奔瓦岗。隋朝的官员裴仁基、柴孝和、郑颢等也闻风纷纷献城投降。著名骁将罗士信等也率众归顺了李密。因裴仁基献出虎牢关,李密封他为上柱国、河东公。当时“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瓦岗军声威大张,成为隋末农民起义中最大的一支义军。

为了巩固基地,李密令田茂广筑洛口城,方40里,同时派房彦藻向东扩展,攻克了安陆(今湖北安陆)、汝南(今河南汝南)、淮安(今河南泌阳)、济阳(今山东曹县)。

经过几次反复的激烈的战斗,瓦岗军又夺隋朝另一大粮仓回洛仓,大修营堑,部署攻打东都。李密召集元帅府幕僚,命记室祖君彦草就了一篇讨伐昏君檄文,传檄天下。檄文中声讨炀帝有十大罪状,并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后来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

这时李渊还未入关,炀帝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关内兵救援东都。柴孝和劝李密避其锋芒,自率精锐,乘虚入关,西取长安。李密认为这是他当年为杨玄感所出的上策,但顾虑到他的部下将士都是山东人,见洛阳还未攻下,就没人愿随从西进,未能依从柴孝和的计策。柴孝和非常惋惜,只得另献一计说,大军既然不能西进,就由他先入关中联络群雄,看机会吧。李密同意了。柴孝和率数十骑入关,说动了关中群雄万余人,准备响应李密。不久,李密在作战中,中流矢负伤。官兵气焰大张,庞玉、段达乘胜夜袭瓦岗军大营。李密箭伤未愈,与裴仁基仓猝应战,大败,弃了回洛仓,撤奔洛口。柴孝和联络的关中群雄听到李密兵败,统统变卦散去了。柴孝和只得轻骑归返瓦岗军。

可李密这时却自以为兵强,想做天下盟主,叫祖君彦写了封信给李渊说明此意。李渊这时正一心经略关中,倒不图虚名,写了封回信假意表示拥戴。李密把李渊的信展示给诸将看,说:“唐公拥戴我,天下肯定是我的了。”从此他不再考虑西进了。

八月,武阳郡丞元宝藏派门客魏征见李密上降表。魏征字玄成,落拓有大志,出家做道士,学识丰富,很有文名。李密立即召魏征为元帅府参军,掌记室,并任元宝藏为魏州总管。

这时,河南、山东发大水,饿殍遍野。炀帝诏命开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赈济灾民,吏不按时赈济,结果每天饿死的达数万人。徐世勣向李密建议说:“天下大乱,本是由于饥饿。如今若能夺得黎阳仓,大事就可成功了。”李密当即就派徐世勣领本部5000人马,会合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等一举攻破了黎阳仓,开仓济贫,远近农民纷纷投奔瓦岗军,10多天时间就得兵20余万。武安(今河南涉县)、永安(今山西霍县)、义阳(今河南桐柏)、弋阳(今河南横川)相继投降。窦建德、朱粲也派使者来表示拥护。

自七月炀帝派江都通守王世充率江淮劲旅北上,同时命将军王隆、河北大使韦霁、

河南大使王辩等同赴卫东都,讨捕瓦岗军。这时他们多已在东都会合,与庞玉、刘长恭合兵10余万,与瓦岗军夹洛水相持。十月末,王世充仗着兵多势众,摸黑渡过洛水,抢占黑石关,然后兵分两路,准备夹攻瓦岗军。李密发觉后,率精骑渡到洛水北岸去抄袭王世充的后路,被打败。柴孝和落水而亡。李密又返回洛水之南,分兵。一路东走月城,王世充尾随而至,包围了月城。另一路直奔黑石关,官兵连举6座烽火告急。王世充赶快从月城撤兵,援救黑石关。在途中遭到李密迎头痛击,杀得大败。李密反败为胜,消灭敌人三千多。

王世充大败后,坚壁不出。越王派使者慰劳他,叫他继续出战。王世充又是惭愧,又是害怕,再次率军到石子河与李密对阵。几天后,瓦岗军大军出动,王世充大败,向西逃回东都。瓦岗军重新振作起来,但东都始终未能攻取。

虽然这时李渊已经取了长安,但群雄中,瓦岗军仍最具备与李渊逐鹿中原的力量。可瓦岗军没有一鼓作气去攻洛阳,却发生了内讧。结果李密杀掉崔让,瓦岗军军心涣散,实力大减,逐渐走向衰亡。

瓦岗寨起义失败

武德元年(618年)春,王世充集结兵力7万余人,正月十五命令各军在洛水造浮桥,渡过洛水与瓦岗军决战。虎贲郎将王辩最先登岸,攻破李密外围营栅。王世充不知这时李密大营惊慌,忽然鸣金收兵,于是李密率敢死队乘机追杀。官兵大败,几万人抢渡浮桥,落水而死的1万多人。王辩当场阵亡。这夜疾风寒雨,军士涉水时衣裤湿透,因此冻死在道路上又有万余人。王世充逃走,自己向越王杨侗请罪,越王遣使赦了他,把他召还东都。王世充屯兵东都城北的含嘉城,但不敢出战瓦岗军。

李密乘胜占领金墉城,扎营北邙山,浩浩荡荡逼近东都上春门。战鼓声一阵阵传入东都城内。十九日,段达、韦津领兵出战,望见密密麻麻的瓦岗军,不战自慌,返身而逃。段达在后逃进了城。韦津冲在前面,被瓦岗军杀了。

东都城门四闭,拒不出战。瓦岗军打了四五个个月,毫无进展。这时宇文化及弑了炀帝,以皇后令立秦王浩为帝,自称大丞相,率领10万官兵,离江都北上,要踏平瓦岗寨。瓦岗军处于宇文化及与王世充的东西夹攻之中,形势险恶。房彦藻为另支义军王德仁所杀,瓦岗大将王君廓又投降唐,李渊称帝长安。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打击着李密。

六月,宇文化及率军直扑黎阳,企图夺仓抢粮。瓦岗守将徐世勣在黎阳西新筑仓城,集中精兵把守。宇文化及赶到,受壕堑所阻。李密率步骑2万增援,抄宇文化及的后路。徐世勣挖地道出奇兵袭击,宇文化及大败,溃逃而去。

这时已经接了帝位的杨侗想利用瓦岗军来抵挡宇文化及,决定招安瓦岗军,派使者盖琮去见李密。李密虽然取得了黎阳胜利,但仍担忧腹背受敌,见盖琮来招安,大喜,以为可解除西顾之忧,避免作战了。他向隋皇泰主上了降表,被册拜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奉令先平宇文化及,然后入朝。

七月,李密因已无西顾之忧,率全部精兵东击宇文化及,大获全胜,斩敌4万。宇文化及元气大伤,无力西进,带着2万多残兵败将,逃往河北去了。李密准备入朝,走到半

途,获报东都兵变,王世充杀了主张招安的大臣,选了两万精兵来攻瓦岗军。李密因为久战,损失了很多劲兵良马,士卒疲病,只得放弃了进占东都的计划。

九月,李密留王伯当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仓,自率精兵,到偃师北邙山驻营。他召集诸将会议。裴仁基建议分兵扼守各交通要道,阻堵王世充东进,再选3万精兵,绕道河西,直趋东都,让王世充来回奔命,然后一战决胜。李密认为说得有理,避其锋芒,以逸待劳,养精蓄锐,确是上策。单雄信等武将不服从,纷纷要求大战一场。李密又改变了主意。裴仁基苦争没用,顿脚叹息说:“魏公将来一定要后悔的!”

接着在偃师大战,结果失利,裴仁基等10余大将重伤。但李密却并不在意,夜不设防。不料这夜王世充遣200多轻骑携带火种,潜伏在北邙山谿谷中。天一亮,王世充率江淮劲兵攻袭北邙山瓦岗军大营。李密来不及列队布阵,仓促应战。这时,王世充的伏兵乘虚爬上山顶,居高下冲,纵火烧营。王世充命士兵把预先绳捆索绑的貌似李密的人牵过阵前,连声鼓噪:“捉到李密了!”声音传遍北邙山。瓦岗军以为李密真的被俘,失了斗志,向山下溃败。在溃败中,一些将领相继倒戈。李密集拢了1万多瓦岗军,驰奔洛口仓。

途中,获报镇守洛口仓的邴元真叛变。邴元真是翟让的老部下,翟让被杀,他一直怨恨在心,听说李密兵败,不等王世充来攻,就投降了。接着,单雄信叛变。偃师失陷,裴仁基、郑颢、祖君彦被俘。于是,李密投奔王伯当。

王伯当这时已放弃金墉,退保河阳。李密赶到河阳,召集诸将商议,想再图进取。可自从下山以来,瓦岗军从未遭受过如此惨败,因此诸将情绪低落,都说难以成功。

冬十月,李密带着2万瓦岗军残部与魏征等文官,进长安投降了唐朝。唐高祖李渊封他为光禄卿、上柱国,赐爵邢国公。消息传开,徐世勣、贾润甫等将领也相继降唐,秦叔宝、程咬金等多数将领投降了隋朝。瓦岗军就此瓦解。

不久,李密感到在唐朝只有虚位,郁郁不乐。他和王伯当两人密议离唐出关,招集瓦岗旧部,重举义旗,东山再起。接着,李密假意向李渊献策,愿亲往山东招收旧部,讨灭王世充。李渊同意。李密又要求贾润甫、王伯当同去,李渊也准许了。

十一月,李密与王伯当、贾润甫3人出了长安城,马不停蹄,直奔黎阳。3人到稠桑时,李渊反悔,敕追李密返回。李密估计返回必无生理,决意反叛。贾润甫哭谏说:“自翟让被杀,天下都说明公忘恩负义,如今归唐复叛,还有谁肯相助!”李密大怒,要杀贾润甫,被王伯当劝住。贾润甫不别而行。李密撕毁敕书,杀了使者,和王伯当两人继续东驰。

一路上,两人招集到几十名旧部,把他们装扮成妇女,裙下藏刀,进入桃林县(今河南灵宝),突然变服,抢占了县城。他们夺取粮械后,聚集了1000多人,直趋南山,乘险东行,准备去襄城依归瓦岗旧将张善相。

不料走进熊耳山,唐朝行军总管盛彦师的伏兵齐起。李密、王伯当等1000多人被冲作两截,首尾不能相顾,全部遭害。鲜血溅染熊耳山,瓦岗寨起义至此彻底失败了。

隋的灭亡

大业十三年(617年)时,隋朝已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农民军除三大集团和林士弘等外,还有许多独立活动的队伍。

河北北部有高开道,据渔阳(今蓟县),称燕王;魏刀儿,据深泽(今河北深泽),称魏帝。大河南北各军大多归附李密,但如王薄、孟海公等部和崛起于兖州(今山东滋阳)的徐圆朗,也都有相当的实力。其余声名较次的武装力量,更是难以计数。

唐朝

唐朝开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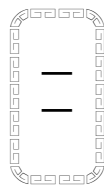
隋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各地有不少官僚豪强趁机脱离隋朝统治,扩大自己的势力,准备夺取政权,其中最主要的是李渊集团。

李渊原来是西魏柱国大将军李虎之孙,其父李郃,曾任北周安州总管,袭封唐国公。隋朝建立以后,李渊先后任谯州(今安徽滁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调李渊为弘化(今甘肃合水)留守,节度陇右诸军。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毋端儿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年)初,李渊任太原留守兼晋阳宫监。晋阳(今山西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食支十年”。因此,李渊“私喜此行”,到达晋阳后,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形势下,便准备夺取政权。他令长子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令次子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他们“倾财仗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就这样,李渊为起兵反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摆在李渊面前的问题是:怎样消灭隋朝在河东的残余势力,夺取长安;怎样防止突厥在背后袭击。刘文静建议暂时和突厥妥协,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李世民同意这个意见,并提出占领河东以后夺取关中、在长安站稳脚跟后再反击突厥的作战方针。

李渊立即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给始毕可汗送去金帛,还把李渊的红旗改为红白狼头旗,表示臣服突厥,并且与始毕可汗约定,将来同突厥共定京师后,长安土地归李渊,子女财帛归突厥。始毕可汗喜出望外,立即遣使晋阳,送马千匹。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李渊正式建立了独立政权,自称大将军,开府置官。任裴寂为长史,李建成为陇西公兼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陇西公兼右领军大都督。刘文静、武士彠、唐俭、姜弘、长孙顺德等都参与大将军府工作。晋阳囤积的数百万斛粮食、数万匹杂缯,都由李渊控制。李渊父子率甲士3万人从晋阳出发,李元吉留守晋阳。



隋朝代王杨侑驻守长安,闻李渊宣布独立,立即派宋老生、屈突通加强河东防务,把主力部署在霍邑(今山西霍县)一带,阻击李渊。七月以后,李渊先打败高德儒,夺取了西河郡。八月大败宋老生,夺取了霍邑。

大军在霍邑休整了10余天后,进围临汾(今山西临汾),隋兵迎降。不久,绛州(今山西新绛)郡守陈叔达也当了李渊幕僚。河东各县一举平定,成了李渊经营关中的根据地。

当李渊在太原起兵不久,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便离开家乡,投奔李渊。平阳公主则秘密回到鄠县(今陕西户县),变卖家产,招兵买马,组成娘子军,后来和她叔父李神通合作,攻下鄠县等地。

平阳公主的家奴马三宝,能言善辩,被提拔担任招抚使。他到关中义军中到处活动,结果把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等都争取过来,投向娘子军。从此平阳公主的势力扩大到潜植(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始平(今陕西兴平)等地,兵力发展到六七万人。

李渊的亲戚段纶也在蓝田起兵,聚众万人,与娘子军合作。到李渊渡过黄河的时候,平阳公主和段纶的武装已经控制长安西部和东南部分地区,在关中策应李渊。

李世民渡过黄河以后,领兵西进,沿途小股反隋军队,都归附李世民,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的时候,部众增至9万余人。当时有隰城(今山西汾阳)县房玄龄来降,李世民和他一见如故,引为谋主。正在这个时候,平阳公主带领娘子军来见李世民。从此以后,娘子军便归李世民统一指挥,全军扩大到20余万人。

李世民和娘子军会师后,严整军令,进兵阿城(秦阿房宫城),并派人报告李渊,约期会师长安。

李渊接报后,即日行军西行。十月,各路唐军在长安城外会合,有兵20余万。李渊多次传谕守城隋军,宣称他拥护代王杨侑,愿与隋军共同防守关中。隋朝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只有13岁。辅佐他的京兆内史卫文升已年过70,听说唐军兵临城下,忧惧成疾,不能视事。负责防守的左冯翊将军阴世师很讲气节,郡丞骨仪秉性刚硬,不理睬李渊。于是李渊下令攻城。他宣布纪律,入城后不得侵犯隋朝宗庙、宗室和代王,违者灭三族。隋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城固堑深,唐军损兵折将,一直攻到第13天,才杀败隋军,攻克长安。时已十一月。

攻克长安后的第七天,李渊拥立代王杨侑,即位大兴殿,为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任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总理万机,晋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立建成为唐世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公,元吉为齐公,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其余随征官员,都有封赏。

武德元年(618年)三月,江都兵变,隋炀帝被杀,宇文化及立秦王杨浩为傀儡皇帝。凶讯传到长安,五月,恭帝退位。恭帝退位后第七天,李渊改大兴殿为太极殿,在太极殿登皇帝位,是为高祖,改元武德,定都长安,建立唐朝。突厥始毕可汗派使者来贺,唐高祖在太极殿设宴奏乐,庆祝开国。次日,命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以宽简为原则修改《隋开皇律》,制定《武德律》,以为唐朝开国法典。六月,大封随征将士。立李建成为太子。任李世民为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晋封秦王。元吉为齐王。裴寂为尚书省副长官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门下省长官纳言(后改名侍中),萧瑀为中书省长官内史令(后改

名中书令) ,都是宰相。

李渊定鼎关中 ,取得了政治和地理优势 ,他以关中为根据地 ,平定群雄 ,去进行统一中国的大业。

唐代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唐初 ,在多年战乱之后 ,社会经济破坏严重 ,人民流离失所 ,政府财政困难。整顿田制和赋税制度 ,成为安抚流亡、恢复经济、保证财政收入、巩固政权的当务之急。

唐高祖在武德元年(618 年)十二月下令实行给内外官职分田制度 :京官一品 12 顷 ,二品 10 顷 ,三品 9 顷 ,四品 7 顷 ,六品 4 顷 ,七品 3 顷 50 亩 ,八品 2 顷 50 亩 ,九品 2 顷 ,雍州牧及外州官二品 20 顷 ,三品 10 顷 ,四品 8 顷 ,五品 5 顷 ,七品 4 顷 ,八品 3 顷 ,九品 2 顷 50 亩。

武德二年(619 年) ,二月十四日 ,高祖下令征收租税 :每丁租 2 石 ,绢 2 丈 ,绵 3 两。

武德七年(624 年) ,三月二十九日 ,唐政府首次颁行均田及赋税制度 ,其内容是 :凡天下丁男给田 1 顷 ,笃疾废疾给 40 亩 ,寡妻妾 30 亩(若为户者 20 亩)。老男亦给田 40 亩。所受田以 20 亩为永业田 ,其余为口分田。受田人亡故 ,他名下的永业田转授给他的承户人 ,而口分田则由官府收回另行授给他人。是为均田之制。赋税制度是 :每丁岁 8 粟 2 石 ,调则随乡土所产 ,綾绢絁各 2 丈 ,布加 1/5 ,输綾绢絁者兼调绵 3 两 ,输布者麻 3 斤。凡丁岁役二旬 ,若不役则收其庸 ,每日 3 尺。有事而加役者 ,旬有五日免其调 ,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不过 50 日。若夷獠之户皆从半税。凡水旱虫伤为灾 ,十分损四以上免租 ,损六以上免(租)调 ,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武德田令和赋役令基本上继承了隋大业的制度 ,并明确了不把一般妇女和奴婢、耕牛作为授田及课役的对象。武德田令中没有一般妇女受田的内容 ,这在现存可见的均田制资料中是最早的。

武德七年(624 年)田令还包括给官永业田和给道士田的内容。给官永业田的限额是 :亲王 100 顷 ,职事官一品 60 顷 ,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 50 顷 ,国公及职事官正二品 40 顷 ,郡公及职事官从二品 35 顷 ,县公及职事官正三品 25 顷 ,职事官从三品 20 顷 ,侯及职事官正四品 12 顷 ,伯及职事官从四品 10 顷 ,子及职事官正五品 8 顷 ,男及职事官从五品 5 顷 ,职事官六品七品 2 顷 50 亩 ,八品九品 2 顷 ,勋官上柱国 30 顷 ,柱国 25 顷 ,上护军 20 顷 ,护军 15 顷 ,上轻骑都尉 10 顷 ,轻骑都尉 7 顷 ,上骑都尉 6 顷 ,骑都尉 4 顷 ,骁骑尉飞骑尉 80 亩 ,云骑尉武骑尉 60 亩 ,散官五品以上受田限额与职事官相同。五品以上各类官须在宽乡受官永业田 ,六品以下的则在本乡受之。道士给田 30 亩 ,女官、僧尼可能与之相同。

武德田令以本地耕地可以满足给田定额的地方为宽乡 ,反之则为狭乡。在宽乡可以按照全额受田 ,在狭乡则要减半。同时 ,对于耕种一年休耕一年的瘠薄耕地加倍给授 ,对于宽乡的耕种一年休耕一年的耕地则再加一倍给授。

均田制是唐前期的基本土地制度 ,而与之伴行的租庸调制则是该期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的目的是要向得受田者收取赋税劳役。从武德时起的百余年中 ,唐政府的主

要财政收入来自租庸调。

唐政府曾在永徽二年(651年)、太极元年(712年)、开元七年(719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多次修令,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没有变动。而口分田和官永业田则有多次变更。

唐初,大量土地荒芜,封建国家有大批土地可以用于给授各类应受田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编户的增加,均田制的实施主要体现在永业田的继承、口分田的退还与给授,而不是按限额给授,即所谓“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唐代欠田簿、退田簿、给田簿,以及敦煌文书中的唐代户籍簿等历史档案资料记载了封建国家依均田制的规定进行耕地使用权管理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均田制在唐玄宗及以前的唐代前、中期确实是实施了。封建国家尽量收回老、死、逃、绝户的口分田、永业田,将其重新分配给具备受田条件的人使用,以把更多的小自耕农束缚在土地上,使自己有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和力役、兵役的来源。但是,封建国家更要维护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上层的特权,包括占有大量土地的特权。在唐代均田制下,官吏占有大额的官永业田、职田,皇帝还不时把巨额田产赏赐给勋戚大臣。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侵吞兼并田产,超限占田,政府很少去认真追究。这样,土地逐渐向地主集中,政府能用于给授的耕地越来越少,根本不可能按额授田。受田定额只能是占田的最高限额,已受田数量与应受田额度之间无必然联系,均田使农民自己买的田地也被纳入其已受田数额之中,成为唐代均田制实施中的特点。

尽管如此,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适应唐前期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状况的,因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直到均田制末期的天宝年间(8世纪中期),租庸调的收入仍然占唐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60%左右,对巩固中央集权国家作用巨大。

随着地主经济的逐渐成熟和唐朝统治集团的不断腐败,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到了开元初年(8世纪20年代),土地兼并使大量均田农民破产逃亡,唐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实行括户以防止租庸调收入过快下滑,另一方面则反复强调官僚贵族的占田限额以减缓土地兼并的速度。但这些都非治本之计。从高宗朝起,政府就日益重视户税和地税,使之由补充租庸调发展到与之并行。天宝年间,均田制迅速弛坏,租庸调制随之下落。安史之乱及随后的河北藩镇割据终于使实行了300年的均田制、租庸调制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给租佃制和以户税地税为先导的、按财产田亩计征的两税法。

唐代科举制度

唐代科举制在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二种。制举主要策,由皇帝临时定下名目考选。制举名目繁多,有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这是一种网罗非常人才的考试,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考中者,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未入仕的由吏部授予官职。唐文宗以后,制举始实际停废。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唐太宗以后,士人趋向开始转向明经和进士二科,尤以进士科为重。在贞观23年中,进士共205人,在高宗、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据不完

全的记载,进士有1000余人,平均每年录取的人数较贞观时增加1倍以上。玄宗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更加突出,官僚虽位极人臣,但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终不为美”。

各科考试内容不同。明经主要试贴经,即选择考生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帖遮盖部分字句,测试其背诵经书的能力。这种考试比较容易。进士科在隋代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又加试诗赋杂文。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考试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中等为及第,下等即落第。每年应考者或八九百人或一二千人不等,能及第者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由于考生多而录取名额少,所以考中进士非常不易。一旦及第便名闻士林,号称“登龙门”。明法科试律令,明算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三种科目是为选择专门人才而设,考生被录取后只能在和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秀才科仅试策,取消了隋代加试的杂文。由于录取标准异常严格,及第者屈指可数。此科渐渐成为一种虚悬的科目。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又创立武举科。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年被推举至兵部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考试通过者,兵部即除官给禄。唐代武举亦属常举,但不重要。

参加科考者有二种来源。一种是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由学馆荐举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另一种是不在学馆,直接来自州县者,称为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经州县考试合格后,再举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这是唐代科举制较之隋代更加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

考官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唐初由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科考,贞观以后,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以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后成为定制。开元中,礼部考试通过后送中书、门下详覆。宰相如不同意,可以改动。详覆之制屡兴屡废。礼部考试是取得出身资格的考试,考中者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资格,尚不能正式做官,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的主要标准是身、言、书、判。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辨正,书指书法遵美,判指文理优长。

唐穆宗、敬宗都曾下令科考及第者免徭役,唐武宗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特权。

礼部考试一般是正月考试,二月发榜。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时及第者称“同年”。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唐初,由此二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吏才占了多数。科举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渠道。这是选官制度的一个进步,在削弱门阀士族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提高官吏文化水平诸方面,科举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以后,历经宋元至明清,虽考试内容、方法有所变化,但科举制度本身一直相沿不替。

科举制在实行中也存在某些弊端,曾出现冒名顶替、漏泄考题等舞弊现象。尤为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结为朋党,相互援引,宦风由此败坏。牛李竞争中,牛党领袖李宗闵和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牛党骨干元孤楚、萧俛与皇甫湜亦有同年之谊。他们主张选用官吏以词彩居先,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他们通过进士科举

结成势力雄厚的私党,往往一门父子兄弟都从进士起家,住居显要,成为新兴的进士贵族。由此,科举制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也大大降低。这些弊端到宋代因糊名、誊录的新规定的实施而得到克服。

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长安发生了一次政变,李世民杀死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迫使高祖交出政权。这场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惨剧是当时政局必然产生的结果。

太原起兵以后,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都统领军队,身任元帅。他们各自收罗文武才智之人,作为羽翼。李世民官居特设的“天策上将”。府中有著名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著名,其余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死后由刘孝孙补)、褚亮、李玄道、李守素、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勋,也都是一时俊彦。秦府猛将最多,尉迟恭、秦叔宝、程咬金等都在他的麾下。太子建成的手下,文官如魏征、王珪是后来的贞观名臣,武将如薛万彻等,也勇猛善战。他又有四方骁勇2000余人做东宫卫士,实力比秦府充足。齐王元吉地位声望不及两个兄长,但素以勇武著名,手下也有相当力量。

太子建成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但是在唐朝创业的过程中,秦王世民打的硬仗最多。两人既然旗鼓相当,必然会出现争夺皇位的斗争。齐王没有独树一帜的条件,便和太子暂时结成联盟,共同与世民较量。

武德七年以后,全国已经统一,唐王朝的统治地位已相当稳固。于是太子和秦王争夺皇位的斗争就更加明朗化。

一日,太子请秦王赴宴,王府亲随劝秦王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秦王认为,过去兄弟之间虽然发生矛盾,也许还不会达到谋害同胞的地步,于是便前往东宫。

太子准备的宴席非常丰盛。席间太子和齐王频频举杯劝酒,不断颂扬李世民的武功。喝着谈着,忽然,秦王觉得头晕目眩,两脚发软。秦王情知不妙,他挣扎一下想站起来,但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齐王看见他二哥倒下,便紧张起来,赶紧问太子:“这,这,怎么办?”太子把眼睛一瞪,喝道:“慌什么?派人送回去。”

李世民被送回秦王府,灌了许多解毒药,吐了不少苦水,才保住性命。皇帝晓得这件事以后,狠狠地训斥了太子一顿。

太子见秦王没死,还不甘心,就怂恿皇帝到郊外打猎,并要求秦王陪驾前往。父皇命令,秦王只好跟随出行。

太子叫部下给秦王备了一匹烈性马。秦王没有想到太子又在耍阴谋,在打猎场上,纵马操弓,追赶一头鹿。突然,烈马野性发作,仰颈狂跳,把秦王甩出一丈多远,险些摔死。

秦王府的兵精将猛,是众所周知的事。为了削弱秦王的势力,太子和齐王绞尽脑汁设法瓦解秦王的队伍。凡是有调兵遣将的机会,他总是竭力设法把秦王的部将调开。例如,程咬金原来是秦王府左三统军,在打败宋金刚和平定王世充的战斗中,身先士卒,斩将薙旗,建立奇功,封宿国公,是秦王府一员得力的干将。因此,太子很担心自己抵挡

不了秦王,于是在皇帝面前造谣,结果把程咬金调任康州刺史,使他离开了秦王府,但程咬金并未立即离开长安,他设法拖延时间,以便维护秦王的安全。

另一方面,太子对于暂时无法调离秦王府的武将,便来用收买的手段拉拢。例如,尉迟恭是秦王亲手提拔的将领,膂力过人,勇猛善战。太子曾用一车金银珠宝收买他,但遭到尉迟恭的拒绝。太子没有买通尉迟恭,又以金帛贿赂段志玄和李安远,“潜引以为党援”。不过太子的瓦解活动都没有成功。

秦王李世民针锋相对,也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武德九年(626年)他曾派张亮带领1000余人,带着大量金帛到东都一带,“阴引山东豪杰”。在设法争夺太子的人员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例如,常何与敬君弘原来都是太子的爪牙,担任防卫宫城的重任,经过秦王的瓦解活动,常何和敬君弘暗中脱离太子集团,变成了秦王的助手。

秦王沉着观变,准备抓住机会,给对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他部下将校,如尉迟恭等,看到本身的前途取决于秦王的成败,也都劝他早下决心。

政变发生在玄武门前。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唐朝宫城在都城的北面,北门守兵是保护宫城的主力,抓住了这个关键就抓住了皇帝,就可以用最高统治者的名义发布命令,使自己处于合法地位。

六月四日那天,守卫玄武门的将领正是常何,他本是建成的心腹,这时已被世民收买。建成不了解这情况,毫无戒备地经玄武门去朝见李渊。世民乘机,带了尉迟恭等少数将士,发动袭击。他亲手射杀建成,尉迟恭射杀了元吉。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闻讯赶来,仗着人多,猛攻玄武门。世民一面使卫兵抵抗,一面使尉迟恭进宫,逼迫高祖下“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命令。一场事变就迅速地结束了。

三天以后,高祖立秦王为太子;八月初九,禅位给太子。次年改元贞观。

贞观之治

李世民在位23年(627—649),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在他统治的时间里,生产关系有所调整,生产力发展较快,社会经济恢复迅速,人口也有很大增长,史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贞观政要·政体》)。这就是被史学家称作“贞观之治”的时代。

唐太宗即位初年,曾“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唐太宗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卷192,武德九年)。唐太宗这段话,可以说是贞观时期政治措施的指导方针。

唐太宗即位以后,采取了各种措施巩固政权。在政治上,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并发展庠序,改革科举,修《氏族志》,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在太宗朝,三省六部制度和科举制都有较大的发展;在经济上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改革军事制度;修订《唐律》,完善了封建法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唐太宗也有许多颇为得当的措施。唐太宗时期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时期。

唐太宗统治集团中,有一大批出色的政治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魏征是贞观时期的著名人物,他对历史政治兴亡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通过大量谏诤参与唐太宗的政治决策。他的谏诤,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礼仪等各方面,而中心议题则是如何从隋末“丧乱”达到唐初“天下大治”。唐初的大政方针、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和帝王风范,都受到魏征的很大影响。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时期的著名宰相,他们一个多谋,一个善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史称“房谋杜断”,对于贞观时期的政治清明也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此外,贞观时期的著名文臣武将还有出身于农民起义将领的徐世勣(李世勣、李勣)、秦叔宝、程咬金,有寒苦出身的刘泊、马周、张亮等,以及出身关陇土族的李靖、长孙无忌、于志宁、韦挺等。尽管他们背景不同、才能各异,却组成了一个出色的统治集团,成为唐太宗的有力辅佐。

唐太宗君臣较好地吸取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出丰富的、比较顺应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政治思想。贞观年间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都是这些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

唐太宗即位之后,首先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10年左右的社会动荡,战乱之余,唐初经济一片萧条,出现了“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纳谏》)的残破景象。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人民生活困苦。贞观四年(630)李世民狩猎时就发现“野人多褴褛”(《册府元龟·帝王部·狩猎》)。不设法恢复生产,农民生活就不能有所改善,社会矛盾就不能缓和,这对唐政权来说,确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次,唐国家财政处于左右支绌的严重拮据状况:“每岁纳租,未实仓廩,随即出给,才供当年”(《旧唐书·戴胄传》)。一遇水旱就更无力赈贷,穷于应付。为了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变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李世民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只能是首先大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唐初恢复农业生产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劳动力的严重不足。隋代极盛时全国户数近900万,而到贞观时期,骤降至“户不满三百万”(《通典·食货典》)。若以每户平均5口人计算,全国人口仅1000余万。为了尽快增加户口,繁殖人口,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招徕、赎还隋唐之际流落到沿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和被掠去的汉人。其次,大力奖励男子及时嫁娶,提倡鳏寡婚配,以达到繁殖人口的目的。贞观一朝历时20余年,人口约增加了50%左右。

均田制的推行是唐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之一。此外,由于隋炀帝的横征暴敛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覆灭。李世民对此亲见亲闻,故能从中吸取教训,采取轻徭薄赋政策。从隋炀帝的竭泽而渔到唐太宗的轻徭薄赋,是当时赋敛政策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实行省徭减赋,就必须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唐太宗并省州县、精简吏员、完善府兵制等项措施都能在这方面起显著的作用。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注意厉行节约。一是提倡俭朴,力戒奢靡,以纠正隋炀帝的腐化恶习。李世民即位之初,立即“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因此“天下大悦”(《旧唐书·太宗本纪上》)。他曾对臣下说过:“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致

亡灭。此皆朕所目见”(《贞观政要·政体》)。他前后放免宫女 3000 余人,这不仅使隋末以来被幽闭深宫的女子得以婚配,而且也节省了宫廷费用。唐太宗的俭朴作风确实社会、政治方面收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开元年间有人说:“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资治通鉴》卷 210,开元元年)。当时的大臣如中书令岑文本,“居宅卑湿”;户部尚书戴胄,“居宅弊陋”;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贫无正寝”;谏议大夫魏征,“宅内先正无堂”,生活都较朴素。史称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贞观政要·俭约》)。这对积累社会财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为了减省国用,除了俭朴之外,唐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八年(644)发兵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种政策,自然有利于农民安居垅亩,发展农业生产。

在政治统治方法上,唐太宗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和纳谏。唐太宗很能搜罗和使用人才,如李勣(即徐世勣)本来是农民起义军将领,魏征是其政敌李建成的幕僚,都为唐太宗重用。马周出身寒微,为中郎将常何家客,当时皇帝正下令让百官“上书言得失”,他替常何写了奏疏,“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唐太宗知道是马周所为,立即派人去召马周,没有来到之前,“凡四度遣使催促”。后来太宗先提拔他为临察御史,最后官至中书令。李世民曾一再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周见事敏速,性甚慎重……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人,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贞观政要·任贤》)。求贤若渴的心情,跃然纸上。当时参与朝政的大臣,包括各个社会集团的人物。其中关陇贵族有长孙无忌、宇文士及、于志宁、李靖、侯君集、杜如晦,江东士族有萧綯、陈叔达、岑文本、虞世南、褚遂良,山东旧族有高士廉、房玄龄、王祚,山东庶族有李勣、程咬金、马周等。唐太宗的目的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巩固政权。

唐太宗不仅能网罗各种人才,而且能知人善任,使之各得其所。卢照邻称其人才济济的盛况为“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祚、魏(征)、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幽忧子集·南阳公集序》)。唐太宗用人,了解臣下的优点和弱点,所以他能扬长避短,使他们各得其宜。例如常被人称道的“房谋杜断”,就反映了这一特点。史称:“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裨谏草创,东里润色,相须而成,裨无悔事”(《旧唐书》卷 66《后论》),为唐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均为丞相,两人各具优点,互为补充,极有利于国家。史书又说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下》)。此语当然有些歌功颂德,但太宗能够搜罗和使用人才的优点,确是比较突出。

唐太宗还善于纳谏。魏征就是当时有名的“诤臣”。他先曾跟随李密,继又降于窦建德,后则紧事太子建成,每次都站在李世民的对立面。但唐太宗不避仇嫌,不计恩怨,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性情抗直,敢于谏诤,遇太宗发怒,亦神色不移,据理力争。前后所谏 200 余事,多为李世民采纳。除了魏征之外,唐初的一些大臣都敢于进谏。这种风气的形成,是由唐太宗的“乐于受谏”所造成的。正如魏征所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任贤》)。唐初很快就造成“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等协调和谐的局面。

唐太宗为了集思广益,纠偏补过,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制度。

一是建立“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宰相入朝议事,必使谏官随

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有所陈说,以便采纳。王夫之认为,这种制度使当时言无不尽,“而治得其理”;以王祚、魏征为谏议大夫,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而太宗在各种政见之间加以明智的选择和折中,可以集思广益,“足以折中群论而从违不爽”(《读通鉴论》卷20《太宗二》)。

二是命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资治通鉴》卷192,武德九年)。这种制度使五品以上的在京官员,可以随时被召见,询访外事,讨论政教得失。

三是中书舍人五花判事制度。唐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政事凡经朝议决策,即交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中书省首长选择。又交门下省审核封驳。若有错误,给事中可涂归驳回中书省重拟。于是诏令既出,少有错失,因此“鲜有败事”。

除了用贤、纳谏以外,唐太宗还用各种手段笼络臣下。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于凌烟阁为开国功臣长孙无忌等24人绘像纪功。唐太宗撰赞,褚遂良题字,阎立本绘画。这些作法,也是唐太宗用贤纳谏、表彰人材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唐初对待功臣的态度和政策,吕温有篇论述写得生动、真切:“其始也,文为经、武为纬。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逼,小不遏,退者全,来者达。控而纵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尽之。不设笼槛,以观辽廓之致;不顿缰锁,以极权奇之变。执一德而众力尽,悬大信而群臣竭。高祖聚之以义,太宗用之以道”(《唐文粹·凌烟阁勋臣赞二十一首序》)。这里所提到的“大不逼,小不遏,退者全,来者达”,“不设笼槛”,“不顿缰锁”,在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下是难能可贵的。

唐太宗不仅对朝廷大臣十分爱护重用,对地方官员也经常留意考察,以便做到用贤去污,除暴安良。贞观八年(634),他曾派李靖等诸道黜陟大使巡行全国,升迁廉吏,惩治贪官。因此,贞观时期的吏治是比较清明的。

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措施,并且保持了比较开明、清廉的政治空气,从而使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封建经济走向繁荣,出现了比较昌盛的局面。有关史籍曾对“贞观之治”作过比较详细的叙述:“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二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物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附降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二十九人,号称太平”(《新唐书·食货志》)。欧阳修这段评论,可能有些夸大,但“马牛被野”、“民物蕃息”、“号称太平”,反映出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的局面。贞观之治所带来的政治清明与经济繁荣,使唐朝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盛世。唐太宗君臣的作为不仅巩固了李氏王朝,也使人民获得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安心地从事劳动生产,从而创建了一个在中世纪少见的文化灿烂、国力鼎盛、富强的中国。

武后临朝称制

唐太宗去逝后,唐高宗李治继位。高宗即位第二年(650年),改元永徽。永徽初期,君臣兢兢业业,朝廷大体上相安无事,只是后宫王皇后与萧淑妃相互争宠,使高宗两

面为难。到后来,高宗索性撇了两人,另去长安安业坊感业寺寻访老相好了。

原来,太宗生前曾有一小宠姬,生得妩媚艳丽,14岁进宫,被封为才人。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名曌。高宗做太子时,曾乘入侍太宗之机,与她偷过情。太宗去世,武才人和许多太宗嫔御一起被安置在感业寺中为尼。高宗进了感业寺,寺众接驾。高宗举目望去,其中姿容出众、丽色照人的正是武才人。只见她桃花如旧、人面依然,不过少了一头凤髻、两鬓鸦鬟。等烧过了香,高宗便携了武氏进云房叙旧,两人久别重逢、悲喜交集,不由情不自禁、相对哭泣。

这事给王皇后知道了。但王皇后正因妒忌萧淑妃,一想正好可给萧淑妃树一敌手,所以非但不责怪,反而劝高宗把武才人接回宫来,还暗中叫武氏蓄发。武氏蓄发不久,又是一头乌云,便随了内侍回到唐宫。这时她26岁。武氏十分乖觉,见了王皇后,就恭恭敬敬地叩下头去,还说了许多恭维话,王皇后十分高兴。以后,武氏极力巴结王皇后,把王皇后哄得欢喜不尽。王皇后也就常在高宗面前说武氏的好话。不久,高宗封武氏为昭仪。

从此,萧淑妃和王皇后都日益失宠。王皇后见弄巧成拙,十分懊悔,就与萧淑妃联手,与武昭仪争宠。可高宗根本不理她们,只相信武昭仪的话。武昭仪见自己名位已定,又愈来愈受高宗宠爱,就开始了陷害王皇后、争夺后位的阴谋。

武昭仪先百般笼络宫女、女官,每次得到赏赐就全分给她们。这些宫人因为王皇后平时脾气大、不尊重她们,对王皇后素有怨言,如今见武昭仪对她们倾心相交,自然很感激,都乐意为她所用。然后,武昭仪就命受她笼络的宫人暗中监视王皇后,把王皇后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她。她再添油加醋说给高宗听。可谁知高宗虽然不常与王皇后同房,却也没有废后之意。武昭仪只好另想良计。

机会终于来了。永徽五年(650年)十月,武昭仪生了个女孩,王皇后很喜欢,到昭仪宫中看玩。武昭仪心中盘算定当,等王皇后一走,就残忍无情地扼死了亲生女儿,然后再给死婴盖上被子。高宗来了,武昭仪承欢言笑了一会,就揭开被子,装作突然发现死婴,假意啼哭起来,并问左右有谁来过。左右都说:“皇后刚刚来过。”高宗听了,勃然大怒,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昭仪乘机大进谗言,于是高宗决意废王皇后。

废立皇后,在中国帝王朝代,可是国家大事,必须通过大臣。高宗感到首先要取得执政的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当夜就带了武昭仪,御驾来到太尉府。君臣在厅上畅饮,饮到高兴处,高宗忽然授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长孙无忌推辞不过,接受了。这时高宗装作随便的样子,说皇后无子还要妒忌别人。长孙无忌方知高宗此来用意,但他假痴假呆,不接口,顾左右而言他。高宗与武昭仪见长孙无忌有意回避,心中不悦,罢席而归。

但高宗还不死心,暗中派内侍送去金银宝器各1车,绫锦10车,讨好长孙无忌。武昭仪又多次支使母亲杨氏到太尉府,乞请长孙无忌立武昭仪为后,长孙无忌不应许。卫尉卿许敬宗也屡去见长孙无忌,劝长孙无忌依允,给长孙无忌狠狠训了一顿。

这时武昭仪又生了个儿子。叫李弘。她得意非凡,非要取王皇后而代之。她命心腹宫女准备了一个木偶,上写高宗姓名与年庚八字,悄悄埋在王皇后宫中,然后便去报告高宗,高宗气冲冲来到王皇后宫中,命内侍挖掘,果然得一木偶,不由大骂王皇后。他不听王皇后分辩,也不顾大臣反对,准备一意孤行,要废王皇后。永徽六年(655年)六

月,高宗在武昭仪撺掇下,下敕禁止皇后母亲柳氏入宫,把吏部尚书柳奭贬到外州去做刺史。武昭仪又引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中书侍郎李义府为心腹,在朝臣中为她活动。瓦岗名将裴仁基之子长安令裴行俭获知高宗执意要立武昭仪为后,认为国家之祸将从此开始,十分焦虑,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商议怎么办。此事被袁公瑜侦知、告发,裴行俭也被贬为外任。

就这样,废立皇后事被长孙无忌等大臣顶了半年多,君臣冲突终于爆发了。

九月,高宗升许敬宗为礼部尚书,表明了要立武昭仪为后的意向。退朝后,召长孙无忌、李世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议事。褚遂良看出了高宗的意向,说:“今日召我们,多半为了中宫的事。皇上心意已决。太尉是元舅,司空(李世勣)是功臣,不能让皇上背上杀元舅、功臣的恶名。我起自草莽,无汗马功劳,得居高位,又受先帝顾托,不以死争,有什么面目去见先帝!”表示由他去力争,阻止高宗废王皇后。于是李世勣称病不入。

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三人进了内殿,高宗劈面就问:“皇后不生儿子,武昭仪有儿子,今朕欲立武昭仪为皇后,怎么样?”褚遂良挺身反对,说:“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时,拉着臣手说:‘朕佳儿佳妇,托付给卿。’这话陛下也听到。如今言犹在耳。皇后没有过失,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违背先帝遗命!”君臣不欢而散。

第二天,高宗临朝,正式提出废立皇后的事。褚遂良跪奏说:“陛下一定要另立皇后,也应慎重从名族中选择,何必立武氏?武氏侍奉过先帝,天下人都知道,实在不妥,后世也要议论陛下!”说完,把朝笏放在殿阶上,脱帽叩头,说:“笏还给陛下,放臣归田里。”血都叩了出来。这番话无疑是揭了高宗的丑,高宗恼羞成怒,命令左右将褚遂良撵出去。武昭仪在帘内火上浇油,大声尖叫:“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闻言,急忙出班保奏:“遂良是顾命大臣,就是有罪,也不可加刑。”褚遂良才得免难。侍中、太子宾客韩瑗和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来济也都涕泣谏阻废王皇后,弄得高宗无法可想。

可就在这时,李世勣背叛了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另一天,单独去见高宗。高宗向他问计:“朕想立武昭仪为后,褚遂良坚持反对,他又是顾命大臣。难道这事就这样算了?”李世勣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还去问外人。”为高宗解决了难题,高宗主意打定了。许敬宗受到指示,就在朝房中,肆无忌惮地宣扬:“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呢!天子要另立皇后,关别人什么事,要妄生异议!”

于是,高宗放开了手脚,贬褚遂良到离长安2400多里的潭州(治所今湖南长沙)做都督,来儆戒反对另立皇后的朝臣。韩瑗悲泣不已,上疏再谏,说褚遂良是社稷忠臣、大唐的微子,不能远放。影射武昭仪是亡殷的妲己,一旦立为皇后,大唐易姓就不远了。高宗根本听不进去。

十月,高宗下诏说: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她们的母亲及其兄弟都除名,流放岭南。第七天诏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初一,举行册立仪式,由李世勣把皇后玺绶授武后,百官在肃仪门朝见新皇后。武后从此走向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高宗内外政事,多与武后商议。武后原有政治野心,又有政治才干,渐渐地骄恣自擅,跟高宗争起权来。高宗被弄得很不高兴,转而想起废后王氏和废妃萧氏的好处来。王皇后、淑妃被废后,囚在冷宫别院。高宗找了一个机会,瞒着武后,去看望王皇后和萧

淑妃。只见囚室严密封闭,只留一个壁洞供递送食物,高宗不觉惻然伤心,在室外呼喊:“皇后、萧淑妃在哪儿?”听得高宗声音,王皇后哭泣起来,回答说:“妾等得罪,贬为宫婢,哪能还有尊称!”又哀求说:“陛下如果还念旧情,使妾等重见天日,乞求名此院为回心院。”高宗应允说:“朕自有处置。”

谁知消息走漏,武后知道了,勃然大怒,跟高宗大吵一场,还想了一个狠毒残忍的惩罚王、萧两人的办法,说:“叫这两个婆子骨醉!”她矫旨派人将王、萧两人各杖一百,然后斩断了两人手足,叫做“人瓮”,塞进了酒瓮。王、萧两人晓得是武后之谋,萧淑妃大骂:“阿武妖猾,到这个地步!我愿下世投生做猫,叫阿武做鼠,扼她的喉!”浸了数日,两人就死了。

来人把萧淑妃的话回了武后。武后又恨又怕,命人将已死的王、萧两人的首级割下泄恨,又下令宫中不许养猫。可是她仍经常梦见王、萧两人披发沥血来找她算账,吓得她一再迁居,最后不敢再住在长安,徙居到洛阳。

杀害了王皇后、萧淑妃,武后巩固了在后宫的地位,进一步挟持高宗。高宗昏庸,政事多听她取决,重用武后心腹许敬宗、李义府。许、李两人是唐初出名的奸臣,都在立武后中立了大功。许敬宗出身江东士族,隋末投奔李密。他为人无行,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被秦王召补秦府学士。高宗即位,就重用他,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后因嫁女纳贿,被弹劾降职,但很快召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不久复职礼部尚书。许敬宗修国史,歪曲事实,凡恨的人,就写得坏,谁贿赂他,就隐去恶事。处理政事更是顺风阿旨,阴附武后。李义府也以善文章著名,也为人阴险奸猾,平时逢人先笑,但一肚子坏水,只要稍有嫌隙就要暗中陷害。当时人都说他笑中有刀,因他阴柔而能害人,背后给他起了绰号,叫“李猫”。高宗拜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

许敬宗为了进一步投靠武后,就在王皇后被害后,立即上奏说太子李忠是庶出的,应废庶立嫡。也就是要改立武后的儿子为太子。李忠是高宗长子,永徽三年立为太子,但是后宫刘氏所生,没有坚强的靠山,他很知趣地主动提出让位。显庆元年(656年),高宗改封李忠为梁王,立武后的长子李弘为太子。从此,武后没有了后宫之忧,集中心思,来对付不合己意的元老勋臣,控制朝臣了。许敬宗、李义府是她的最好帮手。

武后撺掇高宗,升许敬宗为侍中,李义府参加政事兼中书令。许、李两人就迎合武后旨意,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勾结褚遂良图谋不轨。高宗准奏,将褚遂良一贬再贬,韩瑗、来济也被贬为外州刺史。不久,褚遂良、韩瑗忧愤而死。武后在通向执政的道路上,又清除了一个重要障碍。

接着,武后指使许敬宗伺隙构陷长孙无忌。恰巧这时有人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结党,高宗命许敬宗审理。许敬宗严刑逼讯,要韦季方攀诬长孙无忌。韦季方被逼不过,想要自杀,却又没有死成。

许敬宗竟抓住这个机会,诬奏韦季方想与长孙无忌勾结,伺机谋反,如今事情败露,畏罪自杀。高宗不信,说:“舅舅怎么会谋反!”许敬宗说:“臣审得详细,反状已清楚,陛下还要怀疑,恐非社稷之福。”高宗不禁哭泣起来,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如今我舅舅又是这样!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该怎么办啊?”许敬宗说:“房遗爱是个乳臭小儿,成得了怎么气候。可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做了30年宰相,一旦谋反,谁能当得了他。请陛下速作决定。”

高宗仍下不了决心,命许敬宗再去详细审问。次日,许敬宗奏说:“昨夜季方已承认与无忌同反。季方供说柳奭曾劝无忌立梁王为太子,如今梁王被废,无忌忧恐,为自安之计,才日夜与季方商议谋反。”高宗相信了,又哭泣起来,说:“舅舅果真如此,朕决不忍杀他。杀了他,天下人一定要骂朕,后世一定要骂朕!”许敬宗催促说:“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陛下若不早决,臣恐变生肘腋,后悔无及!”

高宗于是不再犹豫,也不召问长孙无忌核实,就下诏削去长孙无忌官职及封邑,押送到黔州安置。又废梁王为庶人,贬柳奭到象州,贬于志宁到荣州。不久,又派人到黔州逼长孙无忌自杀,到象州杀死柳奭。长孙无忌的子孙近亲也被杀的被杀,流放的流放。杀了长孙无忌,武后更加肆无忌惮,揽权行威。显庆五年(660年)十月,高宗小中风,头痛、目不能视,百官奏事,只得都委武后批决。武后聪明敏锐,涉猎文史,因此所处理的事都能符合高宗意思。于是政权渐渐移归武后,威势与皇帝一样。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中外称之为“二圣”。

可是武后因此愈来愈骄横,不再奉顺高宗旨意,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高宗一举一动都受制于武后,不能自己做一点事。他对此愤愤不平,偷偷地召来西台侍郎上官仪商议对策。上官仪说:“皇后专恣,天下人都不赞成,废了她。”高宗认为不错,就命上官仪起草了废后诏。

谁知宫中早就布满武后心腹,奔告武后。武后急忙赶来,大吵大闹,吓得高宗畏首畏尾,不敢发出诏书,还说:“我初无此心,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于是武后立即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一状,说他串通废太子李忠,阴谋叛逆。高宗这时已毫无主意,一切听任武后。结果,李忠赐死、上官仪处死,凡平时与上官仪有过来往的朝臣士大夫统统贬官流放。

从此,高宗临朝,武后垂帘听政。政事不论大小,官员要升要降、要斩要杀,都由她说了算。天下大权,全归中宫,高宗不过傀儡一个,拱手而已。武后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随后,武则天鸩杀太子李弘,逼死太子李贤。高宗继位后又废掉了继位的中宗和睿宗,并镇压了徐敬业的讨武行动。她还利用酷吏苛刑,大开杀戒,诛灭唐宗室诸王,连两个亲孙子也没放过,一步一步向皇权和君位迈进。

永昌元年(689年)十一月,武则天下诏改用周历,就是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一月八日,自名为曌,改诏为制。一月,升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武攸宁为纳言。通向皇位的道路已经铺平,一个武氏皇朝呼之欲出。

八月,又大杀唐宗室,连两个亲孙子也没放过。诛杀他们的亲党数百家,把唐宗室几乎全部杀光,幼弱的流放岭南。

同时,武则天组织朝野,为她制造登基舆论。和尚法明等编了一部《大云经疏》,宣称太后是弥勒佛下世,应该替代唐朝做人主。武则天下令全国各州都要建立大云寺,藏一部《大云经》,由高僧向百姓宣讲,为她夺取皇位大造舆论。酷吏傅游艺承旨纠合关中900多人,请愿“劝进”,改国号,赐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许,但提升傅游艺为给事中。于是,太后之意,路人皆知。文武百官、远近百姓、和尚、道士等6万多人按傅游艺请愿内容上书。声势浩大,连皇帝李旦也吃不住压力,上表自请赐姓武。喧喧嚷嚷,闹了一个多月。

九月九日,武则天登则天楼,宣布大赦天下,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自称圣神皇帝,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

中宗复位

长安四年(704年)十二月,武则天生了一场病,几天不见大臣,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在旁侍候。凤阁侍郎崔玄晖上疏说:“太子、相王足可侍奉汤药,禁宫重地,不可让异姓人随便出入。”武则天在奏疏上批道:“感卿厚意。”二张见了批语,怕武则天对他们日渐疏远,一旦病危,将大祸临头,便在宫廷内外私结党羽,暗作准备。

神龙元年(705年)一月,武则天病重,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张柬之,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崔玄晖,中台御史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五人合谋,决定诛灭二张。张柬之召见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问他:“将军今日富贵,是谁所赐?”李多祚说:“大帝(高宗)啊。”又问:“今二张危害大帝之子,将军不思报大帝之恩么?”李多祚说:“只要有利于国家,惟相公之命是从。”并对天发誓,以表忠心。于是张柬之调荆州长史杨元琰,以及桓彦范、敬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为左、右羽林将军,掌管羽林军。不久,灵武道按抚使姚元之(本名元崇,改名元之,后又改名为崇)回京,张柬之、桓彦范立刻去见他,同他商议讨逆之计,姚元之满口赞成。于是张柬之便派桓彦范和敬晖去见太子李哲,把商定的计划告诉他。李哲也同意了。

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晖、桓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军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王同皎至东宫迎李哲。李哲起初吓得不肯出来。后经王同皎、李湛以利害相劝,方始应允。王同皎马上把他扶抱上马,一同赶到武则天居住的迎仙宫。

这时,张柬之等已经将张易之、张昌宗捉住杀了。见李哲到来,便簇拥着到武则天寝所,武则天问:“哪个作乱?”张柬之答:“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已奉太子之命将二人杀了。因恐泄露机密,没有敢奏闻陛下。”武则天看了李哲一眼,恨恨地说:“原来是你呀,二张既诛,你可便还东宫。”桓彦范奏道:“太子不可再回东宫!过去天皇(高宗)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天意人心,久思李氏,愿陛下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孚民望。”武则天环视众人,看见李湛(李义府之子),便说:“你也是诛易之的将军啰?我对你父子不薄,不想乃有今日!”李湛羞愧地低了头不敢回答。武则天又看着崔玄晖说:“别人都是因人荐用,只有你是我一手提拔的,想不到你也来了!”崔玄晖说:“这正是为了报答陛下啊!”武则天无可奈何,只得下诏传位太子。

中宗即位,大赦天下,只有二张的党羽不赦。相王李旦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授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晖为内史,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敬晖、桓彦范为纳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驸马都尉、并右千牛卫将军,赐爵琅琊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其余有功人员,各有封赏。复国号为唐。隔了两天,迁武则天居上阳宫,留李湛宿卫。次日,中宗率百官至上阳宫,上武则天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

睿宗即位

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二月十四日,立妃韦氏为皇后,追赠后父韦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认为“异姓不封王,古今通例,今唐室初复,就封后族为王,决非明智之举。”中宗不听。谁知韦氏做了皇后,就效仿武则天在高宗时的故事,每当中宗坐朝,她便坐在帷幔后听政。桓彦范劝中宗不能这样做,中宗竟不采纳。

这时二张余党虽已诛灭,武氏宗族仍居要职。韦后又和武三思勾结,共同把持朝政,中宗成了傀儡皇帝。

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所生,所以不受韦后喜爱。武三思尤为忌畏太子,怕对他不利。上官婉儿因武三思的缘故,每下制敕,总是推尊武氏。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根本不把太子放在眼里,而且常常欺侮他,甚至呼他为奴。武崇训又教安乐公主要求中宗废弃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中宗没有同意。

李重俊积愤难平,景龙元年(707年)一月初六,他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祚、沙吒忠义等伪造制敕,发羽林千骑兵300余人,冲进武三思府第,把武三思、武崇训及亲党10余人都杀了。但这次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太子李重俊等人被杀,韦后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以加强。

武崇训被杀,安乐公主新寡,神龙二年(708年)十一月,中宗又把安乐公主嫁给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武延秀是武崇训的堂兄弟,仪表秀美,善于歌舞,公主早就喜爱他。及武崇训死,便招了武延秀做驸马。自此武延秀经常出入宫廷,又和韦后、上官婉儿、安乐公主结成一伙。韦后还和宗楚客、韦巨源等内外勾结,把持朝政,引起了朝野普遍不满。

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于烹调,得以经常出入宫廷,结识了韦后,受到格外的宠爱。二人做贼心虚,怕一旦事情败露,遭到杀身之祸,安乐公主一直想做皇太女,希望韦后和武则天一样临朝称制,他们几人都怀着同样的鬼胎,沆瀣一气,阴谋暗害中宗。一天,中宗正在神龙殿批阅奏章,宫女送来一盘馅饼。中宗平时很爱吃饼,拿来便吃,结果,毒发身死。

中宗死后,韦后秘不发丧,自己总理一切。过了几天,命16岁的李重茂即位,尊韦后为皇太后,立妃陆氏为皇后。

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商议,共劝韦后效仿武则天,把南北卫军、内阁要职都交给韦氏子弟担任,广结党羽、内勾外连。宗楚客又秘密上书,称根据图讖,韦氏应革唐命。宗楚客还想害嗣皇帝李重茂,但畏惧相王和太平公主,暗中与韦温和安乐公主商议,阴谋除掉二人。兵部侍郎崔日用一向依附韦、武,与宗楚客也有往来,知道他们的阴谋。他怕事情不成功,连累自己,便将此事密告了相王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李隆基英武多谋,对韦党专权深为忧虑,暗中招集智勇之士、广结左右羽林军将士,图谋除韦、振兴唐室。他得悉宗楚客等阴谋后,就与太平公主及公主的儿子卫尉卿薛崇简、苑总监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等计议,准备先发制人,一网打尽。

景云元年六月二十日黄昏,隆基改扮成平民,与刘幽求等进入内苑,跟钟绍京会合。到夜深,葛福顺、李仙凫都来了,隆基一声令下,葛福顺便拔剑直入羽林营,斩了韦播、韦璡、高嵩,大声对羽林兵说:“韦后毒死先帝,危害社稷,今夜当共诛诸韦,另立相王以安天下。倘有心怀异端,甘心助逆者,罪及三族。”羽林兵本来就恨诸韦,都欣然从命。

变乱突发,韦后惊惶失措,逃入飞骑营,被飞骑手起一刀,剁作两段,割下首级,向李隆基报功。安乐公主正在对镜画眉,也被军士一刀,砍下头来。驸马武延秀被斩于肃章门外。上官婉儿听到有变,随即带着自己起草的立温王、以相王辅政的遗制出来,正好碰到刘幽求进来,便把遗制给他看,表明自己心向帝室。刘幽求便代她向李隆基求情,免她一死,李隆基不许,下令立即斩首。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少帝诏命,要让位给相王,相王坚辞不受。刘幽求对宋王成器、平王隆基说:“相王前已成帝位,众望所归。今人心未定,国家事重,相王岂可再拘于小节,望能早日即位,以安定天下。”李隆基说:“父王生性恬淡,不惯世事缠身。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况亲兄之子,岂肯取代!”刘幽求说:“众心不可违!”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人心所向,相王方才应允。次日,少帝传位相王。

相王即位,史称睿宗,大赦天下,改元景云。

宋王让储

睿宗即位后,诸事还称心顺利,只有立太子一事,颇费筹思。他有6个儿子,按常例,该立嫡长子成器,而且在则天后光宅元年(684年)那一年他做半年多的傀儡皇帝时,已立过成器为太子,但三子平王隆基有讨平韦氏之功,因此到底立长还是立功,睿宗一直犹豫,拿不定主意。

宋王成器知道了父皇的心事,就主动去推辞储位,连续几天,流着泪,恳切地要把储位让给隆基。

睿宗征询诸王及公卿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平王功大,理应成于储位。守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说得很干脆:“能除天下之祸的,应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没有人比他更大;论德最贤,这事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于是,睿宗立隆基为太子。授宋王成器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又封其他几个儿女,成义为申王、隆范为岐王、隆业为薛王、加太平公主实封万户。

开元盛世

唐玄宗统治时期(713—755),是唐王朝国力鼎盛的时期。首先表现为人口的大量增长。天宝十四年(755),全国有890余万户,5290余万口。《新唐书·食货志》称:“是时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丝绵)百八十余万屯(六两为一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通典·食货典》)。天下诸郡,每年常贡的土物,尚不统计在内。以上只是百姓缴纳给政府绢布粟米两项的统计

数字,全国人口 5300 万的每年绢布粟米消耗总数,为数更多,尚不计算在内。

边荒脊地的开拓,农田水利的发达,屯田的经营,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繁荣,出现了“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元次山集》卷 7)的景象。大诗人杜甫歌颂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杜少陵集》卷 13)。柳芳《唐历》称:当时“天下雄富”,“东由汴、宋,西经歧、凤,夹路列店,陈酒饌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不仅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以及成都平原繁富如此,就是陇右河西地区,所谓“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已往,沙碛悠然”(《资治通鉴》卷 211,开元三年韦湊上疏语)的地方,这时也逐渐出现“阗阗相望,桑麻翳野”(《明皇杂录》)的繁荣景象来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官、私手工业普遍蒸蒸日上。官营的“少府”拥有工匠多达 1.9 万余人,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朝野僉载》)。主要手工业部门的纺织业,分工细致,工艺精巧,花色、品种繁多,远销域外。其他如瓷器、漆器、造纸等业,各有特色,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也日益活跃。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商业城市极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亚洲各地,特别是波斯、大食等国商人纷至沓来。开元中开大庾岭路(《全唐文·开大庾岭路记》),大大便利了内外贸易。市舶使也已设立(《旧唐书·玄宗本纪上》),可见海上贸易发达到了一定程度。

开元之治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继武、韦统治时期的动乱之后,民心思治,以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适应时代的需要,推行安定政局,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的方针,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推动中华文明登上了又一个高峰。

“救时宰相”与“伴食宰相”

开元二年,姚崇为宰相,与之同时任相的还有卢怀慎。

姚崇文武全才,通达知变。一次,他请假十余天。政务堆积,卢怀慎不能决断。待姚崇回朝,须臾即处理妥贴。故人称姚崇为“救时宰相”,而呼卢怀慎为“伴食宰相”。这个“伴食宰相”的雅号后来就成了讽刺尸位素餐的成语。

“救时宰相”的确名副其实。

开元初,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蝗虫飞来如云翳日,所落之处苗草罄尽。先朝也曾时遇蝗灾,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横尸遍野的惨景,以致物价飞涨,政局动荡。姚崇曾历任三代宰相,对此十分关注,力主诏令郡县及时捕杀。“伴食宰相”卢怀慎却认为蝗不可捕,捕则有伤“和气”,恐致灾祸。今日看来“伴食宰相”的这种迷信思想荒诞可笑,但在古时这种思想却很普遍而顽固。姚崇据理驳辩,慨然质问卢怀慎:“我真不明白,您那么怕伤害蝗虫,怎么不怕黎民百姓死于饥荒呢!”

一年,山东地方蝗害严重,地方长官倪若水却上书拒绝捕杀,还说:“蝗虫乃是天灾,人力怎能扑灭。朝廷要行德政,灾害自然消止。”姚崇立即回书给他,说:“依你的道理,假若地方长官好,实行德政,飞蝗也就不会入境了。你那里蝗虫为害,那不就是你这长

官无德吗？”倪若水被质问得十分尴尬，再也不敢抗命了。

官府为奖励治蝗，规定捕蝗一斗，奖粮一斗，捕蝗一石，奖粮一石。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因而，尽管蝗害连年，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

姚崇是玄宗遴选的贤相之一，此外还有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绹、杜暹、韩休、张九龄等多人。他们先后任相，各有所长，多有政绩，成为唐代的佳话。玄宗知人善任，是他取得政绩的重要原因。他能做到这点，并非出于偶然。

据史书记载，玄宗有一天照着镜子闷闷不乐。他身边的太监就说：“自从韩休任相，陛下比以前瘦多了。何若戚戚，为什么不罢免他的相位呢？”玄宗却说：“吾貌虽瘦，天下必肥！选相是为社稷，岂能为吾一身啊！”

奸相专权

姚崇、宋璟罢相后，张嘉贞、张说、李元绹、杜暹等相继为相。这些人虽不及姚、宋，但也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吏部侍郎李林甫早就觊觎相位。李林甫原是唐廷宗室。他表面上柔和谦恭，内里却奸刁狡诈，阴险毒辣。他为了要做宰相，广泛结交妃嫔宦官，探听玄宗的动静，所以每次奏对，都能迎合玄宗的心思，很讨玄宗的欢喜。

李林甫知道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想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寿王李瑁谋夺太子的地位，就向高力士表示自己愿意出力。高力士告诉了武惠妃，武惠妃十分感激，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李林甫说好话。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三月，侍中裴光庭去世，相位出缺。李林甫加紧了谋取相位的活动。哪知玄宗已与中书令肖嵩商量好了，决定任命右丞韩休为相。高力士把这消息透露给李林甫，李林甫很失望，但他马上强抑住内心的不满，高高兴兴地去拜访韩休，满脸笑容地向韩休道贺。过了几天，玄宗果然宣布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韩休虽然为人峭直，也不由对李林甫十分领情。

韩休是肖嵩荐举的。肖嵩原来认为韩休恬静温和，容易听话，哪知韩休做了宰相，办事认真，刚正不阿，遇事不肯苟且，常常在朝会上与肖嵩，甚至与玄宗争辩。肖嵩见他如此，逐渐讨厌他了。玄宗对韩休的认真作风，甚是敬畏，或在宫中宴乐，或于后苑游猎，小有过失，便问左右：“韩休知道吗？”话刚说完，韩休的谏疏已送来了。李林甫知道后，便买嘱太监在玄宗前进谗，要玄宗罢免韩休，以便自己取而代之。

这年十月，玄宗因肖嵩和韩休经常争论不休，失了和气，罢免了二人的相职，改任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张九龄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玄宗还想召李林甫入相，征询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说：“宰相关系着国家的安危，陛下若拜李林甫为相，臣恐他日必为社稷之忧。”玄宗却认为李林甫柔顺，奏对称旨，耳朵里又早灌满了武惠妃等夸奖李林甫的蜜语，执意起用李林甫，先擢升他为黄门侍郎。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玄宗任命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终于爬上了相位。

李林甫阴险而不露，惯于以甜言蜜语谄媚人，而背后却在谋害人，故有“口蜜腹剑”之称。

李林甫独揽朝政,堵塞言路,排斥异己,以酷吏为刀斧,残害正直的朝臣数百家,朝野钳口,皇太子也为之恐惧。李林甫的权势日炽一日,而朝政败坏,日甚一日。

玄宗不识其奸,反以为能。他有一天对太监高力士说:“现在海内太平了,吾想安居无为,委国政给林甫,你看如何?”

高力士为之一惊,说:“天下权柄,怎能轻易给人呢!”顿了顿又补充说:“他若养成威势,一旦有变,谁还敢说个不是呢!”

玄宗怏怏不快。高力士连忙谢罪,说自己胡说,该死该死。

高力士本是玄宗的心腹,对他的话,玄宗往常是言听计从的。这时,玄宗无心于朝政,沉湎于声色,骄侈起来,连高力士的话也听不进去了。最后导致天下大乱,而玄宗始终不悟。

贵妃专宠

736年,正是李林甫开始专权的那年,玄宗所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为此郁郁寡欢,后宫的美女充盈,却无一当意者。这时,闻说寿王妃杨玉环体态丰艳,绝世无双,即令太监将其接来侍酒。寿王妃天性聪颖,晓音律,长歌舞,尤善逢迎。玄宗以自己谱写的《霓裳羽衣曲》示妃。妃略看则已通晓,且歌且舞,有如仙女临凡,无与伦比。玄宗如获瑰宝,愁怀顿开,遂借酒寻欢,无所顾忌。从此,开始了他们的浪漫史。

寿王李瑁,是玄宗的儿子,武惠妃的亲生子。五十六岁的皇帝同二十二岁的儿媳的这种私衷,显然悖于伦理,是一大丑闻。玄宗遂让寿王妃自请为女官,入居南宫,赐号太真,南宫改名为太真宫。玄宗夺了儿妇,又给儿子娶了个韦姓的姑娘作妃子,以示慰藉。

杨太真入得宫来,恩宠与日俱增,不到一岁,仪体已比之于皇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生动地描写了她初时得到的宠遇: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这一对老翁少妇,春夜漫漫,仍苦其短,日上三竿,犹恋床第。这个曾在兴庆宫中盖起了勤政楼借以自勉的风流皇帝,从此再也不去上早朝了。有了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何以玄宗愿委政于奸相,竟连心腹的忠告也听不进去了。

六年后,杨太真被册封为贵妃。贵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可这时并没有皇后,她就是实际上的皇后了。玄宗视贵妃为心肝。她的家族都得到了封赏,宠爱得无以复加了。

有年深秋,大明宫中太液池的千叶白莲,居然有数枝在肃杀的秋景中异时独放,洁白晶莹,宛若玉成。京师中一时传为奇闻。玄宗携贵妃也来临池观赏。左右称誉白莲的娇美,赞赏不已。玄宗爱这白莲,更爱贵妃,遂指贵妃说:“莲花虽美,有形无神,又怎比得上吾这解语之花啊!”“解语之花”遂成为后世赞美佳丽的成语了。

贵妃生长在南国,喜食鲜荔枝。荔枝易坏,离枝四、五日则色味俱变。为快速贡奉

新鲜荔枝,玄宗特开辟了从岭南(一说川南)通往长安的数千里贡道,沿途设有驿站,备有快马。荔枝运到长安,色味不变。

君王宠幸,朝臣官吏也无不倍加逢迎,争献奇珍异味,器物珍玩。岭南军政长官的贡奉得到贵妃的欢心,遂连升三级。广陵的长官起而仿效,也被擢拔为朝廷大臣。由是,文臣武将瞩目后宫,全国风靡。

皇帝每临幸骊山华清宫,贵妃的三位姐姐与三个哥哥也必车骑从幸。大姐封韩国夫人,二姐封虢国夫人,三姐封秦国夫人。从兄杨钊被封为位当四品的朝中高官,杨钊娶了公主,封为驸马,杨国忠后官至宰相,领四十余职,权倾天下。杨家兄弟姐妹的车骑,每家一队,各衣一色,逶迤数十里,到了骊山,诸家合欢,往来穿梭,犹如万花竞放,遍山锦绣。

贵妃姿色虽美,心甚悍妒。曾两次因其醋意太浓,气恼了玄宗,被遣送出宫。

当又一次被遣送出宫后,她哭得犹如个泪人,杨氏兄妹也惊恐不安,担心大祸临头。谁知,玄宗那里也茶不思、饭不想,整日间愁苦欲绝。太监高力士事故练达,早看透了玄宗的心思,遂请赐膳贵妃。贵妃见高力士送来御膳,即刻剪下一绺青丝托高力士奉上,并感切地说:“妾罪当死,今日与陛下永诀。妾之什物,皆陛下所赐,唯有青丝是父母之物,特以奉献,以志衷情。”

玄宗与贵妃又一次破镜重圆,自不待言。但经两次磨难,贵妃虽悍,也不能不心存忧悸。

相传有一年,玄宗临幸华清宫,住在长生殿,正值七月七日乞巧佳节,夜阑更深,贵妃好端端忽地独自抽泣起来。玄宗初不知何故,温存劝慰,久久贵妃才道出了心事,说:“妾遥望牛郎织女二星,不由地慕其夫妻之久长,窃恐自身比不上他们。”稍顿又道:“妾览前史,每见时过境迁,秋扇抛残,怎能不为之伤情呢!”贵妃的衷曲深深地打动了唐玄宗,他们遂相盟誓以志诚,誓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这段宫廷艳史,后被编成戏剧演出,即《长生殿》。

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到天宝年间,奸相专权,贵妃专宠,玄宗日益昏聩,政治愈加腐败,繁荣背后的危机也就加剧了。

首先是均田制的逐渐瓦解。均田制是以劳动力计口授田的,也以劳动力计纳租赋、征发徭役。土地兼并发展着,负担租赋的民户缩减着,而朝廷的费用却加大着,财政的危机日甚一日。朝廷先是设法搜刮民户,议定租赋。然而,仍不足用,就派出征收大员,横征暴敛,甚至一次预征百姓三十年的租赋。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唐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动摇了。

其次是府兵制破坏了。府兵制原是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服役者自备兵器、资粮,轮番更替。均田制破坏了,府兵苦于生计,多有逃亡,加之死亡不补,府兵制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无兵可用了。京师宿卫遂改行募兵制。所募多是无赖子弟、市井小贩,毫无战斗力。同时,中原承平已久,社会风尚耻于当兵。宿卫京师的官兵时称“侍官”。京师人打架相诬必骂对方为“侍官”。甚至子弟当了军官,父母都不愿理睬他。中原几乎无兵可用了。

然而,这时边疆的军政长官,却都拥有悍兵强将,总计达四十九万,形成尾大不掉的

局面。

一言以蔽之，总危机的爆发只是时日问题了。

尾大不掉

唐朝的边帅向来不久于其事，表面看是出将入相，官高望重，其实不能久掌兵权，跟军队没有深厚关系。玄宗时办法变了，边帅往往连任十多年，有的还兼统几镇节度使。加以募兵代替了府兵，大将更容易培植私人势力，造成军阀的形势。

玄宗也考虑过把兵权交给谁最可靠的问题。王忠嗣兼任四镇节度使，被人诬告“欲拥兵尊奉太子”，险些送掉性命。因此，与王公大臣有瓜葛的人，有了兵权，皇帝便放心不下。正在玄宗为难的时候，李林甫出了一个主意：用“胡”人做边帅。他的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比汉族将帅可靠。这是他讲给玄宗听的话，心里其实另有打算。他认为“胡”将文化不高，不能做宰相，节度使都用“胡”将，断了边帅入朝执政的路，他自己的地位便牢固了。

唐朝本有重用各族将领的传统，但专用“胡”将做边帅，却是新的主意。玄宗很赏识这主张，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到了天宝六年（747），主要的节度使都是“胡”将了。

“胡”将也可能变成军阀。“胡”将忠于唐朝的是大多数，叛乱的野心家为数很少。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对唐朝都很忠顺，平叛的朔方名将李光弼也是契丹族。不过“胡”将成为军阀的时候，他一定会利用民族关系，结成一个集团，使叛乱带上民族矛盾的色彩。

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本姓康，叫轧荼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他才改姓安，叫做安禄山。他能说好几种兄弟民族的语言，先做互市牙郎，后来逐渐做到高级将领。天宝元年（742）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兼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他用献媚、贿赂等手段，骗取玄宗的信任。他的身材痴肥，玄宗曾指着他的大肚子，开玩笑道：“此儿腹中有什么东西，以致大到这个地步？”禄山对道：“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颗赤心。”玄宗听了十分高兴。禄山又拜杨贵妃做干娘，玄宗更加把他当自己人了。

他在范阳积极扩充实力，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庄、高尚做谋士，对投降或俘虏的兄弟民族战士，亲自用本族语交谈，好好安慰，编入部队，并挑选精锐八千多人，与称“曳落河”（壮士）；又重用非汉族将领，撤换了许多汉族将校，还积草屯粮，养战马数万匹。这些都是他准备发动叛乱的布置。

玄宗和杨国忠等沉溺在荒淫酒色之中，歌舞升平，毫无应变的准备。玄宗信任禄山，更做足了资寇兵而赍盗粮的举动。杜甫《后出塞》之四说“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唐政府把江南的粮食绢帛，远输幽燕，充实了安禄山的军需。安禄山要求兼管养马，就使他领闲廐、陇右群牧等使、知总监事。禄山利用职权，挑选了许多战马。甚至禄山要求给大批将校升官，要求用“蕃将”代替一批汉将，玄宗都立即批准。杨国忠和禄山不和，他倒是常说禄山要叛变的，然而这仅是权奸和军阀互相忌妒，并不是真有见识。这时府兵制已完全瓦解，京师的宿卫士兵只是些应募的市井无赖，没有作战能力。杨国

忠一面说禄山要反，一面对战备毫不注意。一旦叛乱爆发，自然只有听天由命的了。

当时也有人提醒过玄宗。天宝十三年(754)，有一天，玄宗对宦官高力士说：“朕如今老了，朝事交给宰相，边事交给诸将，什么都不必担心了！”高力士是玄宗心腹，权势很大，然而还是有点见识的人，他答道：“臣听得云南几次兵败，边将的兵权又太大，陛下有什么办法控制？臣怕一旦出事，不可收拾。怎么好说不必担心呢？”

玄宗听了，当时大约有点心动，便说：“卿不必说了，待朕慢慢想来。”

他有没有认真考虑，史无明文，无从核对，大约过了一会便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过他即使当真考虑了，也未必能阻止事变的发生，因为形势已经成熟了。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从这时候起，唐朝前半期的盛世一去不返了。

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发所流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兵15万，号称20万，以讨杨国忠为名，引兵南下，浩浩荡荡地杀向京城。

当时，天下太平日久，武备松弛，百姓都不懂战争，突然听到范阳起兵，远近震惊。河北原是安禄山统治的地方，安军所过，势如破竹，各地官吏望风瓦解，不是开门迎接，就是弃城逃窜。

安禄山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连陷灵昌(今河南开封以北)、陈留(开封以南)、荥阳，其先锋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等已领兵到武牢，与封常清率领的官军对垒。封常清部下多是新募士卒，未经战阵，被叛军骑兵一冲即溃，逃进洛阳。封常清收拾残部，连战皆败，最后只好凿坏城墙，逃往陕州。于是，洛阳陷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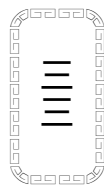
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随后率军西取长安，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西逃入蜀。在西逃途中，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众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并逼迫玄宗赐杨贵妃自尽。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马嵬之变”。

玄宗西逃后，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肃宗。肃宗整军经武，重用李泌、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君臣一心，上下同气，同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广大民众纷纷加入到平叛收复失地的战争中，战事逐渐有了转机。

安庆绪弑父

安禄山盘踞洛阳以后，纵情酒色、荒淫无度，弄得满身病痛、双目失明，性情更加暴戾，大臣、侍从稍不如意，重则杀头、轻则鞭打。侍监李猪儿经常被打得死去活来。

安禄山的宠妾段氏，估计安禄山活不长了，想要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安庆恩代安庆绪为嗣。安庆绪听到风声后惊恐万状，求严庄给他想个办法。严庄也受过安禄山的鞭打，一直怀恨在心，便劝安庆绪杀了安禄山自立，并要他赶快行动，免得错过时机。安庆绪欣然同意，只是派谁去行刺呢，严庄说可以找李猪儿。



安庆绪马上把李猪儿秘密叫来,严庄先问:“你前后挨打,还记得清次数吗?”李猪儿回答:“已记不清了。”严庄又说:“照你这么说,不死还是侥幸的。”李猪儿连连点头。严庄见火候已到,便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并说:“不行大事,死期就不远了!”李猪儿满口应承。

这一天夜里,严庄和安庆绪手执刀剑来到安禄山的寝所,侍卫见安庆绪、严庄满脸杀气,不敢阻挡。李猪儿手持利刃,直入帐中,先把安禄山枕边的宝刀抽出来,狠命朝安禄山肚皮上砍去。安禄山伸手摸枕边的宝刀,没有摸到,摇着帐竿说:“一定是家贼谋逆!”话刚说完,肚肠已经流出来,只在床上滚了几滚便气绝身亡。严庄命左右抬开卧床,掘地数尺,用氈把安禄山的尸体裹好后埋在床下,告诫宫中不准泄漏。

次日早晨,严庄向百官宣布,安禄山病危,立安庆绪为太子,隔了几天,又宣布安禄山把帝位传给安庆绪,自己做了太上皇,再过几天,又宣布安禄山死了,然后发丧。从地下掘出来的尸体已经腐烂,只好草草成殓了事。

血战睢阳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二十五日,尹子奇率勦、檀及同罗、奚兵13万攻睢阳(今河南商丘),以便南取江、淮。睢阳太守许远向河南节度副使张巡告急,张巡自宁陵引兵入睢阳。

张巡,进士出身,博览群书、精通战阵,在守雍丘时,以千余兵力与敌数万作战,常常出其不意袭击敌人,几个月中歼敌万余,因功授为河南节度副使。

张巡带到睢阳的兵马,只有3000人,与睢阳原有守军加在一起,也不过6800人。这一点人马要敌13万叛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因他指挥得当,经过16昼夜苦战,擒敌将60余人,杀敌2万余。许远对张巡的指挥才能非常钦佩,便请张巡负责指挥作战,自己愿作后备,张巡爽快地答应了。

三月,尹子奇又调集大军再攻睢阳。张巡激励将士们说:“我受国恩,为国守城,是完全应该的。但诸君为国捐躯,我却不能加赏你们,深感痛心。”将士们很受感动,纷纷请求出战。张巡便杀牛宰羊,大飨士卒,食毕尽数出城作战。张巡亲执大旗,身先士卒,直冲敌阵。敌军毫无准备,往后溃退,官军奋勇厮杀,斩将30余,杀敌3000余,叛军溃退数十里。

张巡守睢阳,将近10个月,城中食尽,众议弃城东走。张巡与许远商议,以为睢阳是江淮保障,若弃之而去,贼必乘胜而进,且士卒都饥疲羸弱,也冲不出去,不如坐守待援。这时,城里连茶纸也吃尽了,便杀马吃;马吃尽了,又捉鸟雀和老鼠吃,鼠雀没有了,张巡将爱妾杀了给士卒吃,许远也杀了家奴给士卒吃。城中人自知必死,但没有一个叛变投降的。

至德二年十月初九,贼军登城,将士们都饥饿病弱得动也不能动了,张巡与许远等都被叛军捉住。尹子奇问张巡:“听说你每战皆裂齿碎,是什么原因?”张巡说:“我志吞逆贼,但恨力不从心!”尹子奇被张巡的气节所感动,不想杀他,部下都说:“他是个守节之士,终不为我用。且他深得人心,还是杀了的好,免得后患。”于是把张巡与南霁云、雷

万春等 36 人都杀害了。张巡临刑时，颜色不变、神情如常。

收复两京

在张巡苦战的同时，肃宗接受李泌的意见，在至德二年（757 年）二月，移驾凤翔（旧址在今陕西雍县），以示进取。肃宗到了凤翔，果然前方士气大振，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都陆续到达凤翔，江淮漕运也经汉水通到洋州（今陕西西乡）、汉中（今汉中），长安人听说肃宗到凤翔，纷纷逃来，昼夜不绝。

李泌请派安西及西域之兵按原定计划取范阳，肃宗坚持要先收复两京。于是各路兵马奉命进战，结果几路人马出战都不顺利。郭子仪派子郭晔攻潼关，得而复失，败退河东；王思礼出战不利，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乘胜追击，前锋抵达太和关（今陕西岐山西北），离凤翔只有 50 里。

败报一日三传，凤翔震骇、全城戒严。肃宗传令，命郭子仪速来凤翔护驾。郭子仪一到凤翔。肃宗任命他为副元帅，令兵再攻长安。郭子仪请向回纥借兵，肃宗同意，一面命元帅广平王李俶调集朔方、西域等军，一面遣使去回纥。

回纥怀仁可汗有心与唐和好，立刻遣子叶护率精兵 4000 余至凤翔，肃宗当即召见并以厚礼相待，并当面与叶护约定：“克城之日，土地人民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又令广平王李俶与叶护结为兄弟。

至德二年（757 年）九月十二日，李俶率朔方军及回纥、西域等军 15 万，号称 20 万，从凤翔出发，十七日，至长安西香积寺北泮水东摆开阵势：李嗣业为前锋，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 10 万布阵于泮水之北，叛将李归仁出阵挑战，李嗣业执长刀，身先士卒，大呼奋击，杀敌数十人。于是诸军齐进，奋勇杀贼。

李归仁事先在阵东埋伏一支精骑，准备袭击官军后背，被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发觉，引回纥精骑出击消灭，叛军因此气馁。李嗣业又要回纥骑兵会合，出敌阵后与大军夹击，自午时战到酉时，斩敌 6 万余，叛军大败，逃进城去。

到了夜里，只听城内喧嚣之声不绝，仆固怀恩马上去见李俶，说：“贼必弃城走了，请允许我率 200 骑追击，必能捉住安守忠、李归仁等。”李俶说：“将军疲劳了，先休息，等明天再说。”怀恩说：“战事贵在神速，何必等到明天。”李俶不听，叫怀恩回营。待到天明，有探马来报，安守忠、李归仁与张通儒、田乾真都连夜逃走了。怀恩听说后叹息不已。

九月二十八日，官军进入长安。回纥叶护来见李俶，请履行前约，准予掳掠金帛子女。李俶跪在叶护马前，再拜说：“今刚克西京，便行掳掠，则东京人民必助贼死战，请到东京后再遵前约。”叶护爽快地同意了，即与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绕城而过，扎营泮水之东。李俶整军入城，百姓携老扶幼，夹道吹呼。李俶留长安三日，引大军东进，留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

三十日，捷报传到凤翔，百官向肃宗祝贺。肃宗一面遣人入蜀奏禀玄宗，请他回京；一面命左仆射裴冕去京师祭祀宗庙和安抚百姓。

东进官军，在郭子仪率领下，追击叛军到潼关，宰敌 5000 余，连克华阴、弘农 2 郡，兵锋所向直指陕州。盘踞在洛阳的安庆绪，尽发洛阳兵 15 万，由严庄率领着往救陕州，

与张通儒等共拒官军。十月十五日,郭子仪等抵达新店,遇叛军依山布阵,郭子仪等初战不利,正危急时,回纥精骑突然从南山击敌后背,叛军大惊,高呼:“回纥兵来了!”立即溃退。官军与回纥兵两面夹击,叛军大败。严庄、张通儒连陕州也不敢进,逃回洛阳。

安庆绪见严庄败回,惊惶不安。十六日夜,杀唐将哥舒翰、程千里等30余人,率领党徒,偷偷地出了苑门,逃往河北。

回纥兵争先拥进洛阳大肆抢掠,洛阳百姓前番已遭叛军蹂躏,这次又遇回纥兵逞凶,家家儿啼女哭、家财尽空。回纥兵足足骚扰了两昼夜还不满足,后来又由城中父老募集了罗锦万匹送给他们方才罢休。

洛阳既复,李泌再次请求回山。在收复长安后,李泌就请求回山。肃宗问他为什么要走,李泌说:“臣遇陛下太早,陛下宠臣太深,臣权太重、功太高、迹太奇,所以不可留。”肃宗说:“夜深了,先睡觉,以后再商量。”李泌说:“今陛下与臣同榻而眠,臣尚不敢尽言,何况他日宠衰。”肃宗问他还有什么话不敢说,李泌就说是关于建宁王李倓的事情。原来李倓因得罪了肃宗宠妃张良娣,被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进谗,肃宗一怒,命李倓自裁。李泌说了李倓冤死的真相后,又举武则天杀太子李弘和雍王李贤的故事,劝肃宗不可再犯这样的错误。李泌说这番话的用意,是因为广平王李俶功高,引起张良娣的妒恨,暗中散布流言,又想暗害李俶,所以特意提醒肃宗。李泌坚决要求归山,肃宗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回衡山。

胶战邺城

十月二十一日,郭子仪遣左兵马使张用济等率兵取河阳及河内。严庄走投无路,向官军投诚。陈留人杀了尹子奇,举郡出降。安庆绪败走邺郡,兵马不过1300人。过了几天,阿史那承庆、蔡希德、田承嗣等将各率所部来归,又聚众至6万。安庆绪忌史思明势强,遣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率劲骑5000,以征兵为名,企图杀了史思明。

史思明得到消息后连忙召部将商议,好几个人都劝他率兵投唐。史思明觉得有理,设计捉了安守忠和阿史那承庆,遣使奉表降唐。肃宗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前往慰抚,命他领所部兵讨安庆绪。

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李光弼上表肃宗,认为史思明降唐只是迫于形势,终将为乱,劝肃宗授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叫他与阿史那承庆共图史思明,肃宗同意了。

乌承恩接到密令,多次穿了女人的衣服到诸将营中诱说,赂以金帛、收买诸将。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史思明,史思明便捉了乌承恩,搜他的行李,查到了授予阿史那承庆的铁券和李光弼的信。史思明责问乌承恩:“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要害我?”乌承恩无言答对,只说是李光弼指使他做的。史思明马上召集将佐吏民西向而哭:“臣以13万之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要杀我。”将乌承恩杀了,牵连被杀的有200余人。

史思明又捉了李思敬,上表要求肃宗诛李光弼。肃宗遣使抚慰,把事情都推在乌承恩身上,说都是他自作主张,不是朝廷和李光弼的意思。史思明当然不会相信,于是举旗复叛。

九月二十一日,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王思礼等九节度使各统所部大军共

20万,征讨盘踞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安庆绪。肃宗因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元勋,不宜互相统属,因此没有任命元帅,却叫一个毫不知军事的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协调各军。

郭子仪引兵自杏园渡过黄河,在获嘉(今河南获嘉)击败安太清。安太清退保卫州(今河南汲县),郭子仪进兵包围了卫州。接着,鲁灵、崔光远与李嗣业等各领所部来会。

安庆绪发邺郡兵7万来救卫州,以崔乾祐领上军,田承嗣率下军,安庆绪自统中军。郭子仪集射手3000人,埋伏在军营四周的矮墙内,下令说:“我退,贼必追我,你们便登墙鼓噪而射。”说罢,率军纵马来战安庆绪。战不多时,子仪佯退,安军便追,追至矮墙下,伏兵齐起,矢如雨滴,喊杀连天,安军急退,子仪紧追,安军大败而逃往邺郡。

郭子仪率军追到邺郡,这时,许叔冀、董秦、王思礼等相继引兵而来。安庆绪收拾余军与官军战于愁思冈(安阳西),又大败,损失兵马3万余,只好退入邺城,据城固守。郭子仪等领兵围住邺城,安庆绪窘急无计,只好遣薛嵩向史思明求救,并请将皇位让给他。史思明答应了,便发范阳兵13万救邺,但到了魏州(今河北大名)便观望不再前进,只遣李归仁领步骑1万屯于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遥相呼应,自己于乾元二年正月初一,于城北筑坛,自称大燕皇帝。

在邺城的官军得悉史思明称帝,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李光弼建议分兵进迫魏州,牵制住史思明,使官军有较充裕的时间攻邺城,先解决邺城的安庆绪,然后再解决史思明。因鱼朝恩坚决反对,只好罢休。

郭子仪等围攻邺城,筑堤两重,引漳河水灌入城中,城中井泉皆溢,安军只好构栈而居。史思明见邺城危急,令诸将各至离邺城50里扎营,鸣锣擂鼓来威胁官军,命每营各选精骑500骑,去城下骚扰,官军一出击便四散奔回,官军回营后又聚集前来,闹得官军日夜不宁。史思明还选了几队精兵扮作官军,四出拦截官军粮运,看到运粮的车船,纵火便烧,官军粮食渐乏、人心浮动,都想撤军回去。

史思明看时机已到,引大军直抵城下。当时官军步骑60万列阵于安阳河北,史思明亲率精骑5万来战,李光弼、王思礼等先与交战,杀伤各半。郭子仪领军继进,还没来得及布阵,忽然乌云四合、狂飙骤起,拔木吹沙、天昏地暗,咫尺不能相辨。两军大惊,官军南逃、史军北奔,丢弃的甲仗輜重塞满道路。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今河南孟县境)保东京,东京士民因惊骇而散奔山谷,各镇节度使率军各归本镇。败兵过处,沿途抢掠,将士无法禁止,只有李光弼、王思礼的部队仍整齐严明,全军而归。郭子仪退到河阳,诸将陆续赶来,合兵数万,一面布置守城,一面上表朝廷请罪,肃宗还要用他,因此没有加罪。

河阳之战

史思明探知官军溃走,没有追击,屯兵邺城。安庆绪见官军败退了,又得了官军遗弃的六七万粮食,便与孙孝哲、崔乾祐商议,撕毁前约,拒绝史军入城。史思明派人来责问,安庆绪只好遣安太清上表称臣。史思明表示不必如此,愿与安庆绪约为兄弟,互相援应,与唐鼎足而立。安庆绪大喜,请与史思明歃血为盟,史思明同意了。

安庆绪率 300 骑到史思明营中,向史明说:“我失两京,久陷重围,幸亏大王来救,才得复生。”史思明忽然变了脸,说:“你失两京,还是小事。你杀父夺位,天地不容。我为太上皇讨贼,难道是要你奉承吗?”即命左右把安庆绪并其四弟,还有高尚、孙孝哲、崔祐乾等都杀了。史思明本想西进,因顾虑根本不牢,便留儿子史朝义守相州,自己引兵回范阳。

观军容使鱼朝恩借邺城失利,屡进谗言,诋毁郭子仪。肃宗召郭子仪回来,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李光弼刚到范阳,就接到史思明大军分四路南下的消息,便急忙赶往汴州,要汴滑节度使许叔冀守住汴,他即刻回东京发兵来救,许叔冀一口答应。哪知史思明兵到,许叔冀便与濮州刺史董秦及部将刘从谏等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以许叔冀为中书令,仍守汴州。

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与洛阳留守韦涉商议,决定放弃洛阳,移军河阳,命韦涉率百官退入潼关,河南尹李若幽率吏民出城避敌。

李光弼到了河阳。不久,史思明也引兵到了,令骁将刘龙仙到城下挑战。刘龙仙自恃勇悍,谩骂光弼。李光弼问诸将:“谁敢出马?”仆固怀恩愿往,光弼说:“此非大将所为。”裨将白孝德请去,光弼问他要带多少人,白孝德说一个也不要,手持两支长矛,跃马出城,从容向刘龙仙驰去。刘龙仙见只有一个人出城,毫不在意,依旧谩骂。等白孝德走近了,正要动手,只见白孝德向他摇了摇手,刘龙仙不知是什么意思,不敢动手。白孝德走到离刘龙仙还有 10 步,睁眼问道:“贼将认得我吗?”刘龙仙说:“什么狗彘!”白孝德大吼一声,举矛把刘龙仙挑下马来,割了首级回城。

史思明有良马千匹,每日放在河南岸洗刷。光弼命索军中牝马 500 匹,将马驹留在城中,待思明马到水边,都赶出城。母马离开马驹,嘶叫不已,史军牡马看见母马,立即蜂拥渡过河来,官军将它们尽数赶入城中。

史思明大怒,派了一支部队到河清,想要阻绝官军粮道,光弼屯军于野水渡防他。到天黑,当之勇,今夜必来劫寨,他若投降,你便引他来河阳。”果然到天近黎明,李日越领 500 骑来劫寨,见雍希颢整军站在栅门前,便问:“司空(李光弼)在吗?”雍希颢说:“昨夜已经走了。”李日越默然良久,对部下说:“今失李光弼,我必死了,不如投降吧!”雍希颢便领他去见李光弼,李光弼厚礼相待,当作心腹。高庭晖听到后,也来向李光弼请降。

诸将问李光弼:“降两将为何这样容易?”李光弼说:“史思明常恨不得野战,听说我在外,必以为可取。日越捉不到我,必不敢回。庭晖才勇胜过日越,听到日越被宠任,也就来归了。”众人都叹服。

史思明领军再攻河阳,李光弼登城观敌,对左右说:“贼兵虽众,但部伍不整,不足畏。不过日中,保证破贼。”命诸将出战。

到了日中,双方仍杀得难解难分。光弼召诸将来问:“敌阵何处最坚?”答:“西北方。”又问:“其次何处?”答:“东南隅。”光弼遂命部将郝廷玉率精骑 300 攻敌西北隅,又命论惟贞率精骑 200 攻敌东南方,并对诸将说:“你们看我令旗而战,我挥旗缓,任你们择利而战,我挥旗急,则万众一心,杀入敌阵,有进无退,违者立斩!”于是挥动令旗,命诸将出城再战。

战不多时,忽见郝廷玉回马奔逃,李光弼大怒,急遣人去取他首级。郝廷玉报告说因马中箭,否则怎敢后退,李光弼命回马再战。又过了一会,大将仆固怀恩父子倒退下

来,光弼又遣人去取他父子首级,怀恩看到使者提刀奔来,慌忙和儿子拨转马头,硬着头皮冲向敌阵。李光弼连连挥动令旗,诸将一齐拼死向前,喊杀声震天动地。叛军支持不住,向后溃退。这一仗斩首千余级,俘虏500人,溺死者千余人,擒敌大将徐璜玉、李秦授,董秦率部投降官军。

史思明河阳兵败后退守洛阳,此后双方相持,互有胜负。史思明残忍好杀,部下稍不如意便命族诛,人人不能自保。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常跟史思明在外打仗,很谦恭、爱士卒,将士多愿依附于他。但史思明不喜欢朝义,而爱小儿子朝清,留他守范阳,并且常想杀了朝义,立朝清为太子。左右将士知道了他的心思,暗中告诉了史朝义。

有一天晚上,史思明宿于鹿桥驿,令心腹曹将军领兵宿卫。史朝义住在旅店里,其部将骆悦、蔡文景对朝义说:“悦等与王死日快到了!请召曹将军来商议行大事。王若不许,悦等即刻投唐,王亦不能保全自己。”史朝义只是不响。

骆悦等把曹将军召来,与他商议行刺史思明。曹将军知道诸将都怨恨史思明,由不得他不答应。当天夜里,骆悦等带了300人到鹿桥驿,宿卫兵士虽感到奇怪,但害怕曹将军,都不敢阻挡。骆悦等进入史思明卧室,却不见史思明,喝问左右,左右早吓呆了,骆悦挥刀砍了几个,才有人说到厕所去了。骆悦等赶到厕所,仍找不到史思明,忽听墙外有马铃声,登墙一看,见史思明正要骑马逃走,忙一箭射去,正中思明,翻身落马。骆悦等把他捆绑了,带到柳泉驿,用绳子勒死。

骆悦等返报史朝义,用毡裹了史思明尸体,送归洛阳。史朝义即皇帝位,秘密派人去范阳,命张通儒等杀了史朝清及朝清母辛氏,以自己的部将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

史朝义自杀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初五,太上皇玄宗病死,享年78岁。当时肃宗也患了重病,到了十八日,也两脚一伸,跟着玄宗走了。

四月二十日,广平王李俶即位,是为代宗。九月,代宗因仆固怀恩之女是回纥登里可汗的可敦,便遣怀恩出使回纥,重修旧好,并向回纥征兵讨史朝义。登里可汗开始时不答应,经怀恩再三劝说,才同意派兵。

十月,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约期诸道兵及回纥兵马在陕州会合,进讨史朝义。代宗想命郭子仪为副元帅,宦官鱼朝恩和程元振坚决反对,只好任命仆固怀恩为副元帅。

战事告捷,怀恩进克东京和河阳城,捉住史朝义的中书令许叔冀、王伾等。怀恩留回纥军于河阳,遣仆固怀及朔方兵使高辅成率步骑万余乘胜追击史朝义。到郑州,两战皆捷。史朝义逃到汴州,其陈留节度使关了城门不让他进去,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其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领兵四万来与他会合,又被仆固怀击败,长驱进到昌乐(今河南南乐)东,朝义又率魏州兵来战,又被仆固怀击败。于是敌邺节度使薛嵩向唐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敌恒阳节度使张忠老投降了唐河东节度使辛云京。

史朝义逃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文安县以西的鄆州),官军很快赶到。史朝义屡次

出战,都吃了败仗,田承嗣要史朝义亲往范阳发兵来救,哪知史朝义前脚刚走,田承嗣便开门投降了官军。

这时史朝义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投降了朝廷,并遣兵马使李抱忠领兵3000人镇守。史朝义逃到范阳,李抱忠关了城门不让他进城。史朝义派人去责问李抱忠,李抱忠说:“天不保佑燕,今既归唐,岂可反复。”史朝义要求让他饱餐一顿。李抱忠答应了,命人在城东设食供应,结果家在范阳的将士都要求回家,史朝义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让他们走了。史朝义吃饱了,带着数百胡骑东奔广阳(今北京市杨柳青)。走到温泉栅,李怀仙派兵追来了,史朝义穷蹙无计,在树林中自缢而死,被李怀仙取了首级献给朝廷。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到这时总算结束了。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多是安、史降将。代宗广德元年(762年),授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宝臣;薛嵩为昭义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仍守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他们收集安史余党,各拥劲兵数万,自任文武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他们又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结成姻亲,互为援应,对付朝廷。代宗只求无事,一味笼络,但愿他们不生异心,不打算制裁他们。

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六月二十日,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朱泚与弟朱滔共同谋杀了节度使李怀仙,朱希彩自称留后;不久,朱希彩又为部下所杀,代宗正式任命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八年(773年)正月,昭义节度使薛嵩病死,弟薛萼继任留后。九月,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名为“四圣祠”,并上表求为宰相。代宗遣使命田承嗣拆毁“四圣祠”,同意加田承嗣同平章事。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田承嗣诱使昭义兵马使裴志清作乱,田承嗣佯称救援,引兵袭取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薛萼逃往京师。代宗派内侍到魏博晓谕田承嗣,要他各守封疆,田承嗣根本不睬,又派大将卢子期等攻占了洺州(治所在今河北邯郸东北)和卫州(今河南汲县)。

李宝臣和李正己一向被田承嗣看不起,便趁机上表请讨田承嗣。朱泚这时领兵到泾州保卫秋收,弟朱滔为留后,为了表示对唐室的忠贞,也奏请征讨田承嗣。于是代宗下令贬田承嗣为永州刺史,命李宝臣、朱滔与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攻田承嗣的北面;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原名董秦)攻田承嗣的南面,从两面夹击魏博。

田承嗣虽然强悍,究竟寡不敌众。部下将士渐生异心,裨将霍荣国与裴志清先后投降朝廷,侄儿田悦领兵攻陈留,大败而回,骁将卢子期攻磁州,被李宝臣捉住,解送京师,枭首毙命。田承嗣惶急万分,便想了一条计策,派人带了魏博的户口、甲兵、谷物等簿册,送给李正己说:“承嗣已经八十六岁,就要死了,几个儿子都没有出息,侄儿田悦也是个无用之辈。今日魏博所有,还不是为你守着,你何必出兵来攻打我呢!”李正己中了计,便按兵不动。于是河南各道都不敢进兵魏博。

田承嗣消除了后顾之忧,专心对付北方。这时,代宗为了表彰李宝臣,派中使马承倩到成德慰劳。回京时,李宝臣到馆驿送行,赠给他100匹绢,马承倩嫌少,当着李宝臣部下的面,将绢丢在路旁,大骂而去。李宝臣又羞又气,兵马使王武俊就说:“今日大帅

立了功,这小子还敢如此无礼,将来寇平之后,还不知怎样对待你呢!倒不如放了田承嗣,使朝廷还有所倚重。”于是李宝臣也引军而回。

田承嗣得到消息,又使一计,暗中派人到李宝臣的家乡范阳境内埋了一块石头,上面刻了“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倡入幽燕”几个字,接着指使一个术士去向李宝臣说范阳有天子气,并装着望气,带了人到范阳把石头挖来送给李宝臣。李宝臣看了石头上的字,正不知是什么意思,恰巧田承嗣派人送信来,约他一同取范阳。李宝臣以为正应了石上的谶语,欣然同意。于是田承嗣陈兵边境,叫李宝臣先引精兵2000人袭取范阳。

朱滔因诸道退兵,也回军瓦桥,不防李宝臣引军袭来,仓促应战,以致大败,急忙令雄武军使刘怱往守范阳。李宝臣听到范阳有备,不敢轻进。田承嗣得悉李宝臣已与朱滔交兵,便引军南回,并派人去对李宝臣说:“魏州有惊报来,我不能跟你去取范阳了,石头上的谶文是我跟你开玩笑的。”李宝臣又羞又恼,无奈也只好回军。

大历十一年(776年)二月,田承嗣上表请入朝谢罪。代宗下诏赦田承嗣罪,官复原职,准予他和家属一起入朝。五月,汴宋都虞侯李灵耀勾结田承嗣,杀了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自称留后,并效仿河北各镇,任命自己亲党为辖境内八州的刺史和县令。八月,代宗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征讨李灵耀。十月,李忠臣、马燧、陈少游与李灵耀大战于汴州城西,李灵耀军败,入城固守;田承嗣遣侄田悦领兵救灵耀,被李忠臣、马燧杀得大败;李灵耀连夜逃出汴州,在韦城被永平军将士杜如江捉住,解送京师处斩。

田承嗣看到汴州平定,怕朝廷派兵征讨,又上表朝廷,表示悔改,代宗又赦免了他,并叫他不必要入朝了。李忠臣、李宝臣、李正己等看到田承嗣出尔反尔,狂悖无礼,朝廷也不能奈何他,便争相仿效。从此各镇割地自据,名为朝廷守土,实际上各自为政,朝廷再也无法对他们行使命令。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形势和中晚唐的历史相终始。割据状态的存在,造成国家分裂,阻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劳动人民反对割据,地主阶级的多数人士和商人也反对割据。从这点来看,唐朝政府要发愤图强,恢复统一,是符合人心所向的,并非没有可能。问题是朝廷内部积弊太深,宦官专权,大臣朋党纷争,成为不治之症。它们又与藩镇割据交织在一起,更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

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宦官专权的问题,唐代也很严重。专制君主最相信亲近的奴才,这是宦官掌权的根本原因。唐德宗即位之初,很想有番作为,曾经疏斥宦官。但是经历了几次变乱之后,对文臣武将都丧失了信心,结果仍然走进了与宦官共治天下的死胡同,愈陷愈深。兴元元年(784年)以宦官窦文场、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贞元十二年(796年),又以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宦官领兵,成为制度。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强有力的部分,宦官掌了兵权,慢慢地连皇帝本人的生死废立,也操在手中了。

宦官的专横带给人民的灾难是异常沉重的。德宗时,宦官广占长安的“甲舍名园,

上腴之田”，掌握了京畿一半的土地。“宫市”最能说明宦官残酷地掠夺人民的事情。所谓“宫市”就是宦官出外采购宫中用物。开头还只低价强买，后来索性派一批人，叫做“白望”，看中什么，便要什么。他们有时付1/10的代价，有时还要向货主勒索什么“进奉门户”和“脚价银”。

这时地方藩镇拥兵割据，中枢宦官弄权自恣。政治腐败、民怨沸腾，阶级矛盾越来越严重。地主阶级中比较有见识的一部分人士，希望改变这个局面，挽救唐王朝的统治，于是有了王叔文改革的运动。

王叔文(753—806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门。旧史说他以棋艺进身，侍读东宫，成为太子李诵(顺宗)的心腹。

王叔文结纳了许多人才。与他同时伴读东宫的有王伾，此外以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八人，最为有名。改革失败后，八人都被贬为边远地方的司马，后人叫做“八司马”。此外还有吕温、陆质、李景俭、房启、李谅等，也和叔文志同道合。这些人各有所长。后人最熟悉的柳宗元、刘禹锡两人不仅长于诗文，而且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叔文认为这两个人的才能都可以做宰相。程异善于理财，他管江淮赋税，着重整顿工作，避免增加人民负担。“八司马”后来只有他再受重用，就因为宪宗要借重他理财的本领。吕温识见颇高，他写过一篇《诸葛武侯庙记》，认为自汉末以来，人心厌恶汉朝，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口号，不受群众欢迎。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去世，太子继位，王叔文领导的改革开始了。

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显得软弱无力。顺宗不能打破传统势力的束缚，因二王资历太浅，只能任资格较老、出身名门的韦执谊做宰相。王叔文以翰林学士的名义，负实际的领导责任。翰林学士要为皇帝起草文件，可起“内相”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毕竟削弱了运动的声势。

新朝廷采取了一些措施。

京兆尹李实是个民愤极大的酷吏。顺宗下诏把他革职贬逐。长安人民听到这消息，顿时轰动了，大家高兴得欢呼赞叹。许多人拾了砖头石子，候他出衙，想给他吃点苦头，出口恶气。这个家伙知道了，只得偷偷地从小路溜走。

政府下诏宣布停止宫市，长安人民又高兴了一阵。

政府还把禁闭在深宫里的宫人和教坊女妓600人，释放回家。下令免除欠税，禁止官吏在正税以外的额外进献。这些措施都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它们只是些枝节问题，真正要改革朝政，就必须把兵权和财权接收过来。

财权不难解决。王叔文解除李锜诸道盐铁转运使的职务，请宰相杜佑兼领，自任副使，掌握实权。

争夺兵权是成败的关键。当时宦官的首领是俱文珍，做中尉统兵的是杨志廉、孙荣义。王叔文用移花接木之计，任命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副使。这道命令不涉宦官一字，而使神策军脱离中尉管辖，改归范、韩二人统率。这着儿走通了，对付俱文珍之流便易如反掌了。可是那些宦官门下走狗的将领，纷纷向中尉投状，说要改受范希朝的管辖了。宦官大怒，密令诸将拒绝服从政府命令。范希朝到了行营，诸将不来参见。王叔文知道了，无计可施，只有叹息而已。

同年七月，俱文珍等勾结看不起王叔文等的大官僚，以顺宗久病为理由，宣布由太

子李纯监国。八月下诏禅位,诏书上必须用顺宗的年号,不好再用贞元,才改元永贞。这幕政变完全是宦官制造的。

接着,王叔文、王伾和他们的同道纷纷被贬。王叔文被降为渝州司户,在第二年处死。改革运动完全失败了。

元和中兴

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形成藩镇与中央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的藩镇拥有重兵,自署将吏,不输贡赋。肃、代两朝的姑息,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德宗时的四王二帝之乱,充分显示了藩镇的跋扈。顺宗时曾利用王叔文等人锐意改革,以图振作,亦未成功。宪宗即位之初,面临的是各种矛盾交错发展的、危机严重的局面,宪宗注意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抓住有利条件,立志削藩,于是出现了一段中兴局面。

元和元年(806年),针对方镇帅守除授不由中央及不入谢、不朝觐的现象重申法令,令诸镇入阁拜谢。与此同时,乘机更换方镇帅守,以防帅守久居一地,发展地方势力。当时被更换的帅守30镇,不仅有东、西南地区的帅守,也有西北及中原的方镇,从而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朝廷的易镇措施遭到了一些方镇的抵制,西川刘辟拒不受征入朝,并出兵侵扰它镇;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后,其甥杨惠琳自为帅守,拒绝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入境;浙西的李錡起初佯求入朝,既而又拒绝入觐。在方镇帅守纷纷入朝易镇的形势下,昭义的卢从史、忠武的刘昌裔、宣武的弘等中原方镇却保持静默观望态度,而河南、河北的强藩更倚仗地理、军事和财政的优势,维持割据状态,不为朝廷法令所动。所以中央要想重振朝廷威望,必须改变贞元以来害怕藩镇生事而一味姑息的态度,实行武力削藩。宪宗根据各方镇与中央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以及势力对比优劣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西川节帅韦皋死,留后刘辟使诸将表求节钺。朝廷不许,派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辟为给事中。刘辟拒不受征,阻兵自守。朝廷不得已,想用妥协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安定,遂以刘辟为西川节度使,知节度事。刘辟并不满足,在要求兼领三川遭到拒绝以后,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企图以武力达到割据三川的目的。在宰相杜黄裳的坚持和策划下,宪宗下诏讨辟,以崇宗文领兵。伐蜀战争进行了8个月,刘辟兵败被俘。在刘辟发动叛乱的时候,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以出征无功、骄蹇不逊被责令入朝,以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据城对抗,请继其舅韩全义为节度使。朝廷诏发河东、天德兵平定叛乱,不久,杨惠琳为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所杀。

西川、夏绥两镇是关系边镇安危,乃至长安安危的重要军事重地。西川一向担负着“抚蛮夷”、“殿邦国”的重任,是“宰相回翔之地”,夏绥也是防范西北边镇的要镇。在贞元朝廷的姑息下,西北边镇兵士动乱、擅自废立节帅的事屡有发生,这些都说明对西北控制的松弛。宪宗首先对西川、夏绥用兵,正是考虑到两镇的军事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考虑到西北边镇上有神策军监制,西川也非反侧之地,对两镇反叛的兵力中央有胜利的把握,所以,首战两镇并大告成功。

朝廷平定夏、蜀之后,藩镇气焰开始收敛,纷纷要求入朝。元和二年(807年),镇海

节帅李錡亦不自安,迫于形势要求入朝,但并无诚意,不久阴谋败露,遂发生叛乱。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锬为诸道行营兵招讨处置使,统领淮南、宣歙等道之兵进讨。李錡以宣州富饶,想首先攻取,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3000袭击。三人与牙将裴行立同谋倒戈,李錡被解送长安处死。李錡的平定,使东南财赋重地获得安定,中央的财赋来源得到了保证。在以后平定淮西的战争中,浙西殷富的财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淮西是浙西平定后的下一个讨伐目标。虽然有一些方镇入朝,受制于中央,但河南、河北诸镇以及宣武、昭义、忠武等少数帅守仍保持独立的状态。削藩如不指向这些强藩,势必无法解除朝廷的腹心之疾。为了对付强藩,宪宗决意讨伐淮西。淮西与中央的对抗在李希烈时已然开始,李希烈参与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镇叛乱,自称禁帝。李希烈死后,吴少诚继为节度使,派兵袭击唐州、许州,德宗合兵进讨,屡为所败。元和4年(809年)吴少诚死,吴少阳自为留后,后受命为节度使。九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总兵柄,不迎敕使,发兵四出侵掠。朝廷以淮西擅自继袭,肆行寇掠之故下令征讨。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讨。平淮西是元和中兴大业中关键性的一战,从元和九年到十二年,战争进行了四年。中央调动了全部人力和物力,战争比以往艰巨得多。淮西经过李希烈以后30多年的经营,形成了一个拥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吴元济的叛乱,得到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支持,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南北呼应,极力破坏并阻止朝廷的平乱。李师道在元和元年为节度使以后,表面归顺唐王朝,暗中却和河北诸镇相勾结。他和王承宗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以后,就发兵遣将,以助官军讨吴为名,派人在各地进行扰乱破坏,以行援助吴元济之实。如焚河阳转运院仓库,入京刺宰相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击主战派。宪宗支持以裴度、武元衡主持讨伐事宜。元和十二年(817年)夏,裴度自请督师,时值淮西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军心动摇,降唐者多为唐军效力。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在降将李祐的引导下,雪夜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李愬将9000士兵分为3队,以训练有素的士兵3000为前锋,以3000人殿后,急行军130里,到达州城,大破吴元济,元济被俘获,淮西遂定。对淮西用兵的胜利提高了唐廷的威望,淄青李师道、横海程权、成德王承宗、幽州刘总相继归服,李师道也被部下所杀。至此,长期割据的藩镇表示服从中央,使自广德以来60年间藩镇跋扈30余州的局面有了很大的转变。

为了武力削藩,保证军费开支的供给,宪宗着手在财政上进行一些改革。首先是改革了榷盐法。元和初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将隶属于浙西观察使的堰埭收归盐铁转运使,罢除江淮因循权而置的公私堰埭,这是维护国家专利的重要措施。此外,以实估计算盐利,并进而强调除盐本外所得之利悉归度支,将东南盐铁财赋计入国家岁收,统一支配。李巽又整顿了漕运,以便将所征财赋顺利运往中央。为了改变方镇利用实估、虚估的差价进行盘剥、聚敛,以至对所属州税外加征的现象,宪宗采纳了裴迥的建议,对现行的赋税政策进行改革。元和三年(808年)宣布: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按省估折纳赋税,不能随意征纳现钱和贱价折纳匹缣。其次,规定节度使、观察使所治州征税,不足时方可征所属的其余州。为了贯彻改革税法的方案,中央派两税使到江淮以南财赋之地监督执行。又采纳李绹等人建议,在振武军、天德军开营田,以资军费。出宫人,绝地奉,禁南方掠卖奴婢,以及并省内外官,节省开支,等等。宪宗在政治、经济几方面的改革,使唐后期形成的藩镇跋扈、全国分裂、中央政权衰微的政治局面出现了转机,元和朝

统治出现的新局面 ,被史家誉为“元和中兴”。

甘露之变

永贞革新失败后 ,宦官更加专横跋扈。文宗为了摆脱宦官的控制 ,任命李训和舒元舆、王涯为宰相。再次谋划消灭宦官势力。

太和九年(835 年) ,任命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 ,户部尚书王璠为河东节度使 ,部署他们大量招兵 ,壮大自己的力量。又任命刑部侍郎李孝本为御史中丞 ,以太府卿韩约为金吾大将军 ,直接掌握首都及宫廷防卫权力。这些人都是李训的亲信 ,分别安置在要害部门和地区 ,为内外夹击、一举消灭宦官集团做好准备工作。

这年十一月的一天 ,唐文宗在紫宸殿上朝 ,百官鱼贯入宫 ,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将军韩约匆匆入奏说 :“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 ,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感动上天 ,不能得见甘露。”说完以后 ,韩约手舞足蹈给皇帝叩头。宰相李训、舒元舆也率百官拜贺 ,并请皇帝立即亲自观赏。文宗欣然同意 ,于是坐上龙辇出紫宸门 ,升含元殿。先叫李训去看看 ,他很长时间才回来。李训说 :“甘露已经看不清了 ,但暂时不必宣扬出去。”唐文宗说 :“有这样的事情吗 ?”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宦官前去探视。李训召集郭行余、王璠等 ,入殿受诏。王璠吓得全身哆嗦 ,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受命诏募的亲兵数百人 ,携带武器等候在丹阳门外。李训召集这些亲兵 ,部署杀宦官的计划。河东兵陆续进京 ,唯独邠宁军却观望不前。仇士良等进入金吾厅 ,正好遇见韩约 ,并发现韩约神情紧张。仇士良惊讶地问道 :“将军为什么这样紧张 ?”话还没有说完 ,忽然看见金吾厅里风吹幕起 ,里面藏着甲兵 ,于是仇士良慌忙往回跑 ,进了含元殿 ,他气喘吁吁地对皇帝说 :“宫里要发生暴乱了 !”李训等看到仇士良向含元殿方向跑去 ,急忙招呼金吾卫士 ,对他们说 :“赶快到含元殿保卫皇帝陛下 ,进去以后 ,每人赏钱一百缗。”金吾卫士正要登含元殿 ,大宦官仇士良眼明手快 ,急忙令宦官抬着皇帝从殿后出去。李训上前拦住轿子 ,对文宗说 :“臣奏事未毕 ,请陛下暂时留步。”仇士良怒气冲冲地说 :“你们在宫里布置武装 ,要谋反吗 ?”文宗说 :“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听 ,抢步向前来打李训 ,被李训推倒。随后李训从靴子里拔出匕首 ,要刺杀仇士良 ,被宦官拦住。仇士良被抢走。这时 ,罗立言率京兆逻卒 300 余名从东面赶到。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 200 余名从西面赶来 ,并会同金吾卫士 ,登殿杀宦官 10 余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面抵挡 ,自己引文宗走向宣政门。李训在后面追赶 ,被宦官郗至荣截住 ,并被其打倒。宦官把文宗抬到宣政门。等李训挣扎着站起来 ,宣政门已紧闭。李训知道镇压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 ,急忙换上从吏的绿衫 ,化装出宫。郭行余、罗立言、王璠也各自寻找藏身之处。

宰相王涯、贾餗并没有参加李训消灭宦官的计划。他们看到殿中发生变乱 ,不知是怎么回事 ,仓猝之间回中书省 ,听候消息。宰相舒元舆因参与密谋 ,闻报先逃 ,王涯、贾餗也跟着走出中书省。中书门下省的金吾卫吏卒千余人 ,也都向外跑。此时禁军赶到 ,被砍死六七百人。大宦官仇士良 ,又分兵掩闭宫门 ,横加屠戮。所有诸司吏卒 ,及附近商贩 ,都惨死在宦官刀下 ,尸体狼藉、遍地朱紫。同时 ,大宦官又派骑兵千余人 ,追捕

逃入。宰相舒元舆、王涯都被禁军捕获,各加镣铐,施以酷刑。

禁军大兴打伐之际,坊中地痞流氓伪托禁军,乘势骚扰,杀人越货、互相攻劫,扰乱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百官上朝,日出以后才打开建福门。宫城内外戒备森严,禁军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朝官只许带一名随从。文武百官屏住呼吸慢慢前进,走到宣政门,只见大门禁闭。等到开了宣政门,进了大殿,唐文宗坐在紫宸殿。唐文宗见没有一个宰相上朝,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宦官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说到这里,把控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文宗接过来略看一下,敕令郑覃、令狐楚等上殿,把仇士良诬告王涯的状子给他们看,并且流着眼泪说着:“这是王涯的手笔吗?他如果真要谋反,定要正法。”于是敕令令狐楚、郑覃为代理宰相,并且叫他们起草诏令,宣告李训等罪状,但用语模棱两可,仇士良看了,很不满意。

仇士良讨厌令狐楚,于是提拔李石任宰相,和郑覃共同辅政。当时中央各部门主要官员已安排就绪,但是长安城内的秩序仍然混乱,流氓打手夜间继续劫掠。神策军将领等率500人,分屯通衢、打鼓警众,严禁抢劫,并杀戮首犯10余人,从而使首都社会秩序暂时安定下来。

过了几天,仇士良令禁军300余人,挑起李训的人头,押着舒元舆、王涯、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游街示众,然后把他们推到独柳树下,全部斩首。他们的亲属,无论远近,也一律处斩。

这就是“甘露之变”。从此以后,大宦官仇士良等气焰益盛。上胁天子、下凌宰相,唐朝政治更加腐败。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也是唐末政治史的重要内容。“牛李”是指党争中的两大派别——牛党和李党。其中李党的首脑人物为李德裕、郑覃、陈夷行、李绅等,牛党则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他们之间存在着政见分歧,而一旦构成党争,积怨渐深,又不免掺杂着许多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四月,宪宗诏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在策试中指陈当时政治的缺失。李吉甫泣诉于宪宗,许多考官和参预制科的官员,都因此贬官。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认为牛僧孺等直言时事,吏部侍郎杨于陵等以考策敢于直言,不应受到遣谪。不久,李吉甫出为淮南节度使。后来牛僧孺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使牛李两派之间逐渐形成无法消除的嫌隙,酿成了势不两立的朋党之争,史称“牛李党争”。

李德裕以宰相子任官,不是由进士科第出身。当时科场风气浮薄,故李德裕对进士科多有批评,还协助武宗对进士科进行改革,整顿科场风气,任用精鉴徇公的人负责贡举,从而使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健全。他在协助武宗改革方面也起过积极作用,是唐朝末期比较重要的改革家。牛僧孺出镇襄樊时,“汉水溢”(《新唐书·武帝纪》),李德裕便归罪于牛僧孺,免除了他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职务,迁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李德裕还抓住各种机会打击牛党,或借武宗贬斥牛僧孺。他自己也以平泽潞功,进官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而牛党则遭到了沉重打击。

武宗病死后,宣宗继位,即位听政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宣宗素恶李德裕专权。李德裕的贬黜,主要罪状有两条,第一条是“擅改”《宪宗实录》,凡是不利于其父李吉甫的,他都加以削改。第二条是参与制造吴湘冤案。牛僧孺一派王相也久遭贬逐。

李德裕罢相,李党完全失势,牛党却大大抬高了。白敏中、令狐绹相继为相,牛党的后一代都冠冕蝉联,如牛僧孺子牛蔚,唐懿宗咸通末年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僧儒次子牛勣,僖宗乾符中,官至剑南西川节度使,等等。李德裕一派的子弟及高位者很少。

牛李党争是唐王朝政治衰微的一个重大表现。唐王朝的中枢统治集团早已失去了贞观时期那种融洽的君臣关系和臣僚关系,派别之间的争夺也给王朝政治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内耗,使朝廷不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力量来对付各种社会矛盾。派别之争也使统治集团遗漏了许多有才有识有志之士,如李商隐、白居易等皆以党争而不得仕进,寂寞终身,只得退而与裴度等一同“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旧唐书·裴度传》)。牛李党争既是唐王朝政治衰微的结果,反过来,也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天补平均大将军

唐朝末年社会矛盾急剧恶化,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各级官吏巧取豪夺,赋役无度,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唐朝虽然镇压了裘甫、庞勋起义,但并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反而埋下了更大的不稳定。懿宗又不思励精图治,而是骄奢荒政,宠信谀臣、贬忠良。咸通十一年(870年),庞勋起义的余部就相聚间里,散在兖、郓、青、徐之间,进行反对朝廷的活动。这个地区成了唐末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热点,终懿宗朝,都没能消除这个热点。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八日,懿宗死,时年41岁。大宦官刘行深、韩文约杀长立幼,立懿宗第五子普王李儇即位,改名僖宗,时年12岁。这个小皇帝专事游戏,斗鸡打毬,把政事全委托给从普王府带进宫来的左神策中尉田令孜。

这年秋,自虢州(今河南灵宝)直到海边,发生了大旱灾,小麦只收了一半,秋粮几乎颗粒不收,老百姓只能以草为面,磨叶成粉充饥,无数百姓饿死。官府还要催缴钱粮,逼得百姓撤屋伐木、卖妻鬻子。整个关东地区愤怒起来了,一股一股贫民揭竿而起。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十一月,濮州(今河南范县)盐贩子王仙芝率众数千,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起义。乾符二年(875年)正月三日,他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挟击唐朝官吏同裘甫起义一样,要建立一个以公平为原则的社会。六月,王仙芝与大将尚君长一起攻克濮州、曹州(今山东曹县),队伍迅速壮大到数万人。

王仙芝贩私盐有个老搭档,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黄巢。黄巢是曹州冤句(今曹县西北)人,能文能武、善骑能射、任侠好义,曾经多次考科举落第。王仙芝起义,黄巢毅然投笔,与弟黄揆等聚众数千响应。

七月,关东又发生大蝗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于是更多的农民纷纷聚义,多的千余人,少的数百人,投入王仙芝、黄巢起义。数月之间,黄巢所部也发展到数万,攻州略县,横行山东。

唐朝廷诏调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镇军急速集结曹濮地区镇压。十二月，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统一指挥各道。乾符三年（876年）七月，宋威率军在沂州城下，与王仙芝大战，获胜。王仙芝、黄巢突然踪迹全无。宋威表奏王仙芝、黄巢已被消灭，就遣散诸道兵，自己也回青州（治所今山东益都）去了。百官入朝晋见僖宗，庆贺天下太平。

谁知过了三日，各州县纷纷上表报告说发现了王仙芝。朝廷只得又诏调诸道兵，惹得被征调兵士怨怒思乱，战斗力大为削弱。八月，王仙芝、黄巢乘虚挥师西进，攻克阳翟（今河南禹县）、郟城（今河南郟县）。九月，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阳武（今河南登封东南），兵锋直逼洛阳，东都大震。朝廷急命宋威统率本镇及平卢、宣武等四镇兵进驻亳州（今安徽亳县），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迎击，又调昭义节度使曹翔率步骑 5000 守卫东都，任命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卫东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扼守汝、邓（今河南邓县）要路，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守陕州、潼关，以防义军入关。

王仙芝西攻郑州、中牟后，突然翻过伏牛山，疾驱五六百里，攻打唐、邓 2 州。再长驱南下 600 多里，攻克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县西北）2 州。十二月，回师攻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庐、寿（今安徽寿县）、舒（今安徽潜山）州，又南攻蕲（今湖北蕲州）等州。黄巢也率部穿过嵯峨山（今河南遂平县西），与王仙芝部平行南下，在蕲州会合。

这时两支义军只剩下 5000 人马，王仙芝想受朝廷招安求官，派降官王镣送书信给蕲州刺史裴偃。裴偃正中下怀，与王仙芝约定，双方收兵不战，由他向朝廷为王仙芝求官。裴偃是宰相王铎的门生，他开城门延纳王仙芝、黄巢等义军将领 30 多人，设宴置酒，还送了义军很多财货，当场具表给朝廷为王仙芝请求委任状。

不久，宦官专程从长安到蕲州，送来告身，委任王仙芝为左神策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拿到告身很高兴，王镣、裴偃等人都去向他祝贺。黄巢闻讯赶来反对，大发雷霆，大骂王仙芝：“当初大家共立大誓，横行天下，如今你一人想去左军当官，叫 5000 弟兄到哪里去！”说完，痛打王仙芝。义军将领世齐声反对不已。

王仙芝怕触犯众怒，就没有受命，烧了官舍，在城中驱杀，裴偃逃奔鄂州去了。但黄巢与王仙芝从此分裂，王仙芝与尚君长带了 3000 余人，黄巢带了 2000 余人，在蕲州分道而去。

黄巢率部北上，行军 1500 里，乾符四年（877 年）春攻克郢州（今山东郢城）、沂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然后突然再下嵯峨山，与据山留守的尚让会合，休整。七月，回兵中原，进攻宋州，与宋威所率忠武、平卢、宣武三镇兵大战，打得宋威躲进城中不敢出战。朝廷派左威卫大将军张自勉率兵 7000 赶来增援，黄巢怕受夹击，避其锋芒，不得不撤回，南下攻克安州，略地蕲、黄（今湖北黄冈北），又突然北上，攻克匡城（今河南扶沟西南）、濮州，打得唐朝廷晕头转向。

与此同时，长江以南也活跃着一支由柳彦章率领的起义军。他们攻占江州（今江西九江），俘虜刺史陶祥，在江州建立水寨水军，拥有 100 余艘战船。

王仙芝与黄巢分裂后，一直在湖北辗转作战。八月，攻克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征，略地复、郢，连续打了几次胜仗。但唐朝廷已知王仙芝有投降之心，十一月，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派判官吴彦宏招降王仙芝。王仙芝回派尚君长等 3 员大将去

见杨复光议降 3 人在途中被宋威劫取。宋威上奏冒功 ,说他在战斗中俘获了尚君长等。杨复光得知后 ,上表揭露说尚君长是主动来投降的。朝廷派侍御史来审讯 ,审不明白 ,结果宋威杀了尚君长等 3 人。王仙芝白白牺牲了 3 员大将。

消息传到王仙芝军中 ,王仙芝大怒 ,率军自郢州直扑江陵(今湖北江陵)。荆南节度使杨知温不懂军事 ,不设防备。乾符五年(878 年)元旦 ,大雪纷飞 ,王仙芝渡过汉水 ,攻陷罗(大)城。城中将士退守子(小)城。杨知温若无其事 ,穿戴着文官袍帽上城抚慰士卒 ,还在城上赋诗给幕僚们看。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和驻扎襄阳的沙陀骑兵闻讯连夜赶来援救 ,在荆门(今湖北荆门)与义军遭遇 ,沙陀骑兵横冲直撞 ,义军战败。王仙芝得报 ,焚掠了江陵大城 ,往北向申州转移。

正月初五 ,王仙芝在申州遭到唐招讨副使曾元裕的袭击 ,死、降、散 2 万人。王仙芝被迫南返 ,穿过大别山区。二月 ,进入黄梅(今湖北黄梅)。不料曾元裕在此布置了伏兵 ,当王仙芝退入黄梅山时 ,官兵四起 ,王仙芝牺牲 ,5 万余义军大部战死 ,鲜血飞溅 ,染红了黄梅山峦。

黄巢挺进江南

唐朝统治集团内部 ,固然矛盾重重 ,极度腐败 ,但在对待农民起义这一点上 ,统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他们会暂时联合起来 ,动员一切力量 ,扑灭镇压农民的反抗。当时 ,财政收入的主要地区——江南还控制在唐朝手中 ,那里的赋税不绝供应。这就使得统治阶级可以用搜刮来的财物“养兵” ,增强军事力量。黄巢统率的农民军在山东、河南的活动中 ,到处受到唐朝官军的堵截。878 年 3 月 ,黄巢攻破沂州、濮州 ,遭到曾元裕所部的阻遏。起义军转攻河南的襄邑(今河南睢县西)、雍丘(今河南杞县) ,又受到唐军的阻拦。于是 ,起义军西击叶(今河南叶县)、阳翟 ,再度威胁到东都洛阳。

唐朝统治集团又慌慌忙忙地作了一番军事布署 ,急调屯在荆门(今湖北荆门)、襄州一带的曾元裕军队回洛阳 ,担任正面防务 ;增调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宣武、昭义兵 2000 多名守卫东都皇宫 ;又调义成军 3000 人扼守轘辕(今河南偃师东南)、伊阙(今河南龙门)、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等洛阳外围的军事据点 ,迅速地组成了对起义军的包围圈。在这种形势下 ,起义军是不宜进攻洛阳的。于是 ,黄巢采取了长途急进、挺进江南的战略方针。一方面 ,江南是唐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 ,进军江南 ,就可以切断它的经济命脉 ;另一方面 ,江南唐军兵力薄弱 ,后防空虚 ,那时候 ,王仙芝的余部王重隐、曹师雄等已经攻占洪州(今江西南昌) ,在湖南、安徽、苏北一带活动 ,进军江南 ,就可以联合江南各地的反抗力量 ,壮大起义军的队伍。因此 ,向江南挺进 ,就意味着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给唐朝政府以有力的打击。实施这个战略方针是极为重要的。

878 年(乾符五年)4 月 ,黄巢率领起义军横渡淮河、长江 ,乘虚南下 ,进入江西 ,接连攻下了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 ,转战在浙江西部天目山区。起义军关心百姓疾苦 ,黄巢亲自为贫苦农民分盐 ,这对偏远山区的人民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农民踊跃参军 ,壮大了起义队伍。

唐政府急调高骈担任镇海节度使(驻杭州 ,今浙江杭州)。高骈以暴虐闻名 ,是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他一到任,就分兵袭击起义军。起义军屡战不利。黄巢就采取机动灵活、避实就虚的战略,继续率军南进,攻入浙东。那年8月,起义军一度攻占浙东首府越州,浙东观察使崔璆投降。黄巢决定继续南下。本来打算从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无法弄到供10万人远渡的船只。于是,起义军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开辟了一条从衢州(今浙江衢县)到建州(今福建建瓯)长达700多里的山路,胜利地进军到福建。879年初(乾符五年十二月),起义军攻下了福州(今福建福州)。黄巢进城以后,一方面镇压了一批仇视农民起义的反动分子,另一方面对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则采取了宽大政策。这对分化一部分阶级敌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起义军打击了福建大部分州县的贪官污吏,大长广大群众的威风,革命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8月,斗志昂扬的起义军战士,冒着酷暑,浩浩荡荡地通过潮州、梅岭山区,向南方重镇——广州(今广东广州)进军。岭南节度使(驻广州)李迢,在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紧急形势下,又唱起“招降”的老调,声称给黄巢“广州节度使”的官位,企图以此为诱饵来缓和农民军对广州的进攻。但是,黄巢不同于王仙芝,李迢也没有逃脱被俘的下场。

广州是唐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各国的珠宝、玉器、香料等奢侈品都由那里进口,我国的丝织品、瓷器等也由那里运往亚洲和欧洲各地。广州是唐政府主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那里聚集着许多豪商、恶霸,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奴役。10月,起义军攻下了广州,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给了唐政府严重的打击。一大批贪官污吏、豪商恶霸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起义军又分兵西取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州县。至此,东起广东、福建,西至广西、海岭以南的东西千里之地,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农民军挺进江南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从878年春起义军渡过长江起,到879年秋起义军攻下广州、控制岭南大片土地止,历时约1年半。黄巢率领农民军战士,顶风冒雨、披荆斩棘,始终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进行着武装斗争。在南下过程中,起义军先后途经今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8个省区,沿途会合了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王仙芝的余部,吸收了广大的贫苦农民,队伍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农民起义军之所以得到发展和壮大,其重要的原因是义军紧密联系广大贫苦农民,关心他们的疾苦。起义军所到之处,都采取了焚烧反动官府、处死贪官暴吏、救济贫苦人民等符合广大劳动群众愿望的革命行动。所以,群众拥护起义军、参加起义军,是理所当然的。

大举北伐克长安

黄巢在岭南积极准备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把矛头直接指向唐朝的中央政府。他发表文告,自称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使,历数宦官专权、官吏贪污残暴、考选不公、埋没人才等弊病,宣称禁止刺史添置私产,县令贪赃者灭族,明白表示引军北上,入潼关克长安的决心。这篇文告得到了人民的欢迎,把斗争引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这年十月,黄巢大军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发,编了几千只大木排,乘着水涨之势,浩浩荡荡,沿湘江而下,经永、衡2州(今湖南零陵、衡阳),直抵潭州(今长沙)。猛攻1天,便打下了这座10万大军防守的城市。

这时担负镇压义军任务的是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王铎。他原任宰相,是个典型的老官僚。他带着一批“旧族子弟”的幕僚,在江陵纵情声色、逍遥自在,把前方的军事交给部将李系负责。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其实不懂军事,只会在没事时说大话。王铎却以为李氏家世代良将,必然可用,派他去守潭州。不料黄巢兵临城下,他便急急忙忙地溜掉,把城池丢了。

尚让率领得胜之师,进逼江陵。尚让还没有到,王铎已逃往440里以北的襄阳去了。

十一月初六,黄巢大军进入江陵。这时江陵已被王铎的部将大肆焚掠,变为一座空城了。

从当时的交通线来看,由江陵出襄阳,北入河南,距离最近,取径最直。黄巢本来也准备走这条路,但是到了距襄阳270余里的荆门时,中了唐将刘巨容、曹全晟的埋伏,前队败了一阵。黄巢一向惯用避实击虚的战法,他见正面唐军力量较强,便改变方向,于十二月初七放弃江陵,由水路沿江东下,攻破鄂州的外郭。在广明元年(880年)的上半年中,转战江南,先后攻下过饶、信、池(今安徽贵池)、歙、衢、婺(今浙江金华)、睦(今浙江建德)等州,西起江西、东至浙东,声势非常浩大。

唐政府用淮南节度使高骈做诸道行营都统,对付义军。高骈是个老军阀,颇有作战经验。当时驻屯扬州,兵精粮广,都统有调动各处兵马的权力,力量更是雄厚。他确是义军最强大的敌人。他不仅守淮南,而且派部将张璘深入江南,进攻义军。五月间,黄巢在信州一战歼灭张璘全军,大大地打击了高骈的气焰。这一仗为渡江北上打开了道路。

六月底,起义大军攻克宣州。七月间,从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渡江,攻下和、滁2州(今和县、滁县),挥戈东指,直逼天长、六合,进至离扬州50里的地方。

自命为一世之雄的高骈,只想保全实力,不敢出战,诈称得了疯瘫病,躲在扬州城里不动。黄巢知道后顾之忧,在天长屯驻扎了40多天,在九月间全军渡淮,进驻今皖北豫东一带。

于是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一作率土大将军),向各地唐军将领发出通牒,叫他们各守本境,不要听从政府调遣,前来抗拒,又声明吊民伐罪的宗旨,表示入京问罪,与众人无干。这样一来,唐军士气更加低落,藩镇只图自保,观望形势,因而朝廷陷于孤立,河南郡县纷纷陷落。只有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一军,勉强抵敌,然而兵不满万,节节败退,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

十一月十七日,黄巢率领60万大军,不战而下东都洛阳。留守刘允章与百官迎降。黄巢入城,慰问居民,秩序井然。

唐政府手里的武力只有神策军了。这支队伍多年来粮饷优厚,是宦官用以专制朝政、废立君主的工具。说起战斗力来,却是一点都没有。军士多半是富家子弟,出了贿赂取得军籍,仗这身份横行市井。一听说要打仗,连忙雇些病坊里的穷人做替身。这些人连兵器也不晓得怎么拿,哪里会打仗,何况他们哪里肯打,自然一接触便溃散了。

十二月初一(881年1月4日),义军进至潼关,黄巢亲临前线,全军欢呼,声威之盛,真是惊人。唐军都是惊弓之鸟,那里见得这般阵势。齐克让军队在关外抵挡了一下,便烧营溃退。潼关旁边有个山谷,平日防商贩逃税,禁止通行,叫做“禁阨”,里面灌木寿藤

长得异常茂密。溃兵夺路乱奔的时候,往“禁阊”里钻,一夜工夫居然踏成了一条平坦的道路。

初二,义军填平关外的天堑,进兵攻关。尚让和黄巢的外甥林言,分兵从“禁阊”绕到关后,前后夹攻,于初三天明时完全攻克潼关。

长安得讯,顿时大乱。十二月初五,僖宗和宦官田令孜带了几个亲王、妃嫔,率神策军500人,偷偷出金光门,昼夜不停地飞跑,逃往西川。百官没有预料到局势变得这样快,早晨还去上朝,退朝之后,听得败兵进城,才惊慌逃窜。

溃兵、恶少乘机打劫,长安城中闹得乱糟糟的,幸而义军赶到,很快制止了这场扰乱。

当天午后,前锋将柴存进入长安。唐朝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带了数十名文武官员,到霸上迎接黄巢。黄巢乘一辆金装肩舆,左右随从,披着长发,发上扎了红绸,手执兵刃,身披锦绣,团团簇拥着他。军队人强马壮,轻重车辆充塞道路,千里不绝,浩浩荡荡地进入京城。

长安一带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潮水般涌去夹道迎接和观看义军的队伍。尚让沿路向人民说明义军宗旨:“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像李家虐待你们,你们只顾安居乐业好了!”义军将士又将钱帛散发给穷苦百姓。这就是义军初入长安时的景象,也是唐末农民起义发展的顶点。

大齐金统皇帝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三日(881年一月十六日),含元殿上战鼓咚咚,这是黄巢即位的乐声。接着,他登丹凤楼,宣布赦书。新政权国号大齐,改元金统,任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兼知左右军事,崔璆、杨希古为同平章事。

新政府严厉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唐朝皇族和大官僚地主,及一些顽固的反动分子。宰相豆卢瑑、崔沆等隐匿不出,被义军搜获杀死。张直方表面上带头迎降,实则包庇亡命之徒,阴谋复辟,也被查出处死。对长安一般朝官,规定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留任,参加义军的诗人皮日休也充当了翰林学士的职务。

金统二年(唐中和元年,881年),凤翔节度使郑畋纠合西北各镇,反攻长安。四月初五,义军主动退出长安,宿营霸上。唐军先头部队进了城,大肆掳掠。城中的反动分子也活跃起来,有的帮唐军作战,有的混水摸鱼,跟着官兵抢劫。义军乘此机会,由孟楷统兵,重入长安,杀死唐将程宗楚、唐弘夫等,把入城部队消灭了八九成。四月初十,黄巢回到长安,对城里的反动分子进行了又一次镇压。

大齐金统政权建立了,郑畋指挥的反攻被击退了。黄巢领导的义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他没有料到,胜利正在偷偷地从他手里溜走。

黄巢进了首都,没有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唐朝中央政府,组织新政府以后,又没有进一步考虑应该实行哪些措施,来巩固斗争的成果,实现原先的远大意图。从当时的情况看,他是把攻占长安、组织政权看作大功告成,可以坐待各方面的归顺。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他眼花缭乱了,有些陶醉了。

反动势力乘此机会整顿改组了它的阵线。唐僖宗到了兴元(今陕西汉中),便发布诏令,号召天下藩镇出兵镇压义军。他到了成都,情势安稳了,更可以在那儿发号施令。这个政府尽管腐朽,但它的存在总表明唐朝并没有被消灭,使一切反动力量有重新组合的核心。

长安刚陷落的时候,许多地方军政长官惊慌失措,确有一些人表示愿意降齐,连那个郑畋也用诈降为缓兵之计。黄巢真的缓了兵。过了3个多月,形势大变,郑畋便联合各镇,反扑过来了。各地方的节度使,由于阶级的对立,在反黄巢这一点上,态度一致。分散的反动力量逐渐联合起来,向长安采取围攻的姿态。

在义军这一面,军事地位由主动变成被动了。这是“流寇主义”造成的恶果。

多年以来,黄巢转战南北、避实击虚,使唐军防不胜防,取得辉煌的胜利。天下各地,多的是受苦受难的农民阶级兄弟,义军不愁兵力得不到补充。地主阶级中一些找不到出路的人才,见义军强大了,也会前来投靠。流动作战正像滚雪球,愈滚愈大。在这个地区因“气候”不利而缩小了,滚到另一个地区去,又会迅速地扩大。至于给养粮饷,因为到处都有府库仓廩和豪富的资产可以没收,加上人民的输纳,决不会感到匮乏。这些是流动作战的好处,应该承认。进入长安以后,情况变了,这些有利条件统统消失了。

起义军一向没有注意巩固占领的地区,军队前进,就把占领的城市乡村都放弃了。这在初期力量不足无法固守,是不足为奇的。到了南方,由于要北上推翻唐政府,势难留兵岭南,这也合情合理。但是到渡江北上之后,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还不考虑这个问题,实在是个致命的错误。黄巢进了长安,所有不过关中的小部分,连东都洛阳也不在手里。于是一系列的问题都出现了。

首先是变成了挨打的目标。以前唐军处处设防,黄巢以全军击其一点,常占优势。如今坐守长安,遭受围攻,陷入了被动地位。

其次,兵源、饷银都没有了来源,出现了严重的粮荒。义军守着长安,失掉了与广大农民群众的联系,不要说没有土地来满足士兵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连兵源也丧失了。关中地区,由于长期受唐朝统治者残酷的压榨和剥削,生产凋敝,向来苦于粮食不足。义军数十万之众云集于此,粮食问题实难解决。加上唐朝军队在长安外围肆行掳掠,使这一带人口流散,土地荒芜。长安孤城,益发难以维持,粮价曾涨到3万文一斗,数百倍于晚唐的正常价格。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义军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

另外,情况困难了,义军内部的裂痕也出现了。黄巢部下将领,能够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到底的,很难举出什么人来;反之,在危急之际投到敌人阵营中去的,却很不少。这很可能是因为闯荡江湖的人多,真正从贫苦农民出身的少;顺利时一同打天下容易一致,艰难时肯力战牺牲的就不多了。但是朱温可以算做一个代表人物。他出身贫苦家庭,却从小不肯劳动,游手好闲,是个泼皮无赖。他其有一定的反抗性,但更富于投机冒险的习性。以参加起义始,以叛变投降终。

金统三年(唐中和二年,882年)九月,朱温叛变,在军事上给敌人打开了缺口。当时朱温驻兵同州(今陕西大荔),独当一面,负屏障长安的重责。不料他见义军声势渐衰,又与孟楷有点矛盾,竟降了唐朝。唐僖宗知道了,喜出望外,赐了一个名字,从此改叫朱全忠。

此后,唐军加紧了围攻,并调沙陀贵族李克用统领的4万名穿黑衣的“鹞军”,投入

战斗。李克用本姓朱邪,李是赐姓。他是镇压庞勋的朱邪赤心的儿子,父子两代都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

金统四年(唐中和三年,883年)的春天,义军陷入了苦战的局面。同州梁田坡一役,伤亡数万,大将赵璋战死。接着华州等据点失守,长安屏障尽失,坐守危城,势必覆没。黄巢不得已于四月初八晚上,撤出长安,由蓝田关入商山,望东而去,沿路边撒边故意把金银财宝丢撒在路上,追赶的官兵见了,争先恐后抢拾,无心紧追。于是黄巢摆脱了追军,平安退入河南。

黄巢进长安、弃长安,都没有什么破坏行动。唐军进了长安,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宫室民居,绝大部分都遭破坏,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瓦砾场。后来唐僖宗虽力加修缮,然而旧日的面目,一直没有完全恢复。

狼虎谷的悲剧

黄巢退出长安时,有兵18万人,战斗力仍很强劲。如果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用己之长,击敌之短,仍旧可以大有作为。可惜他到了河南,又犯了一个战略错误,硬打陈州(今河南淮阳)300天之久,结果遭到重大挫折,并且导致了失败的结局。

孟楷率领先头部队遭陈州刺史赵沂袭击,被俘牺牲。黄巢大怒,集结主力,围攻陈州。在感情冲动之下,他忘了利害,犯兵家大忌,屯兵坚城之下,不顾一切地猛攻。

日子一久,兵力疲乏,河南连年饥荒,粮食也非常缺乏。唐乘机集结援军,准备在陈州附近打一次歼灭战。金统五年(唐中和四年,884年)五月初,黄巢被迫解围,引兵北上,在中牟(今属河南,在郑州、开封间)被李克用袭败。尚让带了一部分队伍,投到徐州节度使时溥那里;另外一些旧将,逃往汴州(今河南开封),投奔朱温,后来都成为朱温部下的大将。这些人都是农民起义军中的败类。

黄巢率余部东走,连遭追兵掩击。六月十七日,黄巢和兄弟黄邺、黄揆、外甥林言等,退到泰山狼虎谷(在今山东莱芜境),力竭自杀。林言持黄巢弟兄的首级,带了黄巢的家属,投往时溥,也为追兵所杀。轰轰烈烈的持续11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至此结束了。

五代十国

朱温建梁

镇压了黄巢起义,并没有能挽转唐朝急剧衰落的命运。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各路诸侯都乘机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不受朝廷制命,相互攻并。汴州刺史朱温与河东节度使

李克用的战争刚刚停下来,朱温又同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打了起来,结果朱温攻灭秦宗权,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

僖宗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僖宗封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诸镇兵都受他节度,实际上赋予了朱温征伐吞并邻道的合法权力。三月六日,僖宗暴死,时年27岁。大宦官杨复恭拥立皇太弟寿王杰即皇帝位,改名敏,是为昭宗。五月,昭宗加封朱温兼侍中。昭宗龙纪元年(889年)三月,昭宗加封朱温兼中书令,进爵东平郡王。朱温军势大盛,取代了秦宗权而成为中原最大的割据势力、唐朝最大的威胁。

昭宗在位期间,朱温在朝廷中有奸相崔胤做他的内应,专事东吞西并。到乾宁四年(897年)二月,朱温灭朱瑄,于是天平(郢、齐、曹、棣)、秦宁(充、沂、密)、感化(徐、宿)、忠武(陈、许)、宣义(郑、滑、濮)5镇14州全归朱温。到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十月,朱温率军攻打定州(今河北定县),于是河北诸镇都表示服从朱温。举目天下,已无人能独力抗衡朱温了。

乾宁四年十一月六日,长安发生宫廷政变。神策军左右中尉刘季述、王仲先等率禁兵千人把昭宗禁闭在少阳院,矫诏称昭宗为太上皇。十日,拥立太子。宰相崔胤向在定州行营的朱温告难,要他发兵问罪。朱温还师大梁,正好刘季述派养子希度和供奉官李奉先送到矫诏,还许诺把大唐社稷送给朱温。朱温犹豫不决,召将佐商议。有人认为:“朝廷大事,不是藩镇所应当参预的。”天平节度副使李振主张出兵靖难,说:“王室有难,这实在是建立霸业的最好机会。一个宦官小子敢废天子,公不能讨伐,怎么还能号令诸侯。而且幼主位定,天下之权就尽归宦官了。不靖王室,是把太阿之柄授于他人。”朱温正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大悟,囚禁了使者,派亲吏蒋玄晖到长安与崔胤共谋平乱。

右神策中尉王仲先治军很严,查出贪污舞弊的军校都痛打不恕,还要追出赃款,禁兵一向对他不满。昭宗被禁,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尤愤愤不平。崔胤侦知,命判官石戡笼络孙德昭,传示崔胤的衣带书,要他杀刘季述、王仲先二人,迎上皇复位。孙德昭一口答应,又去联络了禁兵将领董彦弼、周承海。十二月二十五日,孙德昭伏兵安福门,杀了王仲先。天复元年(901年)正月初一,昭宗复位,在长乐门楼接受百官朝贺,董彦弼、周承海捉了刘季先等大宦官,押到楼前受审,乱杖打死。昭宗论功行赏,任孙德昭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崔胤进司徒,进封朱温东平王。

朱温野心更大了,存心要篡代唐室,积极谋划。他收服了河北,命大将张存敬率兵3万进军河中,翦除最大的敌手李克用的羽翼。河中节度使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遣书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还书说他寡不敌众,不如弃城举族归太原。王珂又遣书向凤翔、昭义节度使李茂贞求救,李茂贞连回音也不给。二月,张存敬兵围河中,城中守兵都无斗志,于是王珂请降。朱温得报,从洛阳赶到河中受降,将王珂举族迁往大梁,派人在途中杀王珂。

李克用派使者送重金给朱温修好,朱温怪李写的信言辞不逊,派大将氏叔琮统兵5万合魏博等镇兵大举进攻河东。氏叔琮连克泌州、泽州、潞州,直抵晋阳。李克用日夜抵御,挡住了氏叔琮的攻势。后因粮草供应不上,又逢连日大雨滂沱,士卒疟疾痢泻不止,朱温才命氏叔琮撤回还兵。但在篡唐的道路上,已不必再担心李克用与他角逐了。昭宗又封朱温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河中)4镇节度使。于是,自蒲、陕东到海滨,南起淮水直到黄河诸镇都为朱温所有。

当时凤翔、昭义节度使李茂贞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

朱温于天复三年(902年)引兵入关,并打败了李茂贞,抢到昭宗,迁至洛阳。随后又在天祐元年(904年),杀了昭宗,立昭宣帝,又称哀帝,并控制了唐朝政权。自此后,唐室衰微,朝臣官僚仅备员而已。同时,一些旧臣百官见所倚之主倍受凌辱,因而阴私悲愤之志,又对那些新发迹的官僚看不起。朱温为了打击旧日的高门望族,扫清妨碍他篡唐称帝的社会势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心腹,另一方面也想要清除朝内旧臣。

天祐二年(905年)二月,朱温又指使蒋玄晖缢杀了昭宗诸王子,投尸池中。六月,朱温又聚杀了裴枢等朝士30多人,投尸黄河。他为所欲为,百官都俯首听命,唐朝廷实际上已成了梁王朝廷。

到了秋天,朱温收了唐、邓、复、郢、均、房、荆、襄州。他取代唐室的心更迫切了,日夜在大梁修建宫阙,并密嘱右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柳璨与蒋玄晖等密议传禅事。柳、蒋等议: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梁王受禅也应按这次序进行。他们把议定的程序报告了朱温。朱温急着要当皇帝,一听还要有这么多的程序,不由大怒。王殷等原本妒嫉蒋玄晖权宠,这时乘机进谗言,说蒋、柳等人想延长唐朝寿命。

消息传到蒋玄晖的耳中,他吓得急忙去见朱温,说明详情。朱温不悦,说:“你们讲这些闲事来阻我大事,假使我不接受九锡,难道就不能作天子了吗?”蒋玄晖忙辩白说:“唐祚已尽,天命归王,这是愚人智者都知道的。玄晖与柳璨不敢违背王德,但因如今晋李克用、燕刘仁恭、岐李茂贞、蜀王建都是我们的劲敌,王受禅过快,他们不服。所以不得不一步一步来,这是为王创万代之业呵。”朱温大声怒斥说:“奴才果然反了!”玄晖吓得诚惶诚恐,急忙辞别,与柳璨加速进行。

半个月后,哀帝按柳璨、蒋玄晖议,以朱温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荆南等21道69州为魏国,进封朱温为魏王,加九锡。十二月四日,蒋玄晖传带哀帝手诏去大梁见朱温,朱温怪事情办得迟了,怒不接受。九日,蒋玄晖还报哀帝,说梁王怒不消解。次日,柳璨奏称:“人望归梁王,陛下释重负,如今真是时候。”促哀帝速速禅让。当天哀帝就派柳璨到大梁传谕禅让之意,朱温假作姿态,不接受。

这时,何太后哭着差遣宫人去请求蒋玄晖,皇帝让位以后,能保全她和皇帝的性命。这事又被王殷等侦知,王殷再次向朱温进谗言,说柳璨、蒋玄晖、张廷范夜赴何太后积善堂宴会,对太后焚香发誓,要兴复唐宗。朱温大怒,密杀何太后,斩了蒋玄晖,焚尸都门;车裂张廷范,斩了柳璨。柳璨临刑前高呼:“负国贼柳璨,死得应该!”

元祐三年(906年)秋,朱温在平定、贝、博、澶、相、卫5州后,大举进攻幽州、沧州,久攻不下。这时潞州守将昭义节度使丁会闻昭宗被弑凶讯,倒戈,举军投降了李克用。朱温烧营而还,休兵贝州。他自感威望受挫,深恐内外离心,决意迅速受禅。

次年(907年)正月十七日,哀帝派御史大夫薛贻矩到大梁慰劳朱温。薛贻矩见了朱温说:“殿下功德在人,天、地、人心都已去唐室,皇帝要行禅让之事,做臣子的哪敢违背。”说完,就行君臣大礼。薛贻矩还洛阳,报告哀帝说:“梁王有受禅之意了!”于是哀帝下诏,在二月禅位给梁王。

二月,唐大臣们共奏请哀帝退位,宰相又率领百官到元帅府劝进,朝臣、藩镇也相继向朱温劝进。

三月十七日,唐哀帝降御札禅位给朱温。大唐自公元618年李渊建国至今,走完了290年的历程,宣告灭亡。

四月,朱温改名晃,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开平,梁朝建立。

开平二年(908年)二月二十一日,唐末代皇帝李柷被朱温所害,年仅17,谥曰哀皇帝。

李存勖马上得天下

朱温称帝后,其最大的威胁是河东的李克用。李克用原是西北沙陀族的首领。李克用父子以拥有一支剽悍善战的沙陀骑兵而著称。因助唐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被任为河东节度使,封为晋王。从此李克用以河东为基地,经营扩展,逐步占有山西大部地区,成为割据势力中又一个实力最强的集团。朱温称帝后,李克用打着“匡复唐室”的旗号,联络其他割据势力反对朱温,成为后梁的劲敌。

其子李存勖亦颇有才略。他继承王位后,采取了“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申冤滥,禁奸盗”等一系列稳定社会的措施,并着力整饬军纪、练兵备战。在短短的几年内,使晋“境内大治”、“士卒精整”,为以后“兼山东,取河南”奠定了基础。

当时,河北有成德节度使(今河北正定)、赵王王镕、义武(今河北定县)节度使王处直、卢龙(今北京西南)节度使、燕王刘守光三种割据势力。其中,刘守光的力量最强。开平四年(910年)十一月,刘守光出兵屯于涿水(今河北涿水),企图南下进攻镇、定2州。朱温早就觊觎镇、定2州,闻讯,便以帮助赵王王镕抗刘守光为名,遣其供奉官杜廷隐、丁廷微率兵3000分别进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妄图以此为借口吞并镇、定2州。赵深州守将石公立识破了朱温的野心,请求拒绝梁军进入深州。但王镕却命石公立退出城外以避之。结果杜廷隐入城后立即“尽杀赵戍兵,乘城拒守”。王镕悔之已晚,复攻不克,于是遣使赴晋向李存勖求援。

这时,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遣使者来晋。成德、义武两镇经过协商,想共推李存勖为盟主,合兵攻梁。李存勖作出了与王镕、王处直结成反梁联盟的决策,遣周德威率兵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屯于赵州(今河北赵县),以助王镕抗梁。至此,以李存勖为主的反梁联盟与朱温形成了对抗的态势。双方在柏乡展开激战。

此战,梁军除解甲弃兵投降溃散者外,共被歼2万余人,损失粮食、器械不计其数。梁军4万人仅剩数千人逃往河南。由于柏乡之战的胜利,晋军控制了镇、定等州及河北广大地区,为以后夺取全部河北,进一步灭梁建唐(后唐)奠定了重要基础。

晋军打败梁军向河北的进攻以后,李存勖为了消除来自幽州燕王刘守光的威胁,采取了“先取(刘)守光,然后可以专意南讨”进攻后梁的用兵方略。乾化元年(911年)八月,燕王刘守光称帝,国号大燕。同年十一月,刘守光出兵2万南下进攻定州的容城(今河北容县),企图兼并镇、定2州。为了对付幽州兵的进攻,王处直再次向晋求援。李存勖即乘机派周德威率兵3万攻燕。经过两年的争战,消灭了大燕,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扩大了统治地盘。

乾化二年(912年)六月,朱友珪杀其父朱温自立为帝。此时,掌握重兵的梁将杨师

厚乘机攫取了魏博镇(治所魏州,辖今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地区)。朱友珪只好下诏承认他为天雄节度使,坐镇魏博。八月,冀王朱友谦(朱温义子)以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归附于晋。乾化三年(913年)二月,朱友贞发动兵变,杀其兄朱友珪,夺得帝位。贞明元年(915年)三月,朱友贞乘杨师厚病死,为削弱魏博镇势力,将该镇分为2镇,以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治魏州;以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治相州(今河南安阳)。又另派开封尹刘鄩率兵6万自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南)渡河,屯于魏州南的南乐,声言攻镇、定2州,实则助贺、张2人赴镇。魏州兵“父子相承数百年”拒绝分镇,发生兵变,并挟持贺德伦向晋求援。

乾化五年三月,李存勖抓住这个良机,令马步副总管李存审率兵自赵州(今河北赵县)进屯临清(今河北临西),以策应魏州。魏州之战爆发,双方经过数月激战,梁军惨败。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形势对梁越来越不利。朱友贞已感到无能为力,发出“吾事去矣”的哀叹。

贞明二年(916年)三月至九月,李存勖乘胜督军先后攻占卫(今河南汲县)、磁(今河北磁县)、洺、邢、沧、贝等州。至此,河北除黎阳外,均为晋所占。

晋夺取河北之后,晋王李存勖一面遣使与楚(辖今湖南中、南部地区)通好,一面派人联吴(辖今安徽淮南、江苏南部部分地区),企图“会兵以击梁”,实现其南下灭梁的战略计划。但由于契丹于贞明三年(917年)三月,出兵30万进围幽州,严重威胁晋的后方安全,李存勖不得不转兵北向。同年八月,李存勖击败契丹的进攻,解了幽州之围,消除了后顾之忧,然后便调兵南下,与后梁展开了黄河沿岸要点的激烈争夺战。

贞明三年(917年)十一月,晋王李存勖乘黄河结冰之际,遣军夺取黄河重要渡口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杨刘镇),梁军反攻不克,乃筑垒自困、阻遏晋军。贞明四年(918年)七月,李存勖调集兵力,企图南下一举灭梁。双方相持数月,难有进展,最后两军在胡柳陂展开激战,梁军大败,死亡多达3万人。晋军亦因伤亡惨重,无力攻打汴州,而还军魏州。

大梁之战

后梁龙德元年至二年(921—922年),镇、定二州割据集团连续发生争夺统治权的内乱。即后梁龙德元年(921年)二月,王镕养子张文礼(亦名王德明)发动政变,杀死王镕,自为留后,并与后梁暗通。李存勖派兵攻之。王处直恐唇亡齿寒,使其子王郁招契丹兵入境,以牵制晋军。李存勖便亲率晋军攻镇、定,再度转兵北向。在南线,晋军已夺占了一些黄河渡口,但无力南进,与梁军保持对峙状态。直到龙德二年(922年)九月,李存勖才兼并了镇、定,摆脱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第二年(923年)四月,李存勖于魏州称帝(即庄宗),建立后唐,改元同光。继而又乘梁将卢顺密投降的机会,夺取了黄河南岸的重要据点郢州城(今山东东平西北)。

后梁丧失河北后,人心动摇,士气更加沮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严重。朱友能(朱温侄子)据陈州(州治在今河南淮阳)反对朱友贞,将领之间也相互排斥、倾轧和互不信任。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六月,梁军将领康延寿秘密请降了唐军,为李存勖制定袭击灭梁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灭梁之战迅速展开。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十月初二,李存勖亲率唐军精锐自杨刘过河南下;初三,进至郢州城,当天午夜越过汶水,并以李嗣源为前锋继续南进。初四晨,与梁军王彦章部相遇,一战而胜,并攻克梁中都(今山东汶上),俘获梁名将王彦章(号王铁枪)及都监张汉杰等200余人,击杀数千人。李存勖听了李嗣源的分析后,更坚定了奇袭大梁的决心,立即命令部队向大梁进发。当时,唐军士气高涨,踊跃愿行。十月初四傍晚,李嗣源率领前军倍道兼程,奔袭大梁。初五,李存勖率后军从中都出发继进。初七,唐军进抵曹州(今山东定陶西),梁守将遭不意袭击被迫出降。

唐军占领曹州后,不停顿地长驱向西急进,直逼大梁。此时,朱友贞得悉王彦章被擒,非常恐慌,急忙召群臣问策,皆莫能对。无奈之下,派遣张汉伦驰骑北上召段凝迅急回救,同时又令开封尹王瓚强征民众为其守城。但张汉伦行至滑州被段凝所决之黄河水所阻,不能继续前进。大梁此时已陷于极度混乱之中,朱友贞“日夜涕泣,不知所为”。十月初八,朱友贞得知唐军已逼近大梁后,在绝望中自杀身亡。初九晨,李嗣源所部进至大梁城下,急攻封丘门(北门),梁将王瓚开门出降。是日,李存勖亦率后军赶到,从大梁西门入城,后梁百官列队迎谒。李存勖进行安抚,使各复其位。

十月十二日,段凝得知大梁危急,率领5万主力自滑州回救,行至封丘(今河南封丘)时,得知大梁失陷,也投降了唐军。至此,后唐灭了统治中原17年的后梁,战争也随之结束。

后唐灭亡

说起后唐初年形势,经济上虽有困难,其实颇有可观。它拥有的土地,等于后梁和晋的总和。如果把同光三年(925年)灭掉的前蜀算进去,比五代的其他四代,都要大得多。以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后唐的辖境大体相当于河北(缺一小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缺一小块)六省加甘肃、宁夏各一部和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以及湖北的北部。

后唐的统治者如果稍有善政,消除割据,恢复统一,并不见得十分困难。南方割据各国的君臣开头都很恐慌,纷纷派使者朝贡,打听中原的情形。荆南高季兴还亲自到洛阳,以前朝地方官的身分朝见庄宗,表示拥护新王朝。他看了朝中的情况,知道后唐不会长久,心就宽了。吴国徐温的谋士严可求远在江南,他根据所得的情报,也作出“唐的内部不久必有变化”的判断。

后唐根本没有考虑过恢复生产的措施。租庸使孔谦一味横征暴敛,满足宫廷挥霍的需要。政府发出一些减免赋税的官样文章,实际行动却和它完全相反。人民觉得新王朝的赋税比旧王朝更重,孔谦却得了“丰财赡国功臣”的称号。

后梁政府开的黄河决口,继续排出滔滔浊流,淹没下游的广大田亩。这个人为的自然灾害,使人民更加忘不了梁、唐统治下混战的罪行。

李存勖靠武力取得了天下。开国以后,士兵很快便滋长了怨望。原来当时储藏财

物的库有内府、外府的区别,外府收藏经常性的财政收入,供给军政费用;内府收藏各项献贡,专供皇帝挥霍之用。外府经常极为空虚,内府却极为充实。政府要发犒军饷,数目不够,皇帝也不肯拿出钱来。

同光三年(925年),灾荒严重,政府根本发不出军粮。同光四年(926年),魏州爆发了一次兵变。李克用的干儿子李嗣源本受庄宗猜忌,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他借此机会,联合变兵,南下夺取了政权。庄宗众叛亲离,被乱兵所杀。乱兵的首脑是伶人出身的将领郭门高(郭从谦)。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说:“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根据的就是这个事实。

李嗣源即位,改元天成,他就是后唐明宗。明宗原名邈佶烈,是一员战将,即位时已60岁了。他鉴于庄宗的失败,减轻了一些赋税,中原人民稍得休息。因此他统治的8年可以算是小康的局面。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变兵叛将时有出现,内部滋生着祸乱的根苗;外面孟知祥割据两川,重建蜀国,明宗也毫无应付的办法。

明宗是个文盲,他的主要助手安重诲做过枢密使,又做侍中兼中书令,看四方奏章,也不能完全通晓。他们尽管设置端明殿学士,用冯道等文学之士任职,作用不过是解决文字问题,方针政策,这些人是管不到也不敢管的。这是个文化修养很低的政府。明宗初年,任圜做宰相,选拔贤能,颇有气象一新的样子。他曾在明宗面前与安重诲争辩,口气颇为强硬。明宗心里已不大愉快,到了后宫,有个宫人奏道:“妾在长安,看见宰相奏事,从来没有这种模样的,他实在是藐视陛下啊!”明宗没有文化,不知道前朝直臣的故事,听了这些话,深信不疑。任圜从此失势,后来被安重诲杀死。明宗不加追究,而且宣布任圜对皇帝“怨望”的“罪状”,表示支持安重诲的行动。

这样一个朝廷,当然没有解决当时各种困难的能力。相传明宗常在宫中祝告上天,说:“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他的愿望大致不坏,然而光有良好的愿望是无济于事的。

明宗死后,儿子从厚即位,干儿子从珂起兵争位,杀从厚自立。明宗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依靠契丹的援助,发动叛乱,后唐便灭亡了。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为了长期获得契丹的帮助,竟无耻地向契丹统治者称儿皇帝。

后晋兴亡

契丹统治者把石敬瑭摆在皇帝的位子上以后,就把他当作警卫、门岗,把守燕、云粮仓,也通过他向中原百姓进行勒索。

石敬瑭当了皇帝,不得不用傀儡政府的名义,竭尽一切力量,搜刮民脂民膏,再以儿皇帝的身份,奉献给契丹主子。石敬瑭的年龄,比德光要大好多岁,但是他毕恭毕敬拜倒在德光面前,规规矩矩地称儿子、称臣。石敬瑭就是这样地屈辱供奉,一直到死。

石敬瑭死了,新皇帝(出帝石重贵)接位,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李崧为代表,主张遵循石敬瑭的道路走下去,这反映了一部分毫无气节、苟安享受的地主阶级上层分子的要求;一派以景延广为代表,主张采取强硬政策,调整对契丹的关系,把国家和皇帝分开。皇帝个人任随他去称孙子,代表国家民众的政府不再向契丹

称臣。这反映了绝大多数人不甘屈辱的愿望,包括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部分稍有民族气节的上层官僚分子。由于景延广是政府里的实力派,立过大功,握有兵权,出帝石重贵只好跟着他的强硬政策走。

强硬派得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广大人民反抗压迫、不甘屈辱的一种胜利。

不过,在契丹统治者的眼里,后晋政权只是一个把管汉地的汉儿,只是一个可以任意摆弄的傀儡。现在,后晋政权既然拒绝称臣,破裂便是不能避免的了。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决意对后晋用兵。

从公元943年到945年(辽会同六年至八年),契丹政府3次进兵,都遇到了中原士兵和人民的奋勇抵抗。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有时(后)晋兵还打进北界,形势对中原十分有利。但是,后来的形势没能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驻守在太原的晋将刘知远观望不前,只求自保,前方大将杜重威、李守贞等,竟以20万大军向契丹投降,这样便造成了后晋的失败。

946年,契丹主攻入开封,抓走了石敬瑭的儿子晋出帝石重贵,灭了后晋。后晋,历二帝,11年。以契丹而立,终以契丹而亡。

后汉兴亡

947年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改国号大辽,意欲长期入主中原。但是,他却纵兵以“打谷草”为名,四出抢掠。开封、洛阳两京附近的数百里内村舍皆空,禾稼全无。因而激起民愤,中原百姓纷纷聚义抗辽。或几十几百,或几千几万,推举出头领,率众击辽兵、杀辽官,声势越来越大。

晋将刘知远拥军5万,镇守河东。当契丹与晋相争时,他据守本境,坐观静变。契丹攻陷开封,他派部将王峻以贺胜为名,去京城观察形势。王峻回报说:“契丹贪暴,志在掳掠,中原怨怒,其势必不得久。”有人劝刘知远出兵抗辽,刘知远却认为辽势正炽,尚需待机而动。

辽主眼见人民奋起,深为惶惧,遂率百官北撤,行至栾城(今属河北)死去。契丹内部为抢权而纷争,无暇南顾。刘知远乘机发兵晋阳,21天后进入洛阳,又8天进入开封,大兵所向,如入无人之境。黄河以南的后晋州镇,遂尽为其所有。

当辽主称帝于开封时,刘知远已在晋阳自立为皇帝,定都洛阳,建国号汉,史称后汉(947—950年)。刘知远称帝后10个月就死去了。儿子刘承祐继位,是为隐帝。

隐帝继位后,长安、凤翔(在关中)与河中(在晋西南)3镇同时发生叛乱。最后,老将郭威率兵往讨才平定下去。隐帝重赏郭威,郭威不受,而推功于在朝诸大臣和将士们,深得朝廷内外敬重。可是,年轻的汉隐帝却对老臣左右朝廷不满,欲用亲信执政。他先设谋杀死了在朝的几位重臣,后又派人到魏州企图杀害郭威,从而激起兵变。

郭威率兵从魏州(今河北大名)出发,7天就进抵开封城下。隐帝出城督师,后为溃军所杀。郭威以拥汉除奸的名义进入开封城收拾残局,以天子的葬仪为隐帝举丧。

当其时,开封西北有晋阳刘崇(刘知远弟弟),东有徐州刘赟(刘崇的儿子),南有许州刘信(刘知远弟弟),皆为节度使,手握重兵,若联兵问罪开封,郭威的处境就岌岌可危

了。

郭威持重,以李太后之命,宣告将立刘赧为帝,并派出一位深孚众望的使臣冯道去徐州奉迎。

冯道诱刘赧离开徐州,行至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南),郭威已在澶州(今河南清丰西)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回开封建国号大周,史称后周(951——960年)。刘赧得知澶州事变时,已被软禁在宋州的驿馆中。后来,刘赧终于被杀,徐州投降,刘信自杀,许州归顺。晋阳刘崇这时只有遥望顿足,尔后在晋阳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

后汉历二帝4年,是五代中寿命最短的政权。

吴国兴衰

9世纪90年代的初年,大江南北的局势逐渐安定,杨行密占有江淮、钱鏐占有两浙,形成十国中的吴与吴越。他们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促进了东南经济的恢复发展。吴越钱氏于公元978年纳土降宋,实际上存在了80多年。吴后为南唐取代,中间没有经过战乱,到公元975年被宋所灭,实际上也达80年以上。五代号为乱世,东南却比较安定,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唐代后期相比,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杨行密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参加过地方上的农民起义,曾被官兵俘获,侥幸没有被杀。后来应募当兵,做了队长,因受上官欺压,带头起事,占了庐州,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这年,黄巢兵进关中,唐朝政府哪里管得了淮南地方上的事情,只得承认既成事实,拜杨行密做庐州刺史。

杨行密初起兵时,与田頔、陶雅、刘威、刘金、徐温等心腹弟兄,号称36英雄,这些人颇有草莽豪杰的气息,与世代厕身军伍的藩镇旧将,出身和经历都有区别。

淮南节度使高骈是唐末大军阀,早年颇有英名,后来畏惧黄巢,不敢出扬州一步,声望顿减。他又迷信神仙、宠信方士,闹得与部下离心离德,被秦彦、毕师铎等囚禁起来。不久,被他们杀掉。杨行密以讨伐秦彦为名,进攻扬州,实际上是借此夺取地盘。

这次扬州争夺战造成极大的兵祸。杨行密围城半年。城中无粮,米价每斗卖到四五十千钱,居民大半饿死。军士抓了人卖给肉店,屠户就把活人权充猪羊,宰割出售。破城的时候,城中只有遗民几百户,都饿得不像人了。杨行密一生事迹大体上都可以肯定,惟独这件事情,却应加以谴责。

杨行密进扬州,是光启三年冬天的事情。孙儒的军队就在这时候渡过淮河,前来争夺扬州。第二年,杨行密被迫放弃扬州,退回庐州,接着又弃了庐州,渡江取宣州(今皖南的宣城)为家。数年之间,他和孙儒,为了争夺大江南北的土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孙儒部队的战斗力很是顽强。他在淮南强迫壮丁当兵,声势浩大,最盛时号称有50多万人,在江南行军,旌旗辐重,连绵100多里。杨行密同他交战,经常打败仗,最严重的时候,连宣州也差一点丢掉。但是在几年的冲突中,杨行密终于找到了孙儒的弱点:第一,淮南人不愿意跟孙儒,希望散伙还家;第二,孙儒部队没有后方,他攻打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城池坚固,一时打不下来,附近又没有粮草可抢,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杨行密针对这两点做工作,终于彻底打败了这个孙儒。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

孙儒放火烧毁扬州，驱迫丁壮妇女过江。杨行密派兵进城，扑灭余火，搜寻藏粮，散给饥民。孙儒部下的淮南人，不论是投降杨氏的，或是临阵被俘的，杨行密都派人护送回乡，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一边杀人、一边救人，淮南的民心归于杨行密，孙儒的军队逐渐瓦解，都是必然的趋势。

孙儒根本不懂得这一点，他依然耀武扬威地去打宣州。杨行密用坚壁清野的策略，和他相持。景福元年（892年）的夏天，终于一战擒获孙儒，把他杀掉。从此以后，杨行密以扬州为中心，据有江淮地区。唐政府任他做淮南节度使。尽管这时距离他受唐朝封吴王还有10年之久，十国的吴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

这个出身低微的割据者，亲眼看到粮草不足、民心不附就无法持久的事实，吸取了一点教训。他便以招集流亡、与民休息，作为主要的政策。不出几年工夫，江淮地区的农业生产就逐渐恢复了。

从另一方面看来，杨行密在世的时候，情形仍很紧张，打过不少仗。其中最重要的是乾宁四年（897年）的清口之役。

孙儒本是秦宗权的部将，孙、杨相斗，朱温当然希望杨行密得胜。孙儒死后，特别是朱温消灭了徐州的时溥以后，形势改变，朱、杨变成南北对峙的两股势力。乾宁四年，朱温吞并了兖、郓，只过了几个月，就大举进攻杨行密。他派庞师古屯于清口，准备直取扬州；葛从周屯于安丰（今安徽寿县南），以寿州为目标；朱温本人驻在宿州，策应两路人马。这个架势颇有灭此而朝食的模样，朱温显然认为灭淮南并非难事。

杨行密尽管地跨长江两岸，但重心在江北，枢纽是扬州。清口在今江苏淮阴以西，是泗水（清水）入淮之口，南北交通咽喉。由此而南，直趋扬州，地处运河沿岸，没有什么险阻。庞师古这支军队担任的是主攻方向，如果一战而胜，淮南势将为朱家所有。但是杨行密以寡击众（3万人对7万人），彻底击溃汴军，斩庞师古和将士1万多级，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葛从周部先已受到小挫折，得了师古败讯，仓皇北撤。淮南兵乘胜追击，又获大胜。朱温并吞南方的幻想从此破灭。

唐天祐二年（902年），杨行密去世（852年），儿子杨渥继位，军权掌握在张颢、徐温的手中。梁开平二年（908年），两人杀死杨渥，立行密的次子隆演。徐又杀掉张颢，把杀杨渥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于是吴国大权完全落到了徐温的手里。

杨行密的吴王，是唐朝的藩王，后嗣继承爵位，名义上不是独立的王国。公元919年，徐温作主，使杨隆演称吴国王，把唐天祐十五年改做吴武义元年。这个独立建国的举动，作用在于加强扬州所发号令的威信，也就是要所属州县向徐氏俯首贴耳的意思。

为了同样的目的，徐温竭力避免战争，借以防止武将扩大权力。吴与吴越，本来常在苏、常一带发生冲突。苏州一城，10多年中几次易手，争夺战打得相当激烈。武义元年，吴军在无锡大破吴越军，众将主张乘胜进取苏州。徐温却说：“战乱不息，百姓困苦已极。若能使两地人民各安生业，君臣高枕无忧，岂不好呢？”于是他释放战俘，与吴越讲和。从此双方保持了20多年的和平关系。

徐知诰是徐温的干儿子，从武义元年的前一年起，就奉徐温之命，在扬州执掌吴的国政。相传他本姓潘，后来把吴改做南唐，自己做皇帝，改叫李昪，自称是唐玄宗的子孙。这是乱认祖宗，事实上他是战乱时期的一个孤儿，出身低微，亲身体味到战时流亡的痛苦。他曾经对手下人说：“我生长在军旅之中，看到人民受到的兵灾，实在是可怕，

所以再不忍谈到打仗！”这一席话，看来是由衷之言，而且确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他谴责的战争，也确实是非正义的军阀混战。

徐知诰在吴国执政近20年（前10年徐温在世），加上做了皇帝的5年，共达25年（918—943年）。他的心腹谋士豫章人宋齐丘，早先是个落魄秀才，穷得连纸笔都买不起。知诰有事，都和他商量。吴国开头订定的制度，田赋都收铜钱，另外还有丁口钱，也收现钱。宋齐丘认为农民从事耕织，纳税要付现钱，就是叫农民弃农经商（实际上是叫农民卖掉农产品换钱，必然是农民吃亏，商人占便宜）。他主张取消丁口钱，田税改收谷帛实物。当时每匹绢的市价值500文，他建议把一匹绢抵原来1700文的税额。这个条陈一出，朝臣议论纷纷，都认为政府的损失太重。齐丘却说：“哪里有百姓富庶而国家贫穷的道理！”徐知诰考虑了他的建议，赞叹道：“这真是劝农的上策啊！”他坚决执行这项政策，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江淮一带的荒地，很快都长满了庄稼，蚕桑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他又禁止把良人子女买做奴婢。

前蜀兴衰

四川是五代时另一个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地区。它的地位可以和东南的江淮两浙并驾齐驱。

唐朝末年，四川境内的战乱不多。大顺二年（891年）王建攻占成都后，巴蜀经济基本上是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

王建，同杨行密、钱鏐一样，也是出身低微的新兴藩镇。他原是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一个饼师的儿子，年轻时精习拳脚，干些屠牛、偷驴、贩私盐的勾当，乡里中替他起个外号，叫做“贼王八”。后来投入蔡州忠武军，从士兵升做队长，又升到都头，指挥1000人马。他跟着蔡州的军队，镇压过黄巢起义，后被调到西川（今四川西部），逐渐纠合破产农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扩大军事力量。光启3年（887年）末，他开始进攻成都，与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争夺地盘。

陈敬瑄是宦官田令孜的兄长。唐僖宗叫田令孜做“阿父”，派他的兄长做了西川节度使（陈是本姓）。光启年间，田令孜在朝中成为众矢之的，只得逃到西川。这对弟兄是唐末腐朽势力的代表。王建攻灭陈氏，是消灭了一股腐朽势力。但成都攻围连续三年，居民饥困，也死了许多人。

以后，王建又兼并东川（今四川中部、东部），割据整个巴蜀地区。天复三年（903年），唐封王建为蜀王。

王建从社会的底层上来，识得创业的艰难，懂得一点人民的疾苦。他要在巴蜀立业，便留心刘备、诸葛亮建立蜀汉的史事，要模仿他们的作为。

他要做刘备，就不能放纵将士破坏成都。进城以前，他先派以严厉闻名的张勍做斩斫使，先行入城。然后对将士们宣布：“得了城池，不愁不富贵，切勿放火抢劫。我已经派张勍维持秩序。谁犯了法，他先向我禀报的话，我还来得及赦免，如果他先斩后报，我也没法相救！”后来张勍果然杀了100多个犯法掳掠的将士，把尸体堆在街上，警戒众人，使军队保持了较好的纪律。

王建有了地盘,便注意约束那些干儿子,凡是不守法纪或有跋扈嫌疑的,都加以严厉的制裁。王宗裕是建的同族,从小跟随他打仗,态度极为忠顺。有一次,他的手下人为点小过失,被成都尹崔隐惩罚。宗裕到王建面前告状。王建支持执法的地方官,把宗裕责备了一番。王宗涤本名华洪,是王建手下最得力的将官,只因态度傲慢,便被杀掉。

王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便乘朱温代唐的机会,宣布不承认梁朝,在成都称帝。前蜀武成三年(910年),他下诏劝课农桑,引蜀汉诸葛亮“闭关息民,十年而后举兵”的事例,令地方官关心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他有一篇告诫太子的文字,列举应该注意的事项。这类事项是:亲自审判案件,不让任何人受冤屈,也不让任何人逃脱应受的刑罚;不可骄傲自满;不要相信小人的说话;不要贪图声色游猎的享受;安抚百姓,厚待士卒。这几条显然是他总结的政治经验。

他嘱咐太子,必须经常阅读这篇文字,不可遗忘,并且说只有做到这几条,才保得住社稷。

宋朝熟悉巴蜀情形的人,发表评论,认为王建确实可以和刘备相比,是个好的政治领袖。有人说他对人民的剥削并不算轻,但也承认前蜀的仓库很充实,可见农业生产确有发展,经济情况是良好的。

成都这座锦城,在建围城时,居民不免困顿。不久以后,仍旧恢复了繁荣的面貌。著名的蜀锦,也仍旧是当地的特产。

王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重视文士,厚待唐朝的名臣世族。巴蜀一向是唐朝中原士大夫避乱的地方,唐末投靠前蜀的“衣冠之绪”很是不少。他们与西晋末年南迁的士族不同,只能寄人篱下,依靠地方势力的保护。原因很简单,西晋末年的士族带有大批宗族、部曲、佃客,到了南方,可以凭着实力,占有土地、山林、川泽,形成特殊的势力,夸耀门阀世族的威风。唐末的名门大族,手下早已没有爪牙,只带点眷属奴婢,像丧家之犬一样,本身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地方军阀重用,他们就是显贵的高官;不重用,就漂泊异乡,至多做个普通的地主而已。

后梁贞明四年(918年),王建去世(847—918年)。太子王衍继位,他根本不接受父亲的遗训,荒淫奢侈,前蜀的国势很快便衰落了。

后蜀始末

孟知祥是李克用的侄女婿。后唐庄宗灭前蜀后,派他去镇守蜀地,亲戚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灭蜀的主将郭崇韬早年受过孟知祥的推荐,这时就举他为镇蜀的最佳人选,也起了促成的作用。他在同光三年(925年)受到委派,次年正月到差。当年后唐发生政变,庄宗被杀,明宗即位。此后,孟知祥便和后唐政府若即若离,俨然是割据一方的霸主了。

孟知祥所有本只西川,东川(治梓州、今四川三台)另有节度使董璋。孟知祥先和董璋合作抗拒后唐,再击败董璋,兼并东川。他在蜀九年(926—934年),到最后一年才即位称帝,做了几个月皇帝便死了。他的儿子后主孟昶在位30年,在宋太祖乾德三年

(965年)正月兵败降宋。

后蜀的经济方面有些发展。但它只能做到在中原混乱的时候闭关自守而已。

孟知祥和他手下的大臣将相,都是后唐的官僚,其中还有从后梁降唐的人员。这批人一般都没有卓越的见识和魄力,不可能创建一个有新气象的政权。孟知祥能够做的,不过是收拾王氏前蜀的残局,使蜀中恢复小康相安的状态。

他初到成都的时候,蜀中农民正因苦于前蜀的暴政,群起反抗。孟知祥是个干练的封建统治者,他一面派兵镇压,一方选用比较廉明的人员做地方官,免除苛捐杂税,招集流散的人口,使社会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他任用的人,如武漳,在褒中兴建水利工程,灌溉田地数千顷,确有可以称道之处。经过了这一番经营,后蜀逐渐稳定了。

孟昶与王衍都是蜀国亡国之君,然而孟昶其人,既有奢华荒淫的一面,也有精明干练、力谋改善政事的一面。

孟昶即位时才16岁,将相大臣都是孟知祥的老部下,不把这个小孩子放在眼里。五代十国时期,老皇帝死了,将相大臣欺负孤儿寡妇,取而代之,是极其常见的事情。孟昶要防止这类事变,显然并不容易。

孟昶刚即帝位,大将李仁罕便提出主管六军的要求。他不但派人到枢密院提要求,还到学士院看是不是照他的要求起草命令。这个举动很咄咄逼人。孟昶居然不动声色,先接受条件,任命李仁罕做中书令、判六军事,然后等他进宫朝见,令武士捉住,当场杀死。另一员大将李肇,到成都朝见新君,一路上拖拖拉拉,与亲戚宴会,到了成都,又假装脚上有病而拄着拐杖,见了孟昶也不肯跪拜。李仁罕一死,他吓得魂不附体,顿时丢掉拐杖跪下去了。

李仁罕的外甥张业执掌禁兵,孟昶怕他反叛,千方百计加以笼络,甚至用他做宰相,又兼判度支(财政)。张业在家里私设监牢,监押欠债的人。他创立“盗税法”,规定税官吞没赋税的,照吞没的数目罚款10倍。税官受了罚,根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法则,仍向百姓勒索,结果最吃亏的是下级官员和百姓。孟昶废除10倍罚款的办法,最后在后蜀广政十一年(948年),用收拾李仁罕的老办法,把张业杀掉。

孟昶在朝堂上设匭,鼓励臣下陈说国事。有人上书论事,孟昶看了,认为说得不对,左右请求把上书的人喊来诘责,他就引唐太宗纳谏的故事,拒绝了左右的主张。他曾经亲笔撰述箴戒,发给地方官,晓谕他们不要过分剥削人民。他还表示应把前蜀王衍看做前车之鉴,说要吸取王衍因骄奢淫逸亡国的教训。

从这些地方来看,孟昶可以说是一个颇有才识的君主,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但是他的认识和实践很不一致,以骄奢淫逸为戒,但有许多骄奢淫逸的事迹;铲除了一些不可靠的旧人,同时又扶植了一批腐朽的新贵。因此,他又有阴暗的一面。这一面,越到后来,越是占着主导地位。这就是孟氏蜀国的悲剧。

这个悲剧是难以避免的。孟氏君臣不是从下层崛起的新统治者,是从后唐统治集团中分裂出来的。骄奢淫逸原是本性。知祥父子最亲信的将领赵廷隐是后蜀的开国功臣,他家中金帛如山,不断兴筑亭台楼阁,每天要征用几千个劳动力。

后蜀的政治不算好,但也不太恶劣,环境安定,割据的形势使中原朝廷榨取不到蜀中的一丝一粒,经济发展有较好的条件,文化上继承唐和前蜀的情况,与南唐、吴越同为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广政十三年(950年),蜀中1斗米只卖3文钱,人民赋役的负担很轻,府库里储藏的粮食金帛却很丰富。成都城上遍种芙蓉,九月里花开的时候,望去好像一片锦绣。城外江边,处处亭榭,游人云集,十分热闹。这时的中原正在后汉末年,混乱黑暗,比起蜀中来,颇有天壤之别!

但是这终究只是官僚、地主、富商的乐园,广大农民群众至多暂时得到赋役较轻的好处。当地统治集团的舒服日子也不可能长久,因为在这个安乐窝里只会产生腐朽的新贵,一旦中原王朝的实力强大起来了,这些新贵的末日就到了。

孟昶的亲信大臣王昭远就是这些新贵的典型。他13岁做孟昶的侍从,是个贴身小使。后来做通奏使、知枢密事,执掌军国大事。孟昶要对付旧将,就必须提拔自己信得过的新人。在他的心目中,王昭远是绝对可靠的人物,府库财帛,可以任他随便支取,没有任何监督。王昭远跟着权力和财富的膨胀,对自己的才干也估计得越来越高。他身居蜀中、执掌蜀政,便自命为诸葛亮。诸葛亮北伐中原都没有成功,王昭远竟自夸取中原易如反掌。到了被宋军打垮以后,又羞又急,哭了出来,被人叫做“带汁诸葛亮”,成为一个笑柄。

在这批人的统治下,后蜀晚年的政治,一天比一天腐败。后周、北宋不动则已,一动,后蜀的偏安就保不住了。在这一点上,前、后周的情况几尽相同。后唐出兵70天而灭前蜀,北宋出兵66天而灭后蜀,所费时间相差无几,看来像是巧合,实则并非偶然。

长江中游的荆南和楚

长江中游的两湖一带,五代时出现了两个国——荆南和楚。他们的统治者对社会的恢复发展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荆南是十国中最小的一个,辖地不过荆州一带,而且在后梁时,实际上还不称其为“国”。

荆南的建国者高季兴幼时在汴州富人李让家中做家童。后来李让认朱温做干爸爸,又奉朱温的命令,收高季兴做干儿子,两人都改姓朱氏。高季兴积了许多军功,做了大官,才复姓归宗。开平元年(907年),朱温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历史上通常以此为荆南的开始,其实他只是后梁的地方军政长官,与钱鏐等的地位不同。朱温死后,高季兴见梁朝衰乱,才作割据的打算,然而地小力弱,终五代之世,不过勉强维持而已。

江陵在古代一向是南北交通中枢,唐末屡遭兵祸,破坏得极其厉害。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小军阀成汭占领江陵时,居民只有17户。他招抚流亡,奖励农桑,10多年后,才增加到将近1万户。此人在唐末军人中,是一个难得的人物。

成汭后与淮南兵冲突战死。江陵几经争夺,最后为朱温所得,也就是为高氏所有。成汭死后,江陵又遭破坏,季兴刚到任时,“兵火之后,井邑凋零”,境况很是不好。他又用了一番心思,招抚流亡,地方逐渐恢复了生气。

高季兴的心腹谋士叫梁震。他原是蜀人,登第后流寓江陵。高季兴请他出山,他不肯任职,只以宾客身分,参与谋议。他的主张只有保境安民、善事朝廷一条。但是这一条确是荆南的上策。

梁亡以后,高季兴又臣服后唐,受封为南平王,因此荆南又叫南平。高季兴本来叫季昌,后唐时避李克用父国昌讳,才改为季兴。这个国的附庸地位,在这上面也表现得很清楚。

楚是从孙儒的流窜武装集团中蜕变出来的地方势力。它的建立者是马殷。

马殷少年时是许州鄢陵的一个木匠,后来应募从军,跟孙儒的军队南下,地位逐渐上升。孙儒死后,大部分军队投降杨行密,剩下的一部分推刘建锋做首领,向西进入江西、湖南。马殷就是这支兵的先锋将。

刘建锋得了潭州(今湖南长沙),才算有了固定的地盘,停止流窜。不久,刘建锋被部下所杀,众将推马殷为首。这时是唐乾宁三年(896年)。马氏割据湖南,就从这时开始。马殷在唐末是武安军节度使。后梁建国,封马殷做楚王,才有楚的名称。马殷在位35年,名义上先后做过唐、后梁、后唐的藩臣,事实上是独立的割据者。

唐末的湖南,小军阀纷起,各据一州。马殷开头只有潭、邵(今邵阳)两州,湘南的衡(今衡阳)、永(今零陵)、道(今道县西)、郴(今郴州)、连(今连县)以及西部的朗(今常德)、澧(今澧县东南)等州,都有人各占一方。9世纪末、10世纪初,马殷攻灭群雄,才全部占有湖南。此外,他还攻占过岭南的几个州(今广西北部)。

马殷得了湖南,与谋臣高郁商议立国的方针。高郁劝他尊重中原的朝廷,取得封爵,休兵息民、发展生产,积蓄力量。

马殷接受他的主张,提倡造茶、种桑、养蚕,使人民纳税时用帛代钱,大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家庭纺织业。这与吴国徐知诰、宋齐丘的办法相同,都以休养生息为着眼点。马殷特别注意发展商业,收取商税。他同中原王朝保持了朝贡关系,便可以在京师以及襄(今河北襄阳)、唐(今河南唐河)、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等州,设立邸务卖茶,获得巨额的收益。在这一方面吴与中原对立,就无法办到。这是官营的商业。马氏也提倡民间自己造茶,让商人贩运销售,向政府纳税。史籍说马氏“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凑。”大约除税茶以外,其他货物都不收税。马氏境内行使用铅铁铸造的钱,客商带出境外,没有用处,都换了土产而去。

湖南境内的产品,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瓷器。湖南长沙窑首创多彩瓷器。晚唐、五代时,长沙、衡阳一带的制瓷手工业仍继续发展。五代的墓葬中出土很多碗、碟等器皿,多系白瓷,釉色白中泛青,胎薄质精。长沙窑的产品在国内外多有出土,客商们买的土产,瓷器显然是不少的。

这样,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发展,人们的生计,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比较充裕。

南方沿海的闽和南汉

闽的建立与农民起义有直接的关系。唐末农民大起义期间,河南有个屠夫王绪,他聚众起兵,攻占固始。固始县吏王潮出身农家,智勇双全。他与兄弟王审知投入王绪军中,做了军校。王审知便是日后闽国的创建人。

王绪怕被秦宗权并吞,引兵南下,流动作战,经江西进入福建。从他们活动的情形

和史籍上所记王潮“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的话来看,这支军队是一支农民起义军。

王绪不善用人,对于有才能的将校,怕他们反对自己,常常借故杀害。光启元年(885年),王潮利用众心不服的机会,设计把王绪擒住,夺得了部队的领导权。王绪被禁闭了一阵,便羞愤自杀。

王潮带兵,纪律极为严明,不但深得兵心,也受到福建人民的拥护。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居民听到王潮的军纪严明,便要求他前去讨伐。光启二年,王潮攻克泉州,就把那里作为根据地。他招合流散的农民,减轻赋税,一面整军经武,形成了一支新的地方势力。

景福元年(892年),范晖做了福建留后,暴虐无道。王潮乘机进攻福州。泉州人民自愿捐献粮食,补助军费,可见他确实受到人民的拥护。第二年,王审知攻破福州,从此王氏占有福建全部,闽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但是王潮的身分只是唐朝的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乾宁四年底(898年初),王潮去世,审知接替了他的官职。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朱温封审知闽王,才有闽国的名称。

王审知统治28年,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去世。王氏弟兄崛起于起义军之中,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自己的生活较为俭朴。他们注意选择地方官,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在他们两人在位的30多年中,福建境内始终保持着适于发展生产的条件。

王氏兄弟特别重视沿海的商业。他们免除繁重的商税,鼓励海上贸易。福州、泉州两地,船舶出入频繁,从此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港。古代海外进口商品,很多是香料、珍宝等贵重货物。王审知的侄儿延彬,在泉州30年,发展海上贸易。人们都把他叫做“招宝侍郎”。

王审知还厚待流寓福建的士大夫,设立学校。对福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从福建往南,广东和广西的一部分,有刘氏的南汉。南汉与吴、吴越、楚、闽、前蜀不同,建国的首脑不是草莽英豪,而是上层的地方长官。

南汉建国者刘隐的祖上,因经营商业,从北方迁居泉州。刘隐的父亲刘谦弃商而官,到广州做牙将,向社会的上层爬去。他娶节度使韦宙的侄女做妻子。韦氏是名门大族,韦宙本人做过宰相。刘谦配了这门高亲,社会地位又上升了一步。韦氏愿与一员牙将通婚,显然是受了南海富商财产的吸引。然“婚姻不问阀阅”,毕竟透露了时代变迁的消息。

刘谦后来做了封州(今广东德庆)刺史,死后,刘隐继承了他的官职。乾宁三年(896年),唐宗室薛王李知柔到广州做清海军节度使,被叛将所拒。刘隐镇压了叛将,保护李知柔进广州。从这时候起,刘隐事实上已经是“南霸天”了。但历史上或以刘隐做节度使,或以刘隐的兄弟刘昀称帝,作为南汉的始年。前者是唐天祐元年(904年),后者是后梁贞明三年(917年)。

从上面所叙的事实来看,南汉的统治是从富商、名门、官僚地主的结合中产生的地方势力。

刘隐曾被朱温封做南海王。死后,兄弟刘陔继位。他见中原多事,就自己做起皇帝来了。他造了一个字,上“龙”下“天”,读“俨”,做自己的名字,国号先叫大越,后改为汉。

南汉的统治并没有什么兴革。这原因很简单,唐末农民起义军虽曾进入广东,但很

快就撤走,影响不大。唐军也没有与起义军在这个地区打过大仗,战争的破坏也不显著。这个从统治阶级上层产生的地方势力完全照老规矩办事,根本想不到有兴革的必要。

反之,从唐朝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看来,在四海鼎沸的时候,岭南却是一块安全的“乐土”,南迁避难的为数不少,原在岭南做官的,也都在此落户。这对传播中原文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使岭南成为旧的传统势力最浓厚的地区。王定保和赵光允的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刘𦰩其人,极为残酷,把用毒刑杀人当作戏乐。但是他对“清流”、“甲族”,偏偏极为迁就。他要做皇帝,怕王定保反对,故意把他派到荆南去。定保回来时,刘𦰩已经登位,还怕定保有看法,派人探他的口气。定保却说:“建国当有制度,我看见城门上还挂着‘清海军’的匾额,岂不要被人耻笑!”刘𦰩听了,方才放心。赵光允在南汉建国后,觉得自己当了个“伪国”的大臣,一直闷闷不乐。刘𦰩知道了这情况,特地派人到中原,把住在洛阳的赵氏家属,全部接到南方。赵光允因此感激涕零,才死心塌地做南汉的大官。

刘𦰩对王、赵二人的态度颇为宽厚,目的在于争取“清流”、“甲族”的拥护,也就是尊重传统势力的表示。刘𦰩的毒刑名目繁多,或把人投入汤镬,或把人放在烧红的铁床上烤炙,或把人开膛破肚、支解屠割。但是对于这些人,他却并没有甚至没有想到用这些东西来进行威吓。

南汉政权的设施,促进了海上贸易。

刘家原是南海富商,刘隐弟兄称王称帝后,贪欲更加发展,竭力搜罗南海珍宝。这种商业纯粹是为统治者的奢华生活服务,但广州这个港口日益繁华,毕竟是一件好事情。

交州(今越南北部)本来是南汉静海军。937年,节度使杨廷艺被牙将矫公羨杀死。次年,牙将吴权攻杀矫公羨。南汉主以助矫氏为名,想打败吴权,派自己的儿子做节度使。939年,吴权打败南汉军,称王。这是越南吴朝的开始。

南方七国,是唐末和后梁时秦岭淮河以南的主要割据势力。实际上这几十年的情形非常复杂,许多地方出现过大大小小的割据者,时起时灭。

闽、楚灭亡和留、周二氏的兴起

闽的王审知、楚的马殷,出身的低微、施政的清明,都相仿佛。两人的后嗣,一反先人之道,荒淫暴虐、自相残杀,走的道路也完全一样。这两个割据国家,都被南唐灭掉,又都不是南唐消化得了的。留从效占有漳、泉,周行逢重占湖南,两家都是五代后期的新割据者。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王审知死后,20年间,闽国换了5个国主,其中延翰、延钧、延羲、延政,都是审知的儿子,只有延钧由儿子王昶继位,这5个人,除延政投降南唐外,又都死于宫廷事变之中。

延钧杀死兄长延翰,自立为国主。他迷信鬼神,想先做60年皇帝,再升级当“大罗

仙人”。他用薛文杰做国计使。薛文杰专门打听民间阴私的事情,罗织成罪,没收财产,塞饱私囊,并供应延钧挥霍的需要。这个国主在位9年,便给儿子谋杀了。

延羲夺了侄儿的位子,又与兄弟建州节度使延政,发生混战。这对弟兄都是福建人民的死敌。

延羲曾想惩办泉州刺史余廷英。余廷英送“买宴钱”1000万赎罪。延羲嫌少,问:“皇后的土贡何在?”余廷英马上再送1000万。延羲满意了,就不治他的罪。国计使陈匡范增加商税几倍,每天献上大量现金,供延羲挥霍,延羲竟称赞他是人中之宝。

延政在建州称富沙王,改国号叫殷。他最信任的杨思恭,专门想办法盘剥百姓,山泽田亩、鱼盐蔬果,没有一样不加税。人民替他起个外号,叫做“杨剥皮”。延政和延羲混战,福州与建州之间受到的破坏很严重。后来,延羲被部将所杀,延政似乎可以据有福建全部了,但是这时,南唐开始进攻福建,闽国终于灭亡。

南唐军队初到福建时,人民很是欢迎。这就是王氏暴君统治的结果。

南唐军队的所作所为,使福建人民大失所望。于是降唐的闽国将领留从效占有漳、泉,通知南唐守将:“泉州租税不多,只够自给,不烦大军久驻于此!”接着,不管他是否同意,便在郊外设宴饯行。唐将兵力单薄,只得撤走。

留从效出身士兵,了解民间疾苦,又是泉州本地人。他生活朴素,与民休息,因此漳泉一隅,在五代末年,情况较好。他在公元947年送走南唐驻军,到962年(宋太祖建隆二年)病死,踞有漳、泉15年。部将陈洪进继任,到南唐亡后,把辖境献给宋朝。留、陈两人在名义上都是南唐的清源军节度使,历史上也不算在十国之内。

留从效很注意发展海外贸易。《留氏族谱》说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还。”输出手工业品,换回来的东西有贵金属在内,这是对国内经济有利的贸易。泉州被后来的外国旅行家叫做“刺桐”。泉州城郊遍植刺桐,就是留从效时做的事情。从晚唐五代直到元末,泉州港一直兴旺发达,留从效起了促进作用。

楚的马殷死于后唐长兴元年(930年),活了79岁。他晚年衰老不能理事,儿子希声掌权。希声中了荆南的反间计,剥夺高郁的权力,又把他杀掉。马殷知道了,号啕大哭,不久便死了。希声在位2年而死,兄弟希范继位。

希范在位15年(932—947年)。他大兴土木,造会春园、嘉宴堂、九龙殿、天策府,珠帘绣幕,墙壁轩楹都用金银装饰。经费不够用,便大增赋税、出卖官爵。人民犯了罪,富人罚钱,强壮的当兵,只有穷而且弱的人受刑。马殷时政治比较清明的状况完全改变了。

希范死后,希广继位。兄长希萼和他冲突,从朗州进攻潭州,希广被俘而死。朗州兵破潭州时,杀人放火,大抢3天。潭州的公私财物不变成盗赃,便化为烟尘。希萼与希崇又互相攻击,湖南越来越乱。两人都想依靠南唐的援助,南唐军便乘机灭楚了。

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湖南将领刘言等赶走唐军。不久,众将争夺权力,连续演出几幕互相残杀的惨剧。刘言、王逵相继被杀后,周行逢掌握大权,杀戮异己,才恢复了平静的状态。

周行逢出身低微,注意选择廉明的官吏,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的女婿想做官,行逢不肯给他做,说:“你的才干不能称职,还是回家种田的好!”他自奉很朴素,有人批评他过于俭省,他说:“马家穷奢极欲,得到这样下场,难道可以效法吗?”湖南在他的统

治下,逐渐恢复了元气。

周行逢在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取得湖南,名义是受后周任命的武平节度使,实际上割据一方,但历史上并不算入十国之内。他死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儿子保权继位,不久即并入宋朝。

郭威和柴荣改革

后周太祖郭威在位三年零半个多月,柴荣在位五年零五个月,合起来不满九年,事功却很可观。政治、经济的改革,多半前后相继,独有军事的改革和南征北伐的成就,完全是柴荣手里的事情。后人特别推崇柴荣,原因就在这里。

第一是郭威、柴荣都比较注意节约。

后周宫廷节约俭朴的风尚,和后蜀、南唐、南汉等国奢华糜烂的气息,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表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后者呈现了江河日下的倾向。

第二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郭威刚即位,就下令废除后汉窃盗一钱以上处死的苛法,照后晋天福元年以前的法律办事,规定除谋反叛逆以外,不得屠戮亲族。后汉管仓库的官吏,照例要收高额的“斗余”、“称耗”,使人民的实际负担,比税额规定的斗石斤两,超过很多,郭威也下令废止,不准再收。

郭威和柴荣都屡次下令减免租税。显德五年(958年)均定田赋的措施,尤其是五代末年的一项重大改革。

均定田赋简称均田,是按照实际的田亩数字收税。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就是不用这个办法。

第三是惩治贪污的官吏。

郭威和柴荣都能毫不留情地严惩贪污的官吏。莱州刺史叶仁鲁是郭威的老部下,因贪赃1.5万匹绢、1000缗钱,被处死刑。郭威派人告诉他:“你触犯国法,我没有办法救你,只能抚恤你的母亲。”柴荣时,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主管收税,因场官在正额之外,多收耗余,也被处死。有人说孟汉卿罪不至死,柴荣说:“我也知道,但不能不以此警戒别人。”

他们肯这样雷厉风行地办几个人,当然会对政治风气带来良好的影响。

但是郭威和柴荣对于最高级的官员,特别是对于各地的方镇,尽管明知他们贪污不法,也没有办法处理。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向民间诈取了很多钱财。他实际上是个河北王,郭威无法办他,也无法制止,只得派人告诉他:“邺都仓库储藏很丰,卿家要用,要多少拿多少,何必怕没有钱!”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郭威最后还是乘他入朝的时候反他抓起来杀了,不过原因不在贪污,而在威势太大,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了。

第四是招抚流散的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初年,幽州饥荒,难民纷纷流入后周的沧州等地。南唐发生旱灾,饥民步涉淮河,来到后周境内。郭威命令各地官吏,妥善安置难民,分发口粮、分配荒地,一共得到

了几十万个劳动力。柴荣即位后,也注意招集从南唐、后蜀、北汉等国流入的饥民。这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此外,柴荣还准许年老疾病的兵士退伍还乡。这样,国家节省了兵饷开支,农村中增加了一份劳动力(至少是半劳动力),对生产也有一点好影响。

第五是治理河患、兴修水利。

修治以汴水为主的航道,是柴荣在水利史上的大贡献。

显德四年(957年),柴荣命令疏浚汴水,向北流入五丈河。六年,再加了一番疏通的工夫。这条航道,河宽5丈,从大梁向东,渐折向东北,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这入济以后的一段,大体上与现在的黄河相仿。这是从汴梁到相当于今山东省各地的航运路线。

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道交通线,本是唐朝中央政府取得东南财赋的生命线。南北分裂以后,这条航路完全淤塞。柴荣有统一的雄心,要用兵东南,故从显德二年起,便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初步加以疏通。显德五年,又疏浚汴口,沟通黄、淮间的全部航线。六年,又在大梁城外,引汴水通蔡水,沟通京城与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之间的水道交通。这是汴水以西、大体上与汴水平行的一条水道。以后北宋靠汴水为立国之本,每年从东南运来大量粮食,靠的就是柴荣建设的成绩。

此外,柴荣还派何幼冲疏通泾水,灌溉农田。关中自经朱温的大破坏以后,简直没有人做过建设工作,柴荣在这方面的努力,尽管不大,也很值得称道。

第六是开封城市的建设。

北宋的东京是气象宏伟、市容华美的城市。它的基础也在后周时奠定。

开封本来城郭不大,街道狭隘,完全不像首都的样子。五代时,开封做了梁、晋、汉、周四代的都城,官衙商旅越来越多,这座城市便显得格外狭小了。

显德二年,世宗决定修筑外城,先立下标志,等冬天农闲时兴筑、农忙停工,秋后再继续进行。这座新城周围48里233步。政府先划定官衙、仓库、街道的范围,其余让人民自由建造房屋。大梁城中许多旧街,本来并不宽广,又被居民造房屋时占用了一部分,以致能通行大车的不多。改建时都拉直加宽,最宽的有30步阔。

这个改建的工程前后进行了3年,完工以后,面貌完全改观。有些工于心计的人,看到改建京城、疏浚汴渠等大工程的开展,预料日后航运畅通、商货云集,必有一番空前繁盛的局面,就动起脑筋来了。有个叫周景的官员,请世宗准许人民沿汴渠种植榆柳、兴建楼阁,以壮观瞻。世宗答应了。他首先在渠口重要地点,造起12间高楼。后来各地商船来得多了,周家的楼房正当停泊的地点,客商留宿、堆放货物,都极方便,因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这个事例来看,后周末、北宋初开封的商业,显然有很大的发展。

以上六项是后周在政治经济上比较突出的改革。其他如重视官吏的选择;废去大批寺院(共废30336所,保留2694所),鼓励僧尼还俗参加生产,或用其所长,参加别的工作;大量铸造钱币,解除钱荒,都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措施。

郭威和柴荣可以说是五代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柴荣尤其是五代时期最英明的君主。

后周二帝的改革使后周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大增,在群雄角逐中逐渐取得了有利地位,这为代周自立的赵宋王朝兼并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

陈桥兵变

赵匡胤(927——976年)是涿州(河北涿县)人,生于洛阳马夹营,原是五代周世宗柴荣手下的一名高级军事将领。他跟随周世宗立了战功,得到周世宗的信任,成为禁军的重要将领。周世宗对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十分重视。禁军是后周政权的支柱,是一支劲旅。这支禁军由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分别率领。侍卫亲军司掌握的兵额较多,最高统帅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司的兵员较少,但部队比较精壮、战斗力很强,胜过侍卫亲军司。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是后周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掌握了禁军的实权。

五代时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一些军事将领,利用手中控制的武力,从事权力斗争。五代十国各个朝代的兴亡,大多取决于禁军及其统帅的向背。那些掌握禁军实权的大小将领,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往往勾结起来,拥戴自己的最高统帅夺取皇位。后周太祖郭威(951——954年),邢州尧山(河北隆尧)人,是后汉的大将,先后做过节度使、枢密使。他在部将们的拥戴下,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后周政权。那些拥戴他做皇帝的人,都是禁军的将领,如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以及一部分中级将领如郭崇、曹英等。

公元959年(显德六年),周世宗柴荣去世,由他的7岁幼子柴宗训继位,这就是周恭帝。

公元960年正月,从镇州(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县)传来急报说:北汉联合契丹南犯。后周的宰相范质和王溥等,立即主张派赵匡胤率领禁军予以抵抗。赵匡胤名正言顺,当即带领部队北上。当行抵汴京以北20里的陈桥驿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和军中一班将领,在深夜五鼓,一齐聚集在陈桥驿门,宣言要请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为天子。到了天刚亮时,军士们拥到赵匡胤的寝所,由赵光义入内传达军士们的请求。诸将露刃于庭,赵匡胤的爱将罗彦环叫嚷说:“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于是他们就把预先准备好的皇帝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大家高呼万岁,并把赵匡胤扶上马,准备返回京城、登上皇位。

于是赵匡胤下令:“后周太后和主上,不能惊犯;后周大臣不得侵袭;朝廷府库和士庶之家,也不许侵掠。”诸将都表示遵命。赵匡胤当即回到了汴京,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在汴京城内暗作内应,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权。因为赵匡胤当时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于是就用“宋”为国号,改元“建隆”。习惯上称赵匡胤建立的宋朝为“北宋”,都城在开封。

“陈桥兵变”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赵匡胤在后周统帅禁军期间素得军心,得到军士

们的拥护 ;另一方面 ,是由于赵匡胤手下的高级将领沿袭五代以来将帅拥戴之风 ,以赵匡胤为自己的靠山。

宋太祖赵匡胤懂得将帅们的心理。他在即位的第二天 ,就晋升一批禁军的高级将领。除了为石守信加官晋爵以外 ,还以张令铎为马步军都虞侯 ,张光翰为马军都指挥使 ,赵彦徽为步军都指挥使 ,高怀德为殿前都点检 ,王审琦为殿前都指挥使 ,皇弟赵光义为殿前都虞侯。这些人都是赵匡胤的亲信。石守信和王审琦还是赵匡胤“义社”十兄弟的成员。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 ,用和平的手段 ,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战斗 ,夺得了皇位 ,使北方正在好转的社会生产力没有遭到破坏。赵匡胤把周恭帝降为郑王 ,对拥立有功的将帅 ,都一一加以奖赏和提拔 ,如石守信就做了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顺利地解决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李筠李重进反宋

建隆元年(960年)正月 ,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 ,建立宋朝。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试图起兵反宋。建隆初 ,赵匡胤派使者去见李筠 ,以授他中书令一职来拉拢他 ,李筠拒绝接受。在幕僚们的谏诤下 ,李筠虽然接见了使者 ,但他故意把周太祖的画像悬挂在室壁上 ,并涕泣不已。幕僚们都很惊惧 ,告诉宋使说 :令公喝多了 ,有失常性 ,望切勿怪罪。

北汉主闻知李筠想反宋 ,遣使送书 ,邀他共同起兵。宋太祖继续慰抚李筠 ,用他的儿子李守节为皇城使。李筠一方面派遣李守节入朝 ,探听京师动静 ,另一方面 ,派遣刘继冲向北汉 ,奉表称臣、纳款求援。李守节到朝廷后 ,宋太祖即责问他来京城的意图 ,李守节惶恐 ,以头击地 ,说是有人在算计他父亲。宋太祖遣李守节归 ,让他告诉他父亲说 :“我不是天子时 ,听任你的作为。现在我已是天子 ,难道你就不能归属于我吗 ?”李筠不顾宋太祖的一再慰抚 ,决心反宋。

建隆元年(960年)四月 ,李筠命令幕府草拟檄文 ,历数宋太祖的罪恶 ,随即遣兵袭杀泽州刺史张福 ,占领其城 ,将监军周光逊等人抓起来送于北汉。李筠的从事阎丘仲卿认为李筠孤军举事 ,北汉的援助不可靠 ,宋兵精锐 ,难与争锋 ,建议他西下太行 ,直抵怀、孟 ,塞虎牢 ,攻占洛阳 ,然后东向争天下。李筠错误估计形势 ,以为他是周室宿将 ,与周世宗情同兄弟 ,禁卫军都是他的旧人 ,必将倒戈来归 ,况且有儋珪等强将 ,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他不听阎丘仲卿的建议。北汉主刘钧率兵与契丹军数千人增援 ,李筠率部下至太平驿以臣礼迎谒 ,北汉主封李筠为西平王。北汉主几次召李筠议事 ,李筠说自己受周室厚恩 ,不忍背负。北汉与周为世仇 ,对李筠的话很反感。北汉主便派宣徽使卢赞监李筠军。李筠见北汉兵少 ,又派卢赞监其军 ,深感后悔 ,并且在许多方面与卢赞的意见又不协调。于是李筠命令其子李守节守潞州 ,自己率兵 3 万南下。北汉主知卢赞与李筠有矛盾 ,遣平章事卫融前往调解 ,但矛盾依然如故。

宋太祖派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王全斌分道出击 ,特命诸将急引兵扼守要害地区 ,勿纵李筠下太行。又遣慕容延钊、王全斌由东路与石守信会合 ,同监军李崇矩一起在长平击败李筠军。斩首 3000 级 ,攻下大会砦。

六月,宋太祖率军亲征,与石守信等会合,再次大败李筠于泽州南,获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杀北汉宣徽使卢赞,李筠退守泽州城。宋太祖督战,列栅栏围城,大将马全义率敢死队,攀城堞而上,攻占泽州。李筠自焚,北汉平章事卫融被俘。宋太祖乘胜攻潞州,李守节降。北汉主闻李筠败,从太平驿返还晋阳。

七月,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反宋。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与赵匡胤分掌周室兵权。周恭帝即位,李重进出镇扬州,领宿卫如故。赵匡胤代周,拜李重进为中书令,命令他移镇青州,李重进不满,想起兵反宋。正巧李筠已起兵,李重进便派遣亲信翟守珣去潞州与李筠联络,翟守珣却私去京师会见宋太祖。宋太祖遣陈思诲安抚李重进,赐铁券。李重进欲随陈思诲入朝,部将竭力劝阻,李重进犹豫不决。

李筠被平定后,李重进觉得作为周室亲戚的他,不会有好结果,这才下决心起兵反宋。于是李重进拘留陈思诲,修城练兵,派遣使者以求得南唐的援助,南唐主不敢接纳其使,李重进又派遣使者去邀建雄节度使杨庭璋共同起兵,杨庭璋非但不答应,反而将他的使者扣下,并为宋献策攻取李重进。扬州都监右屯卫将军安友规,不愿随李重进反叛,踰城而逃,归宋。李重进因此怀疑诸将皆不附他,关押军校数十人。

十月,宋太祖想对李重进进行讨伐,询问枢密副使赵普有何意见。赵普分析说:“李重进士卒离心,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宋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率师亲征。十一月,拔扬州,李重进自焚,其同谋者数百人被杀。

太宗继位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突然在夜间死了,终年50岁。当时他的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都已成人,皇帝的位置没有由儿子继承,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却在次日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在秦代以后汉族皇朝的皇位继承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赵光义就是宋太宗。

这一事件在六年后,由赵普出面说是有个“金匮之盟”的秘密。原来,赵普虽然因为帮助宋太祖出面策划陈桥兵变,又在制定统一战争方略和削弱藩镇权力等重大决策中为宋太祖出谋划策,深得宋太祖的信任,但因利用权力做了一些贪赃枉法的事被发觉,太祖去世前就被罢去宰相职事。太宗初年,赵普多年郁郁不得志,就上书给太宗,说是他知道有个“金匮之盟”的事。据赵普说,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皇太后杜氏在临死前,曾召赵普入宫立下遗嘱。当时杜氏对太祖说:“你知道这个天下是怎样得来的吗?”太祖说:“都是祖宗和太后的功德”。杜氏说:“不对。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子主天下的缘故。如果后周有年长的君主,你哪能得到皇位!你百年后,应当传位给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再传给德昭。四海至广,能立年长的君主,是社稷的福气”。太祖表示一定遵从母教。杜氏就让赵普当场在榻前记下这些话作为誓书,藏之金匮,由谨慎可靠的宫人掌管。宋太宗按赵普提供的情况找来这个金匮打开,果然有这个誓书。赵普提供的这个“金匮之盟”,到底真实性如何已经无从稽考。宋太宗后来就没有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光美,反而借故治光美的罪。赵德昭后来也被逼自杀了。赵普作为宋太祖的亲信和开国元勋,由他出面讲了金匮订盟的故事,给宋太宗越过赵德昭、赵德芳而继承皇帝位,

提供了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宋太宗也大为高兴，立即重新信用赵普。

宋太宗在后周时就开始戎马生涯。他参加组织陈桥兵变，北宋建立时任殿前都虞候，成为禁军重要将领，后又任职位重要的开封府尹，位在宰相之上。在太祖外出时还作为东京留守，坐镇京城，看守朝政。在太祖逝世以前，他已经掌握了宋朝很大部分的权力。所以，他登上皇帝宝座后，没有经过什么波折就顺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在北宋的皇帝中，宋太宗也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继承皇位以后，也是把宋太祖的统一战争等未竟事业继续进行了下去。

王小波、李顺起义

四川从秦、汉以来便称为“天府之国”。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土地肥沃，盛产稻米、茶叶和丝麻。织锦和造纸就是当地的著名手工业品。四川人民生产的丝帛，“号为冠天下”。

在唐宋和五代时期，四川人民在封建割据统治下，贫困到了极点。后蜀政权尽力搜刮民脂民膏，土地兼并空前剧烈。赵匡胤消灭了后蜀的割据政权以后，四川的封建恶势力并没有受到触动，农民们依然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四川的客户是全国比例最高的，大约占四川地区总人口的十分之六七。许多豪强大姓，拥有几百家甚至上千户佃客。他们过着农奴式的生活。地主阶级把自己的赋税徭役，转嫁到农民头上，弄得他们朝不保夕、惶惶不安。一遇水旱，他们无路可走，被迫铤而走险。少数占有少块土地的自耕农，也是奄奄一息，“耕稼不足以给”。

公元965年（乾德三年），宋军占领了四川，后蜀政权所搜刮的金银财富，通过长江三峡，运到江陵，再转送汴京。宋朝派往四川的官吏，对当地人民进行凶暴的勒索。973年（开宝六年），渠州（四川渠县）就掀起了农民的反抗运动，有近万人参加。

北宋王朝为了搜刮四川的财富，在成都设立“博买务”，垄断民间买卖，禁止商人贩运布帛。政府又把四川的名产茶叶收归官卖，任意抬高茶税。种茶的农民受到沉重的剥削，采摘的新茶要以低价卖给政府。茶农们哀叹：“种茶好比种祸”。各地的小商小贩，也都陷入了绝境。

四川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在993年（淳化四年）发动了反对贫富不均的斗争。

这一年，四川出现严重的旱灾，到处闹着饥荒。人民实在熬不下去了。带头发动起义的是四川青城（四川灌县）的小贩王小波。开始时，他带领100多人起事，提出了“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战斗目标。“均贫富”，这是贫苦农民梦寐以求的最高愿望。大批饥寒交迫的农民，很快投入战斗的行列。不到10天时间，就聚集了上万人。

农民军从青城出发攻下了彭山，杀掉了一贯吸吮民脂民膏的知县齐元振，在他的大腹内装满了铁钱，表示人民对贪官污吏的极度仇恨。起义农民没收了大地主官僚的财物，一一分散给贫民。

王小波在江原（四川崇庆东）的战斗中，杀死了宋军将领张珩。张珩手下的几百名士兵，都倒向农民军一边。王小波在这次战斗中，身受箭伤，不幸伤重身死，由李顺继续

领导战斗。

994年(淳化五年)初,李顺攻打蜀州(四川崇庆)、邛州(四川邛崃),连连获胜。数万农民军连下成都西边的郫县、温江、双流、新津等县,并攻克成都。李顺被拥戴为“大蜀王”,建立了“大蜀”农民政权,用“应运”年号,铸造“应运元宝”钱。农民军的势力南到巫峡,控制了长江上游,北近剑门(四川剑阁东北剑门关),声威大振。

北宋王朝为了镇压四川农民起义,派遣宦官王继恩统率官军分两路入川。一路上宋军血腥屠杀人民,攻占剑州(四川剑阁)、绵州(四川绵阳)等地,逼近成都。

农民军为了把守成都,从攻势转为守势,战斗处于被动地位,遭到宋军的进攻。994年5月,农民军退出成都。在退却的过程中,李顺和部下失去了联系,由张余领导农民军余部继续战斗。

当时成都城10里以外,都还在农民军手里。张余带领万余起义军,连下嘉州(四川乐山)、戎州(四川宜宾)、泸州(四川泸州)、渝州(四川重庆)、涪州(四川涪陵)、忠州(四川忠县)、万州(四川万县)、开州(四川开县)等八州,战斗形势大有好转。这年八月,张余带领2万农民军又攻克云安军(四川云阳)。在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宋朝统治者不得不作些让步。宋朝改成都府为益州,派张咏为益州知州。宋太宗对张咏说:“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行事”。张咏到了成都以后,恢复民间米、盐等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贸易。有一次,王继恩把30多个农民军首领交给张咏处理,张咏把他们全部释放,让他们安家归业。张咏说:“化贼为民,有何不可?”张咏还废除了从陕西转运粮食到成都的虐民措施。在这同时,宋朝的一个军官名叫张璘,杀掉王继恩手下的宦官王文寿,带领500多名宋军,投向农民军。当时张余有众万余,驻在嘉州一带。

由于宋朝派遣大批官军入川,加上地方武装的配合,使农民军的活动遭到许多困难。公元955年(至道元年)2月,张余在嘉州牺牲。起义军转入四川的深山丛林中坚持抵抗。一直到996年(至道二年)还在继续战斗中,最后终于失败。

除了四川地区以外,其他地区也发生过小规模农民起义。公元972年(开宝五年),今山东地区爆发过小股的起义,有300多农民受害。978年(太平兴国三年),福建泉州地区有10多万农民攻打州城,后来失败。宋仁宗初年,许多地方发生了“兵变”,就是被迫当兵的农民所发动的反抗斗争。1043年(庆历三年),陕西军士郭邈山和张海等,率领千余饥民起义,活动于今陕西、河南、湖北等地,纵横千余里。他们每攻入一个州县,就打开府库,把粮食和财物分散给贫民。同年(庆历三年),湖南地区的徭族和汉族人民5000人,并肩联合战斗,坚持了五年之久。

宋辽歧沟关之战

宋雍熙三年(契丹统和四年,986年),宋军分路进攻燕云(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主力在歧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溃败,是导致全线失利的一次重要作战。

宋朝建立后,宋辽之间即不断冲突。北宋初年,宋太祖致力于整顿内部和统一南方,对辽军的袭扰只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即止的方针,但一直有收复燕云16州的打算。中原地区得到初步统一后,北宋王朝为收复燕云,与辽军在幽州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

夺。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宋灭北汉后,宋太宗乘胜迅速自太原移兵连进,乘辽无备,企图一举夺占幽州,然后收复整个燕云地区。五月二十二日,宋军从太原分路东进。二十三日宋太宗率军进抵幽州城南。六月二十五日宋军对幽州展开围攻,久攻不下。七月初,辽军援兵进军幽州城下,同宋军激战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畔。宋军在辽的猛烈攻击下,被迫撤除围城部队,大败南逃。九月初三,辽景帝耶律贤为报幽州被围之仇,遣兵数万出幽州,兵分两路南进攻宋,于满城(今河北满城北)被宋军击败。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辽帝耶律贤率兵在瓦桥关,又把宋军打得大败,并到莫州。此后,宋辽两军不断发生战争。宋军第一次围攻幽州失败后,宋太宗一直想再举兵收复燕云,以雪高粱河失败之耻。太平兴国八年(辽圣宗和元年,983年),契丹圣宗耶律隆绪继位后,因年仅12岁,由其母萧太后摄政。萧太后名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她摄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发展生产、整顿军队,使辽国的国力进一步增强。而宋太宗认为契丹圣宗耶律隆绪年幼,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内部不稳,决意乘机再攻契丹,夺取燕云地区。

雍熙三年(契丹统和四年,986年)正月,宋太宗作出了再次进攻幽州的决策,宋军兵分三路,东路、中路于正月出动,西路于二月出动。其部署是:

东路:命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为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为幽州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两军同行,自雄州直取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涿州(今河北涿州)。

中路: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自定州北上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

西路:命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自雁门(今山西代县)趋云州(今山西大同),尔后会田重进部东下,从北面会攻幽州。宋的三路大军,兵力超过30万。东路军是主力,兵力超过20万。

宋太宗的战略意图是三路齐发,由曹彬部屯兵雄州、霸州,实施佯动,持重缓行,声言取幽州,吸引契丹军主力于东路,使其无暇西顾,保障中、西路攻取山后诸州,尔后合三路兵攻取幽州。

契丹承天太后萧绰闻讯,派使者征调诸部兵增援幽州,命耶律休哥指挥,以挡宋东路军。派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耶律抹只率大军支援幽州,萧太后与圣宗随后率精骑数万南下,进抵驼罗口(今北京南口附近)应援。又派林牙勤德领兵过卫平州(今河北卢龙)海岸,以防宋水师由海上袭击侧后。因西、中两路宋军进展迅速,辽又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兵挡潘美、田重进两军。同时,又加派北院宣徽使蒲领为南征都统,辅佐耶律休哥,准备与宋东路军决战。

三月初,宋军开始进攻,东路宋军连败辽兵,攻占歧沟关(今河北涞水东)、涿、固安、新城等地。辽南京(即幽州)守将耶律休哥在援军未到之前,知寡不敌众,避免与宋军争锋,昼出精锐虚张声势,夜遣轻骑袭扰,暗潜部分兵力设伏宋军侧后,断其粮道,疲惫宋军。曹彬部据涿州仅10余日,即因粮草不济欲退兵雄州,至白沟(今河北容城东北)。中路军田重进部在飞狐击败辽军,擒辽将大鹏翼,攻占飞狐、灵丘(今山西灵丘)、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潘美军也击败辽军,先后攻占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

县)、云、应(今山西应县)等州。宋太宗认为曹彬退军就食是重大失策,严令曹彬率军沿白沟河向米信军靠近,养兵蓄锐,待机北进。曹彬部下诸将听说中西两路军连克州县、屡战屡胜,因此求功心切,都主张出战。曹彬听信诸将意见,在补充粮食后,与米信引军北渡白沟河,与耶律休哥军对垒。宋军结方阵,堑地两边而行,向涿州进军。耶律休哥以一部兵力阻击曹军,使之且行且战,行动迟缓,100里路竟走了20天。这时正是夏天,途中缺水,曹军士卒困乏不堪。到达涿州后,曹彬得知萧太后和契丹圣宗率军从驼罗口南进,已到达涿州东面50里处,有会同耶律休哥军钳击宋东路之势。于是,曹彬命部将卢斌携带城中民众先行向南撤退,亲率主力断后。但撤退中宋军非常混乱,耶律休哥遂以全力追击。五月初三,宋与契丹两军激战于歧沟关外,宋军大败,南逃至拒马河,被辽军追击,宋军溺死者不可胜数,余部继续向高阳(今河北高阳)撤退,途中正烧饭时又被耶律休哥追上,死伤数万人,遗弃戈甲、军资甚多。

宋太宗得知歧沟关战败的消息后,为避免中西两路军再遭失败,同时增兵北境,阻止辽军南进。契丹军在歧沟关取得胜利后,即派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刺四军西进,支援耶律斜轸军,攻击中路宋军,先后攻占了蔚州、灵丘、飞狐等地。宋太宗命令潘美等派兵掩护云、朔、寰、应四州居民南迁。六月,契丹又从南京派炮手支援耶律斜轸军。耶律斜轸引军10余万,进击宋西路军。此时,宋中路军已退兵,西路军孤悬敌后,形势危急。宋西路军主将潘美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令杨业出击。杨业根据契丹军攻占寰州后兵势正盛的情况,不同意向朔州出击。领兵自代州向朔州,监军使王侁遣责杨业:“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续资治通鉴》卷十三,太宗雍熙三年)七月,杨业不得已率兵出战,并与潘美等约定在陈家谷口(在今山西北面的长城线上)派兵接应。杨业孤军北进,遭到契丹军伏击而大败。杨业南退至陈家谷口时,接应兵已撤退,杨业所部全军被歼。杨业受重伤被辽军所俘,绝食而死。至此,宋三路大军皆败,所取州县复失。宋军在歧沟关一战遭到惨重失败后,宋朝君臣再也不敢发动对辽的进攻。

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闰九月,契丹发兵南犯,号称20万大军,浩浩荡荡,直逼黄河北岸。

宋真宗闻报色变,忙问计于宰臣。

副相王钦若、陈尧叟,都主张南迁都城,以避敌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往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往成都。

宋真宗举棋不定,又以迁都之议问计于宰相寇准。寇准明知端底,却佯作不知,故意当着两位副相的面说:“谁为陛下划此败亡之策,罪当斩首!”寇准接着分析了形势,指明了利害,提出了车驾亲征以挫强敌的决策。

十月,宋真宗终于在寇准等催促下,起驾北征。出得汴京,还未到达黄河南岸,这位怯懦的皇帝就动摇不进,又想迁都。寇准再次指出:“今寇已近,四方危心,陛下只能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百倍,敌闻丧胆;退则万众瓦解,敌乘我势,汴京失驭,金陵亦不可得!”真宗无奈,又勉强起驾北行。行至黄河南岸,又驻蹕河边,畏葸不前。寇准等又

固请,车驾方渡河抵达北岸。

当宋旗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南)城上高高升起时,兵民欢呼,声闻十里,气势百倍。

契丹闻讯,派骑兵数千来骚扰,以探虚实,当即被宋军杀伤过半,败逃而去。

真宗临敌,住在行宫亦惴惴不安,于是,派人去察看寇准的动静。当听说寇准正与部将喝酒搏戏,诙谐如常,才放心说:“寇准如是,吾有何忧呢!”

可是,正坐镇军中的契丹萧太后不能不忧。出师未捷,统帅萧挞凛已被宋兵射死,契丹锐气大挫;各路援宋大军正向澶州方向集结,数量甚众,远远超过契丹军,而契丹孤军深入,千里退路上宋民蜂起抗击,怎能使其不忧呢?于是,她不得不派出使臣致书大宋,以求和议。

宋接辽书,寇准即提出,辽欲求和亦可,但必须还我燕云故地,否则,兵戎相见,以决雌雄。但是,宋真宗却唯恐失去和议时机,不顾寇准之议,急派大臣曹利用使辽。临行,真宗特嘱曹利用,契丹如索岁币,虽百万亦可允诺。寇准得知后,立即召曹利用至军帐,说:“圣上虽有敕旨,但你许给辽人的岁币不得过30万,否则,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1005年一月,和议告成。双方议定,宋辽为兄弟,辽帝称宋帝为兄,但是,“哥哥”每年送给“弟弟”岁币30万。这次宋辽和盟是在澶州签定的,澶州为古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曹利用成约而还,真宗正在用饭,未及召见,即派侍者去问许辽岁币多少,利用不肯先告侍者。侍者见曹利用以三个手指支着脸颊,回报时遂说,曹利用以三指支着脸颊,大概是300万吧!真宗失声道:“太多了!”既而又说:“姑且了却此事,300万也可吧!”

和议之后,妥协派王钦若等弹冠相庆,反诬主战的寇准以胁迫君王的罪名,说寇准挟君王作孤注,幸兵以自取重,结果与敌国签定城下之盟,有辱君王。是非黑白就这样全被颠倒了。功臣寇准反遭贬斥,后死雷州。契丹退兵了,宋朝又继续推行其“守内虚外”的国策。守内,即竭尽全力防范人民起义;虚外,即不修边防,理由是勿令敌国起疑。

然而,事有乖巧。宋室虽虚外而不为备,辽却因内争日剧,自顾不暇,注意力内向。宋辽关系因之基本呈现稳定状态,彼此相安达120年之久。

宋夏延州之战

北宋建立之初,割据夏州(今陕西横山西)一带的定难军节度使李氏表示归顺宋朝,但仍保持割据局面。太平兴国七年(982),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亲自朝见宋太宗,献出夏州等地,留居东京开封,其族弟李继迁反对归附宋朝,起兵反宋,向辽称臣,被封为夏国王。李继迁与宋战争连年,互有胜负。宋真宗即位后,李继迁遣使求和,遂被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但李继迁仍反复无常。咸平五年(1002)攻陷灵州(今宁夏灵武),并定为都城。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死,子德明继位,表示与宋修好。景德三年,宋册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予银1万两,绢1万匹,钱3万贯,茶2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贸易。从此双方维持了30余年和平相处的关系。德明死后,儿子元昊于1032年称王,但他不满足于做宋王室附庸的地位,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建元天授礼法延祚。宋廷不承认元昊独立,立即削其封

爵、停止互市,并声称谁若提李元昊的头颅来献,即授谁为定难节度使。宋夏矛盾更趋激化。宋朝以夏竦不洎原、秦凤安抚使范雍为鄜延、环庆安抚使,准备出师讨伐西夏。早已做好战争准备的夏国,还没等宋师出境,就先发制人,主动向宋陕西沿边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次年,元昊拟大举攻宋,遣人多方刺探宋军事政治情报,获悉宋鄜延路地阔寨疏、士卒寡弱、主将少谋,遂决计攻取延州。

延州系宋边境军事要地,亦为西夏出入要冲,其北部门户金明寨(今安塞东南)地形险要,周围有36寨互为依托,由都监李士彬率近10万蕃兵扼守。延州守将范雍听到夏军准备进攻延州的消息,十分恐慌,急奏朝廷请兵支援。元昊为了麻痹范雍,一面遣衙校贺真至延州假作议和,一面声东击西,诈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暗袭金明寨。范雍没有搞清元昊的意图,急忙派大将刘平、石元孙率军3万驰赴保安军救援。当刘、石二将率军至保安军东北面的塞门寨时,夏军以极快的速度南下直逼延州北面的金明寨。金明寨虽有李士彬率10万蕃兵扼守,但分据36个寨中,因兵力分散,各寨防御力量十分薄弱。元昊首先对金明寨守军行离间策反之计,利用李士彬对部下严酷,上下不和的矛盾,以金帛、爵位收买宋军部将作为内应。当夏军进抵金明寨时,叛降者起而内应,李士彬未及应战,就束手被擒,金明诸寨全被攻破,夏军乘胜南下,直逼延州。

范雍急召刘平、石元孙二将返救延州。刘平轻敌,不了解敌情就率军昼夜兼程疾趋延州。元昊侦知宋军动向,在延州西北面的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设伏行援。刘平贸然轻进,二十二日夜,进抵三川口西10里驻营,令骑兵先援延州夺门。次日晨,因步卒未至,刘平折返回迎,途中与奉命增援延州的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卨、郭遵等会师,合军万余,结阵东进。郭遵建议先行侦察,刘平不听。行至大柳树(延州西20里),元昊遣人伪装范雍使者传令,谎称为防奸细混入,命将士分队行进。刘平不辨真伪,依令而行,改为50队,伪使逃逸,方知中计。宋军遂整阵前进,进抵三川口,遭到夏军阻击,宋将郭遵、王信奋勇杀敌,夏军“委老弱及牛马以饵之”,宋军为了抢功而追击,进入了元昊的包围圈。元昊以10万精骑将宋军团团包围,宋军多次冲击,均被夏军击退。当时,“平地雪数寸”,宋军一直奋战至黄昏,郭遵战死,刘平负伤。夏军主动进攻,居于阵后的黄德和见夏军兵多势众,率部先逃,宋军全线崩溃,都随黄德和逃遁。身负重伤的刘平遣其子宜孙驰追黄德和,令其勒兵还击,黄德和不从,逃往甘泉(今属陕西)。刘平仗剑阻拦,仅留1000余人,被迫退至西南山下,立七栅防御。二十四日清晨,夏军四面冲击,攻破山栅,刘平、石元孙被俘。夏军集中兵力围攻延州,连攻七日未下,恰逢连夜大雪,气候严寒,难以久战,又闻宋麟州团练使折继闵、并代钤辖王仲宝率军从侧后攻入夏境,遂引师回国。

宋夏好水川之役

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后,不宣而战,铁蹄不时南犯,西北不得安宁。

宋仁宗遂任命朝臣韩琦、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发抚诏讨副使,共御西夏。韩琦的制敌方略重在进讨,以攻为守;范仲淹的制敌方略则重在招抚,以守为攻。

1041年二月,元昊率军逼近怀元远城。韩琦立即集结兵力1.8万人,命将军任福统

帅,出敌后据险设伏,待敌退邀击。

任福是位猛将,曾多次深入敌境,屡建奇功。这次又决心令元昊匹马不得生还。正行进间,忽闻夏军与宋兵某部战于张家堡南,元昊丢下几百具尸体和大量驼、马、牛、仓皇北窜。任福求功心切,立即命令全军追击。沿途荒僻,任福兵马三日不得食,穷追不舍,在日暮时分追至好水川(即今甜水河,源出今宁夏隆德东六盘山)。

翌日晨,任福与先锋桑怿合沿好水川西进。当前方距羊牧隆城(今宁夏隆德北)5里时,川谷已为夏军扼断,进退不得,方知中计,遂与敌军展开格斗。

先锋桑怿在路旁忽然发现几个密封的银泥盒,中有跃动声,甚为疑惑,未敢开视。将军任福后至,尽开泥盒,突有上百只家鸽飞出,盘旋于川谷上空。家鸽皆佩悬哨,哨音清拔,悠远可闻。元昊军闻哨声而四合。

任福布阵未成,元昊铁骑突至,东奔西突,左冲右撞。宋兵难以立足,遂舍川谷夺取两坡,欲居高制下,扭转劣势。这时,只见夏军中忽地竖起一面大旗,长2丈。宋兵莫名其妙。只见大旗左摆,左山后伏兵冲出,大旗右摆,右山后伏兵骤起。两山伏兵有如悬河决堤。猛扑宋兵,杀声震撼山谷,宋兵死伤相枕,满山遍野。

将军任福身中10余箭,仍奋力冲杀。随从小校劝他脱身自免,任福却说:“我身为大将,兵败何颜以求生,愿以身报国!”说完又冲入敌阵,终以死闻。

这场战役,宋兵死亡1.03万人,几十位将校只有一人战至日暮敌退而生还。此即好水川之役。消息传开,关右大震,韩琦因之被降职。

范仲淹主持延州(今陕西延安市)一线防御。他到任后,即整顿军制、训练士卒、修筑城寨,十分注意安抚边民。结果,夏军虽屡次来犯,而终不得逞。

一次,范仲淹修筑大顺城。大顺城的位置突出于敌境,料夏必争,故密作筹备。临筑城时,发兵而随,10日城成。夏人发觉后,果遣骑兵3万来争,城坚不下,遂佯败而走。范仲淹下令但令其去,不得追击。后知西夏果有伏兵。

夏军屡犯不逞,遂自相告诫说:“咱们莫再打延州主意,今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小范即指范仲淹,大范指其前任范雍。

范仲淹的成功,重要的是执行了安抚边境羌民的正确政策。以往,边境羌民迫于宋兵的骚扰,多背井离乡去投西夏。范仲淹到任后,立即明令将士不得扰民,并筑城寨来招抚流亡。帮助羌民解决土地、耕牛、籽种、口粮。因此,大批羌民相踵归业,重返家园。范仲淹也很注意团结各族上层人士,与酋长600余人,挚诚相待,引以为助。因此,羌人敬爱范仲淹,亲切地称他为“龙图老子”。甚至羌人还为范仲淹立生祠、图像供奉。10年后,范仲淹病逝青州(今山东益都),羌人酋长数百人奔丧,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宋夏这次交兵历时二年多。初时,元昊多次取胜,亦有掠获,但兵员亦死伤过半,国力日蹙。后来,韩、范合力防御得宜,人心倾归,元昊亦不敢轻易骚扰边境。故边民歌曰:“军中有一韩,西夏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夏惊破胆!”

宋夏兵起,互市遂断,两国百姓深感不便,尤其是西夏百姓得不到宋地绢帛粮茶等生活必需物资,更感到开衅不如和好,人民遂作《十不如》谣以讽之。

元昊迫于形势,遂向宋请和。宋也恐夏辽联盟而势盛,故准和议,恢复互市。从此,西夏名义上称臣于宋,以求得岁币;宋每年赐给大夏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以求西北的安宁。从此,西北稍安,边民互市,往来如织。宋与西夏庆历议和之

后,维持了20余年的和平相处。宋神宗赵顼采纳王韶提出的先复河、湟(今甘肃、宁夏东北、乐都),使西夏腹背受敌之策,陆续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等州,对西夏构成了一定威胁。但在元丰四年(1081)的灵州之战,元丰五年的永乐城之战中,宋军或无功而返,或惨遭失败,损失士卒,民伋20余万人。

从宋哲宗起,采用沿边进筑寨堡的办法,巩固了边防,并对西夏构成了严重威胁。元符二年(1099),西夏通过辽的斡旋,向宋谢罪请和。宋哲宗答诏许和,并恢复了“岁赐”及贸易往来。

政和四年(1114),宋徽宗命童贯进攻西夏,双方互有胜负。宣和元年(1119),议和罢兵,又恢复了和平交往。

北宋与西夏之间虽然战争比较频繁,但在双方并存90年间,和平相处的时间仍然多于相互战争的时间。战争给双方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友好交往和榷场贸易往来则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往来。

庆历新政

北宋王朝到了宋仁宗时代(1023—1063年),社会危机已经表面化。如何挽救北宋王朝面临的危机,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范仲淹(989—1052年)生长在南方一个清寒的地主家庭。他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姓谢,无法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不得不带着幼小的孩子再度出嫁给一个姓朱的人家。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经历了艰苦的生活磨炼。他在醴泉寺的庙宇里读书,每天只能吃到稀粥和咸菜。后来入学念书,昼夜苦学,连续五年坚持不懈。每到寒冬腊月,夜深读书疲倦时,就用冷水泼面来振作精神,继续攻读。

由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看到了北宋社会下层的黑暗面,了解到人民的生活疾苦和要求,他在年轻时就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后来中了进士,就连续上书,议论时政。1033年(明道二年),他上书反对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被驱逐到睦州(浙江淳安)去作地方官。过了一年多,又改任苏州知府。当时正遇上大水灾,民田不能耕种,范仲淹亲自规划农田水利,取得了成绩。1035年(景祐二年),他升任礼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知府。当时朝廷里仍然是吕夷简掌权。他们扩大私人势力,打击新进人物。范仲淹不畏权贵,上书批评时政,主张选择贤能、整顿朝廷吏治。结果,又一次遭到吕夷简集团的排斥而被外调。

后来范仲淹被派到西北边疆防守西夏侵扰。几年中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西北一带的“羌、汉之民,相踵归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军事上,范仲淹“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经过欧阳修等大臣的推荐,1043年(庆历三年)范仲淹被提拔为参知政事。这一年山东地区爆发了王伦起义。第二年(1044年),他就向宋仁宗提出10项政治改革的方案。方案的内容包括考核官吏,整顿吏治,惩办贪污,裁汰冗官,改革科举,选拔人才,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发展军屯,加强国防等等,主要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的改革。

在政治上,范仲淹主张严格考核各级官吏,清除贪污犯法分子,限制特权势力。他认为任用官吏,必须经过科举考试。考试的科目应当先是“策论”,后是“诗赋”。提拔人才,首先要知道他对国家大事的基本态度,是不是关心“经国王霸之业”,文学素养应放在次要的地位。要把热心于“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而又有真才实学的“寒士”提拔上来。他还主张政府的法令一旦公布,就必须严格执行。赏罚必须分明,“有功者虽憎必赏,有罪者虽爱必罚”。他深有感慨地说:“国家之衰,莫大于乏人”。如果没有正直奉公的人才,就是有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施行。

为了整顿吏治,他审阅了全国各路的地方官政绩,撤换了一批无能的官吏。当另一位大臣富弼看见范仲淹在职官簿上勾去了一批“监司”的名字时,心里有些不忍。他对范仲淹说:“勾去这些人的名字倒很容易。要想一想,这些人丢了官,岂不是全家人都要痛哭流涕吗?”范仲淹当即回答说:“与其让这些贪官危害一路之内的老百姓,叫一路人都哭,不如让他们一家人去哭吧。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在经济上,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主张“劝课农桑”,认为这是“富国之本”。他要求各地方官必须随时向朝廷报告兴修水利的建议和办法,陈述发展农业的意见,积极修筑堤堰渠塘,减轻漕运负担,恢复江南圩田。范仲淹认为,如果各级地方官能真心实意讲求农桑和水利,不要几年,就可以减少饥荒。他还主张减轻徭役“以宽民力”,不应当服差役的人,都应当让他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

在军事上,他主张军队要搞生产,要实行“兵在于民,且耕且战”的兵农合一制度。一年内士兵三季务农,一季训练,这样,才能节省军费开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认为军事将领应当从士兵中提拔,要真正做到“择将于伍”,提拔“智勇之人”充当统帅。北宋有一员名将叫狄青,就是范仲淹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升为国家的大将。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改革方案。虽然这个方案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当权的保守派的根本利益,但是在整顿吏治方面,限制了权豪势要的特权,因此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他们无中生有、颠倒是非,诬陷范仲淹引用私人、勾结朋党。甚至诬告范仲淹要想废黜皇帝,捏造一切罪名统统加在他的身上。范仲淹的改革,不到一年就失败了。1045年(庆历五年),他被赶出中央朝廷,调到西北边疆。

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但他敢于向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势力挑战。他的言行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积极的影响。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他提倡“养民”、“重农”,使人民能够安心生产。他说:“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这种“修农政”、“足衣食”的思想,把农业生产放在治国的重要地位,是符合人民愿望的。

继范仲淹之后,苏轼也向宋仁宗皇帝多次上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他认为必须限制权豪显贵,遏止兼并势力的发展;要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才;要节约国家财政费用,调整赋税,量入为出;要清除贪吏,改革时弊;要寓兵于民,制定军制,训练军队,加强国防力量。这些主张对改变当时北宋的政治局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苏轼的改革主张,对后来王安石的变法,是有很大影响的。

王安石变法

公元1067年,20岁的赵顼继位做皇帝,这就是宋神宗。他目睹国家财政空虚,官僚政治暮气沉沉,军事力量又不堪一击,很想振作一番,以巩固自己的皇位。于是,破格提拔了王安石,支持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1021—1086年)是抚州临川(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王益是一个州县地方官。王安石在20岁之前,跟随他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接触到一些社会的现实问题,看到了人民的艰苦生活。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了进士。他27岁时任勤县(浙江宁波)知县,以县为单位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兴修了当地的农田水利。后来提任舒州(安徽安庆)通判,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王安石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深有感触。

1058年(嘉祐三年),他向宋仁宗递交了长篇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指出北宋王朝已经到了“财务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的境地,原因是不知改变法度。他认为国家的法令和制度,应当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有所“改易更革”。法度是靠人来执行的,必须培植和选拔人才,才能“变更天下之弊法”,才能使国家走上大治的轨道。王安石主张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改革国家财政制度,使人民能够“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王安石认为要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不增加劳动人民的负担;要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大量剥削所得,一部分收归国家。

1067年,宋神宗把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神宗皇帝身边的大臣。第二年(熙宁元年),王安石送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北宋王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十分严重,“农民坏于差役”,“其于理财,大抵无法”。1069年(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49岁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王安石于1069年的2月,成立变法的权力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是统筹国家财政的,包括盐铁、户部和度支。王安石把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制订出一系列“省劳费、去重斂、宽农民”的政策方针。

宋代经过100年的统治,中央集权制助长了封建特权势力的膨胀。大官僚阶级依仗权势,通过非法手段,兼并土地,侵渔百姓,甚至巧取豪夺,聚敛财富。一小撮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利用别人所没有的法定特权和非法特权,攫取最大限度的私利。这些封建特权势力盘踞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他们像洪水猛兽一样,危害人民的利益,使北宋王朝陷于灭顶之灾。

王安石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史学家。他鉴于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在变法期间提出一些有关限制封建特权的主张和措施。为了整顿吏治,在选举和用人方面,王安石不问家世和资历、不讲上下关系,而着重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他所提拔的年轻人才,都先加以试用。早在上仁宗皇帝书中,他就表示:“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其事。”王安石通过对一个人的言行的调查及在工作中试用,来考核其实际能力,这样易于发现和鉴别人才。

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从 1069 年开始实行,到 1085 年(元丰八年)几乎全部被废止,先后共 16 年。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整顿了科举和学校,为培养人才准备条件。国家裁并了 100 多个州县,减少了大批地方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也相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关于财政和经济制度的改革,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新法:青苗法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利贷剥削;募役法迫使原来可以免役的品官形势之家也必须出钱来代替服役;方田均税法清丈了被大官僚、大地主阶级隐瞒的土地,国家按照土地面积和等级征收赋税,免除了下户的不合理负担;农田水利法开垦了大量荒地,修通了河道陂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市易法的推行,给那些包揽商业、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垄断市场的大官僚、大商人以相当限制,使中小工商业者有一定活动的余地。

在加强防御能力和改革军事制度方面,确立了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置军器监等。王安石为了纠正募兵制的严重弊病,逐步过渡到兵农合一制,规定每户人家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的,就以一人为保丁,以 10 家为一保,50 家为一大保,利用农闲,进行步射和骑射等军事训练。从 1070—1076 年的几年内,全国受过训练的保丁有 700 多万人。1075 年(熙宁八年)统计,全国兵额不到 80 万人,比宋仁宗庆历年间裁减了 45 万人,每年减省了军费 1350 万缗。

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对于富国强兵收到了一些效果。通过限制豪强大姓的土地兼并和漏税逃税,来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减轻下层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的不合理负担。熙宁年间,国家每年收入在 5000 万贯左右,收支已经平衡;农田水利也陆续得到开发。从 1070—1076 年的几年内,全国兴修的农田水利有 1 万多处,使数十万顷的田地得到灌溉。福建莆田的木兰陂,就是当时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完成于 1075 年(熙宁八年),是一处拦洪、蓄水、排灌相结合的大水库。为了发挥木兰陂在农田水利上的效益,除了陂坝工程建筑之外,又进行了辅助工程,于 1077 年(熙宁十年)在陂的南端修建了一座回澜桥。陂内所蓄溪水,经过回澜桥流入 7 条大沟,每条大沟长达 40 里,沟深 3 丈,广 11 丈。大沟两旁又开小沟,一直引水到田间,使昔日旱涸或水潦的万顷海田,旱涝保收。这一水利工程是王安石变法时期莆田一带劳动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成果。经过了 900 多年的时间考验,至今还屹立在东南海滨。

到了元丰年间(1078—1085 年),出现了经济恢复的气象。北宋学者陆佃(1042—1102 年)说:“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王安石在《后元丰行》诗篇中写道:“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元丰年间生产的好转,这是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光辉纪录,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是有直接联系的。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元老重臣的反对。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守旧和革新、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斗争。文彦博、司马光等守旧派和王安石等革新派,都是要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反对农民起义的。他们看到国家财政的困难和军事力量的衰弱,但是在如何维护北宋政权的问题上,司马光等同王安石的政治见解不同。守旧派偏重于保持原来的法令制度,按旧制度办事。他们不同意王安石那样全面而大刀阔斧地改变旧制度。文彦博当面对宋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富弼对宋神宗说,天灾人祸,必须“安静”。御史中丞吕诲上疏给宋神宗说:“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

安静之理。”司马光认为必须“谨守祖宗之成法”，并利用向宋神宗讲述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调。他还写信给王安石，劝告他不要“生事”，即是不推行新法；不要“侵官”，即是不损害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意见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在给司马光的回信中说：“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由于王安石深知北宋 100 年来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不变革不能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是很坚定的。

1085 年（元丰八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死了。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失败了。第二年，66 岁的王安石病死在江宁。

方腊、宋江起义

宋徽宗、蔡京集团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日益增多的农民倾家荡产。在这重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人民被逼上梁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北宋末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南方有方腊领导的起义，北方有梁山泊农民起义和宋江领导的起义。

方腊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 年），起义地点是在睦州的青溪，也就是现在浙江淳安县境。这是一个贫瘠的山区，高峰峻岭占了 8/10，仅有的可耕之地，又集中在少数豪强大地主手里，劳苦大众依靠经营山地维持最低的生活。

两浙路是当时财政负担最重的地区。当地人民不仅担负着繁重的赋税和加派，还担负着特有的“身丁钱”。各州县的“上贡”物资成倍地增加。1102 年（崇宁元年），童贯在苏州、杭州两地开设“造作局”，为皇室制造器用，包括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雕刻、织绣等各种工匠，每天役使几千名，所需物料，全部取于民间。1105 年（崇宁四年），大地主、大富商、大贪官朱勔，在两浙一带敲诈勒索 20 年，引起一些官吏的不满。御史中丞陈过庭就大胆上奏章，指控“朱勔父子，本刑余之人，交结权幸，窃取名器，罪恶盈积，宜正刑典，以谢天下。”东南老百姓对于童贯、朱勔等人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无不切齿痛恨，弄得“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方腊就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动了农民起义。

方腊是今安徽歙县人，原是一个贫苦农民，曾经在青溪县西邦源洞（淳安县碣村北洞源里）大地主方庚家里做佣工。方庚的父亲方有常是个大地主、大米商。这一年（1120 年）的十月，方有常和方庚父子全家由青溪邦源洞迁到邻近的歙县七贤村。方腊率众用铁铲等作武器，打死了方有常，杀了方家大小 42 口。方庚跳墙逃跑了。

方腊利用当地贫苦农民信仰的“食菜事魔”教，把农民们广泛地发动起来。他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追求光明的未来，追求平等的生活。

方腊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利用“食菜事”魔教，组织广大农民，对宋徽宗集团的黑暗统治发起猛烈的冲击，并宣布“法平等”的主张。

在方腊的宣传鼓动下，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不到 10 天，起义的队伍已近 10 万人。方腊自称“圣公”，并用“永乐”为年号，建立了农民政权。1120 年 12 月，农民军乘

胜攻占了睦州(浙江建德)、歙州(安徽歙县)、杭州。到第二年的2月,又攻下了婺州(浙江金华)、衢州(浙江衢县)、处州(浙江丽水),共6州52县。农民军所到之处,“劫取大家财”,分散给贫民。参加起义的农民,“项背相望”,震动了整个东南。当时两浙地区响应方腊起义的,有台州(浙江临安)吕师囊起义、永嘉(浙江温州)俞道安起义、归安(浙江吴兴)陆行儿起义、苏州石生起义、兰溪(浙江兰溪)朱言、吴邦起义、剡县(浙江嵊县)仇道人起义等大大小小的起义。影响所及,包括温州、台州、越州、湖州、苏州、信州(江西上饶)等地。

方腊起义军深得各地人民的拥护。方腊农民军“保全生灵安业”,维护人民利益。方腊起义对北宋王朝的威胁是巨大的。为了保住东南的财赋,宋徽宗必然要倾其全力镇压这次起义。

北宋政府派童贯带领京畿禁军和西北精兵赶赴两浙。陕西六路的军队,在刘延庆统制下顺汴河南下,渡过长江,由金陵、镇江向两浙进发。

公元1121年(宣和三年)的四月,方腊和几十名农民军将领不幸被俘。八月,方腊在汴京被杀害,起义失败了。起义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军事方面来看,由于农民军缺乏严密的组织,缺乏足够的武器,而且战线越拉越长,西攻信州失败,攻取秀州(浙江嘉兴)又未能成功,兵力更加分散,加上双方力量悬殊,农民军更趋劣势。童贯大军水陆两路进攻杭州,农民军数万人又坐困孤城,终于粮尽弃守。其他各州也相继被宋军占领,方腊最后被包围在邦源洞,坚持到最后而被俘。

北宋末年,北方连续不断地爆发小规模农民起义。起义的一个中心地点是梁山泊。

梁山泊又叫梁山泺,就是现在山东的东平湖。梁山就靠近在湖南边。由于北宋时期黄河的两次大决口,梁山泊变成一个周围800里的大湖泊。北宋大臣韩琦在《过梁山泊》的诗里就说,“巨泽涉无际”。周围的广大贫苦农民,依赖这个巨泽里的蒲、鱼、莲、藕为生。他们开垦梁山泊附近的湖滩地,向大自然夺取口粮。他们常年从事捕鱼、采藕、割蒲等生产活动,来熬过艰难岁月。

公元1111年(政和元年),北宋政府设置了一个“西城括田所”,大肆搜刮北方人民的土地和财富,在梁山泊也设卡征税。农民们进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按照船舶的大小,交纳很重的租税。漏税和逃税的人,被当作“盗贼”来处罚。附近每县除了常赋之外,平均要增加租钱10多万缗,遇有水旱天灾,也不许减免。梁山泊周围的农民们,千辛万苦,祖祖辈辈垦荒打鱼,生产自救。他们连这么一点谋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劳动人民交不起租税,被断绝了生路。他们被逼上梁山,聚集在一起,利用高山和湖泊的有利地形,进行武装抗租抗税斗争。宋军来了就一起战斗,宋军退了就忙着生产。梁山泊成为北方农民进行生产斗争的一个重要据点。《宋史》里也明确写:“梁山泺,故多盗”。以梁山泊为基地的农民反抗斗争,很早就开展了。一直到南宋末年,梁山泊的农民还在继续战斗。

北方除了梁山泊农民的反抗斗争外,还有宋江领导的一股农民起义军。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他们虽然只是小股的起义军,但由于勇敢战斗,避实就虚,采取机动灵活的流动战术,“转略十郡”,以对付几万官军的进攻。宋江起义军从河北打到山东,转战青州(山东益都)、齐州(山东济南)、濮州(山东濮县)、单

州(山东单县)一带,并到达江苏北部。

1121年(宣和三年),宋江为沂州(山东临沂)知州蒋园所败,后来率军南下,攻淮阳军(江苏邳县),进入淮南活动。宋江起义军攻打沐阳县,被县尉王师心击败,由沐阳乘船到海州(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知州张叔夜侦察到宋江的动向,以上千名士兵设伏于城郊,用轻兵引诱农民军登陆。宋江中了埋伏,10多只大船又被焚毁,损失惨重。

但这支农民军仍然在北方继续战斗。《宋会要辑稿》就记载1121年12月,“河北群贼自呼赛保义等,昨于大名府界往来作过,良民为之惊忧,久之未获。”他们还在打着“赛保义”宋江的旗号,在河北一带活动。

阿骨打称帝灭辽

北宋末年,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强盛起来。

女真族在向奴隶制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一种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叫做猛安谋克制度。

“猛安”就是千夫长,“谋克”就是百夫长。这种猛安谋克制度,开始出自战争需要,是一种军事组织,后来就成为地方行政组织。阿骨打规定,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猛安的官职为从四品,负责军务管理,训练武艺,也管理农业租税收缴事务。谋克的官职为从五品,负责组织军队训练,相当于县令的地位。这样,猛安谋克又成为官爵、将校等称呼。阿骨打以猛安谋克制度,加强了女真的力量,成为同契丹统治者对抗的势力。

契丹对女真族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苛重的。它令女真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捕捉“海东青”,按期征贡。“海东青”是一种小鹰,能捕捉鹅雁。契丹贵族向女真人征收这种东西,乘机敲诈勒索,引起极大的民愤。

阿骨打乘着人民反抗契丹奴役的高涨情绪,发动了反契丹的战争。公元1114年,阿骨打率领2500人,攻克宁江州(治所在今吉林扶余东)。接着,在出河店(吉林扶余县境内)战役中,把辽兵打得落花流水。从此,辽军“士无斗志,望风奔溃”。阿骨打乘胜进军,连续攻克几个州,占领了东北大片土地,获得许多马匹和武器,军队发展到1万多人。

公元1115年,阿骨打正式称帝,建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阿骨打就是金太祖。

金国建立后,并立的几个政权,呈现复杂的斗争局面。阿骨打率领金兵不停地向辽朝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北宋政权为了乘机夺回燕云16州,主动派人和金朝取得联系,采取联金抗辽的政策。西夏政权却站在辽朝一边,支持辽抗金的战争。

公元1115年9月,金兵攻占辽朝的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公元1120年,金兵又攻陷辽的上京临潢府(今昭乌达盟林西东北)。金与宋双方制定联合作战的计划:金兵攻打辽的中京大定府(今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宋兵攻取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大兴县境)。同时,宋朝答应了屈辱的条件:灭辽以后,原来每年给辽朝的财物,都献给金朝。

公元1122年,辽的一个军事将领耶律余睹投降了金。从他口中,了解到辽朝内部

矛盾重重、政权腐败、国库空虚。金就派耶律余睹作向导，攻克了辽的中京，不久又攻下辽的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

北宋皇帝徽宗赵佶，任命童贯为统帅、蔡攸为副统帅，向辽进攻。由于这些将领只懂得“太平娱乐”，不会带兵打仗，一经交战就吃败仗。在进攻燕京的战役中，宋军将领刘延庆看见辽军营中起火，以为辽兵打来了，吓得慌忙烧毁自己的军营逃跑了。宋军被辽兵打得死伤无数，遭到重大损失。

宋军作战失败，就去要求金军攻打燕京。金太祖阿骨打亲自带兵，在这年12月一举攻下燕京，大肆抢劫财物。第二年四月，金兵退走，又把燕京男女掳去做奴隶。宋朝得一空城，但要给金朝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租钱”。

1125年，辽天祚帝被俘，辽遂灭亡。

汴京保卫战

1123年，完颜阿骨打死后，他的弟弟吴乞买继位，这就是金太宗。他的汉名叫完颜晟。

金太宗继续以武装力量消灭辽朝的残余统治势力，于1125年完成了彻底灭辽的战斗。

灭辽之后，女真族长期受契丹贵族奴役的历史从此结束。金朝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新的统治权力。以金太宗为首的女真贵族，凭借强大的兵力和胜利者的威风，并不以灭辽为满足。他们为了追求中原的土地和财富，不愿意把战斗停止下来，而把武装的锋芒指向中原地区。女真贵族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中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他们把原来属于正义性的抗辽斗争，转变为以掠夺为目的的非正义战争。

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王朝，是一个已经腐烂了的封建王朝，正陷于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北宋统治集团为了转移内部的阶级矛盾，打着收复北方失地的招牌，妄图勾结女真的强大兵力，借“联金”的名义，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北宋在联金的过程中，完全暴露了他们军事上的虚弱，这就更加引起女真贵族们入侵中原的野心。宋徽宗一伙对于金朝的这种掠夺野心，毫无戒备。金兵终于在灭辽之后不到九个月，立即分兵渡河南下。

1125年冬，金兵分两路南下，他们的意图是两路会师于汴京，消灭北宋政权。西路金兵由粘罕（宗翰）统帅，从西京（山西大同）直攻太原。这一路金兵遭到太原军民的痛击，一时间无力向南推进。东路金兵在斡离不（宗望）统帅下，由平州（河北卢龙）直攻燕京（北京市），并迅速向南推进，攻掠邢州（河北邢台）、相州（河南安阳）、浚州（河南浚县）。黄河北岸的宋军，望风而溃。守河的士兵慌忙放火焚毁桥梁，弃甲逃奔，使金兵从容地用小船一批一批渡过了黄河，黄河南岸的宋军不敢抵抗。斡离不嘲笑宋朝将帅实在无能，如果有一两千人守河，金兵也就不能安然渡过黄河。

北宋统治集团顿时陷入慌乱之中。一部分只顾个人私利的求和派官员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主张放弃汴京，向金朝屈膝求和。当时只有少数深明大义，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官吏像李纲等，坚持抗金，保护北宋的都城，反对求和。宋徽宗一面遣

使求和,一面把皇位让给他的儿子赵桓(宋钦宗),自己带着宠臣蔡京、童贯等人,连夜向南方逃奔。

然而广大人民和士兵们,抗金的情绪十分高昂,纷纷自动起来抵抗。以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王朝,面临金兵的侵掠,一心想着求和。但是大敌当前,不得不暂时顺从军民“愿以死守”的坚定意志,任用抵抗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由李纲主持汴京防务,等待四方援军。这时,金兵已经包围了汴京。全城军民在李纲指挥下,决心誓死保卫都城。

北宋都城汴京,既是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它既利于攻,又利于守。都城的结构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个部分。外城是主要防线,土城建筑得非常坚固。外城的四面共开了十几座城门。城门是交通和运输的出入口,有利于分头出击和防守。这些城门中,有七座是水门。各水门跨河设有铁栅闸门。一到晚间,放闸闭门,防止敌人沿河潜入城内。各座城门口,都设置圆形或方形的瓮城,这是为了加强城门入口处的防护而建筑的。瓮城之上设有战棚,供守城士兵们的防御和休息之用。外城城墙每隔六七十步,就配置一座“马面”,它突出于城墙之外,可以交叉射击,保护城墙不受敌军的破坏。城中心区的东边有鼓楼,西边有钟楼。指挥作战的号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城内还分区设立望楼,专门瞭望敌人的动静,随时掌握敌情。沿着外城的城墙,大约每隔200步设置一座库房,贮藏各种武器和军需品。为了加强外城的防守能力,环绕外城周围,把各条河道互相沟通,形成一条护城河。河的内外两岸,栽植榆柳以巩固堤岸,又能增强障碍力。

汴京防御的准备工作,时间十分紧迫。李纲在每一面城墙上配置1.2万名士兵,并准备炮、弩、砖石、橐木、火油等军用物资。城内设前、后、左、右军共9万人,中军8000人。前军保卫西北水门(通津门),后军保卫东面的新宋门,其余三个军留在城里,随时支援各防区的战斗。

全城军民在李纲的组织和指挥下,士气大振。城内居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捕捉奸细,参加城防工程,四处搜集砖石和石灰,准备随时修补城墙。

金兵向汴京城西面的西水门(宣泽门)进攻,几十只火船顺流而下,采取凶猛的火攻战术。李纲派2000名勇士和当地人民组合在一起,用长钩吊住敌船,纷纷投掷石头,把金兵打得七零八落。

金兵发动好几次攻城,用弓弩炮石向城上射击,又用云梯爬城。城头的炮石和箭矢如雨点般向墙脚下的金兵射击。经过了激烈的战斗,金兵遭到惨重的伤亡。

长驱南下的金兵有6万人。他们孤军深入,又无后援,完全陷入腹背受击的不利地位。北宋军民以逸待劳,不但全城人民动员起来了,各地的援军也纷纷来到。西北种师道、姚平仲等将领统率的劲旅就不下20万人。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宋朝。

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既害怕金兵,又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李邦彦等一小撮人忙着策划求和。

金兵在宋朝军民的反击下,经受了巨大的挫折。女真贵族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利用北宋求和之机,向宋朝进行敲诈勒索。金朝提出了以下苛刻的要求:要北宋政府割让太原、中山(河北定县)、河间(河北河间)三镇地方给金朝;每年要给金朝统治者500万两黄金,5000万两白银,100万匹绢帛,1万头牛马;还要宋朝派亲王和宰相作抵押,护送金兵安全渡河北撤。北宋求和派把这些条件全部接受下来,并派康王赵构和宰

相张邦昌到金营作抵押,下令割让三镇,并立即在京城内搜刮金银,“犒劳”金兵。被掠夺的民间钱财有黄金 20 万两,白银 400 万两,而贵族官僚们的财富却丝毫没有触动。

以李纲为代表的抵抗派,对这种屈辱求和的做法表示极端的愤慨。李纲向宋钦宗指出,金人所勒索的金帛,竭全国人民的财力尚且不足,何况光靠一个汴京。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屏障,丢掉三镇,国家怎能保得住?李纲的正义呼声,更加引起求和派的恐惧。1126 年的 2 月,李纲被罢免了。宋朝以求和派分子蔡懋接替了李纲的职位,并下令守城战士,不得随意向金人放一矢、投一石。

北宋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汴京军民数万人响应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号召,展开了反对求和、反对内奸的政治斗争。陈东等上书请愿,要求宋钦宗不要轻信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蔡懋等奸贼的诡计,赶快把他们革职,立即起用李纲,上下齐心、抵抗金兵。请愿的群众要求亲眼看到李纲官复原职。在都城人民的压力下,宋钦宗不得不宣布恢复李纲等爱国将领的原职。奉命召李纲和群众相见的官员朱拱之,由于行动迟缓,当场被愤怒的群众拖下马来活活打死。

当李纲和广大军民见面时,数十万群众欢声雷动。在这次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中,有 20 多名官员被群众殴伤和击毙,人民在斗争中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请愿活动,是古代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爱国斗争的光辉的一页。宋朝的太学生都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妥协求和的爱国行动,深得广大军民的支持和拥护。

汴京人民的反投降、反内奸斗争,壮大了抵抗派的声势,显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大大地打击了求和派的嚣张气焰。李纲复职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重新布署了都城的防卫力量。金兵集中兵力多次进攻西边的城门,都没有得逞。当金兵急攻万胜门时,西城墙多次遭受金兵炮石的破坏,城内军民奋力抢修,用大石和条木堵住缺口。在西城的攻守战中,宋军采取从固子门和新郑门两座城门同时出兵夹击的战术,迫使金兵败退。

汴京保卫战进行了将近 1 个月。守城军民在久经战场的爱国将领李纲的领导下,越战越勇。宋朝的援军纷纷到来,孤军深入的金兵时刻担心着自己的后路被宋军所切断。1126 年的 2 月,女真贵族只得仓皇向北方退兵。

靖康之变

金兵北撤以后,腐败的北宋王朝并没有接受都城被围的历史教训,依然敌视人民的力量,打击和排挤抗金将领,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粉饰太平。曾经退位的宋徽宗又匆忙赶回汴京,继续过着荒淫的宫廷生活。求和派大肆宣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一位有远见的大臣名叫吕好问,他向宋钦宗提出警告:女真贵族如此藐视北宋王朝,他们决不会就此罢兵。到了秋冬的时候,天高马肥,女真的铁蹄又将卷土重来,应当及早提防。宋钦宗一伙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命令各地的援军都撤回原地。宋朝政府仍然不加戒备。

爱国将领李纲非常担忧这种粉饰太平的危险局面。他多次向朝廷提出防御金兵的方略,都被奸贼耿南仲等人所扣留。李纲又被排斥在朝廷之外。

金兵经过半年的休整,于1126年的8月再度分兵两路南下:东路兵在宗望率领下,从保州(河北保定)直逼真定(河北正定)。真定知府李邈先后上书30多次,恳求朝廷派出援兵,都被置之不理。真定孤立无援,很快陷落,李邈被俘后不屈而死。金兵又攻陷庆源府(河北赵县),经恩州(河北清河)、大名府,在李固渡横渡黄河。西路宗翰的金兵也在九月间攻破了被围250多天的太原,守将王禀奋勇力战,最后牺牲。金兵随即抵达黄河北岸的河阳(河南孟县)。黄河南岸有12万宋军扼守,竟被对岸虚张声势的战鼓所吓倒,连夜溃逃,使金兵很快渡过黄河,进占西京(河南洛阳)、郑州,直扑汴京城。

北宋求和派耿南仲、聂昌一伙,颠倒黑白、降祸于人,把金兵第二次包围汴京,归罪于李纲等人主战的后果,借此打击抵抗派。

1126年(靖康元年)11月,宗望的部队已经进抵汴京城东北的陈桥驿,宗翰一路也到达汴京。金兵两路会师,汴京再度遭到包围。北宋朝廷议论纷纷,文武大臣惊惶失措。当时京城内有守军7万,河东、河北大部分地区仍在宋军坚守之中,陕西方面的援军以及宗泽的部队正在向汴京靠拢。局势固然危急,宋朝完全有力量奋起还击。但是宋钦宗代表汉族大地主阶级的腐朽力量,是软骨头。他们一心只想求和,派出奸贼耿南仲和聂昌,分别到宗望和宗翰军前议和,并答应以黄河为界,把黄河以北的土地和人民奉送给金朝。

人民群众切齿痛恨向金人乞和的奸贼。当聂昌到达绛州(山西新绛)时,被愤怒的群众挖掉眼睛,砍成肉泥。

汴京城内的军民,克服一切困难,准备抗击来犯的敌军。人们自动组织起来,杀死了金朝派来的使者刘晏等四人。在朔风刺骨、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被围困的军民饥寒交迫,连水藻和树叶都吃光了。每天都有冻死和饿死的百姓尸体,漂流在汴河和蔡河里。北宋王朝的求和国策,把汴京人民逼向死亡的深渊。闰十一月初,金兵乘大雪破城,钦宗到金营投降,北宋王朝灭亡了。

陪同宋钦宗到金营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是一个刚直而有正气的官吏。女真贵族要宋钦宗脱下皇帝的服装,换上老百姓的便服去会见。李若水十分气愤,破口痛骂金人,被金兵拖住殴打一顿,晕倒在地。宗翰千方百计引诱李若水投降,他绝食表示反抗。在金人的多方威胁和利诱下,李若水的一名仆从,思想动摇了。他从李若水的家庭私利出发,对李若水说:“老爷的双亲都已年迈,稍为迁就一下,不是就能返回故乡,与老父老母团聚了吗?”李若水怒责他的仆从说:“为了国事,早已丢掉自己的家庭了。在敌人面前,他毫不畏惧,骂宗翰是‘强盗’。金人滥用毒刑,惨无人道地割去李若水的嘴唇,血溅满面。但他决不示弱,仍然骂不绝口。最后,金人活活地将他害死。死时仅有35岁。李纲听说李若水为国牺牲,沉痛地表示:‘宋朝的官僚士大夫,多‘寡廉鲜耻’,只有李若水这样的人是知廉耻的。’

金兵攻陷汴京,人民群众掀起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金兵不敢久留中原,于1127年的4月,俘虏了宋徽宗、钦宗以及宫廷中的后妃、宗室、贵戚等3000人,撤出汴京,还军北方。宫中库藏金银、绢帛、珍玩、宝器、图籍、天文仪器、仪仗等,几乎被劫一空。

北宋徽宗和钦宗的屈辱求和政策,不但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且自食恶果、自取灭亡。

由于人民的反抗,金兵一时不能在中原站住脚跟。他们在退出汴京之前,一手扶植

一个“大楚”傀儡政权，册立曾经充当北宋宰相的奸贼张邦昌为“楚帝”，并指定要建都金陵（江苏南京）。女真贵族妄想利用这个傀儡政权，统辖黄河以南地区，为金朝统治南方作准备。

但是，一切违反历史潮流的反动势力总是不能长久的。这个为女真贵族效犬马之劳的张邦昌反动势力，遭到人民的唾弃。当金兵退出汴京，张邦昌就成为赤手空拳的独夫民贼。大楚傀儡政权仅维护 33 天就垮台了。

徽、钦被俘之后，黄河以南和陕西等广大地区，依然在宋朝统治之下。就是河东、河北地区，金兵也只是打通一条通往汴京的道路。河东只是失去太原等几个州，河北也仅失去真定等几个州。北方军民仍在坚守阵地、抗击金兵。

1127 年 5 月，在抗金老将宗泽的支持下，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称皇帝（宋高宗），重建汉族封建政权。高宗赵构就是南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宗泽和一班主张抗金的文武大臣，都盼望高宗政权能领导军民奋起抗金、收复失地，建立中兴大业。广大人民群众也希望南宋王朝能振作起来，完成抗金大业。

南宋

仙人关之战

北宋灭亡后，金朝为进一步夺取中原及陕西等地，于南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 年）开始，至建炎四年，先后三次南下，向南宋大举进攻。金统治者对南宋的全面进攻未能达到灭亡南宋的预期目的，便改变战略部署，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集中力量进攻川陕，企图控制长江上游，为从西北迂回包围南宋创造条件。金军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在陕西方面发动了数次大规模进攻。富平之战，宋军损失惨重，陕西落入金军手中，宋军在西北战场陷入困难境地，只得退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等州，凭险设防，以阻金军入川。绍兴二年冬，宋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鉴于和尚原距后方路途遥远，恐粮运不继，难以久守，便以其弟吴玠驻守和尚原，自己率守军主力退屯仙人关，并在仙人关右依山据险筑垒，特称之为“杀金坪”，与仙人关互为依托，控扼入蜀隘口。翌年冬，金元帅左都监完颜宗弼率军攻占和尚原，吴玠引军退屯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南）。吴玠为实施纵深防御，又于“杀金坪”后边险峻之处设置第二道防线。

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 年）二月，金将完颜宗弼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撒离喝）、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在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宝鸡等地，集结步骑 10 余万，进攻仙人关，决心破关入蜀。二十一日，金军自仙人关以北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进至“杀金坪”，扎营 40 余座与宋军对垒。吴玠闻讯，率部自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入援，转战 7 昼夜，突破重围与吴玠军会师。二十七日，金军开始进攻，吴玠军以万人据险抗击，经反复激战，将金军击退。二十九日，金军立砲数十座攻击宋军，吴玠命将士以弓矢，砲

石并力捍御。翌日,完颜宗弼命金军架了300余座云梯猛攻宋军营垒,宋军则以砲石、撞竿击毁其云梯,以长枪刺杀金军。宗弼久攻不下,遂将全军分为二阵,自率精兵阵于东,命骁将韩常阵于西,轮番进击企图夹攻宋军。吴玠命吴玠等率军于金军两阵之间往复冲杀,在大量杀伤金军之后,因宋军久战疲惫,乃退守第二道防线。金军接踵而至,人披重甲、铁钩相连,前仆后继,鱼贯而上。宋军依托险隘坚垒,以劲弓强弩轮番发射,打退金军多次进攻。三月初一,完颜杲集兵攻宋军营垒西北楼,并焚烧楼柱。吴玠命部将杨政等督励部下持长刀、大斧,左右冲杀,将其击退。是夜,吴玠乘金军久战兵疲,实施反击,宋军在四面山上点燃火把,鼓震天地,又以王喜、王武等将率精锐,分二队冲入金营。金大将韩常中箭左目受伤,金军惊溃,死伤数以万计。初二,金军企图改道由七方关、白水关(今徽县西南)入川,吴玠暗遣精兵迂回至金军寨后,袭破宗弼及完颜杲大寨,金军死伤万余,连夜逃走。吴玠又命部将王俊率军疾驰至河池(今徽县)设伏,扼其归路,斩俘千余人。宋军乘金军溃退之势,挥师追袭,迫使金军退回凤翔府。自此以后,金军暂时放弃了进入四川的企图。吴玠乘胜于绍兴四年四月收复了凤州(今陕西凤县)、秦州、陇州。南宋川陕的防务趋于巩固,金军的重点进攻又遭失败。

藕塘之战

藕塘之战是南宋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1136年)十月,宋军与伪齐军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地区的遭遇战。

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十二月,宋济南知府刘豫降金。建炎三年三月,金将挾懒以刘豫为京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黄河以南诸军,其子刘麟知济南府。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年)九月,在挾懒等人支持下,金立刘豫为大齐皇帝,都大名府,建元阜昌,后迁都汴京。金划黄河以南所占地区为齐国辖地。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年)金军攻占陕西后,又将陕西划归齐国管辖。于是齐国成为金与南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自此,齐开始了与宋长达8年的战争。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春,金朝指使伪齐主刘豫,遣军攻占襄阳府、郢州(今湖北襄樊、钟祥)等六郡,在南宋长江防线打开缺口。五月,宋廷命岳飞率军反击,收复襄阳府等地。九月,完颜宗弼与伪齐合兵进攻西淮地区,遭岳飞、韩世忠军抗击。继闻金太宗病危,渡淮北撤。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1136年)初,宋廷遣军大举北伐,企图收复中原失地。

绍兴六年八月,宋决定攻齐,宋高宗下诏亲征。岳飞遣部将牛皋攻克齐镇汝军,遣部将杨再兴攻下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张俊修筑盱眙城,进屯泗州。岳飞又攻克蔡州(今河南汝南)。岳飞率军收复陕西、河南大片失地后,进逼西京(今河南洛阳)。伪齐王刘豫闻宋高宗亲征,急向金朝乞兵,金命刘豫自行抵御,令元帅左都监完颜宗弼率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以作声援。刘豫为挽回败局,发兵30万,号称70万,分三路南下进攻淮西,反击宋军。其侄刘猷统领东路兵,出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北),渡淮攻定远(今属安徽);其子刘麟统领中路兵,由寿春(今安徽寿县)攻庐州(今合肥);孔彦舟统领西路兵,由光州(今河南潢川)攻六安(今安徽六安)。南宋右相张浚闻伪齐军南下,急

遣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率部赴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会合江东宣抚使张俊军,共同阻遏金军。十月初四,淮西宣抚使刘光世遣将于霍丘(今属安徽)、正阳(霍丘东北)一带击退伪齐中路军,遏制了刘麟军攻势。初八,刘猷率东路军数万越过定远县,企图经宣化(今江苏江浦东北)直趋建康(今南京)。其前锋进至越家坊(今定远东南),被杨沂中军击退,遂即转向庐州,企图与刘麟合兵。初九,进至藕塘镇时,与杨沂中军遭遇。刘猷军倚山据险,列阵发矢。杨沂中命摧锋军统制吴锡率 5000 骑,从正面攻击其阵,乘刘猷军阵乱之势,率大军攻其翼侧,短兵相接,大声鼓噪,以壮声势。张俊军前军统制张宗颜等自泗州来援,两军合力夹击,大败伪齐军。刘猷仅领数骑遁去,其谋主李谔与部将数十人被俘,降者万余。宋军缴获伪齐军舟船数百艘,车数千辆。刘麟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孔彦舟于光州,闻知刘猷军败讯,皆退军北遁。齐军的此次攻宋,遂告结束。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 年)十一月,金帅挾懒、完颜宗弼入汴京,执刘豫父子,废刘豫为蜀王。齐政权在维持 8 年后宣告灭亡。废黜伪齐政权后,挾懒、完颜宗弼加紧向宋高宗诱降。

如此一来,宋高宗又看到了议和的希望。在此之前他便重新起用被罢相不久的秦桧为枢密使,并免去主战派宰相张浚之职。金国内部的主和派头目又捎信给高宗,表示愿意归还徽宗的灵柩与皇太后,以及河南诸州。宋高宗闻讯大喜过望。更加坚定了议和的决心。议和自然要倚重与金国有特殊“渠道”的秦桧,他向高宗说:陛下要想议和,单独与我商议就可以了,不要群臣参杂干预,那么事情一定会办成。于是,在 1138 年 3 月,秦桧被任命为宰相兼枢密使,军政大权全部落在他一人手中。秦桧的再度复相,使投降势力成为南宋朝廷中的主导力量,影响甚大。特别是抗金事业开始出现波折,致使终宋之世,“国家一统之业……裂而不复合”。朝廷中虽然也有许多大臣反对议和,但高宗无论如何是听不进去的。1139 年正月元旦,南宋朝廷正式宣告宋金议和达成,宋帝向金称臣,并且每年向金贡献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这是一个屈辱的条约,宋高宗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心安理得、自鸣得意。李纲、张浚、韩世忠、岳飞、胡铨等主战派人物纷纷上书反对,朝野群情激愤。南宋朝廷内主和派与主战派的矛盾开始升温。

顺昌之战

绍兴九年(1139 年)秋,金朝宗弼等发动政变,杀死曾主持与南宋议和的大臣挾懒等人。兀术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兼掌军政大权。接着,宗弼撕毁和约,于绍兴十年(1140 年)五月出动大军,向南宋发动全面进攻。他令撒离喝进入陕西、孔彦舟取开封、王伯龙攻陈州、李成下洛阳,自己则率主力直奔亳州、顺昌府,打算渡淮南侵。

五月中旬,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着八字军和殿司卒 3 万余人,在前往开封的赴任途中,由水路到达顺昌(今安徽阜阳)。这时传来了金军已占领东京开封,其前锋距顺昌只有 300 里的消息。刘锜与知顺昌府陈规商定坚守此城,他给将士们分析形势,力陈防守顺昌的意义,坚定了大家固守顺昌的决心。他组织修筑城防工事,还下令凿沉船只,以示决不逃跑,将与该城共存亡。战士们纷纷表示,平时人家欺负我们八字军,今天我们要为国家杀敌立功。全军上下,战斗热情非常高涨,“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剑”,准备

迎击来犯金军。

五月二十五日,金将中韩常和翟将军的兵马率先到达顺昌城外,在城北30里的白沙龙涡一带下寨,其游骑数十名则涉过颍河,出没于顺昌城下。刘锜设下埋伏,活捉了2名游骑,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韩、翟两军的情况,遂于二十五日夜,派遣千余名战士袭击敌营,取得杀伤金兵数百人的胜利。

二十九日,金军龙虎大王和三路都统葛王褒率众3万余人来到顺昌城下,将顺昌城四面包围起来。刘锜大开城门,派兵从四门出击,并令城上的守军与他们配合作战。宋军用神臂弓和强弩逼退敌人,然后乘胜追击,许多金兵溺死在河中。是役,杀伤金兵数千人。夜里,刘锜又派勇将阎充带着500壮士前往斫营。那天晚上,天将下雨而闪电不绝,宋兵借助闪电光,杀死许多金兵。第二天晚上,依然是这样的天气,刘锜不失时机地再派出100名壮士去斫营。闪电一亮,壮士们就奋力杀敌,黑暗时,大家就伏着不动。金兵不知虚实,乱成一团,互相攻杀而死伤无数。金军士气大伤。

六月初七日,宗弼亲率大队金军赶到。在顺昌城下,他看见城垣低小,便一面大骂众将无用,一面以轻蔑的口吻说:“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府衙会食。”并下令道:破城之后,城中成年男子,统统杀掉,子女、玉帛,任便掳掠。

初九日凌晨,宗弼统领大军来攻打顺昌城。金军“甲兵铁骑10多万,陈列行布,屹若山壁”,将顺昌城围得水泄不通。宗弼身穿战袍,骑着战马,亲自在敌阵中回环指挥。时方盛夏,刘锜军早晨凉爽时重在防守,中午过后,当身穿铁甲、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的金军酷热难熬、力疲气衰时,突然出击,猛攻敌人。刘锜还令人在颍河上游和城外草中,撒下了毒药,嘱咐部下,无论如何不要去喝河中水。金军人马又饥又渴,不知底细,喝了水,吃了草,中毒的很多,使金军的战斗力遭到削弱。刘锜的军队只有1.8万多人,比金兵的人数少得多,刘锜把一部分兵力分布在城上,另外的将士则每5000人分为一支,令其轮番出城作战,轮换休息就餐。宋军以逸待劳,在战斗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宋军在战场上集中打击的重点,是金军的左右翼骑兵,以及宗弼的铁兜重甲的亲卫军,这些都是金军的精锐部队。宋军将士们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们用长枪挑去敌人的铁兜,刀砍斧劈,使敌人断臂碎首,有的战士甚至徒手把敌人从马上拉摔下来。统制官赵樽、韩直,身受重创,仍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有的战士在战斗不利的情况下,抱住金兵滚入河中,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场战斗,杀死金兵5000余人,杀伤1万余人,使得“兀术平日所恃以为强者,十损七八”。金军大败后,退到城西扎营,企图坐困宋军。恰逢天下大雨,平地积水一尺多深,刘锜不断地派兵来劫营,金兵人心惶惶,日夜不得安宁。宗弼迫不得已,于六月十二日率军狼狈地撤离顺昌,抛弃的车辆旗帜器械甲仗,堆积如山。

顺昌战役,宋军以少胜多击败金军主力,震动了金朝,大灭了金军的嚣张气焰,挡住了金军自两淮南侵的矛头。

郾城之战

顺昌之战后,金都元帅完颜宗弼率军退回东京(今河南开封)。南宋湖北、京西宣抚

使岳飞亲率大军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出发,准备乘胜收复中原。岳飞命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等将分别经略河南诸州郡,又命梁兴、董荣等将潜渡黄河,联络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夺取西河州县,袭扰金军后方。北征先头部队连连告捷。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日,岳家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先后收复颍昌、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洛阳等重镇,切断金军东西联系,对东京金军形成威逼之势。完颜宗弼为了扭转局势,利用宋军分兵攻占州县、宋淮南东路之张俊、王德军已由亳州(今属安徽)退回庐州(今合肥)、岳家军孤军深入之机,亲率昭武大将军韩常、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赛里等部1.5万精骑,奔袭岳飞宣抚司驻地郾城,企图一举摧毁岳家军的统帅机构,打破岳飞反攻计划。七月初八,金军进至郾城北面20里处列阵。当时,岳飞已将重兵派驻颍昌府城,其他部将也率兵分路与敌作战,留在郾城的宋军人数很少。岳飞探明了金军情况,知道来军是完颜宗弼精锐部队,便针对金军作战特点,令其儿子岳云率背嵬(背嵬一词为西夏语,意为亲随、骁勇。绍兴二年,韩世忠创背嵬军,后成为南宋许多将领设置的亲军的名称)、游奕马军与金骑鏖战。骁将杨再兴为生擒宗弼单骑突进,击杀金军近百人,多处受伤,仍拼死力战。正当两军激战之时,岳飞亲率40骑驰入阵中,射杀金军多人。岳家军士气倍增、奋勇杀敌。完颜宗弼见势难以取胜,遂将头戴铁盔、身披重甲的“铁浮图”和号称“拐子马”的精骑投入交战。“铁浮图”一字排阵,从正面推进;“拐子马”自两翼迂回包抄,对岳家军形成很大威胁。岳飞随机应变,待金军进至阵前,令步卒持麻扎刀、提刀、大斧入阵,专砍马足,“铁浮图”大乱。同时令背嵬、游奕马军专门对付金军的“拐子马”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忽攻其前、忽击其侧,致金军于被动。岳家军步骑密切配合,从午后战到天黑,鏖战数十回合,金军伤亡惨重。完颜宗弼率余部仓惶溃逃。

郾城之战后,完颜宗弼不甘失败,为扭转危局,率军攻取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颖(今属河南),企图切断南宋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与部将王贵军的联系,尔后各个击破。岳飞识破金军企图,料其必攻颍昌,遂重新调整部署,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绕道驰援颍昌,同时令统制张宪率背嵬、游奕等军向临颖挺进,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七月十三日,岳飞军部将杨再兴率300骑兵,到临颖以南的小商桥侦察军情,与金军遭遇,击杀金军2000余人,后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完颜宗弼为了避免与张宪军决战,遂将各路金军集结一起,除留部分兵力守临颖外,亲自率主力北攻颍昌。十四日,张宪进攻临颖,击溃金军,收复临颖县城。同时,完颜宗弼率昭武大将军韩常等部,以3万余骑兵列于颍昌城西,以10万步兵列于舞阳桥以南,连阵10余里。驻守颍昌的宋军有3万,由王贵、董先、岳云、胡清等统领,是岳家军的主力部队。王贵将守城任务交给董先、胡清,自己统帅中军和游奕军,会同岳云率领的背嵬军,出城迎击金军。宋军以岳云的800骑兵居中,正面冲击,猛冲金军步兵;又以步兵为左右翼,攻击金两翼骑兵。岳云身先士卒,先后出入金阵10余次,裹伤奋战。从早晨战到中午,血战几十回合,双方胜负难分。负责守城的董先、胡清二人见状,立即率军出城增援。顿时,宋军士气倍增。董先、胡清与王贵、岳云合兵奋击,战局迅速扭转。激战中,宋军杀死完颜宗弼女婿统军上将夏金吾及副统军粘罕索孛堇,还先后杀死金千户5人,大小首领78人,歼灭金军5000余人,俘获金军2000余人,战马3000余匹。完颜宗弼退回东京。岳飞率军乘胜追到距东京仅45里的朱仙镇。完颜宗弼集结10万金兵迎战。岳飞一面同金军对阵,一面派兵向黄河渡口进逼,侧击金军。

郾城一役,宋军大获全胜。金兵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踌躇满志,决定向朱仙镇进军。看来收复旧都,已是指日可待。他抑止不住满怀的豪情,劝勉部下说:“直捣黄龙府,与君痛饮耳!”就在岳家军进军朱仙镇的同时,从“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杭州凤凰山宫廷中接连发出下令撤军的十二道金牌,令岳家军即刻班师回朝。岳飞不禁仰天长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家军班师南回后,业已收复的故土又尽落于金人之手。

隆兴和议

金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策划灭宋,占据江南。高宗不得已起用宿将刘杼等人,部署战备,组建御前诸军。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下。这时,金朝后方人民群起反抗。济南府一带耿京、辛弃疾(1140-1207)领导的起义军、胶东赵开领导的起义军、海州魏胜领导的起义军、大名府王友直领导的起义军等,纷纷举事。宋将李宝率水军北上,与魏胜、赵开等义军合力,一举歼灭了停泊在胶西陈家岛(今青岛附近)一带、准备自海上进攻安府的金军舰队,使海陵王南侵计划严重受挫。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使用火药的著名海战。

完颜亮渡淮后,企图自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市)渡江。时任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的虞允文(1110-1174),督励宋军,凭藉南方的水军优势,迎敌于江中。金军渡江失败。此时,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于辽阳(今属辽宁),宣布废黜海陵王。金军内讧,海陵王被杀,军队北撤。

这时的宋金战场,再次出现对宋军有利的局面。南宋朝廷再次面临着继续前进抑或妥协投降的抉择。

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赵构传位于孝宗赵昀。孝宗锐意抗金,为岳飞父子昭雪,并且召回抗战派张浚、胡铨,驱逐了朝中的秦桧党人。

隆兴元年(1163),张浚出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派大将李显忠、邵宏渊出师北伐,连破灵壁(今属安徽)、虹县(今安徽泗县),进据宿州州治符离(今安徽宿县)。金军大举反攻,李显忠奋力激战,邵宏渊坐视不救,宋军失利,损失惨重。

符离战败后,孝宗抗金决心有所动摇。秦桧余党汤思退以太上皇宋高宗为后盾,力主议和,排挤张浚出朝,撤销海州、泗州戍守,并暗中示意金朝以重兵胁迫议和。隆兴二年冬,孝宗罢黜汤思退,却被迫与金朝再签和约。南宋皇帝不再对金帝称臣,改称侄,每年缴纳银、绢各20万两、匹,双方各守旧疆。是为“隆兴和议”。

钟相、杨么起义

洞庭湖的农民起义是钟相、杨么等人领导的。起义开始在公元1130年,与方腊起义仅隔10年。

北宋末年,洞庭湖地区遭到金兵的洗劫。当地人民群众联合起来赶走金兵之后,宋

军又接踵而来,前门赶走了豺狼,后门又闯进了老虎。洞庭湖一带的人民,日夜得不到安宁。当时在江南地区察访过的大臣朱胜非,就曾经指出:“朝廷横征暴敛,贫民不能谋生,不得不起来作斗争。一斛米的赋税,要付出五六斛的代价;1000文的税钱,要交七八千。正税之外,苛捐杂税和额外勒索,竟重到这般地步,人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另一个官员洪利也说:“兵兴累年,饷餉悉出于民,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不时之需,无名之敛,殆无虚日,所以去而为盗。”这些言论反映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洞庭湖一带遭受金兵蹂躏之后,房屋倾倒、田园荒芜,生产还没有恢复过来,而宋朝政府的经济剥削又如此之重。钟相、杨么起义就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下发生的。

钟相是洞庭湖畔鼎州武陵(湖南常德)人。早在起义前的20多年,他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宗教联络各方群众。他所宣传的宗教,是不同于佛教和道教的“左道”,其实就是方腊起义时利用过的摩尼教。方腊起义失败后,摩尼魔教在南方群众中秘密流传,宋朝屡次下令禁止,但禁不胜禁。一位名叫王居正的官吏向宋高宗赵构报告说:“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以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钟相组织起义的荆湖一带,早在唐代宗时(763—779年),荆州(湖北江陵)就有摩尼教寺——大云光明寺。这里早就成为摩尼教活动的中心地。

钟相提倡入教的群众要分财互助、团结一致,入教以后,可得“田蚕兴旺,生理丰富”。钟相向农民们作宣传:“法分贵贱,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他自称“天大圣”。于是,洞庭湖一带农民,为了追求光明的未来,都来“投拜法下”。

公元1127年,钟相就组织农民武装力量结寨自保,抵御金兵的劫掠。1130年初,金兵掳掠潭州(湖南长沙),宋朝孔彦舟的溃兵又来趁火打劫。洞庭湖的人民忍无可忍,钟相就在这关键时刻发动起义。

农民军活动于鼎州、澧州(湖南澧县)、潭州、峡州(湖州宜昌)、岳州(湖南岳阳)、辰州(湖南沅陵)等广大土地。所到之处,焚烧官府、寺观、神庙、豪门住宅,屠杀官吏、儒生、儒道,建立“大楚”农民政权。钟相自称“楚王”。农民政权宣布:宋朝的国法是邪法;起义军镇压地主官僚,这是行法;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和土地还给贫民,这是均平。这些行动冲破了封建的旧教条,打乱了封建的旧秩序,“人皆乐而附之,以为天理当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农民起义队伍扩大到40万人。

起义军力量越是强大,敌人的手段也就更加卑鄙。孔彦舟勾结地主反动武装,施用阴谋诡计,派匪徒以“入法”为名,混入钟相的起义营垒,内应外合来进行破坏。钟相缺乏高度的警惕。他和他的儿子钟昂最终被俘而惨遭毒手。余部在杨么等人的领导下,进行顽强抵抗。

杨么是穷苦农民出身的孩子。他原名太,因为年龄小,当地人民习惯叫孩子为“么”,因此人们就亲热地喊他为杨么。

杨么团结杨广、夏诚、杨钦、周伦、黄诚、刘衡、黄佐、高老虎等起义首领,沿着洞庭湖筑起几十处栅寨,准备长期作斗争。他们一面战斗,一面从事生产,春夏耕耘、秋冬收粮,自给自足,出现一派兴旺景象。为了适应水上战斗,他们自己砍伐木材,创造了一种“车船”。这是一种轻快的战船,利用人力踏动木制的机车,车轮激水,舟行如飞。最大的战船,装有24部机车,桅长10多丈,楼高5层。船的两旁还有护车板,使踏车的战士

不会遭到敌人的射击。人民群众有无穷创造力,农民军能在“两月之间,水寨大小车楼船十余,制样愈益雄壮”。

洞庭湖的起义军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地理形势,采取灵活的战术。当敌人从陆地上来袭击时,他们就潜入湖中;当敌人下水时,他们又机动地登岸作战,使宋军疲于奔命、无从下手。到了1132年,杨么领导的农民军扩大到20万人。1133年,杨么自称“大圣天王”。

宋朝政府为了镇压杨么的起义军,调动了不少统帅,但是无法消灭革命力量。狡猾的敌人采取软的一手。当时也有个别农民军将领如杨华等,上当受骗,在敌人面前放下了武器,投靠了宋朝。但是杨么领导的起义军,越打越强。宋朝王黼率领的6万水军,在1133年(绍兴三年)的一次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宋高宗在多次惨败的情况下,最后把精锐的岳家军从淮西前线抽调到洞庭湖。

公元1135年(绍兴五年)五月,岳飞到了洞庭湖。他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使杨么陷于孤立的境地,终于把洞庭湖的农民起义瓦解,杨么被俘后壮烈牺牲。

杨么牺牲之后,其部下夏诚等继承他的事业,据守水寨,奋起抵抗。后来由于寡不敌众,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从王小波、李顺起义到钟相、杨么起义,反映了宋代的农民阶级反对土地兼并,要求土地重新分配的强烈愿望。他们针对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的封建制度,提出了平均和平等的要求。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庆元党禁

宋徽宗崇宁以后,程颐为代表的理学被禁止达二十五年之久。北宋灭亡,南宋初年,情况才有改变。

淳熙五年(1178年),御史谢廓然、秘书郎赵彥中相继攻程学。淳熙十年(1183年)监察御史陈贾攻朱熹,请禁“道学”。事情起因是朱熹任浙东提刑,至台州。台州知州唐仲友为民所讼。朱熹弹劾。而唐仲友与宰相王淮是姻家,又是同里人。王淮通过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攻击朱熹,说:“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王淮以太府丞陈贾为御史。陈贾当面对孝宗说,近世道学之徒是“假学以济其伪”。要求孝宗对这些人“摈斥勿用”。孝宗听从陈贾的意见。朱熹被解职。

淳熙十四年(1187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推崇道学,朱熹因此得到重用,除江西提刑。淳熙十五年(1188年)五月王淮被罢去左相职务,朱熹很高兴,赶赴朝廷。见到孝宗,朱熹上五道奏札,要孝宗以“正心诚意”四字加强修养。同年,兵部侍郎林栗因论学不合,遂弹劾朱熹,说朱熹“不学无术”,只不过窃取张载、程颐学说中的零碎剩余的东西,妄自尊大,招收门人。以“治世之法”衡量他们的所作所为,朱熹实是“乱人之首”。

庆元元年(1195年),右正言李沐论赵汝愚“擅权求胜”,宁宗诏罢赵汝愚。太府寺丞吕祖俭上疏请留赵汝愚,并论不当黜朱熹、彭龟年。吕祖俭因此遭韩侂胄的忌恨,被贬逐送韶州安置。

太学生杨宏中等亦因上书请留赵汝愚等,也被五百里外编管。接着吕祖俭改送吉州安置。六月左正言刘德秀请“考核真伪,以辨邪正”,以此打击所称的“道学”之人。韩旼等对不合心意的人,一概目之为道学之人,道学被斥为“伪学”。

庆元二年(1196年)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刘德秀请科举士中对“涉义理者”,当悉皆黜落。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之类书为世大禁。这一年正月,赵汝愚在衡州服药自杀。七月,吕祖俭卒于筠州,蔡元定编管道州。朱熹落职罢祠,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以绝伪学。”

庆元三年(1197年),知绵州王洵上允“乞置伪学之籍”。其中宰执有赵汝愚、周必大、留正、王蔺等四人;待制以上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等十三人;余官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等三十一人;武臣有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有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

庆元五年(1199年)九月吕祖泰击登闻鼓,论不当立伪学之禁,结果被送连州拘管,又配钦州牢城收管。次年,朱熹卒于考亭。

从庆元元年开始的所谓禁伪学前后历时六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

金朝的衰亡

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正月,金世宗病故,皇孙完颜璟即位,是为章宗。章宗时期(1189—1208年)是金朝发展的极盛阶段,同时也是金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

经过世宗时期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至章宗初年,金朝国势达到了它的顶点。国势的兴盛充分显示在国家的富裕上,章宗初年,史称“府库充实,天下富庶”。章宗即位的次年,有臣子上奏章乞减免租税,其缘由是怕府库里的粮食存放太久腐烂了。为防止公粮岁久霉坏,朝廷曾发文,令诸路将仓库里的陈粮不时拿出来晾晒,如有霉坏,要追究有关官员的责任。明昌三年(1192年),全国各地常平仓共计519处,积粟3786万余石,可供官兵食用5年,积米810万余石,可供官兵4年之需。

在章宗时期经济繁荣、国势兴盛的背后,已经蕴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由于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南北两面连年不断的战争,使金朝耗费了极大的财力,出现了财政危机。于是只好滥发交钞和银币,实施通检推排和括地的经济政策,以维持日渐困蹙的统治,同时作为金朝一个重要支柱的猛安谋克制度也开始陷于崩溃,猛安谋克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减弱。这种种因素导致金朝的统治在章宗后期开始走下坡路。

章宗时自然灾害频繁,由于官僚政治的腐败,酿成了黄河三次大决堤,致使大批耕地被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黄河在曹州(今山东菏泽)境内决堤,沿岸大批农民丧生,幸存者还要负担沉重的河防差役,当时营筑河堤用工600余万,多半由沿岸农民负担,他们不堪重负,纷纷逃离乡土。明昌四年(1193年),黄河又在卫州(今河南汲县)决堤,由于这一带都是平原,洪水平地漫灌、泛滥成灾,从大名府往北直到沧州、青州(今河北清县),全被洪水淹没。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在南京北阳武(今河南原阳)故堤第三次决口,这是黄河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大水灾,黄河由于这一次决堤而导致改道。当时泛滥的洪水分为两支,一支向北由北清河入海,一支向南由泗水入淮,侵夺了淮阴以下的淮河河道。这次黄河决口完全是由于治河官员腐

败无能、有失维护造成的。河决后,金朝统治者束手无策,仅仅调集民夫在孟阳河堤和汴河堤作了些填筑修补的工作,使洪水不至淹没南京而已。

章宗时,北方的鞑靼、蒙古等游牧部族不断侵扰金朝,使金朝在北境的征战连年不已。鞑靼诸部在世宗之前一直与金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后来他们逐渐强大,构成了对金朝的威胁。章宗初年鞑靼诸部中势力最强的是阻襄、广吉刺两部,他们时叛时服,反复无常。明昌六年(1195年),鞑靼诸部起兵反金,章宗命右丞相完颜襄率军征讨,自临潢府两路进兵,蒙古诸部也出兵相助,结果才击败鞑靼。两年后,鞑靼再次起兵,完颜襄出师征讨,鞑靼酋长斜出率部归降。承安三年(1198年),鞑靼广吉刺部又叛,章宗令完颜宗浩领兵北伐,迫使广吉刺归降,然后再北上进攻叛金的蒙古诸部,获胜而还。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骚扰,金朝在北境开掘了一条西起临潢府左界,东至北京路的界壕,壕深三四米,宽达十几米。同时在西京路也修治障塞,工程极为浩大,但仍不能阻止外族的侵扰。

在南方,宋朝也发动了对金的战争,权臣韩侂胄想利用金朝内忧外患的机会收复中原,便于泰和六年(1206年)四月出兵北攻。章宗以平章政事仆散揆为左副元帅,枢密副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出师应战。战争初期,宋军攻占了淮北的部分州县,十月间仆散揆督率金军分九路对宋进行反攻,很快就取得全线胜利,但金军损失也很大。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事消耗了金朝的国力,章宗不想再扩大与宋朝的战争,因此在取得胜利后就从淮南退军北归,准备与宋朝议和。次年,南宋史弥远发动政变,杀死韩侂胄,和议得以达成,南宋将岁币增至30万两,另赔款300万两。

频繁的自然灾害对外战争耗尽了金朝的国力,庞大的官僚机构开支也与日俱增,在章宗统治后期的泰和七年(1207年),总计有仕官达4.7万余人,比世宗时增多3倍,金朝的财政陷入了困境。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章宗开始滥发交钞和宝货(银币)。交钞有大小两种,大钞自1贯到10贯,小钞自100文到700文。承安二年(1197年),因交钞发行过多,民间常常拒绝使用1贯以上的大钞,官府不得不将大钞回收一部分。三年(1198年),又因百姓只愿用铜钱作交易,而不愿接受交钞,朝廷便规定凡1贯以上的交易必须用交钞或宝货。宝货发行不久,民间出现大批假币,多用铜锡杂铸而成,于是朝廷才不得不下令停止铸造和使用。由于币制屡变,民间议论纷纷,怨声载道,章宗下令禁止百姓私议币制,违令者论罪,告密者赏钱300贯。滥发交钞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甚至所印的钞币还不敷印刷纸张的工本费用。章宗末年,至以万贯交钞只买得一个烧饼,章宗死后两年,金军在会河堡与蒙古会战,朝廷竟以84车交钞作为军赏,可见交钞贬值到了什么程度。币制的紊乱,是金朝统治趋于衰败的一个象征。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难题,章宗继续实施通检推排和括地两项政策。在承安二年(1197年)、泰和元年(1201年)和八年(1208年)对农户物力进行了三次推排,但到了章宗的晚期,由于朝政的腐败,通检推排之法已遭破坏,民户家产很难核实,有权势者纷纷逃避赋税,贫苦农民要负担越来越重的赋税。括地更是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弊政,金朝统治者为了挽救日趋崩溃的猛安谋克制,以括籍被百姓“冒占”的官田的名义,大量括取民田,分授给猛安谋克屯田军户,把括地当作维持屯田军户生活和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承安五年(1200年),枢密使宗浩等在山东、河北、陕西等路一次就括地30多万顷,括地的过程中弊端百出,大批汉族农民的私田被强行夺取。括地导致了阶级乃至民族间的

严重对立,当时就有人指出这种做法为害至深,认为夺民田而与军户,其结果是“行军心而失天下之心”。

1211年(大安三年)以后,山东境内到处爆发农民起义。在东部有杨安儿领导的起义军,活动于莒州(山东莒县)、密州等地;在中部有李全领导的起义军活动于潍州(山东潍坊市)、安丘、临朐一带;在南部有刘二祖、彭义斌等领导的起义军活动于沂蒙山区。起义群众,以红袄为标志,称为“红袄军”。

13世纪初,女真贵族的统治已经发生根本动摇。他们害怕蒙古军的袭击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1214年(贞祐二年)把统治中心从中都南迁到开封。蒙古军于1215年攻占了中都。

红袄军战斗在山东、河北一带,狠狠地打击了女真统治者。1214年,杨安儿在莱州(山东掖县)建立政权,年号“天顺”,军势大振。杨安儿牺牲后,余部由她的妹妹四娘子杨妙真率领,转移到磨旗山(山东莒县东南)。杨妙真勇敢善骑射,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起义的农民都叫她“姑姑”。她带领杨安儿的余部1万多人,与李全会师于磨旗山。杨妙真和李全都善使长枪。两人通过比武竞技而相互倾心、结成夫妇,从而把双方的部队结合在一起,在磨旗山建立抗金阵地。至今在山南麓半山腰大石上,还刻有“嘉定九年(1216年)四娘子此山下寨”等11个大字。

活跃在山东南部的农民军,在刘二祖牺牲后,余部由彭义斌等人领导,继续战斗于兖州等地。后来彭义斌部也归李全领导。山东的各支红袄军基本上统一起来了。

1217年以后,红袄军在杨妙真、李全、彭义斌等人率领下,由山东经徐州等地,向南宋境内转移。南宋统治者害怕人民的武装力量,不仅不愿与红袄军配合,打击女真贵族,收复故土,反而用一切恶毒的手段对付起义军。尽管起义军处境十分不利,他们仍然坚持反金斗争,并多次打回山东,会合当地起义群众,重新攻克密州、沂州等地。

这时候,蒙古贵族的骑兵已经深入河北、山东一带。起义军面临的敌人有女真贵族和蒙古贵族的武装,斗争更加艰巨。红袄军的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但连续数年的战斗,动摇了金朝的腐朽统治。女真贵族的政权在本族人民和汉族、契丹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长期打击下,已经没有力量继续维持其残暴的统治。1234年,金朝被北方新兴起的蒙古军所消灭。

蒙古国的建立

早在五六世纪的时候,从呼伦贝尔草原向东延伸到嫩江,南抵洮儿河,北迄额尔古纳河下游,已经居住着语言上和东胡有渊源关系的室韦部落。进入七八世纪,室韦部落逐渐发展起来。当时,在北方称雄的突厥人称他们为达怛。室韦——达怛人是蒙古族的祖先,我们可称他们为原蒙古人。

蒙古族的先人室韦——达怛从氏族发展到了部落。随着部落的繁衍,他们沿着额尔古纳河,从呼伦贝尔草原,渡过呼伦湖,向西进到了斡难河(今鄂嫩河)的源头。

这个室韦——达怛人的西迁运动大约是从8世纪以后开始的。当时,在蒙古高原上,回鹘势力已走向衰落,而后契丹势力和女真势力相继进入并得到发展。到十一、十二世

纪时,蒙古各部在此地的势力得到加强。

当时各部正处于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各部之间经常战争,社会生活很不安宁。在各部落的争战中,一位被后人称为伟大的征服者的英雄人物铁木真脱颖而出。

铁木真 1162 年,生于蒙古高原上的斡难河畔,他父亲叫也速该·把阿秃儿,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他的母亲叫诃额仑。乞颜部常常和塔塔儿部交战。当铁木真出生时,也速该刚好俘获了两个塔塔儿部人回来,其中年长的一个叫铁木真。也速该按照古代蒙古人的命名习惯,就把自己刚生的儿子称作铁木真了。

当时部落混战的局势是这样的:你不去战胜对方,对方便会来消灭你。铁木真在这种不断的混战中表现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经过一番征战,铁木真终于把蒙古高原上主要的游牧部落都统一起来。

在统一各部的斗争中,铁木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雄才大略、气度恢廓;他善于团结和使用自己的伴当,善于联合盟友去击败自己面临的强敌,善于在败时保存和恢复力量、在胜时迅速发展力量,善于在各种情况下维护和提高贵族的权力和尊严。在铁木真手下,造就了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拥有一批善战的将帅和指挥官。这支军队是快速的骑兵,具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能够吃苦耐劳,敢于冲锋陷阵。这支军队把征战和杀掠视为英雄的行为和美德。铁木真及其统帅的这样一支军队在蒙古高原上兴起了,这是 13 世纪初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对中国以及广大亚欧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

1206 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集诸弟、诸子、驸马、伴当和部落首领举行忽邻勒塔。忽邻勒塔原是部落议事会,现在,铁木真把它变为一种议决国家事务的聚会。在这次忽邻勒塔上,铁木真建树了九游白旗,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正式成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尚九尚白,九游白旗成了大蒙古国的标记。“成吉思”的意思,说法不一,或为“坚强”,或为“大海”,或为“天”,等等。“汗(罕)”的意思,原来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现在已演变为“君主”、“皇帝”。总之,“成吉思汗”是一个最尊崇的称号。

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编组千户,委任了 95 个“敏合敦那颜”(千户长)。全部牧民都按十进位的军事体制编组,每十户设一个十户长(或称牌头,十户为一牌。),每百户设一个百户长,每千户设一个千户长,由下至上,层层隶属。这样编组的千户,不仅是军事单位,而且是行政管理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单位。千户长以及百户长享有军事、行政和社会经济的各方面权力,成为大蒙古国的新兴的贵族阶级。

千户之上,成吉思汗任命博尔术为右翼万户长,管辖西面,直至按台山地方,木华黎为左翼万户长,管辖东面,直至哈刺温只都山(大兴安岭南)地方。同时,任命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长,管辖著名的“怯薛”——亲卫军。

亲卫军是大汗的常备军队,也就是大蒙古国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亲卫军是成吉思汗专制统治的强大支柱,它维系和控制各个千户长、百户长,并随时准备镇

压牧民的反抗。它又是整个大蒙古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成吉思汗对外征战时最得力可靠的精锐的中军。

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还委任他的义弟失吉忽秃忽为“古儿·札鲁花赤”——总断事官,负责科断“盗贼诈伪的事”和“分家财的事”。

当时,蒙古—突厥部落原有的萨满教还有很大的精神力量。成吉思汗本人就始终信仰萨满教宣扬的“长生天”——永恒的天神。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又任命兀孙老人为“别乞”,让他掌管萨满教事务。他规定:担任别乞的人,穿白袍,骑白马,坐在众人上面,选择吉日良辰,发表议论,受人敬重。

千户制、亲卫军、总断事官以及别乞,这些就是大蒙古国建立初期的国家机器。这套国家机器是成吉思汗参照蒙古社会的传统习俗,根据建国时的实际情况创制出来的。在这里,成吉思汗表现了杰出的政治才能。同时,这套国家机器的创制也反映了历史的巨大变革。大蒙古国的建立,标志蒙古高原诸部落从野蛮进入了文明。从原始社会进入了早期游牧封建社会。大蒙古国的建立,也标志蒙古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了。

成吉思汗的征伐战争

成吉思汗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让他的弟兄、儿子们“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决定继续向外进行军事行动,降服蒙古境外的相邻政权。这些向外扩张的战争,具有很大的掠夺性和破坏性。

13世纪初蒙古周围的形势大体上是这样的:在它的西部有畏兀儿和西辽,在它的南部有西夏和金朝。成吉思汗在征服畏兀儿和西辽的同时,对西夏和金朝进行了骚扰和掠夺。

畏兀儿是突厥语系中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古老民族。唐朝时称回纥、回鹘,曾在蒙古高原建立过回鹘汗国,后被黠戛斯击败,开始西迁。其中有一支迁到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到公元10世纪末期时,地域已扩大到西抵葱岭,东达甘(今甘肃张掖)、肃(今甘肃酒泉)2州,北界天山,南越戈壁,并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其都城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或称“哈拉和卓”;其首领称“亦都护”。

西辽是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建立的。公元1124年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下,在女真军队的打击下,正处于灭亡的前夕。这时辽宗室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其部众西迁,在我国今天的新疆西部及中亚一带建立了政权,历史上称为西辽,也称“黑契丹”、“哈刺契丹”。其都城在虎思斡耳朵(在前苏联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西辽建立后不久便控制了畏兀儿,战败了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势力扩展到巴尔喀什湖以西的两河流域,成为中亚地区势力强大的政权。

成吉思汗称汗后,虽然统一了蒙古各部,但是篾儿乞部的首领脱黑脱阿和他的两个儿子——忽秃、赤老温,乃蛮部塔阳汗的儿子古出鲁克,依然盘踞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1208年,成吉思汗命速不台和者别分别追袭脱黑脱阿和古出鲁克。结果,脱黑脱阿战死,其子率残部逃奔畏兀儿,当时畏兀儿的亦都护叫巴而术阿而忒斤,没有收容他们,并把他们打败后驱逐走了,又派人向成吉思汗通好。1209年,巴而术阿而忒

的斤不满西辽少监的横征暴敛,杀了西辽少监,并于1210年遣使投顺成吉思汗。这样,蒙古国的统治扩大到畏兀儿。

古出鲁克被畏兀儿打败后逃奔到西辽。当时西辽的大汗叫直鲁古,他是一个昏庸无能、不理政事的统治者。古出鲁克奔西辽后,直鲁古对他毫无警惕,反而将女儿嫁给他,并供应他费用去招集乃蛮和蔑儿乞残部,使古出鲁克势力渐渐增强起来。古出鲁克为了达到篡夺西辽政权的目的,先是挑起花刺子模与西辽互斗,继而又于1211年抓获直鲁古,夺取西辽大汗位。古出鲁克统治下的西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都十分尖锐,政权是极不稳固的。1218年,成吉思汗命者别率2万人进军西辽,讨伐古出鲁克。者别利用西辽境内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宣布信教自由,并保证对居民不干涉,立即赢得了广大回教徒的支持,他们纷纷起来杀掉住在老百姓家里的古出鲁克的兵士,使蒙古军队很快就占领了西辽都城,古出鲁克仓惶出逃,者别追至撒里黑·昆地面(今新疆喀什附近),擒杀了古出鲁克,西辽终于被蒙古军队征服。西辽的灭亡为蒙古军队的西征扫除了障碍。

灭亡西辽后,成吉思汗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花刺子模。

花刺子模曾被西辽所统治。屈出律依靠花刺子模算端的支持,得以夺取西辽王位。成吉思汗在灭西辽前,曾派遣商队去花刺子模。灭屈出律后,再次派遣商队去见花刺子模算端。讹答刺城的守将杀死了成吉思汗派遣的商队,成吉思汗决计发动西侵。

1219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蒙古大军出发,到达额尔齐斯河畔。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和大将速不台、者别等随行。畏兀儿、哈刺鲁、阿力麻里等部兵也来会集。秋季,蒙古兵进围讹答刺。成吉思汗留察合台与窝阔台率军围攻讹答刺城。朮赤进攻毡的。他与拖雷率领大军直逼不花刺(布哈拉)。1220年2月,蒙古军攻下布哈拉,进而攻打花刺子模的新都撒马尔罕,守城的法官教长投降。讹答刺与毡的也在这以前被攻陷。成吉思汗便令朮赤、察合台与窝阔台三子共同进攻玉龙杰赤(乌尔根奇)。在巴里黑附近的花刺子模算端摩诃末听到兵败的消息,西走你沙不儿。成吉思汗令大将者别与速不台率轻骑越过阿母河(阿姆河)穷追。摩诃末仓惶西走,最后逃到里海的一个小岛上病死。者别与速不台的军兵更进而向西越过高加索,打败斡罗思和钦察突厥的阻击,大行掳掠,然后绕道里海北岸回军。

当花刺子模算端摩诃末死时,其子札阑丁奉遗嘱即位。他从呼罗珊走哥疾宁,组织反击。1221年初,成吉思汗南渡阿姆河,屠巴里黑城,并派遣拖雷进攻呼罗珊。拖雷自巴里黑西进,沿木尔加布河北上,攻马鲁,再折向西南,屠你沙不儿城。然后折回,围也里城,城降,回军里寒与成吉思汗会合。成吉思汗追击札阑丁至申河(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札阑丁战败溺水而逃。1222年,成吉思汗军沿申河追击札阑丁的余众,回军阿姆河驻营。

灭亡花刺子模后,成吉思汗又重新将灭夏的战争提上了议事日程。

1224年,成吉思汗回军到额尔齐斯河。1225年春,回到了土拉河黑林旧营。

成吉思汗回军后不久,朮赤在他的封地病死。木华黎也早已于1223年在闻喜病死。由木华黎子孛鲁统领军兵同西夏作战。

自蒙古建国以来,党项人所建立的夏国一直是难以征服的劲敌。1218年,蒙古追击屈出律时,要求夏国协同进军,被夏国拒绝。成吉思汗出兵西征的路上,曾去围攻西

夏中兴府,不能攻下,只好撤围而走。成吉思汗宣布说:“倘若长生天保护,从回回(指花剌子模)处回来时,再来征讨!”

1225年秋,成吉思汗留下察合台驻守草原,带领窝阔台、拖雷统率大军向西夏进发。但在进军的路,成吉思汗堕马,身负重伤。将士们建策,停止进军,派遣使者到西夏去招降。西夏献宗德旺坚持抗蒙救亡,送回使者。成吉思汗大怒说:“我们死也不能回去!”坚持带病出战。

1226年夏,成吉思汗统领大兵,自北路入夏境。春夏之间,连破黑水城(亦集乃)、肃州、甘州。六十五岁的成吉思汗老病交加,把窝阔台、拖雷叫到身边说:“我大概快要寿终了。我为你们创下汗国基业,没有别的嘱咐,你们一定要同心协力,才能长久。我死后,你们要奉窝阔台为主。”成吉思汗有了将死的预感,但仍要以残存的年岁作最后的搏斗。十月,西夏献宗病死,侄昱继位。同年秋,蒙古军攻打西凉府,夏守将投降,再从西凉府继续进兵,取栅罗、河罗等县,越过沙漠,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侵入夏州。十一月,围攻灵州,夏遣大将嵬名令公来援。成吉思汗率兵渡过黄河,与夏军展开激战。蒙古军占领灵州后,十二月,围攻夏都中兴府。

1227年春,成吉思汗命大将阿朮鲁等领兵围困中兴府。他自己统率大军侵入金境,攻下积石州等地。闰五月,成吉思汗自隆德县至六盘山驻扎,派遣使臣察罕去中兴府谕降。六月,西夏末帝昱向蒙古投降,请求宽限一月献城。

成吉思汗驻军在清水县,金朝派使臣来到成吉思汗的驻地。成吉思汗要臣下向金使宣告:此后蒙古军攻下城邑,不准再屠杀掳掠,并且要把这个旨意写入诏书,布告各地。成吉思汗得知西夏投降时,已经病在垂危。他在临死前嘱咐人们,暂时秘不发丧,以防西夏又因此发生变故。1227年7月12日,成吉思汗结束了戎马一生,病死在营中。

成吉思汗死后三天,夏国王昱献城出降,被蒙古军杀死。

窝阔台侵宋

1227年春,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另一支蒙古军就在侵掠金统治下的陕、甘地区。成吉思汗死后,侵陕的蒙古军在1228年进入大昌原,被金朝完颜陈和尚军战败。1229年,蒙古贵族在选举窝阔台为大汗的大会上,决定全力伐金。十月,由朵忽鲁率领的蒙古军进入庆阳,次年正月,被金援军阻击,退走。秋季,窝阔台、拖雷率主力攻山西,破代州、石州,十月,围攻卫州武仙军。金兵来援。蒙古军败退。十一月,速不台统率的蒙古军攻打潼关,不胜。1231年初,退守倒回谷口。二月,窝阔台、拖雷军引兵入陕西,攻占凤翔。

蒙古分兵作战,金军往来救援,两军互有胜负。1231年5月,窝阔台在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县北灰腾梁)召集诸将会议,商讨作战方略。决议兵分三路,中军攻河中府,入洛阳;左军进兵济南;右军自凤翔经宝鸡,绕道南宋境,拊汴京之背。三军预定明春在汴京合围,灭亡金朝。十月,窝阔台亲率中路军猛攻河中,十二月攻破。蒙古军士从白坡渡过黄河,遣军与拖雷军会合。拖雷率右军,破宝鸡后,9月,又破大散关,入宋境。12月,拖雷军顺汉水而下,由房、均州向北进行金邓州境,直指汴京。次年正月,

拖雷军与金军遇于钧州三峰山,大败金兵。金主帅完颜合达败死,移剌薄阿被擒,金军主力全部溃灭。3月,窝阔台与拖雷北返官山,留速不台军攻打金都汴京。9月,拖雷病死。

1232年7月,窝阔台遣使臣唐庆去汴京招降,被金军兵杀死。速不台围困汴京。12月,金哀宗逃离汴京奔归德。次年正月,速不台进驻汴京。金哀宗逃到归德后,六月间又逃到蔡州。蒙古与宋朝通使,约定联合出兵灭金。宋将孟珙与塔察儿所领蒙古大军围攻蔡州。1234年初,金哀宗在蔡州自杀。金亡。

拔都西征

窝阔台关于再次大规模西征的决定,是与伐宋的决定同在公元1235年作出的。事实上,他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向西方派兵了,那是由札兰丁图谋重建花剌子模帝国引起的。1224年成吉思汗东归后,札兰丁从印度回到伊朗,很快夺得起儿漫(在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伊斯法罕等地,被花剌子模旧将和各地诸侯拥戴为王。其后四五年内,札兰丁进取阿塞拜疆全境,占桃里寺,侵谷儿只,攻巴格达,恢复了许多原先被蒙古军攻占的地方。因此,窝阔台一即位就派箭筒士绰儿马罕领军3万征讨札兰丁。绰儿马罕从呼罗珊进攻阿塞拜疆,札兰丁本人不战而逃,于1231年8月死于土耳其东部的山中。此后绰儿马罕就留在那里,他的军队在1233年抵桃里寺,在1236年入大阿美尼亚。1241年绰儿马罕病死,其妻代领其众,次年由拜住接替。

公元1235年窝阔台决定大举西征时,由于绰儿马罕已经在中亚站稳脚跟,主要目标便集中在钦察草原和罗斯地区,那里有许多地方是10多年前者别、速不台风驰电掣般地抄掠过的。窝阔台本想亲征钦察草原,其时蒙哥在旁,表示有事可由子弟服其劳,使他放弃了亲征的想法。他根据察合台的意见,命令各支宗室的长子参加西征,各万户、千户、百户那颜以及公主、驸马的长子都要从征。窝阔台说:“这派遣长子出征的意见是察合台兄提出的。察合台兄曾说:‘增援速不台可令诸皇子的兄长出征。如果以长子出征,则兵多将广。兵多了就表现威力强大。那里的敌人多,敌国广;那里的国家百姓也厉害,据说愤怒的时候能用刀砍死自己,而武器也很锐利。依照察合台兄这样谨慎的话,所以派遣长子出征’。因为有窝阔台这番话,有的历史书就称这次西征为‘长子出征’。但是,参加西征的不限于长子,《史集》列出了参加者的名字,他们是:术赤子拔都、斡儿答、别儿哥、昔班,察合台子拜答儿、孙不里,窝阔台子贵由、合丹,拖雷子蒙哥、拔绰,等等。窝阔台明确指示:‘这些远征的皇子和大臣们以拔都为首领导’,因而习惯上称这次西征为拔都西征。这一年贵由、拔都、蒙哥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虽然过去20多年从别国掠得的财富已足以供他们尽情享受,察合台、窝阔台仍要他们领兵远征,他们本人也不辞疲劳,足见那时蒙古统治者的尚武精神如何强烈。窝阔台同他父亲一样,肯把几个儿子(贵由、阔端、阔出和合丹)同时投入战场,这是南宋皇帝绝对做不到的。就这一条,也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西征军的灵魂是速不台,他早有西征经验,而且在灭金战争中又一次显示过他的统军才干,足以辅导诸王。

公元1236年春,速不台与大部分参征诸王动身西行,所率军队大约有10余万人。

他们在秋天到达不里阿儿人境内,与先已抵达的拔都兄弟会合。蒙古军很快攻克不里阿儿城,这是座大木城,1223年速不台与者别曾攻打该城,没有取胜。此次攻克后,大肆虏掠,将城焚毁。入冬以后,蒙古军沿伏尔加河而下,居住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玉里伯里山的钦察部首领之子班都察率众归附。另一钦察部首领八赤蛮不肯降,被蒙古军击败后逃至里海一岛上藏身。蒙哥听说后迅速前往,涉水登岛,擒杀八赤蛮,屠其部众。然后蒙哥又攻打了附近的阿速人。

公元1237年秋,拔都召开了一次忽里台,决定诸王共同征伐罗斯。蒙古军首先征服位于伏尔加河丘陵地西北部的莫尔多瓦,进抵梁赞国。他们先向梁赞大公尤里·伊戈列维奇(玉里吉)提出要全体居民缴纳什一税,遭到拒绝。尤里·伊戈列维奇一面派人向邻近其他大公求援,一面派儿子费多尔率领使团带着礼物去见拔都,但是他的努力都失败了。1237年12月16日,蒙古军包围梁赞城。经过六天激战,至第七天城陷。大公被杀,居民有的被杀死,有的被烧死。“一切荡然无存,只剩下烟、焦土与灰烬。”接着,蒙古军队经科洛姆纳和莫斯科绕向弗拉基米尔公国,在科洛姆纳击溃弗拉基米尔大公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军队。当时莫斯科城尚小,居民没有抵抗,仍被屠掠,守城大公也被俘虏。1238年2月3日,蒙古军抵达弗拉基米尔城下,四天后攻陷该城,纵兵大掠,继之以火。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正外出召集军队,整个弗拉基米尔公国很快落到蒙古军手中。3月4日,拔都军队在西齐河上击溃罗斯军队,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战死。次日,蒙古军别部攻占托尔若克。在此期间蒙古军分兵四出,攻陷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戈罗杰茨、尤里也夫、德米特里也夫、沃洛克诸城。

3月中旬,蒙古军向诺夫哥罗德方面前进,但不久因气候转暖、湖泊解冻、道路泥泞,被迫后退。拔都在回路上转向东南,顺路攻打科集尔斯克城。这是个小城,但其军民英勇抵抗,苦战七周后方才陷落。居民被屠杀。由科集尔斯克再向南便进入钦察草原西部。钦察汗忽滩被击溃,带着残部逃往马札儿(匈牙利)境内。拔都军在钦察草原休整一段时间,又返回罗斯,朝第聂伯河推进,灭彼列亚斯拉夫公国。这年冬季,蒙哥、贵由统兵征讨库班河的阿速人,攻阿速都城蔑怯思,三月方克。阿速一部首领杭忽思率众降,蒙哥命其子阿塔赤及阿速军千人从征。

公元1240年夏间,蒙哥率兵来到基辅,据说他对这座城市的美丽与宏伟感到惊奇,不想毁掉此城,派使者入城劝降。基辅人杀死使者,基辅大公米哈伊尔逃往匈牙利。虽然形势危急,罗斯王公们仍不断内讧。斯摩棱斯克的一位王公被请到基辅执政,却被伽里赤公丹尼尔抓走,后者让德米特尔千户镇守基辅。不久,拔都亲率大军围攻基辅。蒙古军用攻城机击破城墙,冲入城内,在教堂附近与居民战斗。德米特尔受伤,城陷后他因表现勇敢被拔都赦免。拔都、速不台、蒙哥、贵由、斡儿答、拜答儿、不里、合丹都参加了攻城战役。此后,贵由、蒙哥便被窝阔台召回蒙古。

公元1241年春,蒙古军继续西进。他们分成两支,一支由拜答儿与速不台子兀良合台等率领侵入波兰(亨烈儿),另一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领侵入匈牙利。当时波兰处于分裂状态,国王无力组织抵抗。拜答儿军于2月渡过维斯瓦河,蹂躏桑多梅日和波兰首都克拉科夫。继而进入西里西亚,渡奥得河,攻西里西亚都城弗洛茨拉夫。西里西亚大公亨利在利格尼茨城集结波兰军、日耳曼兵和条顿骑士团共3万人,准备迎敌。蒙古军在数量和装备上均占优势。4月9日,两军交战于利格尼茨附近的尼斯河平原,波兰

条顿军大败,亨利被杀。传说蒙古士兵在战场计算杀敌数目,从每个尸体上割下一耳,总计装了九大袋。当月蒙军入摩拉维亚,一路焚杀,直到今天的德、捷、波三国交界处。拜答儿又领兵围攻摩拉维亚境内的奥洛穆茨城,城中军民坚守,不克。6月24日夜,城中军民突袭蒙古军营,蒙军不备,损伤较大,拜答儿战歿。蒙军杀战俘祭拜答儿,三日后退围南下,入匈牙利,与拔都大军会合。

拔都军在3月进入匈牙利,兵锋直指匈都城佩斯。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在位已五年,与诸侯、贵族不和。1239年贝拉四世接纳被蒙古击败的钦察汗忽滩数万人入境,他们所过搔扰,激起原有居民怨恨。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削弱了匈牙利的战斗力量。3月12日,当边防将领归报蒙军已入境时,贝拉正在布达城召集诸侯、贵族开会。他立即让与会者各还本地征集军队,自己纠集军队屯驻布达对岸的佩斯城(两城今合称布达佩斯)。蒙军不日至佩斯城下,连续挑战,贝拉坚守不出。这时居民见蒙古军中有不少钦察人,怀疑忽滩与蒙古军同谋,招之来匈牙利,便杀忽滩及其左右人员。各地农民闻讯,纷纷杀钦察人,钦察人也杀匈牙利人为忽滩复仇,国中大乱。贝拉原来指望钦察人组成军队与蒙军作战,至此希望全部落空。4月,各地援军稍至,贝拉率兵出战,蒙军后退至撒岳河东。贝拉营于河西,附近有桥,以为蒙军只能过桥来袭,派千人守桥。4月10日夜间,速不台在下游结筏偷渡,绕至贝拉军营后方,拔都率诸王先从上流涉浅滩过河,置七炮攻桥,黎明,匈军发现被围,士兵丧失斗志,竞相夺路而走。蒙古兵在后追逐,杀敌无数,在速不台率领下乘胜攻拔佩斯城,尽杀居民,纵火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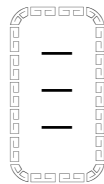
公元1241年夏秋间,蒙古军队仍在多瑙河东面匈牙利平原驻扎,休养兵马,时而外出抄掠。8月,一支蒙古军进至维也纳新城附近,当时城中仅有戍兵50、弩手20。奥地利公和波希米亚王等合兵来御,蒙古兵退走。12月,拔都率军踏冰过多瑙河,于圣诞节攻取匈牙利另一大城格兰。1242年初,派合丹领一军追逐匈牙利王贝拉。贝拉先逃到奥地利,维也纳公弗里德里希二世起初伪装欢迎,很快就乘人之危多方逼迫贝拉。贝拉携家属出走克罗地亚境内的萨格勒布,最后逃入亚得里亚海边岛上。合丹军一边追赶,一边沿途抄掠,于3月间屯驻海边,守望贝拉所栖小岛。不久,进兵达尔马提高地,取道塞尔维亚,与拔都军会合。此时窝阔台去世的消息已经传到,拔都正准备东返。他们在高加索山北部驻扎数月,因钦察人又起来反抗蒙古统治,攻拔都之弟升豁儿,需出兵镇压。1243年初,拔都大军回到伏尔加河下游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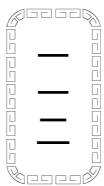
这次西征的结果,是在钦察草原及其邻近地区的辽阔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大国,它在中亚史料中称为术赤兀鲁思或钦察汗国,在俄罗斯编年史中称为金帐汗国。

忽必烈进攻南宋和统一吐蕃大理

蒙宋联合灭金后,蒙古却没有实现将河南地归宋的诺言,反而迫使宋朝将陈州、蔡州西北的大片土地归蒙古占有。蒙宋开始对峙。历史又开始重演了:100多年前,当女真进攻辽朝时,约北宋联合灭辽,结果辽被灭后女真大举进攻北宋;现在蒙宋联合灭金后,蒙古又大举进攻南宋。

这时的南宋政权,已经腐朽到极点。宋理宗赵昀在位达40年(1225—1264年)之





久。他先后重用权臣史弥远、史嵩之、董宋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人，这伙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依然过着纸醉金迷、腐化挥霍的生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情景，有增无减。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不是加强国防、坚决抵抗，而是束手无策、和战不定，把希望寄托在委屈求和、敌人自动退兵上。所以蒙宋 40 年战争，南宋一直被动挨打，直到灭亡。

1251 年，蒙哥即大汗位。开始作进攻南宋的新的部署。由于四川宋军防守严密，蒙古军队不敢轻易进攻。因而采取了绕道吐蕃，进攻云南的大理，然后南北合兵进攻南宋的战略。1252 年蒙哥之弟忽必烈、老将速不台子兀良哈台奉命出征。1253 年秋，忽必烈取道吐蕃向大理进发。当时吐蕃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蒙古强大起来后，还在灭西夏之前，有的吐蕃地方势力就已向蒙古表示臣服。后来，窝阔台派阔端和掌握吐蕃地方实权的萨斯迦派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达成协议，吐蕃正式接受蒙古大汗规定的各项制度。忽必烈入藏后，击败了反抗的吐蕃军队，吐蕃归于统一。

1253 年 10 月，忽必烈和兀良哈台率军进入大理境，在金沙江附近降服了大理以北的么些蛮各部，酋长唆火脱因、塔里马等投降。忽必烈遣使入大理招降，使臣被杀。大理是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 年）白蛮的首领段思平所建，辖今云南全境及四川西南境，当时的国王是段兴智，大权操于高祥、高和兄弟之手，忽必烈的使臣就是被高祥杀死的。1253 年 12 月，忽必烈攻占大理城，段兴智逃奔善阐（今云南昆明），高祥逃奔姚州（今云南姚安），蒙古军追至姚州，杀高祥。忽必烈留兀良哈台继续平定大理国境的未征服各部，自己返回蒙古。兀良哈台攻占善阐，获段兴智。自 1254 年至 1256 年，兀良哈台先后平定了乌蛮、白蛮、罗罗、金齿、白衣等部，大理国八府四郡皆附。

1258 年初，蒙哥再次发动三路大军进攻南宋。他自率主力军进入四川，命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又命兀良哈台从云南北上攻潭州（今湖南湘潭），然后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准备三路军会师后同时东进，直抵临安，灭亡南宋。

蒙哥先派纽璘占领成都，自率大军攻下利州（今四川广元）及其附近地方，然后沿嘉陵江南下，准备进攻重庆。1258 年底，蒙古军到达合州。合州在嘉陵江东岸，地势险要，是重庆的北边门户。合州宋将王坚调集 17 万人增筑钓鱼城御敌，军民抗蒙情绪高涨。1259 年春，蒙宋双方在合州及其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蒙国始终未能攻破钓鱼城。入夏后，天气炎热，疾病流行，被阻在合州城外的蒙古军病倒很多。七月，蒙古军围合州，先锋汪德臣差一点被炮石击中，回营后得病死去。随后，蒙哥等率大军攻城，宋军发炮石，蒙哥被击中负重伤，回营后终因伤势严重，死于军中。大汗一死，蒙古军只好撤退。

忽必烈一路于 1259 年 8 月渡淮河，入大胜关，抵黄陂（今湖北黄陂北），向鄂州推进。九月，蒙哥死讯传来，忽必烈企图攻下鄂州后再北上夺取汗位，因而攻城更加激烈。由于南宋援兵来到，忽必烈一直未能得手。12 月，在汉阳声援鄂州的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向忽必烈求和。这时，忽必烈已得知其弟阿里不哥准备在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即大汗位，于是便采纳谋臣郝经计，匆匆与贾似道签订密约，双方以长江为界，南宋每年献银 20 万两、绢 20 万匹给蒙古。然后，急速撤兵北上争夺汗位。

兀良哈台一支军队到达潭州后，因南宋军民奋战抵抗，未能攻下，兀良哈台便绕道北上与忽必烈会师。

忽必烈夺取汗位

1259年7月,蒙哥在合州钓鱼城战死后,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守旧派和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汉法”派,都积极活动起来,准备夺取汗位。

阿里不哥是拖雷的第七个儿子,蒙哥即汗位后,命阿里不哥留守都城和林。阿里不哥长期在蒙古本土,与外界接触不多,特别对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了解甚少。后来,以他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墨守蒙古成规的保守集团,他们主张维持蒙古原来的统治方式,反对采用中原地区原有的封建统治方式。

忽必烈是拖雷第四个儿子,他很早就结识了一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像信佛崇儒的刘秉忠,熟读孔孟之道的张文谦、王鹗等,都是忽必烈十分信任的。他们把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蒙哥即位后,以漠南汉地委托给忽必烈来管理,从此忽必烈与各族地主阶级进一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他一方面继续网罗人才,像杨惟中、姚枢、郝经、王文统等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都纷纷前来投靠。这些人都是忽必烈的谋士,对忽必烈影响很大。刘秉忠对忽必烈说:“今天谁能重用士大夫,又能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就能当中国的皇帝!”这对抱有统治全中国愿望的忽必烈无疑是极大的启发,因此,像官吏的任用、对南宋的作战方略、经济政策、屯田措施等事,甚至后来的夺取汗位,建立元朝,几乎都出自这些人的策划。除了汉族地主分子外,忽必烈对其他各族上层人物也是加以争取的,像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畏兀儿人廉希宪、西夏人高智耀等接受汉文化很深的一些人也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另一方面,忽必烈为了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采取了拉拢、利用北方地主武装的方针。忽必烈联合汉族和其他各族地主阶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学会统治汉地的方法。因此,在忽必烈夺取汗位之前的10多年间,他已跳出了蒙古“黄金家族”的小圈子,逐渐成为懂得汉法、决心抛弃蒙古旧法的新的封建统治者。忽必烈是蒙汉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

忽必烈不仅为自己夺取政权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还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他主持漠南汉地后,十分注意招抚流亡的人民,大搞屯田积粮,并采取整顿财政等措施。早在1252年,忽必烈就已在河南的唐、邓等州实行屯田,后来又在陕西凤翔等地屯田,这样就使他掌握了大量军粮。忽必烈又立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忽必烈完全控制了蒙古国的财政大权。

1256年三月,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东北、滦河北岸的龙岗,营建营室、房屋,三年后建成,称开平府。在这里聚集了忽必烈的一批重要谋士,成为忽必烈集团的根据地。

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和他的支持者立即采取夺位措施。他命令脱里赤为断事官,占据燕京,号令各方面;又命令各地军队听从调度,由阿兰答儿纠集漠北各地军队,脱里赤纠集漠南各地军队,形成对开平的包围势态。阿里不哥企图先发制人,迫使忽必烈就范。

忽必烈这时还在围攻鄂州,蒙哥死讯传来后,他召集诸将、诸谋士研究蒙哥死后的形势和对付阿里不哥的策略。这时郝经提出了如下建议:一面遣军去迎接蒙哥的灵车,

接收大汗的宝玺，一面赶快与南宋贾似道议和，签订密约，迅速撤军，派轻骑兵赶到燕京，防止阿里不哥的势力南下。忽必烈采纳了此计。1260年三月，忽必烈抵达开平，诸王合丹、阿只吉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等率东道诸王，会集开平。他们都是忽必烈的支持者。忽必烈废弃了贵族选汗的旧制，宣布即位。并定当年为中统元年，开始建元纪岁。

同年四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宣布为大汗。支持他的除阿兰答儿、脱里赤等外，还有窝阔台后王阿速带、玉龙答失、昔里吉，察哈台后王阿鲁忽，旭烈兀子出木哈赤等。

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双方为争夺地盘开始了第一个回合的争斗。阿里不哥命霍鲁海、刘太平等去陕、甘地区任职，忽必烈则命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双方发生冲突，廉希宪擒霍鲁海，杀刘太平等，忽必烈控制了陕甘地区。阿里不哥又派遣阿兰答儿南下联合浑都海作乱。但两人均被忽必烈的军队所杀。

1260年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闻讯后不敢抵抗，逃至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忽必烈占领和林，命亦孙哥驻守，自回开平。1261年秋，阿里不哥至和林，伪装愿意归顺，却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占领和林，并南下骚扰，被忽必烈击败。由于阿里不哥多次战败，支持他的诸王纷纷向忽必烈投降，加上连年饥荒，阿里不哥不得不于1264年向忽必烈投降。经过四年的战争，阿里不哥的分裂势力终于被消灭，漠北和中原地区重新恢复统一。忽必烈战败阿里不哥后，取消和林为蒙古国的都城，改设宣慰司都元帅府。

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胜利，从本质上来说，是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法”派战胜了守旧派，这对于蒙古国最后完成封建化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南宋灭亡

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降蒙宋将刘整向忽必烈提出灭宋方略，当“先攻襄阳”，并指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如果置南宋而不问，是“自弃正统”，更坚定了忽必烈消灭南宋的决心。次年九月，命刘整前往襄阳地区，协同蒙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襄、樊军民从此开始了历时五六年，关系到南宋政局命运的襄、樊保卫战。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都统范天顺自杀，统制牛富率领将士进行巷战，渴饮血水，继续战斗，杀死不少元兵，牛富身负重伤后赴火自尽。二月，襄阳宋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从此元军得以长驱顺江东下。

襄、樊失守，南宋朝野震动。以贾似道为首的南宋反动统治者，拒绝了一切抗元救亡的建议，置南宋王朝的安危于不顾，文过饰非，依然歌舞升平，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宋度宗死，贾似道立了一个4岁的小孩赵□为皇帝。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自襄阳南侵，抗元名将张世杰所在的郢州首当其冲。在郢州军民的奋勇抗击下，伯颜所统的元军主力被阻击在郢州城下，决定越过郢州，继续南下。元军到达长江边的阳罗堡，南宋军民在王达的率领下奋勇抵抗，元军进攻多日

仍未能攻占,于是分兵从上游 40 里的青山矶强渡,接着阳罗堡也被元军攻占,宋将王达、刘成以及 8000 将士英勇战死。元军渡江后,鄂州就向元军投降,伯颜遂率元军主力东下,直奔临安,沿途宋军纷纷投降。

德祐二年(1276 年)正月,元军游骑已到临安北关,文天祥、张世杰请太皇太后、皇帝等逃到东海上,由他们率领临安军民背城一战,又为陈宜中等所反对。正月十八日太皇太后谢道清与宰相陈宜中派使臣送出传国玺和投降书,向元军投降,陈宜中随即逃走。次日,太皇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实际上是要他接洽投降事宜。文天祥与其他执政官前往元军营谈判时,却还梦想保存宋王朝,被伯颜扣押。三月,伯颜入临安,皇太后和小皇帝赵□被送往大都(今北京),太皇太后谢道清因病暂留杭州,以后也被解往大都。临安朝廷虽然投降,但是,南宋军民在文天祥、张世杰和陆秀夫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战。

德祐二年(1276 年)二月,伯颜率元军进入临安的前夕,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从临安逃往婺州(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赵昰被奉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随后南下福州。五月一日,赵昰即位(宋端宗)并改元景炎,陈宜中被任为左丞相兼都督,尚在江北扬州抗元的李庭芝为右丞相,著名的抗元将领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重新建立南宋政权。

文天祥被扣留在元营中,拒绝投降后被押解北上,到镇江时,文天祥历尽艰险逃到江北的通州(江苏南通),又从那里出海南下,四月底到台州,五月下旬到福州后,被任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他提出回温州,组织水军,由海道收复两浙,为陈宜中所阻。由于和陈宜中议论不合,七月以同都督的身份外出组织军民抗元,但是由于文天祥所组织的人民武装,缺乏经验与训练,被元将李恒所部击溃,文天祥的妻子被俘,由于部将赵时赏冒充文天祥,迷惑了元军,文天祥才得脱身,赵时赏后被元军杀害。

文天祥收拾残兵奔循州,驻南岭(广东永安东南)时,又将企图投降的黎贵达斩首,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

这时,11 岁的宋端宗已于景炎三年(1278 年)四月中旬病死,8 岁的赵昺即位为新皇帝并改元祥兴,左丞相陈宜中看到形势越来越恶化,再次逃跑了。朝政由张世杰和陆秀夫主持。张世杰派兵进攻雷州失利后,就从硃州移到崖山。

文天祥和南宋朝廷联系上以后,继续组织军民抗元,十一月进屯潮阳,讨伐叛徒陈懿、赵兴。陈懿逃走,赵兴被捉并被处死。十二月往南岭,旧部邹洵、刘子俊又起兵从江西来会,兵势稍振,但是,由于叛徒陈懿的引导,在五坡岭上,文天祥和部属被元军俘虏。

至此,只剩下张世杰、陆秀夫领导的一支有组织的抗元力量,他们决心守崖山,与元军决一死战,全体人员都上了海船,1000 多条海船结成了水上的堡垒,自正月中旬起战斗了 20 多天,由于淡水道被元军切断,宋军吃了 10 多天的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宋军大困。张世杰仍率领苏刘义、方兴等宋军将士与元军大战,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招降,决心抗战到底。祥兴二年(1279 年)二月初六日(3 月 19 日),元、宋两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宋军战败,宰相陆秀夫眼看要被元军俘虏,就背起 9 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张世杰、苏刘义等冲出重围后,又回军进攻元军,战败后退走,但船为大风所坏,溺水而死。南宋政权彻底灭亡。

元朝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4),契丹人,其八世祖突欲,即辽朝开国帝王阿保机的长子,曾封东丹王。耶律楚材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兼通天文、地理、医卜、释老诸学,并晓音律,工书画,多才多艺。初仕金朝,后归附成吉思汗,先后辅佐成吉思汗与窝阔台30余年,长期任中书令,是位治世良相。蒙古帝国初创,政体、法令、制度等一切皆不完善,有赖耶律楚材为之一一擘划,始有规模,从而促进了蒙古帝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蒙古人的传统生产方式是放牧牛羊,娴于畜牧而疏于农耕。公元1229年窝阔台刚即位,大臣别迭等人就献策说:“汉人对国家毫无用处,不如统统赶走,将其耕田变成草原,让我们的百姓去放牧!”耶律楚材深知废耕为牧是误国之道,遂向窝阔台提议说:“陛下将南向伐金,兵费之需甚为可观,这从何而出呢?臣估算,如向汉民征收赋税,岁可得银50万两,帛8万匹,粟40万石,可足兵用。何以说汉人无补于国呢?”

窝阔台将信将疑,就说:“卿且为朕先试试吧!”

两年后,窝阔台有事于云中(今山西大同市),耶律楚材所设燕京等十路课税使皆呈送来岁贡簿籍,所征得金银粟帛与原奏比比皆符。窝阔台看了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卿不离朕左右,却能使国家财用充足,南国大臣还有象你这么能干的吗?”窝阔台亲用大觥为耶律楚材酌酒,以示嘉奖。

蒙古帝国原来是以掠夺奴隶用以放牧牛羊为其经济基础的,为此,始重农耕,建立起赋税制度。

蒙古铁骑,骠悍而野蛮,以嗜杀著称,征人城郭,稍遇抵抗,即屠戮全城,以致“血流有声”,鲜有子遗。公元1232年,大将速不台率兵攻金朝都城汴京,相持日久,伤亡惨重,遂奏请城破之日,尽屠汴人。耶律楚材得知,立即谏止,指出征战的目的在于获得土地与人民,若得地而无民,地亦无用。窝阔台遂下令:“只罪金朝皇室,其余一概不准擅杀。”汴京城中百姓147万余人,因此得以活命。

蒙古悍兵的屠城恶习并未从此中止,但这些草原的统治者已开始象封建君王一样注意去占有土地和人民了。

蒙古立国之初,成吉思汗曾依世代相传的习惯形成法典,但很不完善。耶律楚材在健全蒙古帝国的法制方面颇为尽力。他曾提出十八项建议,诸如非奉玺书,州县不得妄自征发,死囚,亦得奏准方可行刑等等。但是,蒙古权贵多仗势恃宠,为所欲为,违法乱纪。耶律楚材则绳之以法,严惩不贷。

有一次,耶律楚材秉公审理了一案,拘系了皇帝的一个宠臣。窝阔台大怒,竟把耶

律楚材也绑了起来,可细思之,又觉不妥,便传旨释放,事情本可就此了结,耶律楚材却偏偏强项,不肯释缚。说道:“老臣备位公卿,辅佐陛下,陛下传旨系臣,想必是臣有罪。有罪则应处之以法,明示百官,令人皆知罪在不赦。现在,陛下又释臣,那想必是臣无罪。无罪何以要系?有罪何以又赦?如此轻易反复,如同儿戏。若处置天下大政,难道也这么办吗?”

耶律楚材义正辞严,抗争有据。在场群臣听了都不禁大惊失色,为其出言无状捏一把汗。窝阔台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朕虽贵为天子,难道就没有错误吗?”

耶律楚材执法,敢于严惩不法权贵,硬是逼着忽视法制的帝王低下了高贵的头,不愧是治天下的良才。

蒙古王朝中相互抵牾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就这样随着岁月的推移,彼消而此长。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历60余年方才完成。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第四个儿子,于1260年自立为帝。11年后,建国号为大元。“大元”取义于中国的哲学古籍《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语。这话的大意是:“伟大的天啊,万物的本元!”元的意思是物之所本,事之所始,与“原”字义通。

正是以忽必烈建大元为始,蒙古王朝亦被称作元朝,这标志着蒙古人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权。同时,蒙古王朝终于弃旧俗,取汉法,从奴隶制跨入了封建制时代。

海都之乱

中统建元和平定阿里不哥后,守旧的蒙古贵族对忽必烈推行“汉法”依然强烈反对。西北藩王遣使到朝廷来,气势汹汹地责问忽必烈:“蒙古风俗制度与汉法素不相同,现在你竟留居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全都遵用汉法,到底是什么原因?”因此,守旧与推行汉法的矛盾,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越来越尖锐。

阿里不哥投降后,守旧的藩王以争夺汗位的名义,继续发动叛乱。其中以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的势力最大,叛乱的时间也最长。

海都以其父合失未能承袭汗位,即自己要求袭汗位为由,一直心怀不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好等待时机。当阿里不哥在和林称大汗并发动叛乱时,他竭力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后,海都即返还其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东南)的封地,勾结术赤后裔诸王,占有窝阔台汗国封地,组织叛军,时时企图南下。忽必烈为了阻止海都势力的扩张,册封八剌为察哈台汗国之汗,以争取察哈台汗国服从中央夹击海都。察哈台汗国军队在锡尔河击败海都,海都又求助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击败八剌。后来,海都请窝阔台孙乞卜察克调解,双方结盟,海都势力反而伸展到察哈台汗国境内。八剌死后,海都于1272年(至元九年)立八剌子笃哇为汗。海都与笃哇勾结在一起,在西北地区不断进行骚扰。

1275年(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率诸王镇守西北,蒙哥子昔里吉、诸王脱脱木等随行。那木罕驻守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脱脱木是成吉思汗弟帖木格斡赤斤的后裔,与忽必烈一直不和,蓄谋叛乱已久。1277年(至元十四年),脱

脱木勾结阿里不哥子药木忽儿、察哈台子撒儿班等，劫持北平王那木罕，立昔里吉为帝，率叛军进攻和林。忽必烈急命正在进攻南宋的主帅伯颜率土土哈等北征。伯颜用断绝粮道的办法阻困聚集在鄂尔浑河的诸叛王。土土哈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两次大捷。1278年（至元十五年），昔里吉败走也儿的石河，叛军内讧，脱脱木又立撒儿班为帝，药不忽儿不服，执送脱脱木至昔里吉处，脱脱木被杀。撒儿班又执昔里吉押送至忽必烈处，忽必烈将昔里吉流放至海南岛，后来死于该地。

在昔里吉等发动叛乱时，海都又乘机占领阿力麻里，骚扰天山南北。忽必烈特置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派兵戍守。

为了防止西北藩王的叛乱势力与东北藩王的叛乱势力相联结，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改山北辽东道宣慰司为东京行省，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早与海都有勾结的帖木格斡赤斤的后裔乃颜，立即纠集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后裔哈丹等发动叛乱。海都闻讯后，答允率10万军队前来汇合。忽必烈一面让伯颜驻军和林，阻止海都东来，一面率军镇压乃颜。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乃颜被俘，忽必烈将其处死。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命皇孙铁木耳率军镇压哈丹，哈丹逃至高丽。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在高丽军民的配合进攻下，哈丹兵败自杀。

忽必烈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置辽阳行省统辖各路，并在叛王封地内设万户府。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藩王的权力，巩固了东北地区的统一。

正当忽必烈镇压东北叛乱诸王时，海都、笃哇等气焰更加嚣张了。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七十四岁高龄的忽必烈决定再次亲征。海都得知忽必烈亲征，急忙逃遁。忽必烈仍命伯颜负责西北军事。到忽必烈去世前，海都的势力已被逐出金山之外，平定西北叛王的战争基本上取得了胜利。

忽必烈在位三十多年中，与分裂割据势力和叛乱势力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通过在军事上对叛乱势力的坚决镇压，对巩固元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族分化

元朝统治集团是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还有色目等各族的上层统治者，而被统治的人民，则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蒙古族下层农牧民在内的各族人民，他们遭受着残酷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蒙古贵族统治者在借鉴金朝所推行的民族分化政策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将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而且在选任官吏、法律诉讼、科举条例、名额和待遇等方面，均有一系列不平等的规定。

从民族成份上看，各等人中包括若干族、部、种。蒙古族为第一等，系元朝的“国姓”。据拉拖特《史集·部族志》载，蒙古人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与成吉思汗皇室出于共同祖先的尼鲁温蒙古人，有泰赤乌、兀鲁、忙兀、札只刺等20余部；其二是被称为迭列列斤的蒙古人（指一般蒙古人），有兀良哈、弘吉刺、伯牙兀等10余部。此外，札刺亦儿、塔塔儿、蔑儿乞、斡亦刺、八剌忽、克烈等部，在元代也被看作蒙古人。但在陶宗仪《辍耕录·氏族》中记有蒙古氏族72种（当然，其中有18种是相互重出，钱大昕在《元史氏族表》中已指出）。

色目人为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包括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据《辍耕录·氏族》称有31种,诸如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畏兀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其中也有同名重见,异译并存之误)。据《元典章·刑部》载,大德八年(1304)规定,除汉儿、高丽、蛮子外,俱系色目人。这些色目人多属于西北地区各族,还有些是属于中亚等地。成吉思汗征扩张领土之后,将所占领的广大地区分封其诸子。长子术赤的封地为钦察汗国(也译金帐汗国),据有花刺子模和康里国故地,领有今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的地区。其子拔都西征,又扩大了领地,曾在伏尔加河下游建都萨莱城。次子察合台初领有西辽河之间的地区,称察合台汗国。初建都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则以叶密立和霍博两地为中心,包括新疆准噶尔盆地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称窝阔台汗国,建都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而幼子拖雷按照蒙古幼子守产的习俗,主要领有蒙古本土。

汉人(也称汉儿、乞塔、札忽歹)为第三等,一般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东北的高丽人也属此等。据陶宗仪《辍耕录》载,汉人有8种,即契以利用汉人压制南人,以便分而治之。

南人(也称蛮人、囊加歹、新附人)为第四等,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各族,大部分为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元统治者根据被征服的先后将汉人分为两等,以利用汉人压制南人,以便分而治之。

上述四等人在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蒙古贵族居最高统治地位,享有很多特权,色目人中上层分子则是被蒙古统治者利用为帮手,对各族人民进行压迫,故他们的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贵族,而高于汉人和南人,汉人中少数官僚地主在元朝被笼络利用,而其余广大人民与南人同样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南人在四等人中处于最末等,其地位还不如汉人,就连充任官吏的南人在与汉人出身的官吏发生争执时,也要忍气吞声。可见,元朝推行四等人制,蒙古、色目贵族利用民族压迫政策欺凌汉人、南人,广大汉人、南人劳动者更处在最受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之下。不过,也应指出,蒙古统治者实行这种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政策,只是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并没有给广大蒙古劳动人民带来好处。

阿合马、桑哥事件

忽必烈统治的30多年,是从连年不断的战争向全国安定过渡的时代。诸王叛乱、南下灭宋、镇压反元武装起义,迫切需要军饷;百废待兴、恢复封建经济,迫切需要金钱。因此,谁善于理财,谁就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忽必烈时期主要帮助他管理财政的是花刺子模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和畏兀儿人桑哥。他们三人在旧史书里是大大有名的奸臣,其实他们做的事未必每件都是坏事,在理财上他们都有一套本领,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忽必烈是办不成这许多大事的。正因为忽必烈宠信他们,他们自以为理财有了功,就居功自傲、专权不法,干了不少坏事,引起了统治集团中其他人的不满,最后遭到杀头的下场。

1262年(中统三年),阿合马任诸路都转运使,专理财政,他在钧州(今河南省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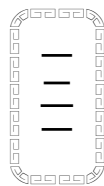
县)徐州(今江苏徐州)兴办了炼铁业,每年产铁103.7万斤,铸成农器20万件,换成官粮4万石;又因太原私盐盛行,盐课收入大减,他大大增加了当地赋税,不论僧道军民户,一律不得免税,于是收入大增。这两件事办成后,忽必烈非常高兴,升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从此,阿合马深受忽必烈宠爱,日益骄横,连中书右丞相安童也不放在他眼里,左丞相史天泽等也常被 he 弄得很窘。他还让他的儿子忽辛当大都路总管,又通过中书省,安插自己的亲信任要职。还依仗自己的理财特权,派人经商,从中获得巨额财富。1278年(至元十五年)中书左丞崔斌上书,揭露阿合马任用亲信,一家身居要职等罪,忽必烈罢了阿合马子侄们的职务,但仍对阿合马十分信任,并认为他有当宰相的才能。1280年(至元十七年),阿合马以清理江淮钱谷的名义,打击诬陷异己。当时崔斌已调任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马乘机诬陷他与江淮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等盗官粮40万、擅自更换朝廷任命的官员800人,将其加以杀害。皇太子真金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派人去制止,竟来不及了。

阿合马搜刮钱财,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大失人心。1282年(至元十九年)3月,益都千户王著秘密铸造了一个大铜锤,准备击杀阿合马。这时正好忽必烈和皇太子到上都去了,阿合马留守大都。王著知道皇太子很痛恨阿合马,就伪装皇太子返京作佛事并假传太子命令,命阿合马等中书省臣来见,当阿合马来迎接假太子时,王著对他加以痛斥,并用铜锤把他打死了。王著被捕处死,临刑时高呼:“王著为天下除害,现在虽然死了,日后必有人将我载上史册!”后来忽必烈知道了阿合马的罪恶,下令剖棺戮尸,他的死党和忽辛等4个儿子都被杀。

阿合马死后,朝廷里没有人再敢言及理财的事了。总制院使桑哥推荐卢世荣到朝廷来理财,忽必烈任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上任后提出改革钞法、制定市舶条例、将没收来的各地权豪私造的铁器卖掉以充实常平仓、官营酿酒、于上都等地收购羊马选蒙古人放牧、选拔阿合马原来任用过的一些理财能手等一系列主张,忽必烈一一采纳。卢世荣得宠后,引起了一批官僚的反对,纷纷上奏弹劾,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杀了。其实卢世荣被杀是有点冤枉的,他的理财措施有不少还是可取的,只是因为触犯了

不少富豪、官僚、贵族的利益,在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很深的情况下做了牺牲品。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卢世荣死后不久,忽必烈起用桑哥理财,第二年任命为平章政事。他更改钞法,发行至元钞,解决了朝廷的财政危机,于是声名大著,升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接着,又清理江南六省钱谷,增加江南赋税和盐酒醋税,大大加重了剥削,引起了天下骚动。他的权势非常大,一些阿谀逢迎之徒,特地为他立了德政碑。桑哥更加跋扈,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意调动内外官员,官爵刑赏全凭钱买和贿赂,引起了一批朝臣的反对,纷纷上奏弹劾。当时百姓失业,起义烽火连年不断,忽必烈深感事态严重,为缓和社会矛盾,于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把桑哥杀了。在抄家时发现桑哥收藏的珍宝至少有宫廷里的一半那么多。

忽必烈统治时期发生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事件,牵涉面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它反映了元朝初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很尖锐的,也是很残酷的。



南坡之变

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后,他的儿子铁穆耳继位,就是成宗。成宗在位12年,《元史》说他“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成宗死后,他的两个侄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相继嗣位,就是武宗和仁宗。后来仁宗的儿子硕德八剌即位,就是英宗。到英宗统治时期,元朝皇室内部的矛盾再次尖锐化,爆发了著名的南坡之变。

自从忽必烈建立元朝,推行“汉法”以来,蒙古贵族内部的保守势力总是千方百计要加以阻挠和破坏。但是,推行“汉法”以适应中原地区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需要。因此,主张行汉法的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总是时暗时明地进行着斗争。英宗即位后这种矛盾又逐渐突出起来。

当武宗取得帝位后,武宗和仁宗兄弟之间曾达成协议,兄终弟及、叔侄相承。武宗死了,仁宗即位;仁宗死了,武宗的儿子即位。但仁宗即位后,右丞相铁木迭儿为了取得皇帝的欢心,勾结太后答己,废武宗子和世㻋,改立仁宗子硕德八剌为太子。他们满以为硕德八剌年幼无知,易于控制。然而,硕德八剌却是一个自幼就接受儒学很深、熟读汉儒著作的蒙古贵族,与答己、铁木迭儿的政治主张很不一致。仁宗死后,英宗硕德八剌即位,答己十分懊悔。为了巩固她的地位,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次任命因侵吞田地牧场贪赃枉法而被仁宗罢官的铁木迭儿为右丞相,诛杀和罢免反对过铁木迭儿的一批官吏,幕后指挥失烈门等搞废立阴谋;……英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任命功臣木华黎的后代、有“蒙古儒者”之称的拜住为左丞相;千方百计限制铁木迭儿的权力;……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两派的斗争日益尖锐。

双方矛盾正在进一步发展时,铁木迭儿和答己太后都在1322年(至治二年)相继死去,御史大夫铁失成了这一派在朝中的代表,但力量已大不如前了。这时水旱灾荒连年发生,各族人民不断起义,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英宗深深感到再不调整原有的统治政策,将会发生统治危机。他在拜住的协助下实施了一系列新政:

任用大批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如张珪、虞集、吴元珪、王约等都得到了重用。他还颁布《振举台纲制》,提倡“举善荐贤”,到处搜罗人才。

罢冗官,使大批依靠特权获得肥缺的蒙古色目官僚失去官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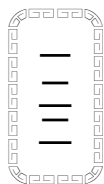
推行“助役法”,规定拥田百亩者以三亩入官,作为补偿一般农民徭役的助役费,使豪家大姓稍有损失;

减轻徭役,减免赋税;

颁布《大元通制》,把这些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英宗是比较有作为的元朝皇帝,这些措施对于扩大元朝统治基础、适应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多少是有些好处的。但由于这些措施触犯了一部分蒙古贵族的利益,因而也遭到他们的拼死反对。

1323年(至治三年),英宗下令追查铁木迭儿的贪污案,处死了一批有牵连的官吏,同时追夺铁木迭儿官爵,抄没其家资。这使铁木迭儿的余党铁失十分恐慌,于是串连了一批诸王贵族,于1323年8月5日夜,当英宗自上都南返大都,途经上都以南30里的



南坡店时 ,刺杀了英宗和拜住。这就是“南坡之变”。

英宗被刺后 ,铁失等拥立在漠北高原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忽必烈孙子甘麻刺之子)为帝 ,即泰定帝。

泰定帝即位后 ,先是加封拥立他的人官爵 ,但是只过了 30 多天 ,他为了维护皇权的尊严 ,对“大逆不道”的铁失、也先帖木儿等一概加以诛杀。

白莲教的活动

白莲教最初称白莲社 ,是公元 5 世纪初出现的 ,它来源于佛教的净土宗 ,供养的是阿弥陀佛 ,他代表光明 ,就是“明王” 。这种宗教劝人念佛修行 ,多做好事 ,死后便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到 12 世纪前期 ,又加进了天台宗的格言 ,忌葱乳、不杀、不饮酒 ,发展成为白莲教。金末、南宋时 ,全国都有白莲教。佛教净土宗的另一派叫弥勒教。弥勒教信奉弥勒佛。据佛教传说 ,弥勒曾是一个对百姓慈爱的好国王 ,后来在释迦牟尼旁边听法 ,释迦牟尼灭度(死)后 56.7 亿年 ,弥勒下降人世而成佛。据说 ,释迦牟尼死后 ,世界变坏了 ,气候变坏了 ,庄稼变坏了 ,人心也变坏了。幸亏释迦牟尼在灭度前留下遗言 :再过若干年 ,弥勒佛出世了 ,等弥勒佛下生 ,世界立刻变样子 ,到处有宽阔、干净的土地 ,青山绿水 ,满地铺着金沙 ,还有各种无名的宝贝 ,人心也变好了 ,寿命也长了 ,人口增加了 ,城市富庶了 ,稻麦播一次种子有七次收成……弥勒教相信世界上有明和暗、好和坏两种力量 ,斗争到最后 ,明和好将取得胜利。

除了白莲教、弥勒教外 ,民间的秘密宗教还有摩尼教等。北宋方腊起义 ,南宋钟相、杨么起义都曾利用过摩尼教。但到元朝时 ,摩尼教的势力渐渐减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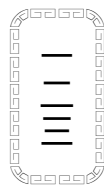
白莲教和弥勒教的教义给贫苦的农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 ,他们一经信教 ,就坚信不移、虔诚地等待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因此 ,不少农民领袖就利用这种宗教来鼓动农民起来反抗当时的政权。元朝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扶箕诗》:

天遣魔军杀不平 ,不平人杀不平人 ,
不平人杀不平者 ,杀尽不平方太平。

《扶箕诗》是宗教活动时歌唱的 ,这首诗尽管含意不十分清楚 ,但它充满着对“不平”的憎恨 ,渴望实现“太平” ,并且鼓动人们去“杀尽不平” ,因此对那些在痛苦中生活的教徒无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元朝时白莲教的势力在民间占了上风。元朝初年 ,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曾利用五公符、推背图、血盆等迷信工具发动过武装起义。后来这种类似的起义也多次发生。所以在 1308 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时白莲教就被元朝政府取缔了 ,祠庙也被捣毁。到元仁宗时 ,白莲教又公开活动 ,但不少白莲教主成为元朝统治的拥护者 ,只有民间秘密活动的白莲教还继续从事反元活动。

元朝末年时 ,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的秘密宗教组织 ,他们的领导人就是著名的农民领袖韩山童和彭莹玉。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他祖父是一个教书先生,人称韩学究,在栾州一带宣传白莲教,烧香聚众,大约在元武宗取缔白莲教时,勒令他迁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到韩山童继为白莲教主时,他的教徒更多了,在河南、江淮一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周围还有一批像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忠实信徒。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韩山童等加紧了宣传组织工作,用“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等宗教迷信来吸引群众,鼓动武装起义,把斗争矛盾引向元朝统治者。

彭莹玉(又叫彭翼、彭和尚、彭祖,敌人叫他“妖彭”)是南方白莲教领袖。他出身在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东村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1338年(至元四年)彭莹玉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周子旺被捕牺牲,他的妻、子也被杀。彭莹玉只身逃到淮西。元朝政府拚命搜捕,但江淮一带的老百姓早就听说彭莹玉的大名,都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因此官府总是不能抓获他。彭莹玉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埋头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元末大起义爆发前,他的徒弟已经布满在江淮一带,其中邹普胜在江汉流域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形成了一个中心,赵普胜、李普胜等在江淮一带也形成了一个中心。总之,由于彭莹玉的辛勤活动,大江南北已经布下了起义的种子,为日后南方红巾军的爆发作好了准备。

挑动黄河天下反

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是元朝末年民间流传的一阕《醉太平小令》。它深刻地暴露了元末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使民众纷纷组织起义。当时北方的韩山童、刘福通和南方的彭莹玉都是以摩尼教(又称明教)、弥勒教和白莲教等宗教组织形式进行起义的宣传活动。他们宣传明王即将出世,弥勒佛快要降生,黑暗很快就会过去,世界就要大变样的舆论。恰好至正三年(1343年)黄河在白茅口决口,连年黄水漂流,人民成了鱼鳖。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15万开黄河故道。监修黄河的官吏鞭挞民工,克扣工粮,河工怨声载道。在这种形势下,韩山童派人四出散播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又派了许多教徒去当挑河夫,在民工中进行宣传。一天,修河的民夫在黄陵冈挖出韩山童暗地派人埋下的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背上分明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民夫一见石人,个个瞠目结舌,打心里相信天下就要大乱的宣传,整个黄河工地顿时沸腾起来。

至正十一年五月,韩山童和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白鹿庄聚集了3000人,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共推韩山童为明王,选定日期,准备起义。并派人四出联络,约好同时行动,以头裹红巾为记号。不料消息走漏,官兵包围白鹿庄,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趁着混乱逃出,躲入深山,隐姓埋名,等候消息。刘福通苦战突出重围,整顿队伍,提前起义,攻克颍州城。黄河工地上的民夫闻讯,一声呐喊,

杀了监工河官,加入刘福通的起义军。起义军头包红巾,身穿红衣,打着红旗,老百姓称之为“红巾军”或“红军”。贫苦老百姓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纷纷从各地投奔红军,起义队伍很快就发展到几十万人,迅速攻占了河南、安徽的十几个州县。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起义,占领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建立政权,尊徐寿辉为帝,国号天完(意为压倒大元),年号治平。设置莲台省(代替中书省),下设六部等机构,铸有“天启通宝”、“天定通宝”。并提出了“摧富盖贫”的口号,受到了贫苦人民的欢迎,势力很快发展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的许多州县。刘福通和彭莹玉、徐寿辉分别成为北方和南方的红巾军主力。彭莹玉率领的红巾军经江西、安徽、浙江、苏南,转战千里,1353年冬在瑞州(江西高安)兵败牺牲。彭莹玉牺牲后,徐寿辉领导红巾军被迫转移到沔阳湖中和黄梅山中,等待时机。1355年,南方红巾军在倪文俊领导下东山再起,在湖北汉川击败元军,占领武昌。1356年正月,徐寿辉迁都汉阳,以倪文俊为丞相,并占领了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广大地区。1357年,徐寿辉派明玉珍率军攻入蜀地,占领川属全境,控制了云南部分地区。这时南方红巾军内部互相争权,1357年倪文俊谋杀徐寿辉未遂,被部将陈友谅杀死。1360年夏,陈友谅又杀徐寿辉,在江州(江西九江)自立为帝,改国号汉,改元大义。除红巾军系统外,浙江黄岩土豪方国珍于至正八年(1348年)起兵,占有浙东;至正十三年(1353年),盐贩张士诚在泰州起事,割据长江下游的苏、杭等地。至正二十年(1360年),南方系统的红巾军领袖徐寿辉被部将陈友谅所害,徐旧部明玉珍不服,断绝与陈友谅的联系,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在重庆称帝,国号为夏,据有两川,设置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并置翰林书院、国子监,设科举,策试进士。1366年明玉珍死后,子明升继位,后为朱元璋所灭。这是元末群雄割据的大略形势。

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响应红巾军的起义,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县)起兵。起义军袭杀州官,占领濠州城。

元朝统治者不折不扣地陷入了人民起义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小明王”亳州称帝

从1355年初开始,刘福通率领北方红巾军的主力开始大规模出击,元朝统治者对刘福通率领的主力军仍然采取“围剿”和堵截战术。1355年1月,元顺帝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儿只守潼关,宗王扎牙失里守兴元(今陕西汉中),陕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温沙守商州(今陕西商县),通政院使朵来守山东,企图形成对刘福通起义军的包围圈,在这包围圈里,让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元军对农民军进行“围剿”。但这个战术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起义军在击败了元军后更加壮大了。

为了进一步联络、调遣北方各支红巾军,建立牢固的根据地,1355年2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碭山夹河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正式建立北方红巾军的政权——宋,改元龙凤,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小明王”是“明王出世”的标志,表示光明已经来临,黑暗势力即将被驱逐。

宋政权的建置与天完政权类似。中央政权设有中书省、枢密院和六部。当时以杜

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由于杜遵道擅权,与刘福通不和,不久被刘福通杀死,刘福通为丞相,后来封为太保,所以刘福通又叫“刘太保”。随着各支起义军的发展,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多,宋政权还设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等地方行政机构。管军机构也逐步完善起来,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并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相应的军职。

宋政权建立后,元朝反动军队进一步加紧了对红巾军的镇压。1355年6月,答失八都鲁被提升为河南省平章,进攻许州(今河南许昌)、长葛,为刘福通所击败。答失八都鲁退到中牟(今河南中牟),红巾军袭击他的军营,夺去辎重,俘获答失八都鲁的儿子李罗帖木儿。但这支红巾军又遭到元军刘哈喇不花部伏击,辎重及李罗帖木儿得而复失。刘福通遣赵明达攻取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黄河以北大为震动。但察罕帖木儿自河南南部赶来,赵明达战败。同时,答失八都鲁又调兵向宋政权的都城——亳州进犯,刘福通在太康(今河南太康)失利,元兵进围亳州,韩林儿逃到安丰(今安徽寿县)。次年3月,刘福通与元军激战于亳州,答失八都鲁大败退走,亳州得安。

宋政权三路北伐

1356年9月,刘福通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亳州的压力,扩大战果,开始分兵出击,遣李武、崔德经潼关入陕,毛贵入山东。1357年夏,由于毛贵在山东的战果辉煌,刘福通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即三路北伐。以毛贵为主力,由东路进攻大都;以关先生、破头潘一支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包围;李武、崔德的西路军由于在陕西受阻,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前往支援。可惜这一战略没有取得成功。

李武、崔德率领的西路军最先出兵。1356年9月,西路红巾军连克陕州、虢州(今河南卢氏),占领潼关。答失八都鲁急调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追击,李武、崔德折往山西南部,攻取平陆(今山西平陆)、安邑(今山西安邑),察罕帖木儿又急追而来,红巾军战败,队伍溃散。

1357年初,李武、崔德又重新组合一支红巾军,突然由襄樊出兵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2月,又夺取七盘,进据蓝田(今陕西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同时,又分兵攻克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诸州。元廷对于红巾军这一突如其来的神速行动大为震恐,陕西省台也连连告急。元廷不得不又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喇不花等由陕州、潼关进攻陕西红巾军。由于察罕帖木儿等已经赶来,红巾军只好放弃进攻奉元的计划。

1357年6月,刘福通决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他们入陕后,夺取兴元路,占领秦(今甘肃天水西)、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10月,红巾军攻凤翔(今陕西凤翔),察罕帖木儿往援,红巾军失利。1358年一部分西路红巾军在李喜喜等率领下进入四川,称“青巾军”。后来青巾军被徐寿辉部将明玉珍逐走,李喜喜不得不率部到武昌,投奔陈友谅。留在陕、甘、宁一带的李武、崔德等曾于1359年攻占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1360年5月,李武、崔德等被打败,

向李思齐投降。

东路军是由红巾军的著名将领毛贵率领的。毛贵原是赵均用的部将。1354年濠州解围后,赵均用、彭早住东击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盱眙(今江苏盱眙),据安东州(今江苏涟水),与董搏霄战于北沙、庙湾、沙浦等寨,败元军于泗州。1356年3月,驻守扬州的地主武装“青军”在其头领张明鉴率领下赶走了元朝的镇南王孛罗普化。孛罗普化逃奔淮安。不久,由盐丁组成的“黄军”也参加了起义。10月,赵均用联络青军和黄军攻克淮安,杀镇南王孛罗普化等元官。宋政权在此置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以赵均用为平章。赵均用派毛贵攻取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由于元将也先来攻,毛贵夺取海船,率军由海道进入山东。

毛贵进入山东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1357年2月至4月这短短2个月时间里,先后攻下胶州(今山东胶县)、莱州(今山东掖县)、益都(今山东益都)、滨州(今山东旧滨县)、莒州(今山东莒县),元朝统治集团惊恐万状,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泰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和董搏霄等出兵堵击毛贵。7月,元镇守黄河的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攻克济宁路(今山东巨野),不久被元义兵万户孟本周夺去,田丰被迫出走,转战济、濮(今山东济宁、鄄城、临清一带),后又占领济宁。是年冬,在棣州(今山东惠民)的元义兵千户余宝也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宣布起义。这时,元朝派往山东镇压农民起义的元军总指挥是太尉纽的该,他一直龟缩在东昌(今山东聊城),不敢出战。

1358年1月,田丰攻克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元朝的南北漕运从此中断。同时,毛贵在益都西南的好石桥击败孛兰奚,孛兰奚退至济南,毛贵乘胜于2月初攻克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已为毛贵、田丰所占领。

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任命毛贵为平章。为了把山东建设成北伐的基地,毛贵设立了“宾兴院”,选用以前的元官,并派姬宗周等为地方政权的官吏,还颁发了铜印,使各级官吏行使权力,维护地方的秩序。同时,毛贵又在莱州立了360处屯田,每屯相隔30里,造大车百辆,运粮储备。不论官田、民田,一律十收其二,赋税标准是很低的。由于毛贵十分注重生产建设,因此山东的局势一直很稳定,并为毛贵北伐奠定了物质基础。

1358年2月,毛贵开始挥师北伐,他亲率起义军进入河北。当时董搏霄驻兵南皮(今河北南皮)魏家庄,元顺帝为嘉奖董搏霄屠杀红巾军的战功,升他为河南行省右丞,这时毛贵兵已至,击败并杀死了董搏霄。接着,毛贵兵攻克清(今河北清县)、沧(今河北沧县)二州,据长芦镇。3月,克蓟州(今河北蓟县),至涞州枣林(今北京通县西南)、柳林,元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毛贵兵进逼京师大都。大都城内以元顺帝为首的元朝统治集团慌作一团,有的主张北逃,有的主张迁都西安,甚至准备派人到高丽去造宫殿。真是乱糟糟,不知如何是好。可惜毛贵只是孤军深入,其他各支红巾军并未配合。当时元廷召四方军队来援,毛贵又在柳林败于刘哈喇不花,不得不退师济南。这次北伐尽管没有成功,却是红巾军的一次重要演习。1359年4月,从淮安来山东投奔毛贵的赵均用,竟杀了毛贵。7月,毛贵部将续继祖从辽阳回益都,欲杀赵均用。山东红巾军由于自相仇杀,从此一蹶不振。但罪魁祸首是赵均用。

在毛贵北伐的同时,田丰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先后夺取了东平、济宁、东庆路(今河南沁阳)、晋宁路(今山西临汾),后又折回山东。这时山东大部分虽为红巾军占领,但

由于毛贵被杀,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下。田丰、王士诚两部较大,田丰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

1360年(至正二十年)夏,察罕帖木儿开始向山东红巾军进攻。冠州(今山东冠县)、东昌相继失陷。8月,察罕帖木儿遣其子扩廓帖木儿及其部将阎思孝、关保、虎林赤由东阿(今山东东阿)造浮桥渡河,田丰率2万人夺桥未成,长清(今山东长清)陷落。元军进攻东平,田丰将崔世英战败,东平被围。田丰投降,元授田丰山东行省平章职。察罕帖木儿令田丰为前锋,先后招降了守棣州的余宝、守东平的王士诚、守东昌的杨诚,进而围攻济南。同时南陷泰安,北攻济阳、章丘,东略沿海州县。济南的红巾军坚守了3个月后,由于叛徒刘珪的出卖,于是年8月落入敌手。察罕帖木儿因镇压红巾军有功,升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10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原部将陈獠头等坚守。次年6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重返红巾军队伍,进入益都城。扩廓帖木儿继续围攻益都。11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獠头俘送大都。接着莒州也被攻陷,山东的红巾军至此全部失败。

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等率领。这一路军的任务显然是为了配合毛贵进攻大都的。

1357年9月,中路军逾越太行山,攻取陵川(今山西陵川)、高平(今山西高平)。闰九月,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接着进攻重镇冀宁路(今山西太原),由于当时察罕帖木儿在这一带驻有重兵,红巾军又退入太行山。

1358年春,毛贵率军进入河北,前锋直指大都。为配合进攻大都的战略计划,并加强中路军,这年2月,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等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杀元怀庆路总管王得贞。3月,王士诚等攻占晋宁路。这时,在山西的中路军,势力大增,决定分兵二路:一支攻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一支由沁州(今山西沁县)出发,攻冀宁、大同(今山西大同)等地,准备由山西入河北与毛贵军会合,可惜由于元军的堵截,计划未能实现。

这年10月,关先生等由定州向西,占领大同,又北向进攻兴和(今河北张北)等路。12月,关先生、破头潘等攻克上都。上都为元朝建立前忽必烈经营汉地的基地,元世祖以后的历代元朝皇帝差不多年年要巡幸上都,所以红巾军占领上都、焚毁宫殿,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接着,关先生等又攻破全宁路(今辽宁昭盟翁牛特旗),焚鲁王宫府。又夺取辽阳行省所在辽阳路(今辽宁辽阳),并以此为基地,准备进攻高丽。元左丞相太平派他的儿子也先忽都儿总兵攻辽阳,他以为关先生等不会久留在辽阳,他儿子进攻辽阳可以马到成功,不料红巾军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也先忽都儿大败而归。

红巾军出兵高丽是为了进一步打击元朝的封建统治。他们在高丽前后有3年的时间,到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初,红巾军被打败,关先生等战死,余众在破头潘率领下退守辽阳。4月,破头潘在辽阳被俘。

中路军在进军高丽的同时,1360年,由汤通、周成率领的一支红巾军曾攻克大宁路(今辽宁昭盟宁城东北),为元将也速战败,汤通、周成牺牲。由雷帖木儿不花、程思忠率领的一支红巾军曾占领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及其附近州县,后亦被镇压。

北方红巾军的失败

宋政权三路北伐后,牵制了元朝的许多兵力,刘福通亲率的中央红巾军解除了压力,于是便开始向外出击。

1357年6月刘福通攻汴梁。汴梁是北宋的首都,北方红巾军以“复宋”为号召,因此进攻汴梁,对于推翻元朝封建统治是有很大的号召力的,但当年并未攻克。8月,刘福通攻占大名路(今河北大名南)、卫辉路(今河南汲县)。于是豫北、冀南广大地区均为刘福通占有,形成了对汴梁的包围圈。当时,太行山以东的豫北、冀南地区,元朝派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驻守,答失八都鲁曾多次败于红巾军之手,面对强大的红巾军,他自知必败,因而不得不求朝廷增援。元顺帝增派知枢密院事答里麻失里来援,结果元军大败,答里麻失里战死,答失八都鲁被迫退驻石村。由于屡战屡败,答失八都鲁忧愤而死,其子孛鲁帖木儿退驻井陘(今河北井陘)。

1358年5月,刘福通再次发动对汴梁的进攻。元汴梁守将竹贞逃跑。这样,北方红巾军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刘福通便将汴梁定为宋政权的都城,韩林儿也从安丰迁来。这时,北方红巾军出现了鼎盛局面。

但是,由于三路北伐军的失利,形势发生了逆转。敌人对宋政权的“围剿”愈益加剧。由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率领的两支最凶狠的军队,对宋政权的包围圈进一步紧缩。1358年7月,察罕帖木儿移军洛阳,加紧了对汴梁的包围。孛罗帖木儿则竭力切断汴梁与山东的联系,拚命进攻曹州。11月,曹州陷落,红巾军首领武宰相、仇知院牺牲。1359年初,孛罗帖木儿又北上代州(今山西代县)、丰州(今内蒙陶卜齐)、云内(今内蒙土默特左旗北),驻守大同,以切断中路军与汴梁的联系。至此,宋政权的处境极其危急。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派兵据守黄陵渡。又发陕西、山西各路元军,把汴梁包围得水泄不通。8月,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汴梁城内数万红巾军战士及宋政权官吏、家属被俘。

1363年2月,曾经投降元朝的张士诚,趁安丰空虚之机,遣大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安丰城里粮食断绝,军民饥饿不堪,甚至腐烂的死尸也挖出来充饥。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抵抗。小明王韩林儿不得不遣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来救,可惜已经迟了,刘福通力战牺牲,朱元璋的军队击败了吕珍和前来助吕珍的、原属南方红巾军系统的庐州左君弼,救出小明王。后来,小明王被安置在滁州,到了1366年12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到应天,途经瓜步,将小明王韩林儿沉死在长江里。

北方红巾军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他们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们最有力地打击了元朝的有生力量,正因为有他们的英勇斗争,才为后来朱元璋最后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势力的崛起

朱元璋参加红军后,因为他打仗机智勇敢,又识得一些字,很快就被提为亲兵九夫长,留在郭子兴的身边。郭元帅见他年纪虽轻,却有见地,有胆略,交给他办的事情,无不办得很好,又很得下面战士的心,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材,就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他。朱元璋做了元帅的女婿,他在军中的地位也就与众不同了。

这时濠州城里有五个元帅,互不服气,互不统辖,时常在闹矛盾,五股力量合不到一块。打下濠州大半年,竟不能出濠州城一步。朱元璋看出,长此下去,不是自家闹事火拼,就是要被元军吃掉,如果想干一番事业,就非得发展队伍、扩大地盘不可。于是,他回到老家钟离乡,竖起一面招兵大旗,小时候的放牛朋友徐达、周德兴和乡里的几十个青年都来投军。这些人后来长年在朱元璋身边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又同是淮西人,逐渐地就都被任命为带兵的将帅,形成朱元璋军队中的骨干。不上十天功夫,朱元璋就招募了700人,郭子兴见此大喜,升他为总管。朱元璋不愿局促呆在濠州,想到外面继续发展队伍,扩大势力范围。他征得郭子兴的同意后,就带着徐达等24位贴身体己的将士往南攻打定远。

定远被攻克后,当地人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俩带着队伍前来投顺。冯家兄弟是个中小地主,因害怕红军,组织乡兵,结寨自保。他俩听说朱元璋吃掉了附近的两支地主武装,又听说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军队纪律还不错,就带领自己的乡兵主动归顺。朱元璋见他兄弟俩身着儒服,知道是个读书人,就向他们请教取天下的大计。冯国用回答说:“金陵(今南京)的地理形势正如古人所说的龙蟠虎踞,是帝王建都的地方。您可先攻下它作为根据地,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取财宝女色。这样,天下是不难平定的。”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把他兄弟俩留在军中,参预机务。

紧接着在进军滁州(今安徽滁县)的途中,定远人李善长到军中谒见。李善长也是地主出身,从小读书,研究法家学问,颇有智谋。见面后,朱元璋问他:“如今四方战乱,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李善长答道:“秦末大乱时,汉高祖以布衣起兵,他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五年而成帝业。”他接着说:“你是濠州人,距刘邦的家乡沛县不远,只要你认真学习这位老乡的长处,天下是可以平定的。”朱元璋听后连声称善,把李善长也留在身边,帮助筹谋划策。李善长的这次谈话对朱元璋的影响很深,自此,他事事以刘邦为榜样,一直到建国后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也都是向刘邦学习的。

文人们的一席话更使朱元璋立下雄心壮志,也使他更加明白读书人的用处,懂得历史上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都写在书上,只有读书人才能取得这些知识。但是,自己书读得很少,没有读书人的帮助,要取得天下是不可能的。从此,他对有学问的读书人更加尊重,只要能提出合理的建议,都给予优厚的待遇,也就是所谓“礼贤下士”。

要想成大事,首先就得整顿军队纪律,取得老百姓的支持。但是,起义军的成分复杂,其中有投降的元朝官军,也有收编的地主武装,因此,不少士兵染上了元军抢掠奸淫的恶习。朱元璋下决心整顿自己部队的纪律,使自己的军队成为一支仁义之师。打下和州(今安徽和县)后,他看到将士掠人妻女,搞得百姓夫妻母子不能团圆,就召集诸将

说：“诸军自滁州以来，不少将士掠人妻女。军队如果没有纪律，怎么能安定民众呢？”他下令把营中抢来的妇女全部放出，让其亲人认领。营门外，早就在等候的父母、丈夫、儿女重又和自己的女儿、妻子、母亲团聚，一时悲喜交集，哭声、欢笑声融成一片。自此以后，每攻下一城，都严申纪律，叫李善长这班文人写成布告，到处张贴，并派执法队沿街巡逻。在渡江攻进太平（今安徽当涂）时，一个士兵违犯纪律，马上被斩首。后来接受杭州投降时，主将李文忠睡在谯楼，不住民房。有一个士兵私自向百姓借铁锅，被斩首。将士出征前，朱元璋每每告诫他们：攻下一城，不许妄杀，不许掳掠。他常说：“取得地盘，如果没有百姓，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当时，群雄并起，大多只图子女玉帛，不惜荼毒生灵，朱元璋以夺天下为目的，约束军队，纪律严明，因之仁义之声远近传闻，有些地方举城归降，省了许多攻城之力。这也是他战胜群雄的重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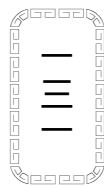
朱元璋对下面的将士赏罚分明，有功必奖，犯了过错，即使是主要将领，也不能随便饶过。当时军队曾一度缺粮，军中严禁喝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了禁令，朱元璋准备按法令行事，有一个官员提醒说，胡大海正在前方带兵打仗，杀了恐怕不妥当。他一听更加愤怒，说：“宁可使胡大海反了，也不可坏我号令！”说完，亲自抽刀把他杀掉。由于朱元璋执法严厉，所以在他的军队里没有行不了的号令。

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郭子兴病亡。这时刘福通已经派人把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立为皇帝，又称小明王，建国号为宋，年号龙凤。郭子兴死后，小明王就任命其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军中文告均用龙凤年号。不久，郭天叙和另一副元帅双双战死，朱元璋遂成为大元帅，郭子兴的旧部全都归他指挥。

朱元璋在开始的头几年，地狭人少，力量单薄。因此，他用优待降人的办法，瓦解敌人，壮大自己。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二月，在攻打集庆（今南京）的战斗中，元将陈兆先战败，率所部3.6万人投降。这些降兵不清楚朱元璋将如何处置他们，内心疑惧不安。朱元璋觉察到降兵的疑虑，就在3.6万人中挑选了500个骁勇健壮者，把他们带到自己营房，夜里让这500人环绕自己睡觉，而他自己平时的卫士一个也不留。朱元璋脱下战甲，倒头酣然入睡，一觉直到天明。第二天，这500勇士非常感激朱元璋对他们的信任，在攻城时个个奋勇先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那3万多士兵也都安下心来为朱元璋效命。

攻占集庆之后，朱元璋把它改为应天府，以它为中心，东起句容至溧阳，西起滁州至芜湖，把这么一块地作为向四周发展势力的根据地。虽然地盘不大，有被吃掉的危险，但也正因为目标小，不招引元朝的注意。而且，这时他的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东面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这样，东、西、北三面都有别股力量隔着，不与元军直接接触，只有南面有零星几支元军。而这时元朝的主力正在北方和刘福通激战，无力他顾。他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消灭周围一些处于与大部队隔绝、孤立、分散的元军、地主武装和其他割据政权的军队。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今安徽贵池）、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应天周围的据点都在至正十六年至十七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被攻克。至此，朱元璋的地盘更大，根据地更巩固，已有足够的力量向更远的地方发展。于是，他决定集中兵力，出击浙西、浙东，消灭该地处于孤立无援的元军。

当攻下徽州时，朱元璋召见名儒朱升。朱升向他提出了三条战略方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第一条是巩固后方军事；第二条是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第三条是



不要急着称王,以免树大招风。朱元璋对这三条十分赞赏,留朱升在军中办事,他的建议也逐步实施。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任康茂才为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和屯田等项农业生产的工作,并拨出一部分将士开荒屯田,定下生产任务,超产者赏,没完成的罚。这些措施解决了战时粮食困难的问题。不上几年的时间,粮食堆满仓库,军队不愁乏粮,也减轻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农民负担,军民皆大欢喜,增强了日后战胜群雄的经济实力。

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婺州(今浙江金华)、诸暨、衢州、处州(今浙江丽水一带)等地又被攻克。浙东的攻取,不仅使朱元璋得到一块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好地方,有着经济上的重大意义,而且消灭了这里的元军,也消除了日后与其他群雄决战时的后顾之忧。这一年,小明王任命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

浙东虽已平定,但地方上的望族刘基、叶琛、章溢还躲在深山里,不肯出来。他们三人都当过元朝的官,抗拒过红巾军。朱元璋派人带了厚礼,并叫军中的文人写了好多书信,再三地聘请。刘基等人经过了解,知道朱元璋的政权并不与地主作对,才答应出山。这三人和婺州的宋濂一起被请到应天。朱元璋称他们为四先生,特地为他们盖了一座礼贤馆,恩礼备至。他还经常叫宋濂等人帮他讲经史,认为这些东西对他很有用,学得很认真,常常和宋濂在一起研究儒家的经典和历史上的成败原因。

自投军七年来,朱元璋已由一个小步卒发展成为称雄一方的霸主。他的政治地位变了,再也不用反对阶级压迫来号召起义,而是突出了民族斗争的口号。攻下婺州时,他在衙门前树了两面大旗,上写“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用来号召一切反元力量,争取那些不满蒙古贵族压迫的汉族地主阶级加入自己的阵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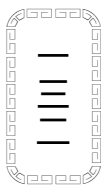
南方割据势力的消灭

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后,政治上把矛头对着朱元璋。陈友谅生活上腐化奢侈,他有成群的后宫妃妾,精致华丽的宫中器物,睡的是镂金床,玩的是珠宝器,和张士诚一伙一样,完全变质了。

为了挽救他的失败,1363年4月,陈友谅竭尽全力,作灭亡前的最后挣扎,举兵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于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鄱阳湖水战。

为了进行这次战争,陈友谅特制了数百艘大舰,舰高数丈,外涂红漆,上下三级,每个大舰有用铁皮包的小船几十只。他选择了朱元璋北上救援小明王尚未回师的时刻,统兵60万,家属百官全部出动,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洪都城原来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到靠江易受水师进攻,将城墙改建为去江岸30步,这次陈友谅来攻,大舰无法靠城墙,只好登岸围城。洪都守将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他率军死守了85天。7月,朱元璋亲率20万大军来救,陈友谅退至鄱阳湖迎战。

当时双方的兵力,陈友谅拥兵60万,大舰数十艘,朱元璋只有20万,用的是小船。从表面上看,陈友谅在人力、物力上占绝对优势,但他杀主篡权,大失人心,内部不稳。他的战舰用铁索联在一起,转动不便,朱元璋战船虽小,却机动灵活。而朱元璋的部队则是上下一心,士气高涨,准备决一死战。



朱元璋看准了陈友谅的弱点,一开始就采用火攻。7月21日,朱元璋利用风势发火炮。焚毁陈友谅舰二十余艘。22日,朱元璋命敢死勇士驾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阵,乘风纵火,陈友谅舰船被焚数百艘,陈友谅弟友仁、友贵及许多重要将领都被烧死。经过23日、24日两天激战后,陈友谅不得不败退保鞋山。

这次激战后,朱元璋派出伏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堵住了陈友谅的归路。8月,陈友谅准备逃奔武昌。26日晚,他在突围时被飞箭射死,结果全军溃败,张定边乘夜晚用小船把陈友谅的尸体运回武昌,并立其子陈理为帝。

1364年2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汉政权灭亡。

陈友谅灭亡后,朱元璋着手出兵平江,消灭张士诚。这年5月,朱元璋在夺取了苏北向江南进军前,发表了《平周檄》,这篇檄文虽然仍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和“龙凤”年号,却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指责张士诚,文中对红巾军进行了百般攻击和污蔑,标志着朱元璋已经转化为封建帝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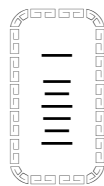
1366年8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20万攻平江。到11日时,徐达等先后攻占了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只有无锡还是张士诚部将莫天祐驻守,朱军已形成了对平江的包围。张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等先后投降朱元璋。朱元璋用叶兑的销城法,在平江四周筑长围困,又架木塔(名叫敌楼)三层,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架起弓弩火铳,又设襄阳炮日夜轰击。张士诚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好拚命突围,也未成功。朱元璋派人劝降,也遭拒绝。1367年6月,张士信在阊门督战,正挟妓欢饮,不料一弹飞来,中炮身亡。9月,城破,周仁、潘元绍等投降,张士诚率军巷战,最后自尽未遂,俘送应天,自缢死。张士诚割据政权消灭。

正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湖州、杭州并发动围攻平江时,长期过着两面派生活的方国珍惶恐不已,他自知难保,日夜偷运珍宝,搜集海船,准备下海逃跑。1367年9月,朱元璋在消灭张士诚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参政朱亮祖一路攻台州,方国珍败逃黄岩,朱亮祖又攻温州,方国珍侄方明善逃走,朱亮祖分兵取瑞安,自率舟师败方明善于乐清的盘屿,追至楚门海口,征南将军汤和一路先取余姚、上虞,进攻庆元,方国珍逃入海中,汤和率军追击,又下定海、慈溪等县。11月,朱元璋又令廖永忠率舟师入海,与汤和合击方国珍,方国珍黔驴技穷,不得不纳款投降,这股割据势力终于被平定。

朱元璋和南方红巾军各派系的关系,一般说来都是紧张的,唯独与四川的明玉珍比较好,这是因为朱元璋和明玉珍都是反对陈友谅的。1364年陈理投降后,朱元璋开始与明玉珍通好。明玉珍也复书表示通好。1366年明玉珍病逝,明升即位。明升年幼无知,其母垂帘听政。大臣间互相不和,丞相万胜杀知院张文炳,明玉珍义子明昭又杀万胜,平章吴友仁不服,联合陕西李思齐、张良弼和丞相刘禎杀明昭,才算安定下来。

明升即位后,夏政权与朱元璋仍互有来往。明朝建立后,当然不容许小小的夏政权继续存在。1369年(洪武二年),朱元璋遣使招谕明升,明升不从。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令汤和为征西将军,进逼重庆,明升投降。夏亡。

南方的割据势力,除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和明升外,还有始终效忠元朝的陈友定、何真、把匝剌瓦尔密等。陈友定是福建的“义兵”头目,因镇压红巾军有功,长期割据福建;何真是广东的“义兵”头目,曾经镇压过广东许多小股的农民起义军。这两股割据势力分别在1367年和1368年被消灭。云南王把匝剌瓦尔密是元朝的残余势力,直到



1381年(洪武十四年)才被消灭。

朱元璋北伐与元朝的灭亡

正当朱元璋逐个削平南方群雄的时候,北方军阀集团之间的火并愈演愈烈。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把被红巾军打得七零八落的元朝残余军事力量进一步削弱了。

朱元璋攻取东吴以后,洞察这一形势,及时地决定了北伐的方针和策略。吴元年(1367年)十月,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5万,由淮入河,进军北伐,决定“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也就是先肃清外围的守敌,待到“天下形势入我掌握”,“彼势孤援绝”之时,一举夺取元朝的统治中心。

为了争取北方人民的支持,朱元璋在大军出发前,告诫诸将说:“汝等师过,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还发布由宋濂起草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人民的檄文,申明北伐的目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号召各地人民不要逃避,“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宣布:“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朱元璋的北伐檄文,具体而明确地提出了重建汉族封建王朝的目标,有利于消除元政权下汉官汉兵的敌对情绪,分化蒙古、色目贵族集团的抵抗力量,同时也符合饱经军阀混战之苦的各族人民要求统一和安定的强烈愿望,因而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为北伐的胜利进军铺平了坦途。

北伐大军按既定方针,先取山东。徐达兵锋所至,元军溃不能当,山东诸郡纷纷望风降附。

在北伐大军进取山东、撤除元廷屏蔽的胜利声中,朱元璋在李善长等人奉表劝进下,在吴二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以应天为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

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徐达实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门槛”的作战计划,引舟师由郢城渡黄河,直趋汴梁。元将左君弼、竹昌迎降。四月,徐达大军西下河南府(洛阳),大败元军于洛水北,元梁王阿鲁温降。又乘胜收复荥阳、福昌、许州、陈州、汝州等地,“河南平。”同时,徐达命冯宗异(即冯国胜)、康茂才等分兵取陕州。五月,冯、康等长驱崤函,直抵潼关,据关而守,阻住了李思齐等援军东来之路。至此,战局已经明朗化,大都的克复指日可待。于是,朱元璋亲到汴梁,从容布置进克大都战略。

闰七月,徐达、常遇春从汴梁率师北上,经彰德、磁州、广平,大会诸将于临清。接着,马步舟师沿运河北进,克德州,下长芦、青州,至直沽,元将也先自海口逃遁。二十七

日,进克通州,元顺帝闻报大惧,于次日夜三鼓带后妃太子出居庸关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北伐军从齐化门填濠登城,克复大都,元朝亡。

明朝

肃清残余割据势力

明太祖建立明朝后,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如何尽快肃清南北各地残存的割据势力,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

在克复大都之前,明太祖就部署南征,三方进师,下湖南、广东,合兵以取广西。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杨璟、周德兴等取湖南宝庆(邵阳),廖永忠、朱亮祖由福建航海取广东,陆仲享从韶州(韶关)直捣德庆。杨璟等连取全州、道州(湖南道县)、常宁、武冈州、永州(湖南零陵),廖永忠等航海至潮州,收降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遂进驻惠州、循州、广州,俘杀邵宗愚,平广东,进军广西。六月,杨璟、廖永忠两路合兵围静江(广西桂林),破之。接着,又克南宁、象州,广西平。

大都克复后,元顺帝逃往上都,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盘踞陕西,纳哈出据守辽阳,把匝剌瓦尔密拥有云南,明升夏政权割据于四川。这些割据势力虽然力量不大,但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新建立的王朝仍是一种威胁。其中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等军阀力量最强,又和北逃的元顺帝相呼应,有可能卷土重来。

太祖分析形势,决定集中兵力,首先解决西北的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徐达、常遇春率西征军由河北入山西,讨伐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派兵抵抗,双方展开激战。十二月,扩廓帖木儿乘北平(太祖改大都为北平府)空虚,亲出雁门关奔袭北平。徐达不回救,反而直捣扩廓帖木儿的巢穴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忙回师救太原,半途被徐达军偷袭兵营,以18骑败走。西征军克太原,平定山西。

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常遇春、冯宗异率军由山西攻陕西奉元路,李思齐逃奔凤翔,又奔临洮。四月,李思齐在西征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势蹙投降。此时,元丞相也速乘明军西征,反攻通州,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9万还救,自北平连败元军于全宁、大兴,直捣上都,元顺帝北逃沙漠,明军追击数百里,俘元宗王庆生、平章鼎住以及将士万人、车万轮、马三千匹、牛五万头,薊北悉平。七月,常遇春在回师南下途中,卒于柳河川,李文忠领兵与西征军会合,大败围攻大同的元军,活捉脱列伯,孔兴被部将杀死。张良弼逃奔宁夏,为扩廓帖木儿执杀,其弟张良臣据庆阳顽抗。八月,徐达率军进攻庆阳、宁夏,张良臣以庆阳降,不久又叛,城破被杀,宁州、黄河等处悉平。

洪武三年(1370年),扩廓帖木儿进围兰州。徐达再次出师,由潼关出西安,攻扩廓帖木儿的据点定西(甘肃定西县)。扩廓帖木儿引兵还救,为明军大败,逃和林(乌兰巴托西南)。东路李文忠则率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应昌。”此时元顺帝死,皇太子爱猷

识里达腊嗣立,李文忠军出野狐岭,至开平,破应昌(内蒙古多伦东北),皇太子亦败逃和林,其子买的里八剌被明军俘获。翌年春,刘益以辽东降,置辽东卫于盖州(辽宁盖县),旋建定辽都司(后改为辽东都司)于辽阳。

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关,趋和林,李文忠趋应昌,冯国胜取甘肃,从三路征讨扩廓帖木儿。徐达大军进入沙漠,至岭北为扩廓帖木儿所败。洪武六年(1373年),扩廓帖木儿反攻大同,徐达遣将极力抵御,将扩廓帖木儿击退。洪武七年(1374年),李文忠、蓝玉出师北征,大败元军。洪武八年(1375年),扩廓帖木儿死,北方边境的元朝残余势力逐渐衰落。

太祖在派徐达等征伐元朝残余力量的同时,于洪武四年(1371年)命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周德兴、廖永忠、杨璟等由东路入川,攻重庆;命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率顾时、何文辉等由秦陇入蜀,取成都。明升据瞿塘天险,阻滞明朝水军,汤和等攻三个月不下。傅友德等乘明升专注东线,乘隙南下,连克阶州(甘肃武都西北)、文州(甘肃文县)、绵州(四川绵阳)、汉州(四川广汉),并以木牌投江顺流而下,向东线明军通报战绩。廖永忠得知北伐明军进展神速,绕间道攻瞿塘,克夔州,进逼重庆,明升出降。傅友德亦不战而得成都。至十月,全蜀郡县平定,夏亡。和四川接壤的贵州宣慰和普定府总管也闻风归附。嗣后,太祖两次遣使王祿、吴云赴昆明招降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均被杀。

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兵30万从东、北两方面进攻云南,北路由四川南下取滇、黔边境的乌撒(云南镇雄、贵州威宁等地)。东路由湖南“辰、沅趋贵州,进攻善定、普安”,直取昆明,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洪武十五年(1382年)闰二月,明军攻下大理,云南全境平定。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军班师,太祖留义子沐英统兵镇守云南。

洪武二十年(1387年)春,太祖以冯国胜为大将军,与傅友德、蓝玉等率军20万,进军东北,征讨纳哈出。明军出长城松亭关,连下大宁(河北平泉)、宽河(河北宽城)、会州、富裕(河北平泉之北),乘夜袭占庆州(内蒙古林西县),渡西辽河,过金山(辽宁开原西北),直逼松花江北,纳哈出势蹙投降。同年十二月,“野人部将”西阳哈等来降,兀者地区归属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辽王阿札失里请求内附,置泰宁(洮安附近)、福余(齐齐哈尔附近)、朵颜(洮儿河上源)三卫。至此,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上、中游以南,归于明朝。除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区域外,南北各个主要的割据势力集团均被消灭,全国基本上实现了统一。

惠帝更改旧法与削藩

立国之初,太祖就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确立了皇位的继承人。为使朱标能顺利地接班,太祖在其23岁时便令他“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太祖命太子朱标巡视关陕,省观风俗形势,考察秦王言行。不料陕西归来后朱标即病,次年四月病死,太祖不得不立朱标才十六岁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太祖深恐皇太孙年少缺乏统治能力,千方百计规定严密的制度,颁《永鉴录》和《皇明祖训》,约束藩王、大臣,并定制后人不得更改。然而,拥有重兵并世袭镇守边塞的藩王已成气候,

大有和帝室分庭抗礼之势。皇太孙朱允炆曾问太祖：“虜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深感藩王对帝位的威胁。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太祖死，皇太孙允炆即位，是为惠帝。

惠帝即位后，罢斥一批洪武旧臣，提拔一批新人同参国事，任用兵部侍郎齐泰为兵部尚书，翰林院修撰黄子澄为太常卿，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决意施行新政。

惠帝推行世治宜用文的用人方针，改变太祖重武轻文的官僚体制，举遗贤，兴学校，提升文臣的地位。少壮文臣在朝廷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上疏建言多达1000余通，政治空气比较宽松。他又改变太祖“以猛治国”的方针，诏行宽政，“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使许多在洪武时期被杀、被流放的人得到平反。蠲逋赋，蠲荒田租，减免江浙重赋，限制僧道占田，使一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复苏。江南地区，“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于屋檐而去者。”同时，又针对“诸王多不逊”的迫切问题，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当时，秦王和晋王已死，削藩的首要对象是实力较大的北平燕王朱棣。计议中，齐泰主张把矛头直指燕王，黄子澄不同意，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于是，建惠帝采纳“剪燕手足”的策略，在上台后三个月，以周王橚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明年四月，又废齐王驎、代王桂为庶人，湘王柏自焚死。六月，又以岷王榘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这样，建惠帝即位后还不到一年，就削去了五个藩王。对于燕王，也采取了削弱其兵力并予严密监视的措施，一面派工部侍郎张瑄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暗中侦察、监视燕王朱棣的行动。一面又借口“北边有寇警，以防边为名，遣将戍开平，悉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去其羽翼”。同时又命令都督耿璠驻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以观北平动静。

惠帝和他的辅臣所采取的新政，应该说是切中时弊的。但他们少年气盛，急于求成，提出“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这种猛烈更改制度的方案，在官僚层中缺乏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加上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提出的新法往往脱离实际，以致造成混乱。特别是过分重用文臣引起武臣的失落感增加，控制内廷过严引起宦官的离心。惠帝及其亲信大臣对此不但没有觉察，进行政策调整，反而在没有掌握军事实力的条件下，贸然削藩，使新政的基础更不稳定。这样，当削藩引起帝室与藩王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的时候，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便朝着惠帝主观愿望的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朱棣靖难与迁都北京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惠帝密令张瑄、谢贵、张信等逮捕燕王朱棣。但是张信为朱棣旧所信任，反而把惠帝的密令告诉了朱棣。接着，北平布政使司吏奈享、按察司吏李友直等也向朱棣密报了张瑄、谢贵等人的行动。当时北平满城都是谢贵的军队，燕王亲兵甚寡，朱棣与张玉、朱能等商议，决定用计先擒杀谢贵、张瑄，于是年七月四日，把张瑄、谢贵骗至王府，在酒席间将其擒杀。北平城内将士听到张瑄、谢贵被擒杀，皆溃散，

朱棣即命张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夺九门”,控制了北平。接着,朱棣援引《祖训》,以清除皇帝身边的奸恶齐泰、黄子澄即“清君侧”为名,举兵“靖难”。

朱棣起兵之后,迅速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河北卢龙),二旬众至数万。而南京方面,惠帝“仁柔少断”,齐泰、黄子澄“两人本书生,兵事非其所长。”旧日功臣宿将,仅存长兴侯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二人。惠帝无将可使,只好起用年已六十有五的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下简称南军)13万进军北平,在滹沱河为燕军袭破,大败而退。惠帝闻炳文军败,根据黄子澄的推荐,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此时,宁王派兵攻永平,朱棣以王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亲自率军救永平,进而直指宁王藩邸大宁。十月,朱棣以计入其城,诱俘宁王朱权,收其部属8万并朵颜三卫蒙古兵3000人,势力大增。李景隆领南军围攻北平,朱高炽拼死坚守。十一月,朱棣回师,内外夹攻,大败南军,李景隆退居德州。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南军与燕军会战于白沟河(河北雄县北),复大败,李景隆南逃,委弃器械輜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都督瞿能、越嵩侯俞渊、指挥滕聚等皆战死。燕军进围济南,幸得都督庸和参政铁铉奋力防守,并于八月击败燕军,朱棣才撤兵回北平。

九月,惠帝擢铁铉为兵部尚书,封盛庸为历城侯、平燕将军,都督陈晖、平安副之,再次率兵北伐。十二月,南军与燕军会战于东昌(山东聊城),燕军大败,亡数万人,张玉战死,朱棣溃围而还。建文三年(1401年),双方仍然在山东和中原地区反复争夺,互有胜负。

建文四年(1402年)四月,双方主力又大战于宿州(安徽宿县)的齐眉山。时燕军连失大将,“淮土盛暑蒸湿,诸将请休军”,多想北归。这本是南军大举进攻的大好时机,但惠帝听信左右一批廷臣的建议,认为燕军已北撤,京师不可无良将,于是在这关键时刻,下令把魏国公徐辉祖统率的部队撤回南京,部署被打乱了,朱棣趁机反攻,大败南军于灵璧,南军骁将平安及陈晖、马溥、徐真等37人皆被执,精锐丧失大半,燕军士气大振,战场形势明显有利于朱棣。五月,燕军南下攻占扬州。六月,燕军自瓜洲渡过长江,下镇江,进围南京。这时南军已毫无抵抗能力,李景隆和谷王橐等打开金川门迎降朱棣,都城遂陷,惠帝下落不明。

朱棣进南京后,“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50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多遭族诛,株连甚众。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即位诏,被诛杀十族873人。是月,朱棣在奉天殿即皇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又称明太宗。

成祖即位后,便酝酿迁都北平,并为此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永乐元年(1403年),从礼部尚书李至刚之请,改北平为北京。以后,又先后设立北京行部、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国子监,罢北平布政使司,改顺天知府为府尹,逐步提升北京的政治地位。永乐七年(1409年)、十一年(1413年)、十五年(1417年),成祖三次北巡,坐镇北京,计8年零8个月,使决策、军事、行政系统逐渐北移。与此同时,通过恢复海运,开通陆运和疏浚会通河,解决南粮北调的难题,满足北京的粮食供应。永乐四年(1406年),在北京修建元代旧宫,十四年(1416年)营建西宫。次年至十八年(1420年),大兴土木,改建扩充北京城,新建皇宫、郊庙,“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成祖正式迁都北京。

明朝创立不久,便进行京都的大迁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因为北京是成

祖发迹之地,也是他控制全国政局的基地。政治实力所在是他决定迁都北京的首要因素。其次,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明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元蒙古势力,元朝复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临近隐患策源地建立全国政治中心,有利于指挥调度,灵活反应,及时制止祸乱,巩固明朝基业。同时,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临中夏而控北荒,足以“控四夷,创天下”,便于对辽阔的北方边疆开拓进取。迁都北京对成祖政治战略的发挥起了重要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

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以明朝建立,遣使宣诏高丽(朝鲜)、安南(越南北部)。次年(1369年),太祖封王颙为高丽国王,陈日烺为安南国王,又遣使宣诏日本、占城(Champa,越南南部)、爪哇(Java,印尼爪哇岛)、西洋(南印度的锁里)诸国。三年(1370年)又遣使招谕暹罗(Siam,泰国)、三佛齐(Palembang,即旧港,苏门答腊岛南部)、淳泥(加里曼丹北部的 Brunei)、真腊(Cambodia,柬埔寨)等国。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诸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冲绳岛)、三佛齐、淳泥、彭亨(Pahang,马来半岛东岸)、百花、苏门答刺(Samudra,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西洋、邦哈刺(孟加拉)等凡三十国”。太祖对待外国,采取“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的政策,对安南与占城的争端不偏不倚,对爪哇灭三佛齐,也未兴师问罪。胡惟庸案发后,明朝与外国的关系趋于冷淡。洪武末年,和明朝保持关系的只有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琉球等国了。

成祖对和海外诸国发展关系采取了比太祖更为积极的行动。登基一个月后,便遣使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刺、占城诸国。永乐元年(1403年)除继续向上述国家派遣使团外,还因随赴暹罗使节还朝的西洋刺泥国(Jilani,今伊朗西北部吉兰省)穆斯林商人的报告,遣中官尹庆赴满刺加(Malacca,马六甲)和柯枝(南印度西岸的科钦, Cochin)。各国亦纷纷派遣使团来华。永乐三年(1405年)起,成祖派遣中官郑和六下西洋,把明朝和海外诸国的联系推到盛况空前的境地。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奉命统领舟师,出使占城、爪哇、旧港、满刺加、阿鲁(印尼苏门答腊岛中部)、苏门答刺、南巫里(苏门答腊的 Lambri)、锡兰(斯里兰卡)、小葛兰(南印度西岸的 Quilon, Kualam)、柯枝和古里(南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 Calicut)。五年(1407年)五月回国,爪哇、满刺加、阿鲁、苏门答腊、小葛兰和古里等国使节随行来朝。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再度出使,前往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刺、南巫里、古里、柯枝、锡兰诸国,七年(1409年)夏回国。

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郑和第三次出使,访占城、爪哇、满刺加、苏门答腊、锡兰、小噶南(即小葛兰)、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南印度东岸)、甘巴里、阿拔把丹,九年(1411年)六月回国。不久,满刺加国王以及古里、柯枝、苏门答腊、阿鲁、彭亨、急兰丹(Kelantan,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加异勒、爪哇使节先后来华。

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郑和第四次出使,访占城、爪哇、旧港、满刺加、苏门答腊、

锡兰、柯枝、古里、加异勒、彭亨、急兰丹、阿鲁、南渤利(即南巫里),入阿拉伯海至忽鲁漠斯(Hormus,伊朗波斯湾港口)。十三年(1415年)回国,忽鲁漠斯使节随行。分舩船队则由苏门答腊西航至溜山国(马尔代夫),抵达东非的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Mogadishu)、卜刺哇(索马里布腊瓦,Brawa)、麻林(肯尼亚马林迪),再北上阿拉伯半岛的阿丹(Aden,也门亚丁)、刺撒、祖法儿(阿拉伯半岛南岸)到忽鲁漠斯。十四年(1416年)夏回国,溜山、木骨都束、卜刺哇、麻林、阿丹、刺撒诸国使节随行。

永乐十五年(1417年)秋冬,郑和第五次出使,送占城、彭亨、爪哇、满刺加、苏门答腊、南渤利、锡兰、沙里湾尼(印度东岸勒加帕坦附近)、柯枝、古里、忽鲁漠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刺哇、麻林、刺撒、阿丹诸国使节回归本国,十七年(1419年)七月自忽鲁漠斯回国。分舩船队往溜山及东非、阿拉伯半岛诸国至忽鲁漠斯,于十八年(1420年)夏回国。

永乐十九年(1421年)秋,郑和第六次出使,送忽鲁漠斯等国使节回归本国,二十年(1422年)八月自忽鲁漠斯回国,阿丹、苏门答刺、暹罗使节随行。分舩船队仍往溜山及东非、阿拉伯半岛诸国至忽鲁漠斯,于二十一年(1423年)夏回国,西洋琐里、古里、忽鲁漠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刺撒、卜刺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渤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刺加十六国使团1200余人随行来华。

郑和最后一次航行是在宣德五年,此次航程最远,经历的国家多。船队从南京下关的龙湾出发,到达古里后,又派小队到麦加圣地朝圣,至宣德八年(1433)回国,不久病逝。

仁宣之治

明成祖朱棣病死于榆木川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只当十个月的皇帝,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病死。他在位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在永乐时代,成祖多次巡幸北京和亲征漠北,朱高炽以太子的身份长年在南京监国,主持朝政,所以,他在明史上还是有影响的。仁宗死后,其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仁宗、宣宗统治期间,基本上继承洪武、永乐时期的政策,吏治比较清明,并在一定程度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继续向上发展,因而,封建史学家颂扬这段时期的统治为“仁宣之治”。

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大臣“蹇夏”和“三杨”,依靠他们管理朝政。

“蹇夏”即蹇义和夏原吉。蹇义字宜之,四川巴县人。夏原吉字维喆,祖籍江西德兴,父亲在湖南湘阴当官,便定居在这里。他们俩都是从洪武朝就开始任事的老臣。明成祖即位后,蹇义被提为吏部尚书,夏原吉被提为户部尚书,掌管了六部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部。蹇义为人厚重,作风谨慎,是掌管吏部的理想人才。夏原吉则精明能干。夏原吉精心管理,有条不紊。蹇义和夏原吉历事五朝(洪武、建惠、永乐、洪熙、宣德),一个当了34年的吏部尚书,一个当了29年的户部尚书,长期掌握朝廷重权,当时臣民并称为“蹇夏”。

“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中,杨士奇刚直敢言,在永乐朝受命辅助太子监国,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成祖出征漠北,杨溥是仁宗当太子时的老

师,为人恭谨,被誉为有“雅操”。其实,“三杨”中杨溥的才干和影响远不如其他二杨。

仁宗在“蹇夏”和“三杨”的辅助下,实行了一些开明政治,其中之一就是他本人能够纳谏。当时,有一个喜欢恭维的官员上书歌颂太平,仁宗把奏疏让群臣传阅。满朝文武都认为歌颂得对,唯独杨士奇不以为然。他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行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待众卿以至诚,希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

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一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凡是发现官吏贪赃害民的,都进行惩办。有一个太监在四川采办木料扰害百姓,仁宗命令副都御史弋谦前去调查严办。

洪熙元年五月,仁宗病亡。宣宗朱瞻基继位。宣宗在位期间,仍然重用“蹇夏”和“三杨”等一班老臣,并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

和提倡节俭相适应的是裁撤冗官。这个建议是宣德三年(1428年)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并叫他负责。后来,有一个不识相的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管粮布政司官一员,被宣宗批评说:“粮税自有常赋,我正在裁抑冗滥,你反要求增官。古话说,省事不如省官。”宣宗还严禁将官扰害百姓。他到北方巡边,严厉申戒将士说:“有敢扰民者,杀无赦!”锦衣卫指挥锺法保建议在广东东莞采珠,宣宗说他“扰民以求利”,把他罢官下狱。宣德四年(1429年),工部尚书吴中启奏说:“山西圆果寺是国家祝福的地方,现旧塔损坏,希望能征调力役修建。”宣宗说:“你想借此求福吗?我以安民为福。”不许他役民修塔。即使是皇室、勋戚这些贵族,宣宗也严禁他们侵扰百姓。

宣宗同样善于纳谏。他能够听取正直大臣逆耳的意见,而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他在位之时,经济繁荣,社会也比较安定,一些喜欢阿谀的官员就不断以“明君”、“圣主”之类的话来颂扬他。宣宗听了觉得讨厌,他对大学士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杨溥顿首说:“臣不敢忘报。”宣宗对他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没事的时候,他经常召集“三杨”、“蹇夏”等一班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在用人方面,宣宗亲贤臣,远小人。内阁大学士张瑄、陈山本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臣,二人寡学多欲,为官不廉。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是自己的旧人而加以庇护,把他们调出内阁,贬了官。都御史刘观被罢官下狱后,杨士奇和杨荣举荐顾佐接替他的职位。顾佐为官清廉刚直,约束下属严格。宣宗命他考察诸御史,整肃朝纲。顾佐不负宣宗重托,到都察院后,贬谪了20位不称职的御史到辽东为吏,又降了8人,罢了3人。同时,举荐了40几位清正敢为的人担任御史,使之督察百官。经过一番整顿,贪墨黜罢,朝纲肃然。一些受到弹劾的奸吏怨恨顾佐,便诬告他受贿、冤屈好人。宣宗明察是非,不为诬言所惑,办了诬告人的罪,而对顾佐更加信赖。

在地方上,宣宗也叫“蹇夏”、“三杨”等推荐了一批廉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这

些人中有许多成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

仁、宣二朝实施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人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有较大的前进,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

土木堡之变 北京保卫战

明英宗正统时,宦官王振专权,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北方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也先多次率兵对明朝进行骚扰活动。王振不但不加强防范,反而与也先勾结,索要贿赂,赠以兵器。正统十四年,也先部2000余人入贡,王振视同儿戏,随意压低马价。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廷曾答应与其联姻又无故反悔,遍集蒙古各部兵马,大举南下,“塞外城堡,所至陷没”。

前线败报不断传来,王振与英宗泄泄视之。在王振怂恿下,英宗决意率明大军亲征。朝臣们纷纷以条件未备劝谏,均不听。在战备极不充分的条件下,正统十四年七月,英宗和王振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结果明军在土木堡战败,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军俘虏,50万大军损失过半,余皆溃散,遗下辎重兵器无数,尸横遍野。王振在混乱中被无比仇恨他的明军将领所杀。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事后人们才知道,也先部回头攻击明军的骑兵,最初只有2万多人,竟使数十万明军顷刻间解体,而皇帝出征被俘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

英宗被俘、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百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下诏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又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

郕王召集群臣讨论战守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首先站了出来,朗朗说道:“臣夜观天象,稽算历数,天命已去,惟有南迁可以纾难。”徐珵的话刚说完,立刻遭到太监金英和礼部尚书胡濙的反对。接着,又有一人从文臣班里站出来,厉声斥责说:“主张南迁的,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你难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训吗?”这一驳斥,徐珵非常难堪。他不敢再说什么,低着头退了回去。驳斥徐珵的人是兵部侍郎于谦。

当时,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剩下的10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人心震恐。于谦经郕王批准,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他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守,人心才稍为安定。郕王把他提为兵部尚书。

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招致这次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他的三个爪牙被愤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人心大快。接着,文武百官又议论立皇帝的事。大家认为国家正处于危难之秋,人心惶惶,必须另立一个皇帝以安定人心。于是,群起上书,劝郕王早登大位。九月初六日,郕王正式登上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史上的景帝。景帝的登基,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奇货可居,想利用来要挟明朝赔款割地,没料到明朝又立了一个皇帝,他手中

的这张牌就失去了作用。

十月,也先挟带英宗,攻破紫荆关,明朝守将战死。也先麾军入关,直指北京城。面对强大的敌人,主将石亨主张尽闭九门,坚壁以避敌锋。于谦坚决反对,他说:“敌人气势嚣张,而我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轻视于我?”他分遣诸将列阵于九门之外,下令尽闭各城门,以示明军誓与京城共存亡的抗战决心。他把自己安排在北面的德胜门外,和石亨一起,抵挡敌人的正面进攻。部署已定,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人人效命。于谦本身戴盔披甲,亲临战阵巡视指挥,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勇敢作战,保卫首都。十月十三日,瓦剌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空屋里,然后派数骑诱敌。瓦剌一万多名骑兵追击进入埋伏圈后,一声炮响,伏兵四出,火器齐发,瓦剌军人仰马翻,大败而逃。也先的弟弟孛罗和瓦剌的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死。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受到明军的坚决抗击。在德胜门北面土城的战斗中,明朝军民配合作战,使瓦剌军又吃了一个大败仗。当明军和瓦剌军在激战时,土城老百姓纷纷爬上屋顶,以砖石为武器,铺天盖地般地投击敌人,喊杀声震天动地。两军相持了五天,瓦剌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也先本想拥来明英宗,逼明朝城下议和,捞取金银财物,没想到一个子儿也没捞到,反倒损失了许多人马,又听说明朝的各路援兵快要到了,恐怕归路被切断,于是,又拥着明英宗匆匆撤围西去。于谦指挥军队乘胜追击,夺回了瓦剌沿途掳获的许多百姓和财物。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随着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也先无隙可乘,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宣告破产。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在景泰元年八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后,当个名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

夺门之变

明代的历史,从土木堡之变到景帝在位这几年,几乎一直没有平静过,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若与其父、祖在位的“仁宣之治”相比较,则更显得动荡。

土木堡之变后,景帝由留守而至监国,终于登上帝位,君临天下。这一方面使他富贵至极,口含天宪,另一方面,外患频仍,朝内政局一波三迭,又使他寝食难安。最令他伤心的,还是太子见济的死,他又没有别的儿子可以继立,这本身就是构成他皇位不稳的一个因素。起初,皇后汪氏连生两胎,竟都是女儿,使他十分恼恨。后来妃子杭氏生了见济,他便将汪氏废去,立杭氏为后。景泰七年,杭氏又不幸病故。然而,更糟糕的是,在国事烦劳和后宫享乐的双重煎熬下,到景泰七年,景帝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积劳成疾,而且病势日渐沉重起来。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而皇位继承人尚未确定,内廷外朝均十分忧虑。十一日,群臣入宫探问病情,景帝的亲信太监兴安对众人说:“诸位都是朝廷股肱之臣,不为社稷大计考虑,天天问安,徒劳无益。”一席话提醒众官考虑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本来,经过“复储之议”,无人敢再提建储之事,但景帝这一病,使人们不得不再次考虑此事。十四日,群臣在朝集议立储问题,有人提出请沂王复位东宫,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既废不

可再立。最后,大家觉得不如只提建储,具体人选由景帝自己定,所以奏疏中只说“早择元良”。景帝见疏,不允所请,并说自己不过偶感风寒,十七日当临早朝,群臣不必惊慌。这时,传说有人要把襄王之子迎入宫中,立为皇储。十六日,主持政务的王直、于谦等人在一起议论请沂王朱见深复太子位一事,推举大学士商辂起草奏稿,写成以后,天色已晚,决定明日早朝时再奏。

然而,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太上皇英宗复位的一场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

首先谋划英宗复位的是武清侯石亨。此人在北京保卫战期间立了一定功劳,掌握了部分兵权,爵封武清侯。景泰八年正月,景帝朱祁钰召石亨至病榻前,令他代行郊祀礼。石亨这人野心很大,在于谦掌握兵权的情况下,不免有抑郁不得志之感。这时,他看见景帝病势沉重,不觉动了谋取大功的念头。归后,他找亲信张軿、杨善及太监曹吉祥等商量:景帝的病一定好不起来了,现在上下官员都在策划拥立各自尊崇的人为新君,我看,拥立沂王,不如拥太上皇复位,可以建立不世之功。他这番话立刻得到赞同,因为这些人都是不得志之人,如杨善迎归英宗,却未得升迁,心怀不满。于是,几个人去找英宗旧日亲信许彬。许彬对他们说:“拥立太上皇复位,社稷之福也。但我已经老了,不能干了,你们可以去找徐元玉商量。”这个徐元玉,就是当年土木堡之变后倡言迁都的徐珵,人很有才,但心术不正,因倡言迁都而遭仕林不齿,于是他改名为徐有贞,字元玉,这时又重新爬到副都御史的位子。石亨等人知道他善谋略,于是又去找他。徐有贞听了石亨等人的计划,大加赞赏,说:“当年太上皇出征,是为天下赤子之故。现在天下离心,请上皇复位,人心必悦。”

于是,在徐有贞策划下,石亨等人分头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由张軿暗中将准备拥英宗复位之事通知南宫,以便英宗有所准备,同时,由太监曹吉祥、蒋冕等人将情况密报孙太后,很快得到孙的首肯。然后,曹吉祥等又预置了孙太后的一道懿旨,以备起事时用。他们知道,十七日景帝将临朝,到时可能会对立储一事作出某种决定,那时将对拥立英宗复辟不利,于是决定在十七日以前发动。这时,适逢边塞报警,徐有贞对担任掌军都督之职的张軿说,你正可以乘此机会,以加强京师及皇宫戒备为名,调动兵力,做好准备。

十六日晚,徐有贞知道今晚事在必举,为了鼓动人心,他爬上房顶,仰观天象,然后下来对众人说:“时在今夕,不可失也。”于是,他与石亨、杨善等人拿出孙太后懿旨,调军向皇宫进发。当夜四更,曹吉祥等人打开长安门,石亨、张軿、徐有贞、杨善等率兵千余人闯入皇城。不等守城士兵有所反应,他们已将城门反锁,并将钥匙投入井中,以防外兵进入,然后直奔南宫。南宫城门紧闭难启,徐有贞令勇士翻墙而入,与外面士兵合力捣毁一段宫墙,很快,墙垮门开。只见英宗一人独自从灯烛中走来,问:“你们想干什么?”众人赶紧伏地齐答:“请陛下即位。”于是,叫士兵们推过皇帝乘坐的御辇来,士兵们慌乱中拉不动,徐有贞就亲自上前拉车,英宗在众人扶持之下上了车,徐有贞又在前引路,向奉天殿而去。这夜,晴空朗朗,月明星稀,朱祁镇看清了眼前这几位主要人物,问道:“卿等是谁?”徐有贞等赶忙各自报了姓名、官职。队伍出南宫不一会儿,就到了东华门。守门者远远看见有支队伍,喝令停止前进,这时,英宗朗声喝道:“朕太上皇也”,守门者知是英宗,竟不敢阻挡,队伍顺利进入宫内,拥着朱祁镇至奉天殿,山呼万岁,钟鼓齐鸣。

这时已是正月十七日黎明,群臣正在朝房准备景帝早朝,很多人还在心里想着,今天这次早朝,建储问题肯定将要提出,免不了要有一番争论。忽闻钟鼓齐鸣,一会儿又见诸门大开,十分诧异。就见徐有贞跑来,大声呼喊:“太上皇已经复位了,快来叩贺。”众臣面面相觑,竟是无人敢于反对,稍稍迟疑,大家还是一齐来到奉天殿朝觐英宗,朱祁镇又亲自向大家宣布自己已经复位,今日正午,在奉天殿正式举行登基大典,群臣这才一齐跪下,山呼万岁。

这样,朱祁镇自土木堡之变后,在塞外和归后软禁于南宫,整整当了七年半时间的太上皇,终于重登大位了。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夺门之变”,也叫“南宫复辟”。二月十九日,身体景帝被英宗命太监蒋安用帛勒死在西宫之中。

英宗复辟后,昏庸如前。他思念王振,下诏恢复王振的官位,并以木头刻成王振的形状,招魂安葬,祀其牌位于智化寺,其祠赐名叫“精忠”。对“夺门之变”中的为首分子,英宗大加封赏。徐有贞爵封武功伯,官至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即内阁首辅。石亨进爵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升为司礼监,总督三大营。其他一些在“夺门之变”中出过力的官员,也分别被封为侯、伯或加官晋俸。在权力分配中,这些迎复派官僚你争我夺,产生了矛盾。徐有贞因和石亨、曹吉祥争权夺利,曹、石二人联合打击他,因而,仅过几个月,徐有贞便被下狱,后被罢官谪戍。徐有贞败后,曹吉祥和石亨更加专横,终于酿成“曹石之变”。

弘治中兴

英宗死后,太子朱见深继位,是为宪宗,改元成化。宪宗朱见深是个16岁的少年天子,风流荒唐,玩物丧志,他嗜好珍宝,崇信左道,以至吃丹吹符,服用淫药。在位23年,仅成化七年(1471年)召见阁臣一次。内外朝政都被一帮佞幸把持,尤其是任用宦官有增无减。这样,到了成化中期,终于又形成汪直擅权的局面。

汪直黜罢后,成化晚期宦官干政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吏科给事中李俊在一次奏疏中还指出:“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丛十余人,一事而参六七辈,分布藩郡,总领边疆,援引俭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方责贿”。梁芳、钱能、韦眷、王敬等一班宦官,依然弄权售奸,莫敢逆者。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死去,继位的是孝宗朱祐樞,年号弘治。朱祐樞为淑妃纪氏所生,宪宗第三子。生时正值比宪宗年长19岁的万贵妃专宠后宫,宫中不敢将此事报告宪宗。直至太子死后,宪宗始知之,育祐樞于周太子宫中。他是在万贵妃的妒忌和迫害中成长的,因此比起英宗、宪宗等人来,较少纨绔荒唐习气。他当上皇帝后,斥逐了一批奸邪。宦官梁芳、王敬、韦眷等均被黜。奸佞李孜省作恶多端,被逮捕入狱,死在狱中。禅师、国师、真人等妖僧方士被罢遣者达一千数百人。阿谀尸位的大臣如内阁万安等也被罢黜回乡。与此同时,积极提拔贤能,任用正直、练达之士,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了许多名臣,如王恕、李东阳、刘大夏、谢迁、刘健等。孝宗还比较注意广开言路,恭俭自饬,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从

而使弘治朝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明史》称孝宗“使政不旁挠,财无滥费,滋培元气,中外纲安”,“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虽不免过誉失实,但与英宗、宪宗诸朝相比,弘治初政确实清平许多,宦官专权的现象有所收敛。

但是孝宗对于正统以来政治积弊的匡正是很不彻底的,许多近幸如李广等依然得到重用。弘治八年(1495年)以后,孝宗热衷于斋醮、炼丹,视朝渐晏,章奏批答也不及时,“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雍滞,有妨得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弘治十年(1497年)召见大学士徐溥等,每人赏茶一杯,满朝以为盛事。弘治十二年(1499年)给事中张弘曾陈初政渐不克终八事云:“初汰传奉官殆尽,近匠官张广宁等一传至百二十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玘等再传至一百八十余,人,异初政者一。初戮方士李孜省,斩僧继晓,近则烧炼斋醮不息,异初政者二。初去万安、李裕辈,朝弹夕斥,近被劾数十疏如尚书徐琼者,犹颀然居位,异初政者三。初尝谕,有大政召大臣面谕,近自十年三月召见文华殿,不复再召,上下否隔,异初政者四。初停增设内官,近已还者复去,已革者复增,异初政者五。初慎重诏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陈情乞恩,率奉俞允,异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由旧章,有妄乞武职者奏治,近乞升无违拒,异初政者七。初节光禄供亿,近冗事日繁,移太仓银贖市廩物,异初政,宦官扰乱国典,者八”。到了晚年勋戚、官僚挟势行私,朝政更趋腐败。“兴作相继,费出无经,民困于科派,里困于力役。”

刘瑾专权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死,太子朱厚照继位为武宗,年号正德。武宗朱厚照是一个纵欲逸乐的风流天子。他即位时,就不顾内府财用不充,大肆挥霍铺张。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武宗举行大婚礼,户部送银30万两,实际上耗费高达金8520余两,银533840余两,其奢侈程度可知。正德二年(1507年),开始于西华门别构禁苑,筑宫殿,密室勾连,养藏美女,谓之“豹房”。据正德七年(1512年)十月工部报告:“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白金二十四万余两,今又增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以为继。”武宗荒嬉废政,政事为宦官刘瑾所操纵。

刘瑾,陕西兴平人,“幼奸黠有口辩,颇知书”,孝宗弘治年间,得侍东宫朱厚照,“以俳弄为太子所悦。”武宗朱厚照即位,刘瑾及其党伙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八虎”,迅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宦官势力集团。

刘瑾得势后,加紧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力量,“内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诛求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进言。”正德以前,与宦官司礼监分庭抗礼的是内阁以及六部长官,为了达到控制内阁的目的,刘瑾在排斥刘健、谢迁的同时,以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芳潜通瑾党,瑾遂引芳入阁,表里为奸,凡变紊成宪,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皆芳导之”。焦芳一入阁,依仗刘瑾为靠山,马上就掌握了内阁大权,李东阳虽以旧阁臣留任,但他善于见风使舵,对阁事仅“颀首而已”。之后,刘瑾又把自己的私党刘宇、曹元等矫旨入阁,这样,刘瑾当权期间,内阁大权始终牢牢地控制在刘瑾的党徒手中。刘瑾除了在内阁安插党徒之外,六部及其他许多政要部门,也都有一大批亲信

在其间操纵控制,仅六部正副堂官附刘瑾者就有20余人。“尚书则吏部张縠、户部刘玘、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濬、礼部朱恩、刑部刘纘、工部李善。侍郎则吏部柴升、李瀚、前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外廷大僚党附宦官的人数大大超过王振、汪直的当权时期。

刘瑾除了把持司礼监、掌握内外军权之外,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又“矫诏令内阁撰敕,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也就是说宦官有权参预地方上的民政事务。这样,国家的一切事务,实际上就掌握在刘瑾手中。武宗“以天下章奏付刘瑾,……瑾初亦送内阁拟旨,但秉笔者逆探瑾意为之,其事大者,会堂侯官至瑾处请明,然后下笔”,内阁完全秉承刘瑾的意旨行事。“后瑾竟自于私宅拟行,……府部等衙门官禀公事,日候瑾门,自科道部属以下皆长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还京者,朝见毕,必赴瑾见辞以为常”。凡内外章奏,主管官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白本送御览者,只不过是履行形式而已。大臣上书刘瑾,要自称“门下小斯某,上恩主老公公”,故当时刘瑾有“立地皇帝”之称,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刘瑾专权期间,皇帝完全被架空,而内阁则成了他的附庸,甚至到刘瑾被逮捕入狱,会审诸大僚仍然“噤不敢声,瑾大言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皆稍稍却。”由此可见刘瑾对于外廷的控制之严。

正当刘瑾权倾朝野的时候,宦官张永等对刘瑾等的不满情绪正日益增强,张永等“与瑾同为八虎者,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望,(瑾)又欲逐永,永以谗免”。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宁夏的宗室安化王朱寔鐭以讨伐刘瑾作为起兵的借口发动叛乱。武宗派大学士杨一清总制军务,太监张永为监军,前往宁夏处理朱寔鐭叛乱事。杨一清了解张永对刘瑾有怨恨,于是就与张永相与结纳,关系甚洽。“欲因诛瑾,一清为画策”。八月十五日,张永回京师报捷献俘,乘机拿出朱寔鐭声讨刘瑾的檄文给武宗看,“因奏瑾不法十七事”。武宗遂令连夜逮捕刘瑾,外廷科道官亦纷纷上疏劾瑾,定罪30余条。“狱具,诏磔于市,梟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

世宗崇道

武宗朱厚照没有儿子,死后由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召兴献王朱祐杬的世子朱厚熜入继帝位。朱厚熜是武宗的堂弟,封国在湖广安陆(今属湖北)。他即位后改下一年为嘉靖元年,是为世宗。这一年,他仅15岁。

在武宗死后到朱厚熜即位之前,由杨廷和总理朝政近40日。杨廷和是个有志于整饬朝政的首辅。他是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1478年)19岁的时候便考中进士,正德初年入阁参预机务。当时刘瑾专权,杨廷和只能委曲其间,稍有补救而已。武宗多次外出纵游,他先后多次上疏谏阻,都不被采纳。武宗一死,他为太后设计,逮捕佞臣江彬,又以武宗的名义颁发了一个遗诏,罢威武营团练诸军,把江彬调入京师的边兵遣还各镇,在威武大将军的所谓“军门”办事的官校饬令各自归本卫,武宗所经营的皇店一概关

闭,豹房里的成千上万的番僧、少林僧、戏子娼妓、专供游乐的南京“快马船”的船夫,以及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美女,都一概遣还放回,而且,还停止京城中不急之务的营造,把宣府行宫的一切金宝统统收归朝廷内库。世宗登基之时,杨廷和又借起草即位诏书之机,用世宗的名义进一步实行改革,裁汰了锦衣卫、内监局旗校工役 14.87 万人,减少漕粮 153.2 万余石。于是,那些由奉迎、恩幸而当上官的小人大半都被罢斥,武宗时期的暴政革除殆尽,天下臣民都盛称新天子圣人,歌颂杨廷和功高。

但是,杨廷和在争议世宗的生父朱祐杭的尊号问题上违忤了世宗的旨意,于嘉靖三年(1524 年)正月辞官。以后的内阁首辅都缺乏杨廷和的魄力,有些则热衷于互相攻讦,争权夺利。世宗本人也是个昏愤不堪的皇帝,因而,明帝国又日趋衰败。

世宗一生最感兴趣的是崇拜仙道,祈求长生。最早引诱他走上这一条路的是暖殿太监崔文。那是在嘉靖二年(1523 年),当时世宗仅 17 岁,崔文诱惑他在乾清宫等处建醮、祷告。玩了一个月,经不住杨廷和与一些言官的苦苦劝谏,就停止了。第二年,世宗又耍起这玩艺儿。这时,杨廷和已经辞官,而有些当政的官员不但不加阻止,反而迎合世宗的癖好,以取得他的欢心,换取自己的权力地位。如大学士张璁,就曾受命为世宗在钦安殿建醮,并附和世宗的意思,写了几首关于斋醮的诗进献。礼部尚书夏言也是因善于撰写青词而步步高升的。

道士们利用世宗企求长生不老、成仙心切的心理,对他百般愚弄。他们自称能祈雨召鹤,其实,祈雨往往是在久不下雨、旱情严重的时候进行,这时尽管不求,雨也照样会下的,而召鹤的骗术,可能是道士平时畜养训练好的。可是,昏愚的世宗却以为是道士的法术灵验。道士还收买世宗身边的太监,在夜间偷偷拿桃子放在宫中,然后欺骗世宗说:“这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仙桃,乃仙人所赐”;又伪造所谓五色灵龟、灵芝仙草,说是“天降瑞兆”,甚至炼制什么仙丹灵药献给世宗。说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而炼制的原料又是水银、铅等有毒的金属。世宗竟也深信不疑。有一个道士谎称能“化物为金银”,带着他所化的银器进见。世宗大喜,把银器摆在太庙里,对道士非常宠爱。后来发现“化物为银”是个骗局,才把道士杀掉。

由于世宗深信道士的种种骗术,对道士的宠爱也就达到无可复加的地步。道士邵元节自称能求雨求雪,世宗赐给玉带冠服和玉、金、银、象印各一枚,每年给禄米 100 石,赠田 30 顷,还为他建真人府,拨给校尉 40 人,供真人府洒扫之役。嘉靖十五年(1536 年),世宗有了儿子,他认为是邵元节祷告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一品服俸,赐给白银、文绮、宝冠、法服、貂裘。十八年(1539 年),邵元节死,世宗非常悲恸,命令官府为他举行葬礼,卹典按伯爵的等级。邵元节死后,世宗宠爱另一个道士陶仲文。陶仲文也是以画符念咒、驱邪除妖这些玩艺儿来欺骗世宗,在两年的时间里平步青云,被任为少保、礼部尚书,又兼少傅,食一品俸,总领道教之事。后来,又加封为少师。在此之前,明朝没有一个大臣像陶仲文身兼三孤的。二十五年(1546 年),世宗又加封陶仲文为伯爵,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把一切可以加封的爵衔荣誉都给了陶仲文。但是,这个一心想让世宗成仙的道士自己却成不了仙,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死去。

大量的祷告活动,使朝廷在经济上增加负担,在政治上受到严重腐蚀。经济上,当时宫中用于土木祷告的费用,仅香蜡一项,每年就费去黄蜡 20 余万斤,白蜡 10 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由此可见在这方面的浪费是十分惊人的。政治上,如前所说的,道士可

以官至一品 ,尊至公卿 ,实在荒唐至极。而世宗本人耽迷于求道成仙 ,不理朝政 ,大臣有敢谏阻者 ,动则廷杖下狱。嘉靖十八年(1539 年) ,他想让 4 岁的太子监国 ,自己专心修炼一两年。太仆寺卿杨最劝他说 :“不近声色 ,保复元阳 ,自然就会长寿。而黄白之术 ,金丹之药 ,都足以伤元气 ,不可相信。”世宗大怒 ,把他投进锦衣卫监狱 ,用重刑拷死于狱中。过了两年 ,御史杨爵见世宗闹得实在不像话 ,就负起言官的责任 ,上了一疏说 :“为君治人者必须奉天安民 ,使他们各得其所。如今饥民颠连无告 ,委命沟壑 ,而土木之工二十年不止 ;又委任部臣 ,远建雷坛 ,以一方士之故 ,腴民膏血。这样 ,民何以得其所呢 ?……金紫赤绂 ,赏及方术 ,保傅之位 ,坐而论道 ,……名器之滥 ,至此极矣。”世宗一看奏疏 ,大怒 ,把他投进监狱。

张居正的改革

张居正 ,字叔大 ,号太岳 ,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他少年得志 ,12 岁进学秀才 ,16 岁中举 ,23 岁就中进士 ,走上宦途。开初 ,他在翰林院任编修 ,当时正是严嵩权势熏灼的时候 ,他看到“京师十里之外 ,大盗十百为群 ,贪风不止 ,民怨日深” ,感到国家的形势很不妙。他认为这种形势非得有一个“磊落奇伟之人 ,大破常格 ,扫除廓清”不可 ,只有这样 ,才能弭天下之患。但是 ,当时皇帝昏暗 ,奸臣柄政 ,他的思想比较悲观 ,认为世上即使有这种“磊落奇伟”之人 ,当政者却未必了解他 ,即使了解 ,也未必肯起用他。因而 ,他只在翰林院当了七年的编修 ,便称病辞官归家 ,种了半亩竹子 ,闭门读书。

张居正在家读了整整六年书 ,由于父亲很希望他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他重又进京当官 ,任国子监司业。他性格深沉 ,有胆略 ,此次进京 ,怀有更大的抱负。公事之余 ,他注意研讨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 ,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徐阶起草世宗遗诏时 ,曾与他一起商量。隆庆元年(1567) ,他被遴选入阁。第二年 ,他针对嘉靖以来的种种弊端 ,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 ,指出当时朝政积习生弊 ,颓废不振。他认为如不及早厉行改革 ,一新天下耳目 ,势必积重难返。他在奏疏中向穆宗提出了六大急务之事 :1.“省议论” ,反对说空话 ,务求实效 ;2.“振纪纲” ,要申明法纪 ,政教号令概由中央制定发布 ,刑赏予夺 ,做到公正无私 ;3.“重诏令” ,执行皇帝诏令要坚决迅速 ,文书奏报要及时 ;4.“覆名实” ,严格对京官、外官的考勤考绩 ,不使毁誉失实 ;5.“固邦本” ,提供节用恤民 ,抑制豪强兼并 ,清理赋役不均 ;6.“饬武备” ,即申严军政 ,设法训练 ,巩固边防。

张居正的这些政治主张可谓切中时弊 ,颇具见识 ,在当时是势在必行 ,穆宗皇帝对此亦深表赞赏 ,可惜他在位六年便去世了 ,而张居正当时还不是内阁首辅 ,所以这些主张暂时得不到实行。穆宗去世后 ,太子朱翊钧继位 ,改元万历 ,即明神宗。张居正联络宦官冯保 ,撵走内阁首辅高拱 ,在皇太后的支持下 ,出任内阁首辅 ,拥戴 10 岁幼龄的神宗朱翊钧。这时张居正大权在握 ,年幼的神宗对他既尊重又敬畏 ,言听计从 ,于是他便把昔日的六点改革纲领 ,在万历初年逐一付诸实施 ,掀起一番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首先从整饬吏治开始。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 ,政以贿成 ,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不清” 。于是便提出考核吏治以达到“民安邦固” ,也即要求为官清廉 ,治政清平 ,让人民生活安定 ,从而使封建政权长治久安。他决心要扭转政

风士习,做到“事权归一,法令易行”,便竭力提高内阁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加强中央集权以号令天下;另一方面,在地方上,则分清抚、按职掌,使巡抚和巡按的权限明确,并假以事权,使之分工合作,协力督促有司贯彻执行中央政令。

其次,大力开展开源节流的经济改革。

所谓“开源”,也即开辟财源,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明初,田赋及力役的征调,主要依据记载田亩的“鱼鳞册”和记载户口的“黄册”,以后,随着土地的不断兼并,人口逃亡,这一制度已遭到破坏。到了明中叶,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承平日久,人丁生聚,田野垦辟,但是全国田亩额数以及户口数反比建国初期减少,政府实际所能征收的赋税也相应的日益减少。另一方面是“冗员日多”,官吏的禄米有增无减,王室的挥霍浪费也与日俱增,结果朝廷的财源涸竭,收支失去平衡。

土地的兼并和欺隐、丁口的逃亡和户籍的紊乱,造成赋役负担严重不均,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因为官僚地主霸占民田,却想方设法把赋税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身上,形成产去税存、赋役不均的弊病,加剧了社会矛盾。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就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为了进一步改变严重的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赋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1581年)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1. 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染织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
2. 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征银。除在苏、松、杭、嘉、湖地区收本色赋外,其余地区的田赋一律征折色赋,即银子;以前到各地征收的土贡方物也一律“计亩征银”。
3. 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计算的原则是以原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然后把这些税额按一定比例分摊到土地和人丁上,即所谓“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
4. 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征银,轻便易于储存、运输,不像过去交本色赋时体积大,重量多,需要由里长、粮长协助征收和运输,因而,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和运交国库,所以说“丁粮毕输于官”。

张居正在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时,也重视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军队围困北京的“庚戌之变”发生之时,他正在北京,目睹了从这一事件暴露出来的国防虚弱,军备废弛的种种弊端,内心深有感触。所以,等到他执政时,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他曾感慨地说:“武备废弛如此,不及今图之,则衰宋之祸,殆将不远。”于是,他“殚心尽力”,决心对边防加以整顿。

张居正一面精心选任驻边将领,练兵备战,修治边防要塞;同时训令诸将在边境屯积钱谷,整顿器械,开垦屯田,务必做到兵精粮足,战守有备。

除此之外,张居正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还注意兴修水利,消除黄河水患。嘉靖、万历年间,黄淮“横流四溢”,经年不治。每当洪水泛滥,田园、房屋尽毁,人民颠沛流离,遭殃受苦,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万历五年(1577年),黄河又在崔镇决口,河水四溢,淤塞淮河口,淮河水向南倾泻,冲坏了高堰,湖堤大坏,使高邮、宝应等县全被洪水淹没,成了一片汪洋。当时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主张疏濬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

希挚则主张堵塞决口，“束水归槽”。两人主张不一，意见不合，治河工程迁延不决。第二年夏天，张居正起用治河行家潘季训，委任他当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负责治河。

历经二年，治黄取得良好的效果，做到了“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水患的遏制，使黄、淮流域的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张居正执政期间，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是多方面的，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务在强公室，杜私门”。当然，改革在客观上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争立国本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后王氏多年不育。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皇元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由妃子王氏所生，颁诏赦天下。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常洛5岁时，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三皇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礼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但是，神宗十分宠爱郑氏，不仅封郑氏为贵妃，还想立常洵为太子。辅臣申时行、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也主张依制立长，但他们怕触犯皇帝，有时态度比较暧昧。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一派的人，坚决主张依制立长，同时深恐郑氏家族窃取皇权，于是纷纷上书，要求尽早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

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辅臣申时行等上疏，请册立东宫。疏言：“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自元子诞生，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礼部，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立长是名正言顺，神宗不好公然违反“祖制”，但借口“元子婴弱”，少俟两三年举行。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沈璟上言：“贵妃虽贤，所生为次子，而恭妃诞育元子，主鬯承祧，顾反今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进恭妃，次及贵妃。”神宗大怒，谪姜应麟为广昌典史，沈璟调外。上谕阁臣：“恶彼疑朕废长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储，自有成宪，朕岂敢以私意坏公论耶？”刑部主事孙如法上言：“恭妃诞育元嗣，五年未闻有进封之典，贵妃郑氏一生子，即有皇贵妃之封，贵妃能得之于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不能无疑也。”孙如法之言，揭露得神宗无言以对，又使其十分恼怒，利用皇权无理地将孙如法谪为潮阳典史。之后，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等请定储位，均遭神宗指责，并夺其俸。

万历十五年、十六年，礼科都给事王三余、御史何倬、钟化民、王慎德，以及山西道御史陈登云各奏建储，不予置理。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御毓德宫，召辅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等至西室，神宗曰：“朕知之，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妃亦再三陈请，恐外间有疑，但长子犹弱，欲俟其壮大使出。”辅臣复请：“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神宗点头表示同意。同年十月，吏部尚书朱燾、礼部尚书于慎行率群臣合疏请立东宫。神宗大怒，下旨夺俸。

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正月，礼科都给事李献可疏请为长子豫教，被皇上削籍。

大学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还御批。神宗愤怒。给事钟羽正、御史钱一本、主事董嗣成等 18 人交章申救,有的削籍,有的降调,有的杖一百。十一月,礼部尚书李长春屡请册立太子,上疏 14 次,不予上报。不久,也罢去。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正月,辅臣王锡爵密疏请建东宫:“皇上亲发大信,定以二十一年举行”,“倘春令过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迟,今复何名而又缓?’伏乞降谕举行。”神宗曰:“朕虽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三皇子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神宗欲立郑贵妃所生之子常洵为太子之心不死,虽然曾许过二十一年建储立太子,仍以“皇后年尚少”,“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为由,故以常洛、常洵、常浩同时并封三王,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以便数年后常洵仍有立太子的机会。由于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以及其他许多廷臣坚决反对三王并封,不断上奏阻止这一诏令颁发,神宗迫于公议,只好于二月收回三王并封之命。

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正月,礼部尚书余继登请先皇长子册立,而后寇礼可致祝,婚礼可致醮。三月,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等乞行皇长子三礼。不久,移皇长子于慈庆宫,再谕内阁,册立有期,群臣不得渎扰。

关于主张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事,不仅许多朝臣力主按“祖制”建储,连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也坚持立长子,因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十月,神宗只得册立年满 20 岁的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是,神宗同时封常洵为福王,又不让他马上到封地洛阳去。后来还以授给福王的土地不足 4 万顷为由,继续将福王留在北京宫中。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为内阁大学士,上疏坚决反对。他认为如此做不合“祖制”,又指出:“封王要地过多,只能强占民田,而过去世宗朝景王要求庄田过多,‘几至激变’,引起人民反抗,提醒神宗皇帝不要忘记这一‘前事之鉴’。在叶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三月,神宗才让福王赴其封地洛阳,授给他的庄田削减一半。这就是‘福王就国之争’。争立国本,最后以长子朱常洛被封为皇太子而告终。

妖书之案

万历二十八年,工科给事王德完就曾专折进言,劝万历善待中宫,并说进京才数月,已闻道路相传,中宫皇后供给甚薄,连役使奴仆也只数人,希望皇上以国为重,眷顾中宫。万历见疏大怒,立刻将王德完投入锦衣卫狱中。此后,在郑氏策划下,皇后在宫中地位几乎不保。但郑氏集团也遇到了强有力的阻挡,这就是李太后非常喜爱王氏,郑氏想通过万历废去王氏,但李太后这一关就过不了。李太后觉得王皇后恭谨有节,常加以照顾,所以万历根本就不敢提起废后之事。郑氏废后只有通过减少对皇后供奉的办法,希望皇后早日死去。但王氏性情安静,身体虽然较弱,却能自得其乐,郑氏也奈何她不得。

在社会上,郑氏废立之心早已是路人皆知了的,太子册立以后,传言并未减少,反而日渐增多,终于酿成“妖书”一案,掀起一场政治风波。事情在太子册立以后,但溯其原委,却要从太子册立以前说起。

“妖书”事始发于万历二十六年。早在万历十八年,山西按察使吕坤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闺范图志》,内容为历代贤淑妇女画像及说明。后来,太监陈矩奉旨在社会上为万历搜集书籍,见到这本书,拿来献给万历。万历见此书讲的都是妇女之贤德,便将书赐给了郑贵妃。郑贵妃正在积极谋划储位之事,很想找机会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声望,便亲自写了一篇序言,赞扬吕坤这书是“扶持纲常、砥砺名节”的好书,“真闺壶之箴鉴也”。郑氏将自己的序言及原书交给伯父郑国泰,叫他重新刻版印刷,以广留传,郑国泰为扩大郑家影响,又加进了历代贤德后妃一项内容,起自汉代明德皇后,至郑贵妃而止。万历二十六年,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因为与已升为刑部左侍郎的吕坤发生矛盾,借题发挥,上章说吕坤借郑氏亲族向贵妃献书,勾通内廷,别有用心。这时,又有人写了“忧危竝议”的文章,作为《闺范图志》的跋,传播开来,这篇跋语中,列举了历代嫡庶废立的事,又说吕坤的书以汉代明德马皇后为开头,因为马后与郑贵妃的类似的经历,吕坤的意思肯定是讨好郑贵妃,而郑氏家庭刊印此书,则是为拥立皇三子朱常洵寻找历史根据。

此说一出,立刻引起舆论注意。当时,在储位斗争中,大臣们以门户为界限,借端互相攻讦之风已开始形成。于是郑国泰、郑承恩等人立刻上章,说“忧危竝议”为戴士衡所写,中伤善类。万历一怒之下,将戴士衡等有关人员10多人撤职或贬谪。这场风波被称为“前妖书案”。

太子册立、冠婚以后,郑氏极力倾陷太子,社会上又有人窥测风向,认为万历确有废立之心。于是又有人写了一篇“续忧危竝议”,这篇文章以一个叫“郑福成”的人与客人问答的形式写出,这个名字寓意为郑氏与福王的事必成,文章接着前妖书案而作,所以叫“续忧危竝议”,公然说易储势在必行,因为皇上立朱常洛为太子纯出于无奈,所以不久必然废弃他,立福王。又说,皇上忽然令大臣朱赓入内阁,寓意深刻,“赓”者,更也,正表明想要换太子的想法。大学士朱赓因为这篇文章点到自己的名字,将该文呈给皇上,以表白自己与之无关。万历阅后,雷霆震怒,下令严查主犯。

这件事立刻在朝野上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锦衣卫和东厂奉皇命四出搜捕,市井纷乱。社会上各种人挟私诬告,一时捕人甚多,更有甚者,朝廷官员也各以旧日恩怨,互相告讦,闹得纷然难解。锦衣卫、东厂和巡城御史都抓了不少人,真伪难辨。这事说来也怪,一夜之间,上至宫廷,下至大街小巷,都见到了“妖书”,但究系何人所为,竟找不到线索。这时万历又严催速速惩办主犯。最后,各方达成默契,把东厂所捕的市井无赖邬生光定为主犯,邬生光原与本案无关,他曾伪造一首歪诗,其中有“郑主乘黄屋”等句,以此向郑国泰等人讹诈,结果成了本案的替罪羊,被万历下令凌迟处死,这就是万历朝有名的“后妖书案”。

这个案子引起了人们对福王久留京师的警惕。自此以后,奏请福王之国的奏本越来越多,郑氏却总是拖着不睬。后来,又发生了一起告讦事件。万历四十一年六月,锦衣卫百户王日乾上书,报告说奸人孔学与郑贵妃手下太监,请妖人诅咒皇太子和其母王恭妃,并在二人木像上钉钉子,甚至私贿东宫卫士,将对太子采取行动。因牵连郑妃,万历又一次被激怒,幸得大臣叶向高劝谏,说这都是一些市井泼皮所为,与上次妖书之事相同,不如以静处之,不予理睬,万历这才没再追究。此事险些酿成又一次大波,可视为妖书案的余波。

挺击太子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 端午节前夜 ,有一身份不明的男子 ,手持一根枣木大棍 ,闯入太子所居的慈庆宫。这人来到第一道宫门 ,见只有两名老宦官守门 ,举棒打伤其中一人 ,直闯入宫。来到第二道宫门 ,竟是寂静无人 ,于是顺利进入 ,直到殿檐下 ,拾级而上 ,试图加害太子。这时 ,被太监韩本用发现 ,大声呼喊 ,七八名宦官一齐拥上 ,将凶犯捉住。当时天色已晚 ,将该犯交东华门守卫监收。

第二天是端午节 ,太子将此事奏报万历 ,得旨就近送审。于是 ,案子交到巡城御史刘廷元等人手里。联系到多年来的储位之争以及太子的地位 ,刘廷元等人大约感到事件的背景复杂 ,因此草草结案 ,将案子推给刑部。刘廷元在报告审讯情形的奏疏中报告 :已审明犯人名叫张差 ,蓟州人。经再三拷讯 ,“本犯嗷嗷称吃斋讨封等语 ,话非情实 ,语无伦次 ,按其迹若涉疯魔 ,稽其貌系黠猾”。这份报告本身便模棱两可 ,预留退路 ,迹若疯魔 ,可以理解为该犯是个疯子 ,而貌系黠猾 ,又可视为预谋不轨。将来无论怎样了结 ,刘廷元等人都不可以不承担干系。而且 ,刘的结论是 :这样的案犯 ,不能不详细审讯 ,从重拟罪。而刘系巡城御史 ,当然不能当此重任。

案子推到了刑部 ,交给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人。他们深知此案发得蹊跷 ,干系甚大 ,而以当时郑氏与东宫的矛盾而言 ,审案稍有不慎 ,便会开罪郑氏。唯一的办法是照着刘廷元提供的线索审讯 ,以“迹涉疯魔”为缺口。草草讯问后 ,他们向朝廷报告说 :张差是蓟州人。前不久 ,当地开办了一座烧砖的官窑 ,一时柴薪走俏 ,张差变卖了田产 ,收购了大批柴薪 ,前往卖给官窑。谁知当地人李自强等认为张差抢了他们的生意 ,放火把张差的柴薪全部烧光。张一气之下得了疯病 ,于本年四月进京告状 ,路上 ,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告诉他 :你要告状申冤 ,没有状子 ,可用一根木棒代替。张差信了 ,于五月四日手持木棍由东华门进入慈庆宫 ,打伤了守门太监 ,至前殿檐下被擒。报告中说 ,张差“日夜气忿 ,失态颠狂” ,拟定依照“宫殿前射箭放弹 ,投砖石伤人律” ,将张差立即斩首。

不料 ,有人持木棍入宫 ,试图加害太子的事件早已传遍街衢 ,舆情大哗 ,人们纷纷猜测 ,此事一定与郑氏一伙人有关 ,说刘廷元、胡士相等人的审讯 ,实际上是包庇幕后主使 ,郑氏已成众矢之的。传言达于大内 ,万历闻之十分烦恼。在郑氏窜掇下 ,万历令刑部将张差严加看守 ,不准任何人探望 ,想等待舆论稍稍平息以后再说。

然而 ,事出意外 ,看守虽严 ,却挡不住从内部攻破。在刑部衙门中 ,有一个叫王之案的主事 ,暗中探牢 ,巧审张差 ,竟使此案生成一场更大风波。王之案曾做过县令 ,颇有审案经验 ,恰在这时担任刑部大牢的提牢主事。这天 ,他带领一班狱卒在牢内送饭 ,偏偏留下张差的饭 ,最后才送。饭拿到张差的狱室 ,王之案见他身体强壮 ,神情正常 ,绝无疯颠之状。于是他叫狱卒把饭放在离张差不远处 ,对张说 :“你从实招来便给饭吃 ,否则就饿死你。”张差低头不语 ,良久。这时饭时早过 ,张差实在耐不住饥饿 ,小声道 :“不敢说。”王之案令狱卒们散去 ,只留两人架着张差 ,再问 ,张差才开始招供。据供 ,张差小名张五儿 ,此次进京 ,是乡人马三舅、李外父指使 ,跟随一个不知名的太监来的 ,许诺事成

之后给他几亩田地。张差也不知道进京来干什么,到京后住在一所很大的宅院内,有太监给他饭食。后来又交给他一根枣木棍,告诉他说:“你先闯宫撞上一个就打死一个,事后由我们来救你。”随后由老公引入,打伤人后被擒。王之案这次审讯,虽然没有弄清此案的全部背景。但已初步揭开了谜底,张差是受人指使,并由太监引入宫中,目的是要打死太子。王之案立即上言于朝,详述审讯过程,并认定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请求皇上立即进行朝审,或由九卿、科道及三法司会审,案情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王之案仅是个提牢微员,其奏疏须经大臣转呈,所以,疏还没递上内容却已传开。万历觉得审下去说不定又会牵连郑氏,又是一场风波,于是将其疏留中,但已无法控制舆论。一时间,大臣们的奏章雪片一般铺天盖地而来,纷纷要求彻底查清张差口供中提到的太监何人,大宅谁家。而且有人指出这个案子,是危及太子的一种讯号,如不查清,后患无穷,所以“务在首恶必得”。十几天后,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原参审人员和王之案等,再审张差。这一次,张差进一步交代了来京情形: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与张同村。带张差来京那个“不知姓名老公”名叫庞保,那所大宅院是太监刘成的住宅。并交代叫他来时已说好,“打了小爷,吃也有,住也有”。小爷是宫中对太子的称呼,而庞保、刘成均为郑贵妃亲信太监。审讯情况传出,群情鼎沸,无法遏止。这时,郑国泰自己出来揭疏辩白,在这种情形下,他的辩白等于不打自招,激起朝野更大愤怒。

郑贵妃这时也慌了神,在万历面前苦苦哭求。但万历也感到事情难办,只好叫郑氏先去求太子。郑氏见到太子,且哭且拜,力辩自己本无加害之意。朱常洛自幼即遭冷落,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见贵妃如此,很受感动,“贵妃拜,太子亦拜”,并为之“掩涕”。朱常洛当即答应帮助郑氏迅速了结此案。但外间此时已是廷议汹汹,难以平抑,没办法,万历只好亲自出面了。

这时,万历已有25年未与群臣见面了,君臣隔膜甚深。内阁辅臣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官员鱼贯而入,万历命齐至孝定李太后灵前行一拜三叩头礼,然后至御座前叩头行礼。只见万历白冠白袍,端坐于上,太子朱常洛素服侍立于御座之右,三个皇孙并立于阶下。万历召群臣靠近一些,然后说:自太后升遐之后,哀痛不已,今春以来,感到足膝无力,但节日及朔、望、忌辰,总还要来太后灵前行礼。近日,忽有疯人张差闯东宫伤人一案,外廷议论纷纷,你们都是有父子的人,为什么要离间我们父子呢?又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指着几个皇孙说:看看几个皇孙都长这么大了。这番话一出口,方从哲等叩首唯唯,无话可说。万历又宣谕:将张差处死,不许牵连无辜。说着,不免有些激动。这时,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遭到万历斥责后仍大言不止,他的本意是想顺着万历的意思说几句好话,但这种场合根本轮不到他讲话。万历怒起,连声呼喊锦衣卫何在,无人答应,即命太监将刘拿下,于是太监一哄而上,拳脚相加,而后挺杖交下。事出仓促,次辅吴道南顿时吓得昏厥于地,以至“便溺并下”。这时,万历才命将刘光复押下,候旨处理。方从哲叩头请皇上息怒。万历怒稍平,手抚太子说:“这孩子已长大成人,我如有他意,又怎么会等到今日呢?”又对太子说:“你有什么话,尽管对群臣说吧。”朱常洛顺着万历的意思说:“张差不过是个疯子,从速处置罢了,不必诛连。”稍顿,又道:“我们父子何等亲爱,外间竟有许多议论,是为无君之臣,还想使我成为不孝之子。”一番话正说到万历心坎上,他连声问群臣:“你们都听见太子的话了吗?”有刘光复作例子,哪还有人敢作一声,众人唯有叩头称谢。于是,令诸臣退出。

随后,张差被处死。不久,司礼监会同九卿、三法司审问庞保、刘成。由于张差已决死,无对证,二人对张差所供各项俱不承认,推得干干净净。正审问间,忽传东宫太子之谕:庞、刘二人或许曾虐待过张差,张差为了报复,故意说二人是主使,不可轻信。于是,只得停审。然而,社会上仍然传言藉藉,要求追查下去,万历只好下令将庞保、刘成二人于宫内处死,以免节外生枝。其余涉及此案的马三道等亦判流徒、笞杖等刑。

至此,一场轰动朝野的宫廷大案,草草了结。那个为申明案情立过功劳的王之案,案子一结,立刻被找了个借口罢官为民。后来,他又在这个案子的争论中沉浮其中,几起几落,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竟被囚死于狱中。

红丸案

“挺击案”以后,朱常洛的地位忽然有了很大提高。他在处理“挺击案”过程中的表现,大得其父万历的欢心。万历觉得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而且,常洛的几个儿子也成长起来,也给万历添了几分欣慰。因此,朱常洛在万历眼中一下子重要起来。至此,常洛的太子地位总算稳定下来。另一方面,通过这次事件,郑贵妃一伙人看清了人心所向,知道常洛地位已不可动摇,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并为长远利益打算,他们对朱常洛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于是,朱常洛的生活也有了很大变化,郑氏不时送来金银珍宝和精食美饌,并选了八名美女送来侍奉太子。

朱常洛虽已当了十几年太子,但历来倍受冷落,供奉淡薄。地位忽然有了如此转变,他受宠若惊,有如穷儿乍富,一时不免贪淫纵欲。本来他身体就比较弱,经此折腾,精神劳瘁。到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他终于登上了他等待了19年的皇帝宝座,然而,由于几年中的酒色虚耗,他虽还不到40岁,却已经病势沉重,他由人搀扶着,勉强完成了即位大典。

光宗即位后,手上有几件要立即办理的事,首先便是为万历治丧,并遵遗嘱封郑贵妃为太后,等等。他初登大位,也想显示一下自己是勤于政务的明君,不免公务烦劳。郑贵妃这时又居心叵测地送来几名花枝招展的美女,朱常洛在应付朝政之后,一退朝便有饮宴和美女侍候。他虽然身体不好,却努力支撑着。一天,退朝以后,宴于内廷,一时兴奋,接连“御幸”宫女数人,“圣容顿减”,憔悴不堪。八月十一日,万寿节传令免朝贺,已经卧床不起了。次日,召内医崔文升请脉。朱常洛纵欲伤身,而崔认为是肾虚火旺,给他开了一付药性很强的泻药,这一下,光宗一夜竟泻了数十次,支离床褥之间,精神立觉萎顿不支。而郑贵妃昼夜遣人探问,不问病情,一味催促他赶紧下旨封自己为太后。光宗不得已,在病榻上下谕礼部,准备封郑氏为太后的礼仪。此事立即遭到反对。礼部大臣认为:郑氏既非皇上生母,亦非先帝正宫皇后,本朝无封太后之先例,况且,皇上初立,生母尚未追封,因而郑氏的要求不应办理。

光宗染病的消息传出,引起群臣极大关注。兵科给事杨涟上疏,更是直言不讳地劝光宗“慎起居”。疏中直接说到皇帝的的生活,同僚们都很为他担心。结果,光宗看了奏疏,似乎觉得他说到了问题的症结,不但没有治罪,反而十分看重他。光宗在病中几次召见群臣,他不谈当时政务,却谈了不少身后之事,甚至提到了自己的陵墓之事。八月

二十九日,光宗于病榻中召见首辅方从哲等人,并特命兵科给事杨涟一起入觐。这时,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全身发冷。群臣来到他卧病的乾清宫东暖阁,朱常洛又对大家说起自己怕是不行了等话,朝臣们劝慰他说:陛下登基一个月以来,善政甚多,老天必然保佑无虞。光宗道:“病势已难挽回,赶紧立太子是正事”。于是,召皇长子朱由校出见群臣。朱常洛指着朱由校说:“卿等辅佐他为尧舜之君。”话音刚落,负责照顾皇长子的李氏走出,要求光宗封自己为皇后,光宗下令将李氏封为皇贵妃。

这一段时间,光宗朱常洛卧床不起的事已传遍朝野。有人传说,鸿胪寺丞李可灼炼制了一种仙丹,据说可以包治百病。李可灼也向首辅方从哲自荐,欲入宫为光宗医病,光宗听说此事,很感兴趣。于是,谈完几件事后,光宗问方从哲:听说有个鸿胪寺官要进药,人在哪里?方从哲答道:李可灼自称仙丹,未敢轻信。光宗命速召李可灼。李可灼来到后,为光宗诊了脉,并谈起病源及医治之法,说得头头得道。光宗大喜,命李赶快进药。当时在场的13位大臣与李可灼一同退下,命李与御医们讨论进药之事。御医与李可灼意见不一致,正在争论之中,光宗又派人催李快进药。李可灼拿出一个红色药丸,用奶调和,给光完服下。光宗本来喘得厉害,喝了这药竟然止住了。光宗大喜,连声称李可灼为忠臣。这时,大臣们出乾清宫门稍候。少顷,传出消息,说圣躬进药后,暖润舒畅,并想要吃东西了,一时群臣欢跃而退,李可灼留在宫中。不久,传出光宗圣旨,令李可灼再进一丸。御医们都说不行,而光宗恐药力歇,催问甚急,不得已,李可灼又调了一丸进上。不多时,又进了第三丸。当晚,内阁大臣向李可灼探讯病情,李可灼答称:皇上服药后,传安如常。不料,次日凌晨,宫中忽然急召群臣,大家急忙赶去,原来,光宗朱常洛已经驾崩。而首辅方从哲认为李可灼诊病有功,以皇长子令旨,赏李可灼银50两,彩缎2匹。

光宗朱常洛在位的时间,从八月初一日登基,至九月初一晨崩逝,满打满算也只有30天,是明代诸帝中在位时间最短的。在他卧病期间,两次病情大变,都是由于进药,一次是内医崔文升进泻药,这次是李可灼进红丸,初服颇有效,连服三丸,竟一命呜呼。变化太快,不免使人生疑。李可灼进药以前,社会上对他的“仙丹”已有传闻。同时,两次进药的人,似乎又都与郑贵妃有关,内医崔文升原是郑贵妃属下,李可灼则是由一贯依附郑氏集团的方从哲引荐的。因此,这件事立刻成为朝内斗争的导火索,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从立储时即已对立的两大派,又借这一问题,互相大肆攻讦。正统派群臣联系到以前发生的“梃击案”,说崔文升、李可灼都有意弑逆,应当立正刑典,并查出幕后主使者,这当然是指向郑妃一伙的了。而首辅方从哲则力图为自己辩白,说明李可灼进药情形。但他在光宗死后,仍然不合理地奖赏李可灼,使人们产生怀疑,事情越闹越大。最后,为平息事态,由阁臣建议,将二人重新处理:李可灼下狱究问,而后流戍边远;崔文升发配到南京充净军,这件事才暂时得以了结。

移宫案

朱常洛当太子时,地位一直不稳固,连东宫嫔御也未齐备。万历四十一年,太子妃

郭氏去世,就未再立妃。“挺击案”后,朱常洛的太子地位稳定下来,生活大大改善,郑贵妃又送来不少美女,东宫嫔御渐渐多了起来。那时最得他宠爱的是两个选侍,两人都姓李,分居东宫的东、西两厢,被人们称为“东李”和“西李”,其中,西李善解人意,尤为得宠。光宗即位时,身边没有太子妃,便将人称“西李”的李选侍带进了乾清宫。

这李选侍的身世已经很难查考了,大约出身也较卑微,但有一点却可以断定,她与郑贵妃一伙一开始便关系密切,曾经是郑妃属下,也许是郑氏送给朱常洛的美女之一。她利用得宠的地位,从光宗登基起,便开始插手朝政。由于太子妃已死,光宗将朱由校、朱由检两个皇子交给她照顾,从而提高了她的地位。尤其是朱由校,万历三十三年降生时,其祖父神宗曾以“元孙诞生”诏告天下,当时作为皇长孙,这样做预示着他可能成为皇位的继承人,这也成了李选侍政治斗争的筹码。

最初,李选侍与郑贵妃勾结,她支持郑封为太后,郑也支持她为皇后,一唱一和,在光宗耳边聒噪。光宗卧病后,二人都加紧了活动。郑氏封太后的事因群臣反对而受阻,但她却因手中控制着皇位继承人而更加肆无忌惮。光宗临死前,于八月二十九日召见群臣,她便躲在阁外偷听。当时,已经议定将她晋封为康妃,只是尚未举行正式封典,她对此极不满意,一再要求要封皇后。当她在阁外偷听到光宗将封她为皇贵妃时,便拉着皇长子从外边闯了进去,大声吵嚷着要封皇后,并推推搡搡地让朱由校帮自己说话,朱由校言不由衷地对众人说:要封皇后。礼部大臣孙如游应声说道:皇上令选侍封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于是,方从哲等人再至榻前,将情况奏明光宗,光宗又重申了封李氏为皇贵妃之命。

当天夜间,光宗因连服“红丸”,圣驾殡天。由于死得突然,身边也没有大臣守候,也未留下什么遗言。李选侍身居乾清宫,首先得到消息,立即进行了布置:她将储君牢牢控制在手中,令宦官手持木棒,禁止大臣进入,准备以此相要挟,迫使群臣答应她的要求。但是,光宗去世的消息很快便传出,群臣急忙奔向宫中,皇帝死后,群臣“哭临”,而后拥立新君,为明代一项常例。群臣不约而同奔来,途中,吏部尚书周嘉谟等人与杨涟等人相遇,谈起拥立新君一事,大家一致认为应当拥立皇长子朱由校。这时有人提到,新君拥立后仍交李选侍照顾,杨涟大为不满,他将亲眼所见李选侍粗暴对待皇长子,甚至推推搡搡的情况说了,提出新君绝不应交与如此妇人之手。大家边走边谈,又遇上首辅方从哲、阁臣刘一燝等人。

廷臣入宫后,直奔乾清宫,不料却看见一群宦官手持木棒挡在门口,不许众人进入,群臣知系李选侍所为。杨涟素以忠勇刚烈闻名,此时更加怒不可遏,他冲上前去,不由分说,推开守门宦官,直闯入宫,众人也随之一拥而入。“哭临”仪式中,很快便有人发现,皇长子等并未如常例侍立灵前,四下也无踪迹。仪式一完,内阁次辅刘一燝立即询问光宗身边的宦官们,但他们都支支吾吾,答非所问。这时,太监王安凑上前来悄悄告诉他,说皇长子早已被李选侍藏了起来,这一下激怒了刘一燝,不禁怒吼:“何人胆敢藏匿新天子?!”王安劝刘一燝等先在外面稍候,他入内设法让皇储出现。

王安入内宫去见李选侍,说群臣希望见到皇长子朱由校,并向她解释说:如今皇长子既非嫡子,又未正式册立为太子,不让见群臣也不是办法,让他出去,见见群臣也是必要的。李选侍一时被他说动,觉得应当让朱由校去见群臣,确立了新君地位然后再扣留在手中,岂不更有作用。于是,叫出朱由校,让他跟王安去见群臣。不一会,李选侍突然

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急令左右去追回朱由校,却已晚了。刘一燝在王安去后也作了布置,皇长子一出来,他和一班官员立刻山呼“万岁”,然后将朱由校扶上准备在乾清宫外面的御辇。御辇刚刚推动,李选侍身边的宦官已追了出来,一齐喊着:“哥儿回来,哥儿回来!”刘一燝等人护着御辇急走,并不时回身赶开追上来的宦官。刘一燝身为内阁次辅,宦官没有得到明令,是不敢把他怎样的。就这样,朱由校来到文华殿,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群臣高呼万岁,拥立朱由校为太子,然后护送入慈庆宫住下,群臣这才详议登基的各项细节。

李选侍失了一着,丢了皇长子这个重要筹码,恼羞成怒,为了争夺权力,她一次次与群臣周旋、争斗。起初,李选侍图谋夺回皇太子,朝臣对此早有防范,她未能得逞。随后,她又下令,大臣奏章应先送给她看,然后再转给皇太子处理,试图造成控制权力的事实,又被群臣识破。在身边太监的教唆下,她又下令将反对她最积极的左光斗、杨涟等召入宫中,准备扣押起来。此计又为大臣识破,左等人不奉命。着着失败,她只剩下最后一着棋了,这便是赖在乾清宫不走。原来,内廷的乾清宫与外廷的皇极殿一样,只有皇帝才能居住,皇后也配居于此。皇帝死去,若不是照顾年幼的新君,即便是太后也不能久居于此。光宗即位之前,郑贵妃便曾以此为手段与群臣斗争。现在,李选侍也要学她的榜样,以乾清宫为筹码,捞取政治权力。

乾清宫地位尊贵,是一般妃嫔向往之地,能住进去,似乎便取得了跟皇后一样的地位。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后王氏病故,万历也染病,郑贵妃便以“侍疾”为名,搬进了乾清宫。万历帝死后,郑贵妃仍住在其中,不愿迁出,她的目的,是以乾清宫相要挟,逼迫光宗封她为太后。当时,已决定光宗八月一日登基,可直到七月十九日,郑贵妃还占据着乾清宫。

郑贵妃要封为太后,据说出自万历遗命,光宗朱常洛和当时的首辅已决定同意了,却遭到举朝上下官员们的反对。自万历时期的储位斗争以后,郑氏一伙在朝野印象极坏,所以很多官员以帝死不封后为由加以反对,说她既非先帝皇后,又非新天子生母,根本不应晋封。为了迫使郑贵妃迁出乾清宫,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向郑氏家族施加压力。他们把郑贵妃的侄儿郑养性叫来,软硬兼施,命他转告郑贵妃从速移宫,否则将由郑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郑贵妃在这种压力之下,只好迁出乾清宫,新天子朱常洛得以顺利迁入。这件事发生在“红丸案”以前,可算是“移宫案”的前奏,也称“前移宫案”。

现在,李选侍为了攫取政治权力和提高自己地位,又一次以乾清宫为斗争本钱,赖着不走。而且她有恃无恐,过去郑贵妃是怕家族受到伤害而迁出的,她却是只身一人,作为光宗的遗孀,撒起泼来,量朝臣们也奈何她不得。这时,她为争取地位而出的一计又一计都未成功,而群臣已经意识到她的诡计,促进移宫的奏章雪片般飞来。但是李选侍打定主意,对此不理不睬,一味拖延,官员们一时似乎也没有办法。

在促进移宫的正统派群臣中,以东林党人左光斗、杨涟等人最为积极,他们认为李选侍的作法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李选侍拖延不动,他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奏章的语气也越来越强硬。李选侍认为拖得时间越长,越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所以,她不仅赖着不动,还不时放出口风,说还要等些时候才能准备好搬迁。另一方面,内阁首辅方从哲过去曾依附于郑贵妃一伙,与李选侍也有过一些交往。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他不敢公开

支持李选侍,只是说移宫是应该的,但先帝尸骨未寒,似也不应操之过急,即使拖过了登基时间也关系不大,光宗本人也是登基以后才迁入乾清宫的。方从哲的这种主张,立刻遭到群臣的驳斥,他们认为,李选侍是学着郑氏的榜样,欲壑无穷,你退一步她会进两步,对于这种要求,绝不能稍有迁就。

在这种促请、拖延和争论中,新天子登基的日子临近了。到九月初五,已是登基的前一天了,李选侍不但不迁出,反而放出风来,说自己受到光宗的嘱托,照顾朱由校,现在朱由校即位为帝,仍然可以交给她来照管。这种试图重新控制朱由校,并由此插手朝政的企图,立刻激怒了群臣。当天,朝臣不约而同地群聚于乾清宫外,要求李选侍立刻迁出,喧嚷之声达于内廷,有的当场宣布,选侍如不迁出,今天就在这里不走了。面对如此汹涌的反对声浪,李选侍有些害怕了,在百般推托不成的情况下,她无可奈何地带着一班宦官、宫女,匆匆迁出了乾清宫。

然而,移宫事件并未就此结束。不久,李选侍手下宦官们放出谣言来,说大臣们逼迫皇上庶母(指李选侍)太过,有悖光宗遗愿,传说李选侍险些投缢自尽,皇八妹跳井自杀。传得活灵活现,竟使刑部尚书亲自入宫,探问实情。就在这时,御史贾继春乘机上了一本,综合了各种说法,指责大臣们。这人文笔极好,将移宫一事写得十分生动,不仅说群臣逼迫皇上庶母,而且连新天子也指斥了一番。这一奏疏立刻激起轩然大波,贾继春一向依附方从哲,与郑贵妃及李选侍等也有联系,群臣立即上疏,指斥贾继春为奸党。

事情越闹越大,刚刚即位的熹宗只好出来表态,他历数李选侍的种种罪状,并说她曾“殴毙圣母”,指李曾恃宠殴打熹宗生母王选侍,致使王氏含恨死去。这就直接支持了反对贾继春的群臣。但是,首辅方从哲觉得,这道上谕如果公布,不免有“彰父之过”的嫌疑,即暴露了光宗的某些不光彩行为,实际上是方从哲不愿将李选侍的罪状公布于众。于是,他以首辅的身份封还了熹宗的上谕,劝他不要发表。方从哲封还上谕之事为群臣所知,杨涟立即上疏一本,详述李选侍移宫始末,指出所谓庶母投缢,皇八妹跳井纯系谣言。熹宗就此再发上谕,支持杨涟,并揭露李选侍罪行。上谕中叙述了光宗死后,李选侍阻止他出见群臣的情形,又详述了李选侍对自己“侮慢凌虐”,又因曾“殴毙圣母”,不许熹宗与其生母王选侍的侍婢接触,深恐罪行暴露。最后,熹宗宣布停止给李选侍的一切封号。后来,熹宗又屡次降旨斥责贾继春,不久,贾继春被罢官。移宫一案始告结束。

阉党专政

东林党在万历朝不受重用,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和光宗在不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后,其命运才有转机。光宗临终之时,杨涟以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受顾命。光宗暴卒后,杨涟、左光斗等一班东林党人又合谋从乾清宫逐走李选侍,扶立熹宗朱由校,自此东林党人受到重用。天启初年,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把持。东林权势,盛极一时。

但是,当政后的东林党并没有什么建树,他们毕竟只是封建社会没落地主阶级中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没有提出,也提不出一个救世良方。此时的东林党人只是忙

于“搜举遗佚，布之庶位”，起用大批前期受贬的党人，再则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诸党。并且，这些被誉为正人君子的东林党偏狭傲慢，不能容人，凡是不合自己口味的都视为异党，加以排斥。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壮大东林党自己的势力，反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迫使一些本非死对头的官员投靠正在发迹的魏忠贤。

熹宗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他即位后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暧昧关系的惜薪司太监李进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让他恢复魏姓，赐名忠贤。

原来，魏忠贤乃河北肃宁县人，是个二流子，因赌博输了钱，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混入宫中充当太监。后来和客氏搭上关系，得到熹宗的宠幸和信任。

魏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能当秉笔太监，因有客氏这个关系，才获得这一重要职位。当上秉笔太监后，就利用王体乾和李永贞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效劳。他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和客氏狼狈为奸，宫中谁也不敢和他作对。王体乾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在魏忠贤之上，也得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使唤。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

由于朝中两大派官僚争斗的激烈和客氏的不断唆弄，熹宗渐渐由任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宦官近侍。魏忠贤这班阉人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乘机从中弄权，勾结外廷官僚，操纵朝中一切大权，于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与东林党作对的各派官员便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形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人们称它为“阉党”。阉宦得势，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在天启四年（1624年）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一一遭罢黜。阉党顾秉谦升为首辅，控制整个内阁。魏忠贤又和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勾结，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其党羽在内宫有王体乾、李永贞等30余人，为左右拥护；在外廷有崔呈秀等5个出谋划策的文臣，号称“五虎”；田尔耕等5个负责捕杀、镇压异党的武臣，号为“五彪”。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的大小爪牙。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无不遍置魏阉死党。

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而喜欢木工作业。他经常自己动手。劈、锯、刨或者油漆木器，成年累月，不觉厌倦。魏忠贤这班阉党就利用他的这一特性，每逢熹宗正兴致勃勃地做他的木工活计时，就拿出一大堆奏章文件请他审批，或向他请示问题，故意惹得熹宗厌烦。这时，熹宗便随口说：“我都知道了。你们拿下去，自己好好地处理就行了。”就这样，大权便落在魏忠贤手里，使得他能在朝中擅作威福，为所欲为。

魏忠贤经常外出炫耀威风。每次出门，他身坐装饰华丽的车子，羽盖、旌旗皆用青蓝，驾车的四匹马，飞一般的奔驰，“铙鼓鸣镛之声，轰隐黄埃中”。那些身着锦衣玉带，脚踏长筒皮靴、佩着利刃的卫士，夹护左右飞驰，加上随从的厨子、优伶、车夫，总共数万人。所到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一些逢迎拍马的官员甚至呼他为“九千岁”。朝中事无巨细，必须派人飞驰至魏忠贤面前请示，经他认可方能办理。熹宗虽然近在咫尺，却无人请裁，真是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

魏忠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弟侄亲朋，一个个平步青云，官高禄厚。他的侄儿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和少师。而这时的魏良栋、魏鹏翼却都是口皆乳臭，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孩。

阉党的胡作非为,引起正直官员的严重愤慨,于是,便有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而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斗争。天启四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24大罪,其中有: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以及生活糜烂腐化、穷奢极侈等等,大胆地揭发了魏忠贤的奸恶,刺痛其要害。魏阉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他辩解,王体乾等也极力为他辩护。昏愚的熹宗竟偏信不疑,不但没办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但是,朝中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周宗建等70多个正直的官员还是冒死上疏,交章弹劾。由于熹宗的昏暗和阉党权势之大,魏忠贤竟逍遥法外,毫毛无损,而为首揭发魏阉的杨涟、左光斗于这年十月被罢官。

魏忠贤遭受这番弹劾后,对东林党人切齿痛恨,决心赶尽杀绝。其党羽也想借机报复,以泄旧恨。阉党崔呈秀等就在魏阉面前煽动说:“东林将害公”,怂恿他镇压异党官员。他们阴谋编造黑名单,有所谓《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把不阿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入内,统称之为东林党人,献给魏忠贤,对他们罗织罪名,逐一施行残酷的打击迫害。天启五年(1626年),终于兴起大狱,首先逮捕东林党著名领袖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诬以受贿,交给锦衣卫拷打追赃。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对这六人五天就进行一次拷打逼供,杨涟等五人被折磨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历史上对在这两次大狱中受难的东林党人称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当时,就连早已病死的李三才也不能幸免,阉党宣布削除他的官籍,追夺封诰,可见其对东林党人打击迫害的疯狂残酷。阉党肆意诬陷、残害异己,凡是和自己有过仇隙的,都给加上个东林党的头衔,重则砍头,轻则充军、罢官。于是,东林党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许多想往上爬的人,都拼命附和攻击,吠声吠影,以取悦于魏忠贤。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重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修了《三朝要典》,定所谓三案是非。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邪党官僚争论是非的官员都惨遭迫害,如首先对张差疯颠质疑的王之案被投入监狱,病死狱中。而因“红丸案”被充军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当上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封为康妃。

为了钳制舆论,魏忠贤又用剿灭东林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用以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魏忠贤在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之后,趾高气扬,更加专权腐化。其党羽对魏忠贤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是“尧天帝德,至圣至神”,真是“佞词累牍,不顾羞耻”。他们在奏疏中凡提到魏忠贤的地方均称“厂臣”,而不直书其名。内阁在草拟圣旨时,竟然“朕与厂臣”联名并称。天启六年(1626年),浙江巡抚潘汝楨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效尤,生祠几遍天下,“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每建一祠,多者费几十万两银子,少者也要花几万两。这些银子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阉党为了在开封建魏阉生祠,竟拆毁民房2000余间,建起九楹的宫殿,状如皇宫。有些官员在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五拜三叩头礼。有个叫陆万龄的监生,甚至无耻地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

天启七年(1627年)秋八月,熹宗病死,没有儿子,其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帝位,改元

崇祯,即为思宗。熹宗死后,阉党失去依靠,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崇祯帝也明白阉党不得人心,想振作一下朝政,支撑住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于是,就下令把魏忠贤贬谪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忠贤闻讯,畏罪自杀。忠贤的侄儿、侄孙及客氏和客氏的兄弟、儿子都被处死。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皇帝又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分别定罪:崔呈秀等6人被定为首逆同谋,即时处决(其时崔呈秀已先自缢,下令戮尸);田尔耕、许显纯等19人被定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还有180多人被定为交结近侍,分别判处充军、徒刑和革职闲住。同时,还为遭受迫害的东林党官员恢复名誉。

但是,由于当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崇祯皇帝本人生性猜疑,为了控制百官,加强统治,不久,他又重蹈前代皇帝的复辙,信任宦官。在整个崇祯朝,东林党和阉党仍潜伏地对立着,并且时有纷争。崇祯政权覆亡后,在南方的几个偏安小朝廷中,这个斗争仍一直继续着,直到朱明残余势力彻底覆亡为止。

东南倭乱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四月,在浙江沿海的黄岩、象山、定海等地的村镇,一片火海,房舍熊熊燃烧,烟灰弥漫,满地血腥。一群群光头赤膊、面目凶狠,发着野兽一般咆哮怪叫的强盗,狼奔豕突,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双刀,四处捕杀惊慌奔跑的百姓。他们抢夺居民的贵重财物,杀害来不及逃避的无辜百姓,奸淫被掳的青年妇女……满目是烟火瓦砾,僵尸枕籍,惨不忍睹。一阵淫杀洗劫之后,强盗们逃窜海滨,扬帆东去。这伙强盗就是明朝中后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四处流窜、残酷蹂躏百姓的“倭寇”。

倭寇的祸害,早在明初就已出现。但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朱元璋先后派汤和、周德兴等将领在山东至福建的沿海各地修筑城堡,控制要害,巡视海道,严加防卫,所以未酿成大患。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1467—1573年),各封建诸侯为了争权夺利,扩张势力范围,彼此征战不已。在兼并战争中的溃兵败将,失掉军职的武士,也即所谓“浪人”,便沦为海寇,还有一些嗜利的日本商人,由于明朝对贸易加以限制,牟利无门,也流为海盗。这些人沦落荒岛,浪迹海洋,成群结伙,形成一股明火执仗侵扰中国大陆沿海的邪恶势力。他们都是来自日本,所以人们称之为“倭寇”,这是因日本在古代叫“倭奴国”而得名的。

面对严重的倭乱,明王朝的千里海防却是衰敝无力、残破空虚。当时军屯制度破坏,军官侵渔虐待士卒,士卒纷纷逃亡。地处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卫所平均每卫只有1797人,仅占原额5600人的32%左右,而其中有些还是虚额,还有不少是新入伍的和老弱病残之辈。海防军备器械,也是非常恶劣。沿海战船,十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兵非素练,船非专业”,畏敌如虎,望风逃窜。东南沿海辽阔的海防线上,几乎没有什么防卫力量可言。难怪每当倭寇大举进犯,如入无人之境,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屠杀和掠夺。

嘉靖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除了明朝政府控制的官方对外的“朝贡”贸易之外,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相当活跃。这些商人不顾朝廷海禁的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私相贸易”,牟取暴利。他们有的人

数众多,规模巨大,成群结伙,形成海上走私集团,来往于日本、南洋一带。其中势力较大的海上走私集团,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兼行劫掠”,如徽州(今安徽歙县)人王直,就是当时著名的海盗商人头目。他以日本平户为据点,自称“五峰大舶主”,勾结倭寇,“组织舰队,诱导日本、中国西海之贼,洗劫江浙沿海”。当明朝厉行海禁时,沿海一些商人豪富,因商业利益受到打击,便和这些流窜海上的海盗商人以及倭寇相互交结联络,“倭人借华人为耳目,华人以倭奴为爪牙,彼此相附,出没海岛”,里应外合,进行掳掠抢劫,使得倭寇的祸患更为严重。

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遣使者宗设来宁波通贡,另一封建主细川氏也遣贡使瑞佐、宋素卿前来。按宁波市舶司的规定,货物的验发以贡使所带的勘合号数为序,否则,就以船只入港的先后为准。当时宗设持的是正德朝的勘合,瑞佐、宋素卿持的是弘治朝的勘合。勘合不同,本应以入港先后为准。宗设的船先到,但宋素卿等贿赂市舶司太监,反得优先验发。后来在宾馆宴会时,瑞佐和宋素卿又位列上座,宗设居次。宗设不甘心被歧视,十分恼火,就施展出海盗凶杀的惯技,当场与瑞佐格斗。瑞佐被杀,宋素卿逃走。宗设追至绍兴,再从绍兴折回宁波,夺船入海。沿途焚杀劫掠,明朝军官战死多人,浙中大震。这就是所谓“争贡之役”。争贡之役是因市舶太监受贿枉法而触发的,也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废弛和军队的懦弱。事后,明政府看不到政治和军事的弊端,错误地以“倭患起于市舶”,遂撤销市舶司,停止对日的贸易。这种消极措施使正当的对外贸易和友好往来受障碍,而走私活动却更加剧烈起来。沿海的倭乱也因为内外勾结而日益猖獗。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派朱纨为浙江巡抚,兼提督福建沿海军务,负责抗倭事务。朱纨上任后,攻下倭寇巢穴——双屿港,擒杀通倭的海盗商人头目李光头,并追倭入福建沿海,擒杀了另一名头目许栋,在沿海一带布下防线,颇有成效,同时,朱纨又搜捕处死一批通倭的商民,严申通倭禁令。他的这些措施引起在朝的闽浙官僚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和通倭的沿海势家豪族有联系,并通过势家的通倭而获利,因而极力反对,诬陷朱纨捕杀通倭商民是“擅杀”良民,群起而攻之。朱纨势孤力单,慨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最后,朱纨被罢官,并被逮捕办罪。他愤恨不过,服药自杀。

朱纨死后,浙闽防线被撤除,负责抗倭的巡抚官也罢设。自此,“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的祸害愈演愈烈。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朝政府被迫复设巡视重臣,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经略闽浙地方”。但这时的倭寇几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王忬就任后,虽然也积极组织抗倭,任参将俞大猷、汤克宽,在温州、昌国卫等处击退过倭寇,但终因缺乏有效的措施,为言官所劾,改任大同巡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东南诸省军务,“便宜行事”,并征调“两广狼土兵听用”。张经为了打有把握之战,主张作充分的准备,“日选将练兵,为捣巢计。”三十四年(1555年)初,倭寇复大举进犯,杭州被围,“数十里外,血流成川”,并进据南直华亭柘林川。张经认为明军准备尚未充足,不与速战。这时,首辅严嵩的亲信工部侍郎赵文华“以祭海至”,再三敦促张经进兵出击,张经拒不从命,文华遂通过严嵩密疏弹劾张经。三四月间,张经征调的广西、湖广狼土兵到达前线,张经立即命令俞大猷等合力进击,大败倭寇于浙江嘉兴的王

江泾，“斩贼首一千九百余级，焚溺死者甚众，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正当前线军民庆祝胜利之际，张经却因赵文华的诬陷，“论死系狱，……天下冤之”。

严嵩把王江泾大捷的功劳记在亲信赵文华和胡宗宪身上，张经被陷后，遂升胡宗宪为浙江巡抚总督军务。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十六年（1557年）间，宗宪设计诱杀了当时为祸最烈的寇首徐海、陈东、叶麻、汪直及日本大隅岛主之弟辛五郎等，两浙倭寇的凶焰有所减杀。但宗宪终因热衷于依势附炎，玩弄权术，三十七年（1558年）还把剿倭最得力的将领俞大猷弹劾逮问，于是倭寇复大至，“江北、福建、广东皆中倭”，这时，幸亏有参将戚继光积极训练部队，组织抗倭，才使局面有了彻底的改变。

戚继光平定倭寇

戚继光，字元敬，“世登州卫指挥僉事，……嘉靖中嗣职”，备倭山东。不久，他改调浙江。戚继光来浙后，为了克服“卫所军不习战”的弱点，向浙直总督胡宗宪提出组织新军的建议，时“金华、义乌俗称犷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号为“戚家军”。特别是他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造了新的战阵法——鸳鸯阵，使持各种武器的士兵协同作战，各尽其长，密切配合，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

正当戚继光紧张地训练新军的时候，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春，他奉命调任分守台州府、金华府（府治在今金华县）、严州府（府治在今建德县）等地的参将。

1561年4月开始，倭寇分股侵犯浙江沿海地区。戚继光率领主力赶往倭寇较多的宁海。犯宁海之敌听说戚将军亲自领兵前来，闻风先逃。犯桃渚之敌获悉戚继光率主力远在北面的宁海，就乘隙西袭台州府城。戚继光作战，一贯重视侦察敌情，他很快就侦知这一新的动向，立即挥师南下。5月10日中午，戚家军到了台州城下。士兵们经过半天急行军，未进一粒粮食，想进城用饭。守城门的说：“我们奉命，现在谁也不许进城。”有些士兵就在城门口叫嚷起来。随后赶到的戚继光，责问士兵们：“倭寇距城已经逼近，你们还争着入城？”有个士兵高声说：“别让守城人认为我们胆怯，弟兄们！让我们先消灭敌人再来会餐吧！”士兵们同声响应，他们忍着饥饿，抖擞精神，争先恐后地去迎击敌人。

战斗在距城二里的花街打响了。戚家军首先用火铳射击，倭寇逞强不退，反而摆开了一字阵，蜂拥而来，有个左手挟矛、右手持刀的头目，凶相毕露地走在前面。戚继光高声宣布：谁能杀得此贼，记他头功。勇士朱珏应声而出，连发二铳，打掉了那个倭酋手中的刀矛，冲上前去，砍杀了他，还连斩敌人七名。戚家军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当天五战五捷，歼灭了大量倭寇，还解救了被倭寇掳去的男女百姓5000多人。

5月14日，又有一大股倭寇企图进攻台州城，他们得知明军有备，就从小道转移，阴谋偷袭处州（府治在今丽水县）。戚继光及时察知敌人的动向，他抢先一步，在通往处州的必经之地上峰岭，布下了天罗地网。18日，倭寇排了个长蛇阵，爬上上峰岭，走了一段，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就大摇大摆地往前直走。走过岭顶一半的时候，突然，山路两旁的松树纷纷倒地，原来这是戚继光伏兵的伪装物。戚继光一声号令，明军好像从天而

降,冲向敌人,喊声如雷,山鸣谷应,几面“戚”字大旗在山上招展。倭寇被拦腰切成两截,首尾不能相顾,死的死,逃的逃,有的掉到山涧里摔死,有的逃入岭下民房,负隅顽抗,最后也挨个儿被收拾了。上峰岭之战,戚家军出动了1500名,以少击多,打得2000多名倭寇一败涂地,这充分显示了戚继光出奇制胜的卓越的指挥艺术,也显示了戚家军敢打敢拚的战斗风格。军队凯旋时,台州城内官吏百姓,出城20里相迎,由衷地感谢胜利地保卫处州城安全的戚家军。

戚家军到台州后,大小10余战,连战连胜,到6月8日,肃清了这一带的倭寇,共计擒斩敌人1400多名,敌焚溺而毙命者4000多名,救出了百姓万人左右。倭寇慑于戚继光的威名,称之为“戚虎”。“戚家军”真是名震天下,老幼皆知了。这年秋天,戚继光因作战有功,晋级为都指挥使,职务仍为分守台、金、严的参将。此后,他又到义乌乡间募兵,把戚家军扩充至6000多人。

倭寇在戚家军的有力打击下,不敢来浙江侵扰,但在福建沿海活动得更猖狂了。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8月间,戚继光奉朝廷之命,率师援闽。他率领戚家军6000人和另一部浙军1600人,从温州出发,由海路转陆路,经山间小道,爬山涉水,向南疾进。部队为争取时间,往往一边啃着“光饼”,一边行军。光饼是戚家军的一种军用干粮,这是一种直径约为三寸的圆形烧饼,面粉内掺了些盐,焙烤干,在南方的潮湿天气里也不容易变坏,饼的中间有个洞,用绳穿成一串,挂在身上,随时可以取食。后来,穷苦的老百姓也经常食用这种烧饼。因为它是戚继光的部队创制的,所以被称为“光饼”。

戚继光在出征前了解到,在福建宁德县的东北海边,有个叫横屿的小岛,是倭寇已经盘踞了三年的一个重要巢穴。横屿离海岸10里,岛和海岸之间是浅海,潮涨时岛的四面是水,潮落时浅海成为泥淤,因此易守难攻。倭寇还在岛上修筑了工事,妄图长期占据下去。戚继光决定先消灭这股敌人。9月初,他领兵进入宁德境内。在宁德县城和横屿之间的张湾,聚集着一批倭寇的胁从分子,戚继光临之以军威,同时宣布:只要悔过自新,胁从者一律不问。结果,不杀一人,使张湾的胁从分子全部投诚,从而打通了进攻横屿的道路。

如何攻横屿?步兵难于涉海,乘船又怕潮退搁浅,真是个难题。经过反复研究,戚继光作出了决定。他命令兵士们先准备了大量的草。9月6日凌晨,等海潮一退,士兵们把草铺在潮退后露出来的泥土上,踏着用草铺成的路,一步一步费力地向前行进。戚继光亲自在岸边擂鼓,以激励士气。队伍在行进中保持着鸳鸯阵的阵式,每百步一息,鼓声一起就开步走,鼓声一停就止步。最后,队伍逼近岛屿,鼓声不止,战士们抢登上岸,以锐不可挡之势,打垮了守在岸边的倭寇,攻破了岛中的木城工事,到下午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摧毁横屿的敌巢,是个大胜利。不久,中秋节(9月13日)到了。中秋之夜,在欢庆胜利的气氛中,戚继光召集部下赏月,让士兵们唱着他编的一首《凯歌》:

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处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中秋节的次日,戚继光率军南下,于9月27日到达福清县。倭寇有几万人集结在县城东南30里的大据点牛田。福清的老百姓在迎接戚继光时纷纷诉苦,历数倭寇的罪恶,要求他立即下令攻打牛田。戚继光说:“我兵远道而来,必须休息几天,养精蓄锐,才能待机进攻。”他在公开场合这么说,是为了麻痹敌人。当夜二更,他就命令军队开拔,途中歼灭了从杞店派出的10多名倭寇探子,突袭杞店,一网打尽了村内还在放心熟睡的倭寇。天色微明时,部队在锦屏山下稍事休息,敌人前来袭营。戚继光先从一名俘虏口中知道了敌人的诡计,已作了布置。敌人一进入埋伏圈,他亲自点燃号炮,伏兵四起,倭寇返身狂逃,有个头目从一个大口袋里拿出金银财宝撒在地上,企图诱使明军不去追他。戚家军不顾财宝,只顾杀敌,首先就把这个倭酋一刀砍了。接着,戚家军乘胜追击,直捣牛田敌巢,又连续作战,肃清了附近的敌人。

牛田战役之后,倭贼4000多人向南败逃,转据林墩。该地在兴化府(府治在今莆田县)府城东面20里,四周有河,直通海上。戚继光对林墩敌情作了周密的侦查工作,然后于10月10日率师到达兴化府城。当天夜里,全军轻装出城,向东疾进,黎明时,向林墩发动了进攻。敌人利用地形,破坏了桥梁,凭河据守,当明军涉水冲入村内时,还拚命顽抗。戚继光亲自来到激战地督战,他手刃了一名后退的哨官,指挥所部浴血奋战,终于克复林墩,大获全胜。

牛田和林墩两次胜仗,共歼敌3000名左右,救出了百姓3000多人,戚家军也伤亡不少。戚继光收兵入兴化城时,当地官员百姓出城远迎,送上的彩旗和慰劳品塞满了街道。戚继光拒绝接受对他个人的祝贺,他说:“士卒伤亡,我何忍受贺!”他亲自看望伤兵,抚恤阵亡者的亲属,素服哭祭阵亡士兵。人民当然也忘不了戚继光领兵灭倭、卫国保民的大功。兴化人士就在戚继光到过的平远台立碑纪念。11月间,戚继光班师回浙,路过福州,当地的官吏和百姓也热烈迎送。福州城里有个醉石亭,据说就是当年宴请戚家军的地方。后人还在城里建立戚公祠以纪念他。戚继光回浙后,这年农历十二月间,因援闽之功,由参将升为副总兵,职责是防守浙江的台州府、温州府和福建的福州府、兴化府、福宁州(州治在今霞浦县)等地。

福建的海岸线很长,被戚家军歼灭的只是一部分倭寇。戚家军回浙后,剩下来的倭寇扬言:“戚老虎走了,我们还怕什么?”随即蠢动起来,于1562年12月间攻陷了政和(今松政县境内)和寿宁两个县城,并包围了兴化府城。广东总兵官刘显奉命援救兴化,先派了八名士兵去联系。倭寇截杀了这八名士兵,剥下他们身上绣有“天兵”字样的军衣,让寇兵伪装成明兵,进入了兴化城。半夜里,那些伪装的倭贼杀死守城的明兵,预先埋伏在西城外的大队倭寇,用梯子登城而入,放起火来,袭占了兴化城。倭寇在城内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后来风闻戚家军将来开到,他们慑于戚家军的威名,于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2月21日退出兴化城,攻占了在城东90里、地处海边的军事据点平海卫。他们的打算是:守不住时,就从海上逃走。

明朝嘉靖皇帝在兴化城陷落后,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令戚继光再度率师援闽,同时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全面主持福建军事。戚继光先到义乌募兵。将戚家军补充至万余人,然后兼程赴闽,于5月4日抵达福清。11日,谭纶召集俞大猷、刘显和戚继光商量进军部署。戚继光自告奋勇,要求担任中路的主攻任务,谭纶表示同意,并让刘、俞所部分任左右两翼。12日凌晨,明军进攻平海卫。戚家军先用火铳猛烈射击,打得

倭寇的第一线骑兵四散乱窜,接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垮了敌人作为第二线的步兵。左右两翼及时配合,截杀狼奔豕突的倭寇。明军俘斩敌 2400 多名,救出百姓 3000 多人,一举收复了平海卫。随后收复了政和、寿宁两城,又歼敌 1000 余名,救出百姓 3000 多人,于 6 月 15 日结束战斗。戚家军在收复平海卫等地中战功最大,戚继光的官级因此由都指挥使晋升为署都督僉事,再升为署都督同知。谭纶在上报战绩时,称赞戚继光“用兵如神”,敌“畏之如虎”,民“望之如云”,“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

倭寇占据平海卫时,曾将抢掠到的大量金银财物运回本国,从而引起了新的倭寇成批地窜来福建。平海卫战后不久,福建沿海形势又紧张起来了,这年冬天,在谭纶的竭力推荐下,朝廷提升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兼浙江的金华、温州两府,统一部署这些地区的水陆军事。

1563 年 11 月 21 日,倭寇 2 万人左右,开始围攻福建仙游县城。戚继光没有匆忙进行解围之战,他一面从各地调遣兵力,一面不时派小队袭击围城的敌人,以削弱敌人攻城的势头,又派人在黑夜里穿过敌垒之间的空隙,把守城所急需的火药绳送入城。他还在外围布置队伍,以阻止外地倭寇继续窜来仙游。

1564 年 1 月 9 日(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大雾弥漫,倭寇乘机用吕公车猛攻仙游城。吕公车是一种攻城工具,高过城头,前左右三面围上好几层竹木,再用棉毡裹住,不怕飞箭火铳,靠近城墙时,可用“飞桥”跳登城头。就在吕公车逼近城墙,情况十分危急之际,戚家军突然出现在阵地上。原来,戚继光经过充分的准备,也在这天发动了解围之战。戚家军利用大雾掩护,直奔城下,杀得倭寇晕头转向,全部摧毁了县城四面的敌人营寨,歼敌 2000 名左右。解救了百姓 3000 多人。仙游之战,明军不足万人,敌人超过 2 万,戚继光指挥若定,一战而胜,正如谭纶在请赏中所说,“乃能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2 月间,又经过同安县王仓坪、漳浦县蔡丕岭等地的歼灭战,福建的倭患就基本上肃清了。

1564 年(嘉靖四十三年)冬,倭寇已力薄势衰,跟倭寇勾结多年的广东“山贼”吴平,被迫向当时的广东总兵官俞大猷投降。吴平被安置在福建南端诏安县的梅岭,他贼心不死,又纠众万余人,劫掠广东沿海地区。1565 年(嘉靖四十四年)2 月间,俞大猷会同戚继光,水陆并进,会剿吴匪。吴平率残匪辗转逃遁,最后在次年春天全部被歼。2 年之后,追叙剿灭吴平之功,戚继光的官级晋升为右都督。

这时,经过多年的反复的战斗,东南沿海的倭患终于基本上平息下去了。

援朝战争

援朝战争即朝鲜壬辰卫国战争是 16 世纪末期,朝鲜在中国明朝军队支援下,先后战胜日本入侵的两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这两次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当时日本强占朝鲜,染指中国的狂妄企图,为维护亚洲的安全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给中世纪朝鲜人民反侵略斗争史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这两次战争经历了 1592 ~ 1598 年的 7 年时间,实际上是 1592 年爆发的和 1597 年

再次爆发的两次大规模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1592年、1597年适值朝鲜李氏王朝宣祖25年、30年；中国万历20年、25年；日本文禄元年、庆长2年，这两年为夏历的壬辰年、丁酉年，因此朝鲜历史上通称这次保卫祖国免遭奴役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为壬辰卫国战争、壬辰倭乱、壬辰丁酉倭乱；日本史称文禄·庆长之役，中国则称万历朝鲜之役。

这次战争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日本战国时代。在天皇对全国失控、大权旁落，各地封建领主、武士相互厮杀、兼并、混战长达120余年的极其混乱时期，随着西势东渐的潮流，欧洲商船队开始涌入日本西部，开辟了东西方贸易的通路。当时日本商业资本日益增长，在日本西部逐渐兴起了商业城市。当时集大封建领主和大军阀头目于一身的丰臣秀吉（1536～1598年），在16世纪后半期，经过长期的混战，以雄厚的武力相继统辖了各藩的领地，征服了大大小小的领主，壮大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1590年统一了日本全国，结束了战国时代。从此以后从表面现象观察，在名义上日本天皇似乎恢复了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强逼天皇授权担任关白要职、协助天皇总揽朝政、执掌全国军政大权的丰臣秀吉，才是全国最高的实际统治者。日本天皇只不过是操纵任其摆布的一具傀儡而已。

以丰臣秀吉为首的反动扩张势力所以在16世纪末期发动这次侵略战争，既有其远因也有近因，既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对外扩张的要求，也是丰臣秀吉对外扩张野心的袒露。在这次战争的若干年前，也就是说在丰臣秀吉尚未完成统一日本宏图大业的期间，就曾经表明“侵朝伐明”的野心与计划，并已着手准备。例如1578年，当丰臣秀吉还在作为织田信长部将时，就曾对织田明确地表示过，在大军平定日本本州西部地区以后，就要立即进军九州，进而“图朝鲜，窥视大明国”。再如丰臣秀吉在1585年9月3日亲自写给一柳未安的文件中，就有“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又如1586年3月16日，丰臣秀吉在大阪会见名字叫科艾里奥的外籍传教士等人的时候也曾开门见山地表示：“在平定了日本国内之后，他还要准备‘专心征服朝鲜和中国’，现在正采伐木材以制造2000艘可渡海的舰船，还拜托传教士们代他斡旋，购入两艘欧洲战舰”。在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前2年，即1590年11月1日，丰臣秀吉在京都接见了朝鲜使节，并要该使节转交致朝鲜国王李昖的一封信。在信中他用外交辞令表示了他统一日本以后野心极度膨胀的心术：“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予无愿也，只显佳名于三国（即日、朝、中）而已”。从这句话就可以明显地揭示出丰臣秀吉的真真假假的“伐交”、“伐谋”、“伐兵”兼而有之的谋略思想，“修邻盟”是假，侵略邻国是真。

作为大封建领主的丰臣秀吉由于其对外扩张野心，在统一日本的过程中，逐渐与商业资本的大商人勾结在一起。随着日本西部商业资本的成长，大商人为了发财致富极力要求对外开展贸易和征服。丰臣秀吉代表着商业资本的这种要求，在他们的支持下不仅统一了日本全国，而且还企图征服朝鲜、侵略明朝。根据这一趋势，以丰臣秀吉为代表的日本大封建领主集团梦想通过侵略战争来建立一个包括朝鲜、中国和日本的“三国为一”的封建大帝国，以便称霸亚洲大陆，奴役其他民族。

统一以后的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空前激化，为了转移国内人民斗争的视线，丰臣秀吉集团就势必不惜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以维护和巩固其国内的统治。具体来说，主要是：

面临农民强烈反对的丰臣秀吉，企图发动侵略战争转移农民的视线，从而摆脱日益

激化的政治危机。

他企图把封建领主和武士吸引到这次掠夺性的侵略战争中去,以消除他们的不满,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权。

他企图通过侵朝战争不仅消除封建势力的不满,还在削弱反对势力的同时巩固自己的专制。

丰臣秀吉是一个权势欲、君主专制欲、名利欲兼而有之的人物,他受这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所驱使,难以自拔,指望能打赢这场侵略战争而“扬名后世”,让人们把他当作神灵加以祭礼、崇拜,广为宣扬。丰臣秀吉还有一个如意算盘,那就是企图用全力征服朝鲜以后,利用朝鲜的人力、武力充实自己的实力再进攻中国明朝,实现其扩张领土的狂妄野心。基于上述诸多原因,丰臣秀吉不计后果地发动了这场日本头一次以灾难性惨败而告终的侵略战争。它既断送了丰臣秀吉的生命,又给他的声誉蒙上了一层污浊的阴影。

朝鲜壬辰卫国战争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592.4~1592.6) 1593年4月12日,日本侵略军先遣部队,共出动15万多陆军、4万水军、700多艘战船,渡过对马海峡,大举入侵朝鲜,突然袭击釜山。敌酋小西行长率领的第1军首先在釜山登陆,紧接着另一敌酋加藤清正率领的后续部队继续登陆。庆尚道朝鲜水军未能阻止日军继续登陆,朝鲜地方军在东莱城拼命抵抗,也未能抵挡入侵之敌。日军登陆后,以优势兵力,采取“水路并进”的战术,分3路北进,第1军经釜山、密阳、大邱、尚州、闻庆、直抵忠州;第2军经彦阳、蔚山、永川,在忠州与第1军会师之后直逼丽州和京城(今汉城);第3军经金海,越过秋风岭北上。入侵水军先后攻占庆尚、全罗、忠清诸道的沿岸地区,确保海上交通线,保证陆军的军粮和战略物资的供应,以紧密配合入侵陆军迅速占领全朝鲜。

在日军登陆之前,朝鲜李氏王朝朝廷接到日军入侵的急报,急派李镒、申砬等当时名将阻击北上日军。他们亲率朝军越过乌岭天险,4月27日,在忠州挹川设下背水阵势抵抗日军。这是朝、日两军第一次交锋,但被日军战败。申砬被击毙的消息一传到京城(今汉城),京城上下人心惶惶,混乱一片。朝廷宣祖(李昖)和大臣立即逃往开城、平壤方面,临海君和顺和君两个太子分别到咸镜道和江原道,一方面征兵抗日,一方面向明朝递送急报,请求援兵。因李氏王朝防备虚弱,无力抵抗,致使敌人仅用20天于5月3日就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京城(今汉城)。接着日军分两路北上,窜入腹地,一路由小西行长率领日军经过开城,向平安道方向进攻,直逼平壤;另一路由加藤清正率领陆军向咸镜道方向进攻,直抵朝、中边境的会宁。这时朝廷宣祖(李昖)已逃往义州(今新义州)。

4月20日,李舜臣率所属95艘战船,与全罗道水军共同出海与日本侵略军水师首次交战,给予入侵之敌当头一击,阻止了日军的海上行动,坚定了朝鲜军民抗敌的信心。

5月4日,李舜臣率全罗左道和全罗右道水军共85艘舰船从全罗道丽水出海,向庆尚道方向驶去,与该道水师会合,寻机打击停泊在巨济岛玉浦港的日军水师的战船。

几天来,双方连续交锋,朝军节节胜利。著名的玉浦海战共击毁击沉44艘日军舰船,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战斗意志,坚定了他们战胜入侵之敌的信心,粉碎了敌酋丰臣秀吉的全盘侵略计划。“水陆并进”受挫,水陆失去联系,陆军的

物资供应困难重重,日军被迫暂停进攻。这样,朝鲜水军的辉煌胜利就有力地扭转了被动局面,开始在海上取得了主动权。

5月29日,李舜臣将军根据27日获悉的十余艘敌人舰船驶往泗川、昆阳等地的情报,亲率包括铁甲龟船在内的23艘舰船,在全罗道水军的配合下开到了泗川、固城附近的露梁海面,对敌军阵地发起进攻,把敌军追击到泗川前海,在这里停泊着121艘敌人舰船。400余官兵见势不妙,却离船登山并在山上摆设半月形长蛇阵。敌军居高临下,准备利用有利阵势,寻机歼灭朝鲜水军。李舜臣发现这一不利形势,当机立断决定改变战术,诱敌下山出海,在海上歼灭敌军。当敌人舰船开到泗川浦口的时候,朝鲜水军的铁甲龟船,迅猛冲进敌人舰船编队,用各种火炮轰击。与此同时还炮击了山上之敌。朝鲜水军在这次泗川海战中,把121艘敌人舰船全部击沉并消灭了大部敌军。

6月2日,朝鲜水军在泗川海战后,继续向东挺进。当天早晨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即对唐浦敌军阵地发起了进攻。当时在唐浦港口停泊着大小21艘敌人舰船,朝鲜水军一到阵前,马上以龟船为先锋猛烈冲撞敌人指挥船,敌军措手不及,指挥船被冲撞破损,敌人船队顿时大乱,朝鲜水军趁机猛烈攻击,烧毁和击沉了全部敌人舰船。在这次海战中,丰臣秀吉的忠实信徒、入侵敌酋龟井兹矩被击中,一命呜呼。

6月4日,李舜臣将军所属水军与全罗道在水使李亿祺指挥前来增援的25艘舰船编队会师,朝鲜水军大大加强了实力,舰船多达50余艘,极大鼓舞了朝鲜军民的斗志。翌日早晨,李舜臣和李亿祺共同率领50余艘舰船编队,向停泊在唐项浦的满载掠夺物资的大小26艘敌人舰船发起进攻,以龟船为先锋,集中火力首先击沉敌军指挥船,其他敌船仓皇突围逃窜,朝鲜水军跟踪阻击。经过激战,除个别船只逃脱外,敌船全部被击沉。当日晚,逃窜到陆上的敌军,妄图偷乘仅存的一只敌船逃命,也被全部歼灭。朝鲜水军又一次获得了唐项浦海战的光辉胜利。李舜臣因卓越指挥,立下战功,荣升资宪大夫要职。

6月7日,朝鲜水军继续巡逻,搜索残敌,最后在永登浦前海,又击毁了从慄浦逃往釜山的7艘敌船,击伤了很多敌军官兵,直到全部肃清残敌之后,李舜臣便下令班师,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出征。在这一连串的海战中共击毁击沉74艘敌军舰船,歼灭包括10多名敌酋在内的数千名官兵,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摧垮了敌水军的一支主力船队,粉碎了敌军侵犯全罗道的企图,打乱了敌军“水陆并进”的作战计划,进而使朝鲜水军既完全掌握了海战的主动权,又控制了朝鲜南海的制海权。6月末7月初,敌军又组织3支船队分3路对全罗道方面展开了进攻。

7月8日,朝鲜水军抓住了敌人的这一行动征候,立即组成联合船队在凌晨迅速赶到了梁港口,根据敌情和地势的情况,李舜臣马上周密地制订了诱敌到闲山岛前海予以全歼的作战计划。果然不出所料,敌军第1船队驶入闲山岛前海,被隐蔽在闲山岛北侧的朝鲜水军主力团团包围,经过1天激战,朝鲜水军击沉59艘敌人舰船并杀伤、溺死数千余名官兵。

7月10日,获悉安骨浦停有42艘敌军舰船的情报后,李舜臣便立即决定再次诱敌出海给予围歼,用小船轮番进攻的战术,集中火力痛歼敌军指挥船和增援水军,敌军离船登岸逃窜,朝鲜水军继续炮击,紧追不舍,终于把42艘敌军舰船全部击毁、击沉,又一次显示了朝鲜水军的威力。从此“闲山岛大捷”宣告胜利结束,在海战史上又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

入侵朝鲜腹地的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敌酋统率的日本侵略军陆军主力,由于日本水军的连续受挫,难以补充军粮和其他战略物资,被迫暂停了进攻,放弃了夺取朝鲜海峡地区和黄海制海权的企图。

8月27日,英勇不屈的朝鲜义兵对日军群起展开坚决斗争。是日,赵宪率领700名义兵战士,与一支义兵灵主部队一道预计攻打锦山,因官军不配合作战,义兵与数万日军英勇决战,打死打伤众多敌人,终因寡不敌众,700名义兵全部壮烈牺牲。

9月1日,李舜臣等朝鲜将领所率朝鲜水军再次乘胜出征,冲向停泊在釜山一带的599余艘敌船。经过1天的激战,朝鲜水军又烧毁100多艘敌船,击伤击毙数千名敌军官兵,敌军极度惊慌失措,力避正面迎战,边战边退,逃到山上另建巢穴去了。

9月16日,义兵领袖郑文孚统率义兵对镜城发动进攻,全歼守敌,收复了镜城。

10月17日,明朝廷任命李如松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准备大规模地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军。

10月21日,郑文孚所率义兵继攻占镜城之后,又一举歼灭驻明川的一部日军。10月31日,义兵全部歼灭了吉州以北的侵略军。12月10日,义兵在双浦痛击侵略者,围歼了驻守端川的日军。义兵在咸镜道与敌斗争的连续胜利,奠定了尔后收复该道的基础。

朝鲜各地先后掀起了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义兵运动。很多僧侣在民族危机严重时刻,与广大爱国群众一样,也纷纷组织义兵,进行抗战斗争。妙香山普贤寺僧侣休静组织了1500名僧兵,以顺安法兴寺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取得累累成果。僧兵在收复平壤的战役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从广大义兵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来看,朝鲜义兵实际上已经形成保卫祖国的中坚力量。这支部队可以说是朝鲜政府陆军败退后,在敌后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力,是有力阻止日本侵略军灭亡朝鲜的重要力量。

另外,中国明朝在1592年12月派李如松率明军4.3万人从辽阳出发援助朝鲜。12月24日,明军渡过鸭绿江,进驻朝鲜义州(今新义州)。12月28日,明军离开义州。12月30日进驻定州。1593年1月2日,李如松率明军进驻安州(即顺安,次日进驻肃川)。

1月7日晨,李如松下令对平壤进行总攻击。朝、明联军从西、南、北三面对平壤城发起猛攻,破坏了敌军许多坚固的防御工事,并杀伤了众多敌军官兵。

1月8日清晨,在李如松的命令下,用大炮轰开了城门。李如松遂整军入城,众军蜂拥而入,骑兵云集,四处砍杀,而日军却龟缩在土窟中。日军将领小西行长退缩练光亭土窟(平壤城东部,紧靠大同江)。李如松命令督运柴草,四面堆积,以备火攻。但这时七星门、普通门土窟的敌军死守不放,明军攻打死伤甚众,甚至连李如松的坐骑也中弹而死。明军将领请求暂时停止攻击,李如松也深感一时难拔敌窟,部队饥疲难熬,遂暂时退师回营。

明军停止进攻之后,李如松通过翻译通告小西行长:“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而不忍尽杀人命,姑为退舍,开你先路。”小西行长回答说:“俺等情愿退军,请无拦截后面”。李如松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在当天晚上,命令朝鲜将领李镒撤回中和(平壤南)一路所设伏兵。是日夜,小西行长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平壤全城,趁河西冰封渡过大同江,

向朝鲜南部逃窜而去。明将李宁、查大受亲率精兵随敌追击,击毙敌军官兵 600 余人,生俘 3 人。朝鲜黄州判官郑晔截击小西行长之后,也击毙敌军官兵 90 余人。日本侵略军在撤退中,饥饿疲惫不堪,有的投藏老百姓茅舍,有的投宿寺庙内,也不断被群众和僧侣痛打砍杀,其惨状可想而知。朝中联军在当天晚上收复了平壤。

据《援朝抗日战争》统计,平壤之战战果如下:“平壤之战除焚溺者外,中国明军和朝鲜军共斩获日军 1647 人,生擒 5 名,夺马 2985 匹,救出朝鲜被掳者 1225 名,收复了平壤城。明军阵亡 796 人,马骡死 576 匹。”平壤城的收复,对日本侵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挫败了日本侵略军扩大侵略的阴谋,铸成了入侵敌军彻底失败的起点。

平壤之战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 集中了援朝的全部明军,以 4 万余兵力对 1.5 万余兵力,在兵力上占明显优势,并得到朝军的配合作战;2. 明军官兵援朝抗日,英勇杀敌,视死如归;3. 充分发挥了火攻战术的强大威力。

2 月 19 日,李如松率明军进驻开城,日本侵略军已将该城屠杀掠夺焚烧殆尽,丢下一座空城,急速南逃,明军继续向临津江进发。

2 月 24 日,李如松在开城商讨收复京城之策。

2 月 27 日,李如松为了解前方日军动静和作战地理状况,亲率明军 2000 人渡过临津江向南进军,一直深入到距京城(今汉城)仅 30 里之遥的碧蹄馆,在这里突然遭到日军的激烈袭击。李如松亲自指挥所率明军列阵对敌,明军施放火箭,敌人很少退却,后知明军兵员不多,又集中兵力反攻,双方殊死搏斗,敌人径直冲向李如松,危险至极。因双方众寡悬殊,明军势不能支,遂挥兵撤退,李如松亲自殿后。明军撤退,日军尾随追至惠仁岭。此时,明军将领杨元率后续大军 1000 人赶到,日军被迫停止追击退回。当晚李如松退至坡州,后又退驻开城。

碧蹄之战的挫折,给明军特别是给总兵李如松一个影响深远的教训,使之明确地认识到决不能轻敌冒进。当时,日军驻守京城的总兵力 4 万余人,前锋约 2 万人,而且是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部队。敌我力量对比敌人处于优势。因此要收复京城,直至把日本侵略军赶出朝鲜,必需补充实力,加强朝明两军的协同作战。为此,朝明联军调整了新的战略部署,暂停战略进攻,而把大军留驻于开城一线,不再前进,利用这个时机整顿联军,等待援军。通过上述的确切部署,为新的战略举措提供了两个有利的条件:1. 可以阻止日本侵略军可能发动的进攻;2. 可以在新的援军到前线时发动攻势,以收复京城。

3 月初,日军主帅丰臣秀吉得知侵朝日军受挫,粮饷不足,疾病流行,决定暂时撤军。明朝兵部尚书石星也认为明军长期异域他乡作战,官兵疲惫,也有意从朝鲜撤军。但是,朝鲜国王李昞一意想复国报仇,不断恳请明军与朝军联合作战进击日本侵略军。明军主将鉴于当时军事形势,按兵不动。

3 月 22 日,李如松指派使臣沈惟敬前往京城(今汉城)会见日军将领探讨和谈问题。

4 月 9 日,沈惟敬在龙山会见日酋商谈了和谈并议决了各项条件。

4 月 19 日,侵占京城的日本侵略军撤出了该城,并带走了朝鲜两王子和被俘大臣。据传 3 月下旬,京城(今汉城)内外日军总共有 5.3 万余人。

4 月 20 日,李如松率明军进驻京城。

5 月 2 日,根据丰臣秀吉确定的“和谈”条件,日本侵略军撤离京城的先头部队抵达

釜山附近地区。从京城撤退下来的日军,玩弄两种手法,一方面在庆尚、全罗两道的沿海城市先后修筑了18处坚固的城堡,作顽抗的准备;一方面派出使节到朝、明方面进行“和谈”活动。从此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又谈又打,谈谈停停,企图从谈判桌上取得在战争中难以取得实际利益的“和谈”时期。

第二阶段(1593.6~1597.1) 6月21日,日本侵略军在“和谈”的幌子下,大肆进攻晋州(庆尚南道)。当时朝鲜派出使臣曾多次请求分驻大丘(庆尚南道)、南原(全罗北道)和尚州(庆尚南道)等地,要明军给晋州军民以应急援救,明军以未得军令,均未行动。晋州全城被日军惨杀6万人。这时李如松本想进兵援救,但因日军很快退出晋州,遂按兵未动,致使朝军惨败。

6月28日,丰臣秀吉把“和谈”条件交给了明朝使臣并派出小西如安前往北京。

日方提出奴役朝鲜人民苛刻的无理要求作为“和谈”条件:

- ①在朝鲜八道中,允许日本占领南部四道。
- ②朝鲜、中国与日重开官、商贸易。
- ③朝鲜政府将王子、大臣各一或二人送到日本作人质。
- ④朝鲜国王应宣誓永不背叛日本。
- ⑤日本答应遣返被俘的朝鲜两王子。

明朝廷鉴于日本侵略军已撤到朝鲜南部并进入“和谈”阶段,似已无大的军事活动,遂下令明军撤回国内,只留一部暂驻朝鲜。

7月28日,李如松离开京城归国。朝鲜国王李昫曾在黄州送行。

8月8日,明军3万人离开京城。明朝廷决定2万人归国,1万人左右留朝与朝鲜军队一起镇守由朝、明联军控制的主要城市,由刘继统辖。

9月20日,朝鲜王朝任命李舜臣为三道水军节度使。在李舜臣水军节度使的统一指挥下,三道水军联合行动,密切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水军的作战能力,李舜臣将军决定将朝鲜水军总部从全罗道丽水迁到庆尚道的闲山岛。与此同时对枪炮进行改良和批量生产,并对大批舰船进行了修复。此外,还抓紧时机培养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人员。由于李舜臣将军的努力,进一步加强了朝鲜水军的战斗力。八九月间,丰臣秀吉也先后下令侵朝日军加强朝鲜沿海城市的守备,补充兵力并筹备所需的武器装备,以备再战。

在此情况下,明、日双方“和谈”使节来往穿梭,讨价还价,成败难定,各显其能。直到1596年9月,“和谈”依然处于僵持局面,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日方之所以同意“和谈”,主要是为了利用“和谈”的机会,积极进行再次发动战争的准备,拖是真,谈是假,以“伐交”代替“伐兵”。明朝统治集团对日本侵略军的“和谈”阴谋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早为朝、明人民所识破和揭穿。朝鲜爱国将军李舜臣就是一个公认的显例。他对敌人“誓海鱼龙动,盟山草木知”,对国对民“忧心辗转夜,残月照弓刀”,诗如其人,既充分表达了他彻底消灭敌人的决心和勇气,也充分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充分体现了“三尺誓天,山河动色”,为国捐躯,名垂青史的一生。

日本侵略军鉴于第一次战争失败的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只要李舜臣担任朝鲜三道水军节度使,负责指挥朝鲜水军,他们虽然在“和谈”的幌子之下,做好了再一次发动战争的准备,但也无法实现他们的侵略目的。为此,他们采用反间计,于1597年1月,日

酋小西行长派出间谍要时罗钻到朝鲜庆尚右兵使金应瑞处,捏造奇闻,散布流言蜚语,陷害李舜臣。朝鲜上下信以为真,全都中了敌人的奸计,朝鲜国王李昖轻信谗言谎语,下令逮捕李舜臣入狱。2月26日,李舜臣被押送到了京城(今汉城)。

日本侵略军的缓兵之计,蒙骗了朝鲜上下无能之辈以及明朝重用了“和谈”代表沈惟敬这一无赖,使其阴谋得逞,为日本对朝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大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阶段(1597.2~1598.11) 2月21日,丰臣秀吉下达动员令,调集14.1490万人的陆军和数万水军、数百艘舰船再次入侵朝鲜。从动员出兵到准备就绪抵达朝鲜共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6月,日本侵略军大部队陆续抵达朝鲜。7月中旬备战就绪,待命出击。中国明朝延获悉这一信息后,又动员了川、陕、浙、蓟、辽等地陆军及福建、吴淞水师等部队,再次出兵援朝。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开始进攻。日军与消灭朝鲜水军的先头部队,再一次派出奸细潜入朝鲜水军总部散布假情报,巧取朝鲜的信任,朝鲜水军中了敌人的诡计,仓促迎战,连续惨败。

7月15日夜,日本侵略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水陆夹攻停泊在巨济岛西部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朝鲜水军仓惶应敌,被包围三四重,不力抵抗,边战边退,舰船尽被烧毁,官兵几乎全部战死溺亡,接替李舜臣任三道水军节度使之职的元均也兵败身亡,闲山等要塞岛屿全被日军占领。日军因此取得了首次打败朝鲜水军的胜利。

日本侵略军强占闲山岛之后,控制了海上通道,遂即以水陆两路向全罗道进军。

8月1日,1.4万日本侵略军兵分3路向全罗道南原发起猛攻。恰巧这时,明朝援军的先头部队陆续进驻全罗、忠清两道。杨元率援军3000人驻全罗道南原。

8月3日,元均指挥的朝鲜水军惨遭败北后,朝鲜王朝在朝野上下强烈要求恢复李舜臣将军原职的沉重舆论压力下,无奈重新任命李舜臣将军为三道水军节度使,使朝鲜军民抗击日军侵略的爱国热情与获取胜利的决心为之一振。

李舜臣复职后,立即收罗了残存的12艘舰船和120余名官兵并在此残破的基础上重新整顿了三道的水军,确定地势险要的利津港为三道水军的基地。

8月16日夜,经过激战,日军攻占了南原南门,杨元负伤带10余人逃出西门,明军2700名官兵战死身亡,南原失守。

8月19日,陈愚衷率明军退出全罗道的守城全州,向北撤退。南原失守,全州以北瓦解,明军退守京城。明副总兵解生、牛伯英、杨登山等率精兵2000人坚守忠清道稷山。日军占领南原、全州以后,又连续占领了海南、顺天、宝城等地,几乎占领了朝鲜的谷仓全罗道地区,以借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8月28日,李舜臣将军指挥朝鲜水军一举击退了驶来偷袭的8艘敌人舰船之后,立即率舰船驶入珍岛东北地势险要的碧波亭水域,利用海潮时涨时落的特点,在鸣梁口东西通道口暗设铁索、木桩等物,以阻碍敌人舰船行动,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这一巧妙安排是为著名鸣梁大捷所做的万无一失的准备。

9月7日,日本侵略军右军先锋黑田长征率军猛攻稷山,左军进攻舒川,企图一举而占两城。解生等亲临阵前指挥精兵2000人奋力抗击,在游击摆寒亲率援军2000人密切协同,英勇杀敌,日军死伤不计其数,溃败而退。

明军在关键的一战取得了胜利。稷山战后日军开始南撤,明军南进。敌酋丰臣秀吉下令日军不再准备进攻京城,在占领全罗、忠清两道之后,立即撤到釜山、西生浦等地沿岸一带,企图持久盘踞,蚕食朝鲜,然后再犯明朝。

9月16日的鸣梁大捷的辉煌战绩,既大大鼓舞了朝鲜军民的抗敌意志,又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水陆并进的侵略计划。

与此同时明朝廷决定任命总督邢玠和提督麻贵为援军将领,统率4万大军再次援朝。明朝援军渡鸭绿江后,与朝鲜权栗都元帅所辖和指挥的朝鲜陆军会师,组建朝、明联军,协同作战,向南挺进。

稷山战役和鸣梁大捷以后,日本侵略军各部相继南撤,形成从蔚山到顺天的沿海要点的防御阵势。加藤清正驻守蔚山,小西行长驻守顺天,岛津义弘驻守泗川,各筑营垒,以图再犯。

12月20日,明军进驻庆州,以备专攻蔚山。蔚山依山傍水,东与岛山相连,水路通向大海,西与生浦、釜山等地相联,陆路也可经彦阳通釜山。此地水陆相通,对联系作战十分有利。驻守蔚山的日军总兵力约2万人左右。为取蔚山,联军详细地作了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

12月23日午夜,明军兵分3路从庆州直捣蔚山。黎明,左协李如松率先头部队与守敌相遇,交战后佯退,敌人乘机追击,明军大军参战,歼敌400余人(一说500余人)。交战时,适值敌将加藤清正在西生浦监督修筑土木工事,得知明军攻城,星夜返回蔚山,明军强攻蔚山未果而退。

12月24日,明军继续强攻蔚山,英勇冲杀,但仍未攻下此城。

12月25日,明军再次强攻蔚山,仍未见成功。

12月28日、29日,明军连续强攻,甚至准备火攻,两天进攻均无效。

12月30日,敌将加藤清正见几天来连续受到猛攻,蔚山全城已无粮无水,殆无生路,难以继续应战,遂派联络人员给明军将领送信,乞求讲和,遭到回绝。

1598年2月7日,驻西生浦的水陆日军1.3万余人增援蔚山。

2月8日,明军再次进攻蔚山,死伤近500人,攻城未果退回。

2月9日,明军对蔚山发起总攻击。守城日军与多路援军,遥相呼应,协同反击,明军攻城无效,决定撤军。日军见明军撤退,守军与援军一起追击,明军败退死伤3400人。倾注全力进攻蔚山的明军就这样败于旦夕。

2月10日,明军经略杨镐退至庆州,然后回到京城。明军对蔚山发起攻击前后10余天,始终未果,究其原因主要是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1. 没有掌握敌情,没有攻击蔚山坚固石城的充分准备,势必屡攻屡败。2. 攻坚无效,没有采取“野战歼敌”的有效战法。3. 没有及时改变主攻方向,处理围城与打援的关系失当。4. 盲目撤军,组织杂乱无章致使遭受重大伤亡,前功尽弃。

蔚山战后,日本侵略军的战略总方针是:继续占据从蔚山到顺天的沿海地区,固守要塞,作长期准备,在朝鲜南方站稳脚跟,蚕食全朝鲜,最后进犯中国。明军的战略方针是:水陆并进,分路进攻三要塞——蔚山、粟林、泗川。

此时在京城的首席大臣邢玠,鉴于蔚山失利,决定继续请求援兵,特别强调增调水军,对敌实行水陆夹攻,全歼盘踞朝鲜南部的日本侵略军。据查固守要塞的日军只留有6.47

万人,一半以上的兵力已回国休整。邢玠遂在2月,任命副总兵督都佥事陈璘为御倭总兵官。陈璘之广兵、刘继之川兵、邓子龙的浙兵相继调往朝鲜。同时把明朝援军分3路并进,陈璘率水军,在海上策应,水陆夹攻,全歼日军。

6月4日,明军杨镐因蔚山失利被免职。

6月24日,命万世德为经略取代杨镐。

7月15日,陈璘率水军进驻古今岛,与李舜臣将军所辖水军会合,组成联合舰队,牢牢地掌握了朝鲜南海的控制权,切断了敌军的退路。朝鲜水军7328人,陈璘水军1.94万人。连同上述陆军兵力,朝鲜和明、朝联军的总兵力共11.3万人左右,与日军留驻兵力相比占有明显优势,很有再战必胜的把握。

8月18日(明历19日),敌酋丰臣秀吉因日军侵朝一再失利,积郁而死于日本的伏见城(今京都市伏见区桃山町)。日本侵略军得知丰臣秀吉死亡的消息后,留在朝鲜的日军将领和所辖官兵均无心再战,加之日军已被明、朝联军重重包围。四面楚歌,军队涣散,形势对其十分不利。为此驻守顺天的敌酋小西行长又提出停战和谈的建议,遭明、朝联军的拒绝,无计可施,只有请求援军前来解围了。

9月20日,刘继率明军攻顺天东南、三面临海、筑有坚固营垒的敌酋小西行长的主营曳桥。此时明、朝联合水军也已泊在曳桥临近海域,准备水陆强攻。但因日军以1.3万余人的兵力防守,小西行长坚守不出,明军陆上兵力几次强攻,均无奏效。翌月2日,刘继率陆军,陈璘率水军协同强攻曳桥,受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水陆夹攻也无结果。

9月20日,董一元率明军进攻晋州,日军不战而退,逃到昆阳、泗川。明军占领晋州,继续追击敌军。在10月2日,明、朝联军以多达2.9万余人的强大兵力对泗川的新寨发起了进攻。新寨三面临江,一面受冲,守敌十分惊慌。但正当联军以炮火轰开守敌城门,各路部队冲向城里的时候,明军游击彭信古营中火药着火,顿时,全军大乱,争先逃脱险境。敌军乘机追杀,明军惨败,死者多达七八千人。董一元退回晋州。

此次战役前后14天(9月20日~10月3日)。明、朝联军四路出击,水路夹攻,虽有小胜,稍有进展,但损失近万人之众,是一次失败的战役,也是明军将领战略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11月,日本侵略军在朝、明联军和朝鲜各地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已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外遭联军的重重包围,内呈士气低落,军纪涣散,分崩离析之势,同时根据丰臣秀吉的遗命准备撤军,不拟再战,打道回国。因此出现了欲战有难,欲撤不能,坐以待毙的局面。

11月16日,面临覆灭命运的敌酋小西行长派出满载枪剑、马匹等物的7艘船只驶向李舜臣的本营,乞求李舜臣接收此礼放其率日军回国。李舜臣对此愤慨万分,严辞拒绝了敌人的物质诱惑。敌人的卑鄙行径更加激发了李舜臣率军全歼不共戴天之敌的满腔热情和战斗意志。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小西行长只好向驻守泗川的日军求援,以解其被围之困。

11月17日,泗川守敌将领鸟津义弘率日军500余艘舰船和大批部队,从水路支援小西行长,妄图一举冲破朝、明水军的联合防线,打通回国之路。朝、明联合舰队,根据敌军这一动静,立即连夜驻进露梁海峡。李舜臣和陈璘亲率联合舰队扼守海口,切断了敌军的退路,严阵以待,迎接一场空前激烈的歼灭战的到来。11月19日凌晨,隐蔽停

泊于露梁海域的朝、明联合水军舰队,向敌军展开了猛烈进攻。李舜臣擂鼓督战首先冲向敌人舰船,被日军舰船包围。陈璘见状急忙冲入包围圈救援,形势十分危急。经过激战,陈璘突然鸣金收兵,舰船之上,一片寂静,日军疑有诡诈,不敢贸然进攻,稍稍后退。明船突然枪炮齐发,很多日军舰船被击中起火,被击毙和跳水溺死者不计其数。这时,李舜臣已冲出重围。年过70的明水军老将邓子龙勇往直前,亲率200名勇士追击日船,投掷火球,向敌舰船进攻。正在激战时,不料,邓子龙的舰船被烧起火,日军趁势围攻,李舜臣前往救援,邓子龙力战身亡,为朝鲜人民光荣献身。李舜臣与陈璘自始至终,密切协同作战,合力夹击日军,用虎蹲炮轰击敌船。此时,李舜臣胸部中弹,伤势很重,在危垂之际,嘱咐他的儿子李荃和侄李莞说:“战方急,慎勿言我死”,说着说着便与世长辞。李莞遵照李舜臣的遗嘱,以李舜臣的名义,发布命令,继续督军作战,直到日本侵略军渐渐不支,溃败而终。

通过露梁海战,朝鲜、明朝联合舰队共击毁击沉敌军200余艘舰船,消灭敌军2万余名官兵、俘虏180人,溺死不计其数。

露梁海战,从战略上来说,它是海上伏、夹攻成功的一次战役;从明朝援军作战和朝鲜壬辰卫国战争来说,它是援朝战争和壬辰卫国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获得巨大胜利的一次战役。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明代中后期,在手工业各部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若干手工业部门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在丝织业、棉布加工业、矿冶业、榨油业等部门中最为明显。从地域上看,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主要出现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

元末明初的徐一夔在《织工对》中记载,当时杭州有人置备四、五张织机,佣工以织,“日佣为钱二百缗”,技术高超者拥值加倍,织工若对佣值不满,还可自由离去(《始丰稿》卷一)。很明显,这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纺织作坊。但在当时,这只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

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丝织业的迅速发展,从农家副业中分离出来的从事专业经营的机户越来越多,并且在机户中还产生了大户和小户的分化。这为丝织业中的雇佣关系的发达创造了条件。如张瀚《松窗梦语》卷六记载,其祖先在成化时期因经营酤酒业失利而转而购买了一张织机,由于织品质量上乘,很受欢迎,获利较多,“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家业大饶。就当时丝织业生产力而言,每张织机至少需要二三人同时操作,拥有20多张织机至少要雇佣七八十人。冯梦龙《醒世恒言》卷18也曾描绘苏州盛泽镇上的小业主施复的发家故事。嘉靖年间,施复夫妇在家中开了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他们的织品光彩润泽,上市出售,人们竞相购买。施复利用所得利润扩大生产,几年之后就增加了三四张绸机,不上10年,便积累了数千金家产,买了两所大房子,开设三四十张绸机,成为大规模的丝织作坊。也有许多小业主不像施复那样幸运,而因种种原因破了产,便只能受雇于施复这样的大户。

在明代后期的苏州,机户至少在3万家以上,受雇织匠的数量当很可观。据《明神宗实录》卷361记载,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也就是说,其时“机户”雇佣“机工”从事丝织生产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蒋以化对这种情形也有所描绘,他指出,苏州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饷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西台漫记》卷四)。蒋以化所说的“大户”和“小户”,就是《明神宗实录》中所说的“机户”和“机工”。机工是“自食其力之良民”,他们“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明神宗实录》卷361),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是可以随意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他们与“张机为生”,即依靠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剥削的机户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货币关系。

在棉布加工业方面,由于棉布是需求量极大的消费品,明王朝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费者,每年消费总额多达1500万匹。为了保证棉布来源,政府大力鼓励农民植棉,并将棉布列为征税目标。这一方面促进了家庭棉纺织业的普遍化,另一方面也使绵纺织业长期徘徊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范畴之内。随着棉织业总体规模的发展,渐渐有一些家庭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工作上,甚至全日纺织,专门为市场进行商品生产。在棉布的市场流通量不断增加的基础上,从成化时期开始,政府逐步放弃了征纳实物而改征白银,到万历初期,棉布折银制度巩固下来,这自然又反过来提高了棉布流入市场的数量,因为纳税者需要在市场上把棉布换成白银。

棉纺织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为棉布加工业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当时的棉布加工业多数是个体生产的家庭手工业,但也有个别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其中最突出的是松江的棉布袜制造业。据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载,松江原来没有夏天穿用的袜子,许多人大热天还穿着毡袜。万历以来,有些人使用尤墩镇出产的棉布制成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闻,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很明显,暑袜店的店主把原料尤墩布分发给当地男女使之缝纫成袜,已是由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的包买主;为店主缝纫暑袜的男妇以“从店中给筹取值”为主,自然是在自己家中为店主工作的雇佣工人。在这里,虽然没有形成像苏州织织业那样的手工工场,但其资本主义的经营性质是十分清楚的。

在矿冶业方面,随着民营矿业的发展,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不少规模较大的冶铁手工工场。如在徽州,有资本的富户“租赁他人之山”,寻找矿穴,“即得矿,必先烹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砂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换,约四、五十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引《徽州志》)。福建龙溪铁矿较富,有赏财者往往“招集四方无赖之徒,来彼间炼铁,每一炉多至七百人”(张萱:《西周闻见录》卷40)。所谓“无赖之徒”,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

广东的冶铁业规模更大。“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广东新语》卷15)。从开矿、烧炭、冶炼到运输,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线,并且带有综合经营的特点。这些工场中的劳动者基本上都是雇佣而来的,这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中的记载可明显看出。据该书说,广东“韶惠等处系无主官山,产生铁矿”,本地有财力的“山主矿主”,“招引福

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徙”，每年于秋收之际，“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峒，创寮住扎。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炉，煽铁取利。山主矿主利其租税，地鬼总小甲利其常例，土脚小民利其雇募”。很明显，这里的“山主矿主”是土地的占有者，上杭等县前来的“无籍流民”从山主矿主那里租下矿山，再雇佣“土脚小民”进行生产。“土脚小民”与雇主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纯粹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因而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

云南铜矿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明代对铜矿的控制要比铁矿严格，铜矿属国家所有，采矿必须得到官府批准。一般说来，当找矿发现达到一定储量的矿穴后，便由“硃头”出面报官。批准后，硃头“视硃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硃头约束者也。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铜，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硃头任之，硃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硃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无若干人入硃，至暮尽出硃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硃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硃头得之；一聚为义夫平分之”（王士性《广志绎》卷五）。在这里，国家是矿山的主人，硃头是拥有开发矿山资本的“租地资本家”，义夫则是被雇佣来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义夫的报酬虽然通过分红的方式获得，即用对分产品的方式代替了货币工资，但这并不能掩盖硃头与义夫之间所存在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在中国农村和城镇中，很早就有榨油作坊存在，但一直规模很小，并且大多属于家庭副业。直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了一些拥有巨资、雇工很多的大型油坊，从中还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是浙江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的榨油业。据记载，万历年间，该镇共有油坊20家，“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帝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无赖，或故髻钳而匿名畏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康熙《嘉兴府志》卷一）。很明显，油坊中的工人都是雇佣而来，所谓“赤身无赖”云云，正说明这些雇工已丧失了土地，脱离了官府户籍的束缚，成为纯粹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记载中曾提到，对于这些雇工，“即坊主亦畏之”，可见他们与坊主没有形成任何人身上的依附关系。每个油坊平均雇工达40人，规模相当大，油坊主人完全可以脱离劳动，依靠剥削雇工的剩余价值为生。类似这样的大榨油作坊在其他地区亦有，如苏州府吴县的新郭及横塘一带，就有不少人开设榨油作坊以谋利。

除上述几个部门外，其他手工业中也存在大量雇工现象。如江西景德镇在明代后期民营瓷窑发展至二三百区，较大的民窑每次可烧小器千余件，需要用工数十人，于是“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势之若鹜”（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八）。万历时期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光绪《江西通志》卷49）。再如江西铅山县石塘镇为造纸专业市镇，万历时“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康熙《上饶县志》卷10），总计帮工达五六万人之多。这些手工工场的经营方式也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

反税监、矿监的斗争

所谓“市民运动”，又称“市民风潮”、“城市民变”，是指以城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贫民为主体、以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群众性的反抗运动。在明代，它集中爆发于万历、天启二朝。万历朝的目标是反对矿监税使，天启朝是抗议宦官干政。这场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引爆线，是明神宗推行“榷矿榷税”的政策。

张居正的改革遭到扼杀以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围绕着立皇太子而展开的、历时15年之久的“国本”之争，以攻击和斥东林党人为内容、前后延续30多年的“东林党议”，耗银1000余万两的“万历三大征”（即征宁夏致仕副总兵□倅拜、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以及援助朝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援抗倭正义战争），闹得满城风雨的晚明宫廷三大案（即万历朝开始实行的“辽饷”以及崇祯新增“红丸案”、“移宫案”）；三次追加全国田赋的明末“三饷”加派（从万历朝开始实行的“辽饷”以及崇祯朝新增“剿饷”、“练饷”）等。这些事件的出现表明明王朝已经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陷入绝境。而此时，昏懒贪财的明神宗却深居九重，数十年不视朝，章奏堆积如山而不批，留在宫中，束之高阁，名曰“留中”，层层缺官而不补，政事无人处理。据《明史·田大益传》云：（万历三十年）“时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更有甚者，还有“中外所争，最苦无财”，国家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为满足其毫无止境的私欲，不顾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对，大兴“榷矿榷税”，横索民财，供其专用。

中国矿业历史悠久。但由于历代封建王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加之崇奉迷信，对开发矿藏往往不感兴趣，甚至极力反对，视开矿为利藪。从明太祖开始，历朝都为矿事争吵不休，有的力言其利，有的极论其弊，因此时开时停。且由于管理不得法和矿官贪污舞弊，每次开矿往往有亏无盈。例如，从嘉靖二十五年（1546）十月至三十六年十二月的10年间，称后委官40余人，派遣护兵1180人，俸粮、器械、铅、炭等费银30000余两，而开采所得只银28500两，“得不偿失，因罢其役”（《明史》卷237）。但因明神宗“溺志货才”、“好纲成癖”，依然借开矿为“出利之孔”。并屡次欲兴矿税，曾下专旨责问内阁为何不见行动。由于阁臣申时行、王锡爵等人坚决反对，一再谏阻，才暂时中止。万历二十年以后，“三大征”接踵而起，军费浩繁。二十四年安陆、坤宁、乾清两宫又被火化为灰烬，急需筹款重建。明神宗遂下令开矿，正式派遣大批太监为矿监，督领矿税。已而，又命大批太监为税使，分赴各地专收商税。“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出，多兼矿务”，矿监和税使变为一身二任。明神宗对所派出的矿税使，“皆给以关防”，委以重权，而大队人马，每到一地，开设中使衙门，恣行威福，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终万历之世，引起全国民怨沸腾的矿监、税使之祸，“因之大兴”，“海内骚然”，前后达20余年。从北到南，由东到西，全国两就十三省都派矿税使，而且是无处不开矿，无地不征税。甚至是“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明史》卷237）。不论纳矿税、商税。其中，税使之祸尤烈于矿监。“自矿使出而百姓之革更甚于兵，税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矿”（《皇明经世文编》卷400）。据统计，自万历二十六（1598）至三十四年掠夺到的财物有银6715700余两、金22570两，另

有金银制品、珍珠宝玩不计其数。实际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因为横索所得,入内府供皇帝专用者一,矿税使贪污者二,随从瓜分者三,恶棍骗去者四(同上)。如,广东税使李凤一人即积有私货300余担。

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必然引起政治上动荡不安。明神宗的疯狂掠夺终于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神宗命天津税监马堂兼领山东临清税务。临清原是运河沿岸著名的重镇,商贾聚集,店铺林立,贸易发达。马堂到临清以后,科征无艺,连零星米豆亦皆抽税,甚至青天白日用武力强夺民产,于是商店纷纷倒闭,居民大批失业,衣食无着。同年四月,临清居民万余人在小商贩王朝佐的带领下,全城罢市,放火焚毁税监衙门,杀死马堂的随员37人,史称“临清民变”。这次民变声势浩大,矿税使的嚣张气焰“从此顿减”。王朝佐的行动,表达了各阶层的共同要求。在他被捕就义以后,各等大小商人和市民深深怀念他,立祠祭礼,并百般照顾他的家属。临清市民的英勇斗争,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年十二月,为抗议湖广税监陈奉一伙横行掠夺和公然侮辱生员(知识分子)的妻子,武昌、汉阳居民一万多人,群情激奋冲入税监衙门,用瓦片、石块打伤陈奉,是为“武昌、汉阳民变”。

市民运动风起云涌,说明“榷矿榷税”政策不得人心。也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恐慌,要求停止矿税使的呼声日益高涨。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和十二月,凤阳巡抚李三才和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等分别上疏,严厉抨击明神宗“崇聚财贿”,“以金钱珠玉为命脉”,而不顾百姓的死活,用宦官为矿监税使,专事劫夺民财。“官吏农工皆为入税之人”,人人无不深受其害。四海之民为此反唇切齿,积怒已久。一旦众心齐倡,天下必然崩溃,“此所谓怨极必乱也”(《明史》卷二二一《李三才传》、卷二二七《田大益传》)。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武昌市民数万人为抗议朝廷偏信湖广税使陈奉的诬告,逮捕湖广分巡佥事冯应京,群起抗暴,包围税监衙门,“誓必杀奉”。陈奉狼狈逃窜,愤怒的群众将其党徒16人投入长江淹死,又烧毁湖广巡抚衙门。史称“武昌民再变”。武昌两次民变与临清民变不同的地方,是领导者俱为生员,说明明末市民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到矿税使迫害的社会各阶层都置身于其中。

事后,廷臣再次纷纷上疏,说由于矿税使如虎似狼,逢人咆哮,层层盘剥,今日乡里空,山泽宽,国库空。苦矿苦税之民知祸不可解,必定群起为变,变速罢开矿征税,撤回矿税使,不然国将无救。神宗见疏,沉迷不返。各地矿税使为虐变本加厉。司礼太监孙隆督税浙直,驻扎苏州,随意加征苛捐杂税,致使广大机户关厂停产,织工失业。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继“武昌民再变”之后,苏州市民忍无可忍,由织工葛成(葛贤)率领广大市民举行了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苏州民变”,将孙隆的死党六七人溺死河中,焚烧税棍的住宅,包围税监衙门,要求停止征税。苏州为明代全国闻名的纺织业中心,商业大镇,经济贸易十分发达,工人集中,这次市民运动由手工业工人直接领导,意义无疑重大。它说明在中国工人阶级正式形成以前,他们的先辈已经勇于挑起历史重任,并为保护广大市民的生命安全,视死如归,自己昂首挺胸走进牢门。

矿税使之害不除,市民的反抗斗争就决不会终止。万历三十年(1602)江西景德镇工人万余人起义,毁器厂,烧税署,打死江西税监潘阳的爪牙,并迫使潘阳偷偷溜走。云南腾越居民暴动,杀死税监的打手,焚毁税厂。廷臣纷纷上请罢矿使之疏至此已达110

余件,明神宗被迫于万历三十三年下诏罢各地矿税,以税务归有司,以岁输所入的一半归内府,另一半归户、工二部,叫做“集矿分税”,但拒不撤回矿税使,纵其继续肆虐。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月,云南指挥贺世勋率领冤民万余人,发动“民变”冲入云南税监杨荣的衙门,杀死杨荣及其党200余人,史称“云南民变”,朝野为之震动。万历三十六年(1608)“辽东民变”,税监高淮乱辽十年,至此狼狈逃入山海关。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福州民变”,市民万余人起义,誓得福建税监高赭“而食其肉”,吓得高赭不敢离衙门一步。中使威风,从此扫地。

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二十七年(1599)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以前,各地共发生市民运动30余起。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病死,遗诏罢矿税,召回矿税使。虽然繁重的税役剥削没有因此而停止,但作为万历一朝流毒全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矿税使出扰民的现象,毕竟暂时宣告结束。明末市民运动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反对榷矿榷税的经济斗争转入以反对宦官暴政为中心的政治斗争。天启六年(1626)为抗议宦官魏忠贤逮捕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御史黄尊素,而先后发生的“苏州民再变”与“常州民变”;以及同年反对为魏忠贤建生祠,由生员吴绶领导的“杭州民变”等等,都和经济问题无关,而完全是一种为维护封建法制而展开的政治斗争。

虽然,在明末市民运动中未见有鲜明的纲领与口号,没有形成组织,参与者成份复杂,斗争形式也比较原始,主要是罢市、示威、鼓噪和殴击,更没有和当时各地的农民起义斗争结成同盟。但是,它集中发生于经济、贸易发达的中心市镇,而且以空前的规模骤然形成一股广泛的社会风潮,延续数十年,遍及全国各地,不失是当时反对封建统治的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这股新兴势力的出现,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熟,城市经济的迅猛增长,以及市民思想的觉醒。这些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这也是明末市民运动兴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基础。

东林党和复社

在明末市民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地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裂痕,产生了要求改革,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集团。它的出现,有力地冲击着贵族大地主的僵化政治,透视出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的某些新变化。这就是以江南中下层官吏为代表、以讲学议政为方式,而被封建统治者斥之为“党”、而欲加以党锢之罪的“东林党”和稍后的“复社”,及其所发起的党社运动。这场党社运动,是继张居正改革之后地主阶级内部发动的又一场自救运动,目的是刷新政治,振兴明室。这场运动,由顾宪成的“东林党”开其端,迄张溥的“复社会”而结束,历时40余年。

从万历中期开始,由于朝政日非,廷臣树党相攻之势益炽,“百官不知职业,惟以营进”竟立门户,纷争不已。万历十四年(1586),明神宗以皇三子常洵出生,封其母郑贵妃为皇贵妃。而恭妃王氏生皇长子朱常洛已5年,仍不得进封。内外因之议论纷纷,疑神宗将另立丘三子为皇太子。一批廷臣遂上疏请封皇长子为皇太子,“以定天下之本”,神宗不听,舆论沸腾。所谓“国本”之争日趋激烈,“门衣之祸大起”。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内阁首辅王锡爵上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朱常浩)三王并封之议。神宗立即

表示同意。礼部主事顾宪成,以伦序有定,反对三王并封,请及早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一场所谓“定国本”之争,闹了多年。恰巧是年又值农历癸巳年,例当举行京官考察(京察),主察者为吏部尚书孙铤和考功郎赵南星等人。他们在顾宪成的积极支持下,矢志澄清吏治,杜请托,汰贪墨,罢斥了一批赃官污吏。一些人对此大为不满,恶意进行攻击。赵南星以“专权植党”罪被革职为民。孙铤上疏论断,不听,愤而闭门不出,最后谢职归里,朝中“善类摒斥一空”。次年二月,会推阁臣,顾宪成(时为吏部郎中)所推者皆逆旨,遂被罢落职。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别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历任户、吏二部主事。性刚直,遇事敢言。万历十五年以上书批评当局处事不公,被旨切责,贬为桂阳州判官,迁处州府推官。十九年进泉州府推官,举公廉第一。天性聪明绝人,自幼有志于研究学问。无锡原有东林书院,为宋代大儒杨时(1053—1135,字中立,世称龟山先生,福建将乐人)讲学处。顾宪成被罢官家居时,与弟允成倡议将其重新修复。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落成,面貌一新。宪成遂偕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诸人,讲学其中。这些人都是比较正直、廉洁,有抱负,而又因不满当局被削职的官吏和知识分子。

顾允成(1554—1607),字季时,号泾凡,顾宪成之弟,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性耿介,重名节。曾上疏论救当代名臣海瑞,反对神宗三王并封,被罢归定,一心在林讲学,不复为官。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别号景逸,与宪成同里。万历十六年(1589)进士,授行人,谪广东揭阳典史。家居讲学30年。天启六年(1626)得悉魏忠贤将派人逮捕他,视死如归,在家自尽。

钱一本(1539—1610),字国瑞,号启新,江苏武进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知县、御史,疏争“国本”,“言最戆直”,被削为民,家居25年,潜心切磋学问。

薛敷教,字以身,号玄台,与一本同乡。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与高攀龙同为赵南星的门生。历官教授、国子助教。以疏救赵南星谪光州学正,归家不出。

史孟麟,字际明,号玉池,江苏宜兴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太常少卿。上疏逆旨被贬,愤而弃官专心理学,教授生徒,一时名士多出其门。

于孔兼,字元时,号景素,江苏金坛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官郎中,上疏反对三王并封,又申救赵南星,皆被责贬斥,遂谢政家居20年,杜门读书讲学。

顾宪成曾经明确说过:“他最鄙视以下三种人:居官朝廷而志不在忠君报国,身为地方大吏而志不在关心民生,在野时只讲求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不关心国事者。这实际上也是东林士人政治观点和政治标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贴在东林书院里的这副对联,则可以说是东林的政治主张。它旗帜鲜明,很富有号召力。所以,当是时抱道逆时的士大夫,退处林野的官僚,皆“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等人不是一般的学生,而是政治斗争的勇士。他们建立书院的真实意图,不是为讲学而讲学,而是以书院为地盘,通过聚众讲学,培养人材,扩大影响,积蓄力量,增强东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之名大著(《明史》卷231),人称“东林党”。

后来,顾宪成诸人的好友孙丕扬(1532—1614,字叔孝,陕西富平人)、邹元标

(1551—1624,字尔瞻,江西吉水人)、赵南星(1150—1627,字梦白,今河北高邑人)等一大批较正直的官吏先后入院讲学,“自负气节,与政府相抗,是为东林党议之始”(《明通鉴》卷70)。“与政府相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东林党的政治性质,它不只是个谈经论道的学术团体,更重要的是一个“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誓“与政府相抗”的政治集团。“是在明末腐朽社会中形成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是贵族大地主的保守政治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相互撞击的产物。

江南,是明代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各种社会矛盾也特别尖锐复杂。从明初以来就被封建朝廷认为是“繁剧难治”之地。封建朝廷与江南地主两者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矛盾冲突。前者坚持独裁专政和垄断财富,后者则要求参与政治,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由明太祖制定的封建朝廷对江南的基本方针旧:经济上坚持重赋剥削,政治上限制和打击地主势力。而其中遭受剥削和限制的主要是中小地主。明中叶以后,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贵族大地主的日趋没落,这种矛盾斗争也就愈为尖锐起来。特别是江南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对贵族大地主的腐朽政治越来越表现出不满和反抗。“东林党”人士主张宽赋于民,减轻剥削,以避免“驱民为资”;坚决反对矿税的残酷掠夺,要求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主张开放言论,澄清吏治,反对宦官干政,希望稳定社会秩序。所有这些主张都是针对当时贵族大地主专制统治而提出的,表达了江南中小地主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些主张,“东林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在万历中(二十至三十)和天启初年两度掌权,左右朝政。东林党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先辈,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进步思潮。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顺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趋势,在历史上具有进步作用。

由于明代末年,门户之见大开,随着东林声名大著,忌之者亦日多。各种保守势力皆视东林为大敌。“众射之的,威指东林”(《明史》卷231)。宣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等像一群“当关虎豹”,“声势相倚,并以攻击东林,排除异己为事”。凡事稍有异议,他们即群起攻而逐之,大僚非其党不得案于其位。从而使“东林党”人除了耗精力,唇枪舌剑之外,事事难成。天启三年(1623)以后,魏忠贤擅权乱政,凡逆其志者,“率指目为东林,攻击无虚日”,杀戮禁锢,一网打尽。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在“东林党”人遭到残酷镇压以后,江南地区又一批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接过东林的旗帜,运用结社的形式,继续与贵族大地主的腐朽政治进行斗争。

以文会友,通过结社聚会,一方面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选择知己;一方面切磋学问,揣摩风气,议论时政,以扩大影响,壮大自己干预政治的力量,是在明末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爱国之心之中小地主知识分子,为革新政治而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自东林起后,踵之者不绝。至崇祯年间,影响最大的是张溥、张采领导的复社。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娄东人。泰昌元年(1620)补博士弟子,自此名重一时,声震文坛,广交各地贤士。崇祯四年(1631)举进士。他为人宽厚,有兼容并包的风度,以故四方名士奔走其门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他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干练人物,具有号召天下的组织才能。张采(1596—1648),字受先,号南郭,与张溥同里,人称“娄东二张”。也是张溥最知心的朋友,同窗共读,互相勉励。张采性“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知江西临川县令,“摧强扶

弱,声大起”。后以病归家,“士民泣送载道”(《明史》卷288),威望很高,深受地方官赏识。天启四年(1624),正当魏忠贤逆势方炽之时,张溥慨然创“应社”于苏州。江、浙各地的名士纷纷响应入社,“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应社和东林一样,名义上以读书为社事,实则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因此,它“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很快由江南扩及江北、河北等处。

天启六年(1626),“苏州民再变”,市民颜佩伟、杨念如、马杰、周文元5人,为反抗魏忠贤暴政英勇献身。次年,魏忠贤死,人心大快。张溥作《五人墓碑记》,热情讴歌五烈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奉献精神,崇善辟恶,发扬正义,充分表达了张溥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崇祯元年(1628)春,张溥、张采在北京“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毅然在京集同志组织“燕台社”(亦称“燕台十子社”),标志着二张将由以文会友、探索学问,进而步入政治领域。是时,“拨乱反正,文社四起”,俱以张溥为领袖。崇祯二年(1629),在政治危机空前严重,明王朝行将败亡的关键时刻,张溥以天下为己任,在江苏吴江尹山召开复社成立大会(尹山大会),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张溥提出的宗旨是:忠君(“致君”)爱民(“泽民”)。他说:自世教衰落,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而已。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名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这个致君泽民的宗旨,从文字到内容都和上述顾宪成提出的三条政治标准毫无二致。张溥自己也说:“吾嗣东林。”所以,一般人都视复社为“小东林”。

复社以江南为中心,为东南一大社。当时加入复社的著名社团有:江南应社,松江几社,苏州羽朋社、匡社,浙西闻社、庄社,浙东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黄州质社等。张溥既合诸社为一社,建立社规,制社词,定课程,互相分工,以共同振兴学术,培养人材,拯救明室为先务。在组织方面,各地均设有社长,专门负责内政和外交。又用编辑文集的形式(名为“国表”)详细登录社友姓名,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复社纪略》卷一)。这些都是以往的社团所未曾做到的,而张溥被称为“在野政党之魁杰”。故有人以为复社为近代中国政党之雏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复社,“党羽半天下”,成员遍及大江南北。分布于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18个省、市,有姓名可考的社员3025人,文章数千篇。“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复社也因此“由诗文的结合而变为政治的运动”,声势震天下,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嗣东林”,而又非东林所可比。

崇祯四年(1631),张溥中进士,改庶吉士,时宜兴人、内阁首辅周延儒第一次见到他,就赞叹不已,“恩礼倍至”。张溥在京因此得以任意临事,裁决可否,影响朝政。周延儒有才气,但性贪婪,而且为人圆滑,立场多变,很多大僚对他甚为不满。他居乡时颇支持东林,善遇“东林党”人。执政后,立即与东林反目。及主持会试,所取士多又张溥等一代名流,有意进行拉拢。从而为复社一度直接干预国家政治,左右朝政提供了方便。但也使复社因此而深深地卷入最高统治集团派系斗争的旋涡之中。

此时,辽东战场硝烟弥漫,后金节节胜利,步步进逼,明末农民大起义方兴未艾,气势磅礴,明王朝处于南北夹攻,腹背受敌,内外交困之境。在明王朝大难临头的严重

时刻,复社为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通过直接参政,实现其忠君爱民的宗旨,挽救明王朝,于崇祯六年(1633)初,约集各地社长在苏州举行第三次大会(虎丘大会),山左、江右、楚、闽、浙等处到会者数千人,会场内外水泄不通,人人竞以入复社为殊荣。观者以为规模之大,情绪之高涨,为三百年来所未见。这是复社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集会,也是复社发展的鼎盛时期。

虎丘大会以后,“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有人公开宣称: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均由张溥一人定夺。又说:“中式者皆复社之人。”于是人人争入复社,以为角逐势利之所。俊秀之才虽入网罗,躁进奸徒亦多窜迹其中,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联合知识界,把持科场,进而操纵朝政。由此引起了贵族大地主的极端仇视。虎丘大会过后不久,周延儒被罢,复社的政敌温体仁为内阁首辅。他利用各种机会,罗织罪状,指使他人诬陷两张“悖违祖制”。说:“风俗之弊,皆源于士子。溥、采二人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明史》卷288)崇祯十年(1637)六月温体仁去位,张至发、薛国观相继为内阁首辅,皆效法温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暗中使人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两张组织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至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张溥已病死,他们还上疏说张溥“遥握朝柄”,张采“结党乱政”。欲置复社于死地。

清兵入关以后,张采惨遭宿怨迫害,避乱身亡。复社广大社众奋起“抗清复明”,组织义军,复国保民。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以及陈子龙等200余名骨干分子,不惜为恢复明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顺治九年(1652),复社为清政府所取缔。在明末政治舞台上活跃一时的地主阶级“在野政党”,至此正式消亡。

复社和东林,都是中小地主阶层知识分子松散的政治联盟。他们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但思想上十分幼稚,把封建君主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混为一谈,不可能真正提出和实践救国救民的主张。阶级的局限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结成同盟。失败是必然的。但在另一方面,东林和复社,虽然未能改变贵族大地主的专制统治,扭转中国封建政治的历史进程,更没有使人们看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曙光。但如果把当时贵族大地主的僵死政治比喻为一潭死水,那以它们的出现无疑就像是猛力投进池中的一块石头,从而溅起几串洁白的水花,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社会的进步,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的出现,二百多年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清王朝而提出的“反满”思想,应该说和东林、复社仁人志士的政治思想,有着不能分割的内在联系。